

# 喀琅施塔得：1921

## Kronstadt, 1921

【美】保罗·阿夫里奇 著

十二春译



PRINCETON LEGACY LIBRARY

# 喀琅施塔得：1921

保罗·阿夫里奇 著

十二春 译

***KRONSTADT***

***1921***

***PAUL AVRIC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 目录

致谢 1

引言 3

第一章 战时共产主义的危机 7

第二章 彼得格勒与喀琅施塔得 34

第三章 喀琅施塔得与俄国流亡者 86

第四章 首次进攻 133

第五章 喀琅施塔得纲领 160

第六章 镇压 197

第七章 结语 223

## **附录 A**

**关于组织喀琅施塔得起义事宜的备忘录 238**

## **附录 B**

**我们为何而战 244**

## **附录 C**

**引号里的社会主义 238**

**注释性参考文献 251**

**当代报刊与期刊 279**

## 致谢

我十分荣幸，谨向在本书撰写过程中给予我诸多帮助的众多同事与友人致以谢意。

我尤其要感谢三位杰出的学者与师长——杰罗德·T·罗宾逊教授、亨利·L·罗伯茨教授与迈克尔·T·弗洛林斯基教授，他们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指导了我对俄国史的研究。我同样感谢马克斯·诺马德与洛伦·格雷厄姆教授，他们通读了全部手稿，并提出了极具价值的意见与批评。玛丽娜·廷科夫、克塞尼亚·J·尤丁、安娜·M·布尔吉娜、N·日古列夫、彼得·塞奇威克、爱德华·韦伯、亚历克西斯·斯特鲁夫以及埃诺·尼万卡均热心回应了我的问询，并提出了诸多有益建议。我感激菲利普·E·莫斯利教授准许我查阅哥伦比亚大学俄国与东欧历史文化档案，也感谢该馆馆长L·F·马格罗夫斯基在我查找相关文献时提供的协助。我还要向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胡佛研究所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国会图书馆以及国家档案馆的全体工作人员致谢，感谢他们在我搜集资料时给予的周到帮助。尽管本书参考了大量文献，但我尤其要感谢艾达·梅特与乔治·卡特科夫的开创性研究，相关成果已列入

参考文献。毋庸赘言，本书的一切责任均由我本人承担。

我深切感谢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我以资深研究员身份供职于此——尤其要感谢所长马歇尔·舒尔曼教授，他给予了我热情的款待与鼓励。我同样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美国哲学学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他们资助了我关于俄国无政府主义与民众起义的研究，本书正是这项研究的副产品。

## 引言

列宁在评价喀琅施塔得起义时曾说：“这道闪光，比任何东西都更清晰地照亮了现实。”<sup>1</sup>1921年3月，这座芬兰湾海军要塞的水兵们——曾被誉为俄国革命“光荣与骄傲”的力量——发动了反抗布尔什维克政府的起义，而正是他们曾亲手将这个政权推上权力舞台。在“自由苏维埃”的口号下，起义者建立了革命公社，坚持了16天，直到政府军踏冰而来将其镇压。一场漫长而惨烈的战斗过后，双方均伤亡惨重，起义最终被平定。

这场起义立刻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且从未真正平息。水兵们为何起义？在布尔什维克看来，他们是白卫军阴谋的代理人，这一阴谋由流亡西方的俄国侨民及其协约国支持者在境外策划。然而在同情者眼中，他们是为恢复苏维埃理想、反抗布尔什维克独裁而战的革命烈士。在他们看来，镇压起义是一场暴行，击碎了苏维埃俄国是“工农国家”的神话。事件之后，一批外国共产党人开始质疑自己对这个政权的信仰——它竟能如此残酷地对待真正的民众抗议。从这一意义上说，喀琅施塔得事件成为后来一系列事件的原型：那些理想破灭的激进分子最终与运

---

<sup>1</sup> 弗·伊·列宁，《列宁全集》，第5版，第55卷，莫斯科，1958-1965年，第41卷，第138页。

动决裂，去追寻他们最初纯粹的理想。富农清算、大清洗、《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每一次都造成大批党员与支持者出走，他们确信革命已遭背叛。路易斯·费舍尔 1949 年写道：“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喀琅施塔得时刻’。在它到来之前，一个人或许在情感上动摇、理智上怀疑，甚至在心里完全否定这一事业，却仍不愿公开抨击它。多年以来，我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喀琅施塔得’。”<sup>2</sup>

还有人直到更晚才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喀琅施塔得”——那便是 1956 年匈牙利起义。因为在布达佩斯，一如在喀琅施塔得，起义者都试图将威权主义的官僚体制，改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然而在布尔什维克看来，这种异端倾向，比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原则本身更具威胁。匈牙利事件，以及后来 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其危险之处并不在于它是反革命，而在于它同喀琅施塔得一样，对革命与社会主义的理解，与苏联领导层存在尖锐分歧。可莫斯科方面却一如 1921 年，将起义斥责为反革命阴谋，并随即予以镇压。一位苏联政策的批评者指出，布达佩斯起义的被镇压，再次表明共产党人会不择手段，消灭一切挑战其权威的力量。<sup>3</sup>

不过，这类类比不宜过度引申。相隔 35 年、发生在不同国

---

<sup>2</sup> 理查德·克罗斯曼 编：《失败的上帝》，纽约，1950 年，第 207 页。

<sup>3</sup> 伊曼纽尔·波拉克：《喀琅施塔得起义》，纽约，1959 年，引言。参阅安杰莉卡·巴拉巴诺夫：《列宁印象记》，安阿伯，1964 年，第 58—59 页。

家、参与者全然不同的事件，至多只存在表面上的相似。1921年的苏俄，还不是后来数十年间那般庞大集权的利维坦。它是一个年轻且根基不稳的国家，国内面临民众的反抗，国外则有不共戴天的敌人，一心盼着将布尔什维克赶下台。更重要的是，喀琅施塔得地处俄国本土：布尔什维克面对的，是自家海军在扼守彼得格勒西线入口的核心战略前哨发生兵变。他们担忧，喀琅施塔得会点燃整个俄国腹地的反抗之火，或是成为新一轮反苏武装干涉的跳板。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俄国流亡者正试图策应这场暴动，并从中谋取私利。这并非说白军的活动，可以为布尔什维克针对水兵犯下的任何暴行开脱。但这些情况，确实让政府急于镇压起义的心态，变得更易理解。再过数周，芬兰湾的冰层便会融化，西方势力便可向此地运送物资与援军，将这座要塞打造成新一轮武装干涉的基地。抛开宣传层面不谈，列宁与托洛茨基对这一可能性，显然是发自内心地感到焦虑。

遗憾的是，西方鲜有历史学家对这些焦虑予以足够重视。而苏联方面的作者则严重歪曲事实，将起义者描绘成受白军阴谋蒙蔽的傀儡或代理人。本书试图以更贴近史实的视角重新审视这场起义。为此，必须将喀琅施塔得事件置于更广阔的政治与社会事件背景之中——这场起义是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期间重大危机的组成部分，列宁将此次危机视作他掌权以来所面临的最严峻考验。此外，还需将此次起义与喀琅施塔得本地乃至全俄长期存在的自发反抗传统联系起来。人们希望，这样的研究路径能够为解读起义者的心态与行为提供有益的启

发。

除此之外，还有若干具体问题需要细致分析，其中较为重要的包括：舰队的社会构成、民族不满情绪所起的作用、白军的参与程度，以及起义者意识形态的本质。当然，其中部分问题在苏联相关档案对外开放之前，无法得出确切结论，而档案开放短期内尚难实现。在此之前，本书将在现有资料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完整地还原这场起义。本书利用了西方档案馆中的一批相关文献，也参考了苏联公开出版的资料——这类资料虽常被单纯视作宣传品，但只要审慎使用，对于厘清若干关键问题仍具有真实价值。

最为重要的，是厘清起义者与其布尔什维克对手之间相互冲突的动机。一方面，水兵们是狂热的革命者，与历史上所有的理想主义者一样，他们渴望重回理想的纯粹性尚未被权力现实所玷污的年代。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在血腥的内战中取得胜利后，绝不允许自身权威遭遇任何新的挑战。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双方均依照各自的目标与诉求行事。这样说并非否定道德评判的必要性。但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历史学家既可以同情起义者，同时也能承认布尔什维克的镇压具备合理性。事实上，唯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全部悲剧性。

# 第一章

## 战时共产主义的危机

1920年秋，苏俄进入了由战争向和平过渡的动荡时期。六年多来，国家始终处于持续的动荡之中，而如今，历经世界大战、革命与内战的洗礼，硝烟终于渐渐散去。10月12日，苏维埃政府与波兰签署停战协定。三周后，白军最后一位将领彼得·弗兰格尔男爵被赶入黑海，内战就此宣告胜利，尽管国家已满目疮痍、元气大伤。在南方，无政府主义游击队领袖内斯特·马赫诺仍在逃，但到1920年11月，他那支曾一度势不可挡的部队已被击溃，不再对莫斯科政府构成威胁。西伯利亚、乌克兰、土库曼斯坦，连同顿巴斯煤田与巴库油田，均已收复；1921年2月，布尔什维克军队攻克第比利斯，推翻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政府，完成了对高加索地区的再度征服。至此，在历经三年朝不保夕、命悬一线的艰难存续后，苏维埃政权终于得以有效控制俄罗斯广袤疆域的绝大部分地区。

内战的结束，开启了苏俄与外国关系的新纪元。布尔什维克暂时搁置了世界革命即将爆发的期望，力求争取1918年内战

爆发后便与他们失之交臂的“喘息时机”。同样，西方列强对列宁政府即将垮台的预期也已消散。双方都渴望建立更为正常的关系，到1920年末，这一愿望本已具备实现的条件：协约国封锁解除，对欧俄的武装干涉终止，阻碍外交承认与贸易恢复的最大障碍已然消除。此外，这一年间，苏俄还与波罗的海沿岸邻国——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正式缔结了和平条约；1921年2月，苏俄又与波斯、阿富汗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与土耳其的同类协定也即将达成。与此同时，苏维埃使节——尤其是驻伦敦的克拉辛与驻罗马的沃罗夫斯基——正与多个欧洲国家商谈贸易协定，前景一片光明。

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积极进展，1920—1921年的冬天仍是苏维埃历史上极为严峻的时期。列宁在1920年12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便承认了这一点，他指出，要顺利过渡到和平的经济与社会重建并非易事。<sup>4</sup>军事斗争已然取胜，外部局势也在迅速好转，但布尔什维克却面临着严峻的内部困境。俄国国力耗尽、经济崩溃，战争的创伤遍布国家的每一个角落。过去两年间，人口死亡率急剧攀升，除了数百万战死沙场的军民，还有数百万民众死于饥荒与瘟疫。自17世纪俄国混乱时期以来，这片土地从未经历过如此深重的苦难与破败。农业产量大幅锐减，工业与交通系统彻底瘫痪。用当时一位学者的话说，俄国在内战结束后，陷入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

---

<sup>4</sup> 全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与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20年12月22—29日），莫斯科，1921年，第16页。

的经济崩溃状态。<sup>5</sup>

是时候医治国家的创伤了，为此必须调整国内政策，以匹配外交领域已然出现的缓和态势。而这首先意味着，要放弃战时共产主义——这套为应对内战紧急状态而仓促出台的政策体系。顾名思义，战时共产主义带有鲜明的强制管控与集中统制烙印。受物资匮乏与军事需求所迫，它将社会生活各领域的行政管控推向了极致的中央集权。其核心支柱，便是向农民强制征粮。武装征粮队被派往乡村，收缴余粮以供养城市与规模达五百万之众的红军。尽管上级要求为农民留下足够的口粮，但征粮队常常以枪口相逼，连农民的糊口粮、来年的播种粮都一并掠走。列宁本人也坦言：“‘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质，就是我们实际上拿走了农民的全部余粮，有时甚至不只是余粮，还拿走了农民维持生计所需的部分口粮。我们征走这些粮食，是为了保障军队供给，维持工人的生存。”<sup>6</sup>除粮食与蔬菜外，征粮队还会没收马匹、饲料、马车及其他军用物资，且往往分文不付。这使得村民连糖、盐、煤油这类基本物资都无从获取，更不必说肥皂、靴子、火柴、烟草，或是生产修缮必需的铁钉与废铁。

毫无疑问，强制征粮制（俄语称余粮收集制，*prodrazverstka*）使布尔什维克政权免于覆灭；倘若没有这一政策，作为政权核心支撑力量的军队与城市人口都将无法维系

---

<sup>5</sup> Л.Н. 克里茨曼：《伟大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第2版，莫斯科，1926年，第166页。

<sup>6</sup> 列宁：《列宁全集》（俄文版全编），第43卷，第219页

生存。但为此付出的必然代价，是与农民阶层的离心离德。农民在枪口威逼下交出余粮，却无法换取自身急需的消费品作为补偿，村民的反应也在意料之中：征粮队即便没有遭遇公开抵抗，也会被农民用尽一切机智想出的规避手段所阻挠。1920年，据一位权威学者估算，超过三分之一的粮食总产量被成功藏匿，未被政府征粮队收缴。<sup>7</sup>此外，农民开始仅耕种满足自身直接需求的土地，截至1920年末，欧俄地区的播种面积仅为1913年的五分之三——1913年是战争与革命爆发前最后一个正常年份。<sup>8</sup>当然，播种面积的缩减很大程度上源于俄国农村遭受的战争破坏，但余粮收集制无疑也加剧了国内战争时期农业生产的灾难性滑坡。到1921年，粮食总产量降至战前水平的一半以下，牲畜数量仅为战前的三分之二左右。亚麻、甜菜等基础经济作物受创尤为严重，产量跌至正常水平的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之间。<sup>9</sup>

与此同时，强制征粮重新点燃了俄国由来已久的农村人口与以城市为根基的国家政权之间的对立。列宁早就认识到，鉴于俄国落后的经济与社会状况，其政党若要夺取并随后巩固政权，就必须与农民结成策略性同盟。布尔什维克至少也必须使农民保持中立。正是出于这一主要动机，1917年12月布尔什

---

<sup>7</sup> 克里茨曼：《伟大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第135—139页

<sup>8</sup> A.S.普霍夫：《1921年喀琅施塔得起义》，列宁格勒，1931年，第8页

<sup>9</sup> 参见克里茨曼：《伟大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第153—161页

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同样的考虑或许也影响了M. И. 加里宁的人选——他是少数出身农民且广为人知的布尔什维克重要人物之一——被选为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但争取农民支持的核心手段，是实现他们长久以来的梦想：“黑分”（chernyi peredel），即全面重新分配土地。1917年10月26日与1918年2月19日颁布的布尔什维克土地法令，与农民阶层的民粹主义与平均主义诉求高度契合。年轻的苏维埃政府借用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该党的理论正是为迎合农民愿望而量身定制——废除了一切土地私有制，并下令土地在亲自耕种、不使用雇佣劳动的劳动者之间平均分配。<sup>10</sup>这两项法令为1917年夏天村民早已自行启动的进程注入了新动力；到1920年，土地已被分割为超过2000万个由个体家庭经营的小块份地。

难怪农村居民对布尔什维克这些初期举措欢欣鼓舞，只是出于对国家颁布的官方法令一贯的警惕，这份喜悦才有所收敛。对农民而言，布尔什维克革命首要的意义，便是满足了他们对土地的渴求、消灭了贵族阶层，而此刻他们只求能安享太平。农民固守在自己新分得的土地上，对一切外来干预都抱有戒备。而这样的干预很快便接踵而至。随着国内战争愈演愈烈，征粮队开赴农村，农民开始将布尔什维克视作敌人，而非朋友与恩人。他们抱怨道，列宁及其政党赶走了地主、把土地分给人民，

---

<sup>10</sup> 参见E. H. 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共3卷，纽约，1951—1953年，第2卷，第39—46页。

到头来却要夺走他们的粮食，剥夺他们自主处置土地的自由。此外，农民还对国内战争期间当局在部分大型贵族庄园上建立的国营农场心怀不满。在农民看来，真正的“黑分”（chernyi peredel），是将所有土地全部分给民众；这也意味着废除国营农场所延续的“雇佣奴隶制”。正如列宁本人所言：“农民会想：若是出现大农场，那我就又成了雇农。”<sup>11</sup>

这些政策导致不少农民开始认为，布尔什维克与共产党人是两拨人。他们将土地这一珍贵馈赠归功于前者，却痛斥后者——尤其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出身“非本土”且人尽皆知的共产党领袖——对他们施加了新的奴役形式，此番奴役他们的不再是贵族，而是国家。“我们是布尔什维克，不是共产党人。我们拥护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赶走了地主；但我们不拥护共产党人，因为他们反对个体土地所有制。”<sup>12</sup>这便是列宁对 1921 年农民态度的描述。一年后，斯摩棱斯克省的一份警方报告显示，农民的心态几乎没有改变：“农民对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人的抱怨无休无止。就连中农和贫农的交谈中，更不必说富农，都能听到这样的话：‘他们根本没打算给我们自由，而是要把我们推向农奴制。戈杜诺夫时代已经来临，那时农民依附于地主；如今我们则依附于莫德科夫斯基、阿伦森之流的犹太资产阶

---

<sup>11</sup> 列宁：《列宁全集》（俄文版全编），第 38 卷，第 200 页。

<sup>12</sup> 同上，第 44 卷，第 43 页。布尔什维克于 1918 年 3 月正式更名为共产党。

级。”<sup>13</sup>

然而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绝大多数农民依旧容忍苏维埃政权，将其视作比白军复辟更可接受的选择。无论他们对执政党多么反感，都更加惧怕贵族卷土重来、失去已分到的土地。诚然，征粮队在乡村时常遭遇抵抗，不少布尔什维克成员因此丧生，但农民始终未发动足以威胁政府存续的大规模武装反抗。但随着1920年秋弗兰格尔军队被击败，局势迅速剧变。白军的威胁已然消散，农民对余粮收集制和国营农场的的不满彻底失控，农民起义的浪潮席卷了俄国农村。最严重的暴动爆发在坦波夫省、伏尔加河中游、乌克兰、北高加索和西西伯利亚——这些边缘地区政府控制力相对薄弱，民众暴力反抗也有着悠久的历史。<sup>14</sup>

1920至1921年的整个冬天，各地起义的声势迅速壮大。列宁曾指出，在此期间，“数以万计、十万计的复员士兵”返回故乡村庄，壮大了游击武装的队伍。<sup>15</sup>到1921年初，约250万军人——几乎占红军总兵力的一半——在暴力与社会动荡的氛围中被复员，这种局势已然威胁到国家的根基。这一情形在第

---

<sup>13</sup> 梅尔·芬索德：《苏维埃统治下的斯摩棱斯克》，马萨诸塞州剑桥市，1958年，第43页。

<sup>14</sup> 伊·亚·特里福诺夫：《苏联新经济政策初期的阶级与阶级斗争（1921—1923）》，第1卷：《同武装的富农反革命作斗争》，列宁格勒，1964年，书中对苏俄各地农民起义做了详细考察。

<sup>15</sup>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莫斯科，1963年，第23页。

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欧洲其他地区并不陌生，彼时大规模的军队复员加剧了本已严峻的经济紧张局势，激化了民众的不满。但俄国的局势尤为严峻。近七年的战争、革命与社会动乱，催生了难以根除的无序状态。流离失所的民众尚未安定下来，而正如列宁所言，此次复员又释放出大批无所适从的人员，他们唯一熟悉的行当便是作战，自然将精力转向盗匪活动与武装反抗。对列宁而言，这一局势无异于国内战争的死灰复燃，只是形式更为凶险。在他看来，其危险性在于，发动反抗的并非已是历史淘汰的没落社会势力，而是普通民众本身。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即普希金笔下“盲目而残酷”的新普加乔夫起义，其幽灵开始萦绕在苏维埃政权上空——而恰在此时，作为布尔什维克传统支撑力量的城市，已然凋敝衰弱，自身也深陷剧烈的动荡之中。

1920年11月至1921年3月间，农村暴动的数量急剧攀升。仅在1921年2月，也就是喀琅施塔得起义前夕，契卡便报告全国发生了118起各自独立的农民暴动。<sup>16</sup>在西西伯利亚，起义浪潮几乎席卷了整个秋明地区，以及邻近的车里雅宾斯克、奥伦堡和鄂木斯克三省的大片区域。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交通遭到严重破坏，进一步加剧了欧俄各大城市本已严峻的粮食短缺。在伏尔加河中游——这片斯捷潘·拉辛与普加乔夫曾获得最广泛拥护的土地——武装劫掠团伙（农民、退伍军人、逃兵）在

---

<sup>16</sup> 塞思·辛格尔顿：《坦波夫起义（1920—1921）》，《斯拉夫评论》，1966年9月，第25卷，第499页。

乡间游荡，搜寻粮食并大肆劫掠。盗匪行径与社会起义之间仅一线之隔。走投无路的民众在各地伏击征粮队，以拼死的决心对抗一切敢于干涉他们的势力。最为激烈的斗争或许发生在黑土区的坦波夫省，这里自17世纪起便是农民起义的温床。起义由前社会革命党人A. C. 安东诺夫领导，他作为游击战士的才干与“罗宾汉”式的声望，足以与内斯托尔·马赫诺比肩。这场暴动失控肆虐了一年多，直到刚镇压完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的红军能干将领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率大军前来，才将其平定。

17

1920至1921年冬，除农民起义频发之外，投身反抗队伍的人数之多同样令人震惊。安东诺夫领导的运动在鼎盛时期约有5万名起义者；而据可信度较高的资料显示，仅西西伯利亚的一个地区，游击队员数量就多达6万人。<sup>18</sup>普通农民手持斧头、棍棒、干草叉，仅有零星步枪与手枪，却同正规军展开激战。他们拼死抗争的勇气，致使政府军士兵大批倒戈——这些士兵大多与农民有着相同的社会背景与立场——最终不得不调派忠诚度毋庸置疑的契卡特工部队与共产党军官学员前往镇压。分散的农民武装缺乏新式武器与有效组织，最终根本不是经验丰富的红军部队的对手。此外，起义者并无统一纲领，但各地

---

<sup>17</sup> 参见同上，第497—512页；以及《安东诺夫叛乱，坦波夫，1923年》。

<sup>18</sup> 特里福诺夫：《苏联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第1卷，第4—5页；尤·亚·波利亚科夫：《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与苏维埃农民》，莫斯科，1967年，第205—206页。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馆藏有一批与1920—1921年这些农民起义相关的文献。

口号却如出一辙：“打倒余粮收集制”“取缔征粮队”“拒不交出余粮”“打倒共产党人与犹太人”。除此之外，他们普遍仇视派出政委与征粮队的城市，以及将这些闯入者派往乡村的政府。一位派驻坦波夫省的布尔什维克军事指挥官记载，当地民众将苏维埃政权视为“劫掠成性的政委与官员”的始作俑者，是脱离人民生活的专制势力。因此，坦波夫的一支起义武装将首要目标定为“推翻将国家推向贫困、死亡与耻辱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统治”，也就不足为奇了。<sup>19</sup>

尽管武装抵抗与规避粮食征收是农民最有力的武器，但他们还动用了另一种传统抗议方式：向中央政府呈上请愿书。1920年11月至1921年3月间，莫斯科当局收到来自全国各地铺天盖地的紧急诉求，要求终止战时共产主义的强制政策。请愿者认为，既然白军已被击败，强制征粮便失去了正当性。农民要求以固定粮食税取代强制征粮，并拥有自由处置余粮的权利；同时为激励生产，他们还要求增加向农村供应的消费品。

20

然而，这些基层请愿在苏维埃行政圈子里鲜有同情之声。在当局眼中，个体小农普遍被视为无可救药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一旦获得土地，便不再支持革命。布尔什维克最担心的，

---

<sup>19</sup> 辛格尔顿：《坦波夫起义》，《斯拉夫评论》，第25卷，第500页；《坦波夫农民为自由而战》，出版地不详，1921年，第12—13页。

<sup>20</sup> 波利亚科夫：《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第213页及以下。

莫过于资本主义在俄国农村扎下根来。他们时刻不忘历史的前车之鉴，回想起 1848 年西欧农民曾充当反动势力的堡垒，因此不愿做出任何可能增强本国独立个体农民力量的让步。此外，在不少布尔什维克看来，实行国家集中经济管控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具备他们理想中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因而不愿放弃这套体制，转而恢复自由市场、让农民阶层重新站稳脚跟。

瓦列里安·奥辛斯基（本名奥博连斯基）是这一观点的有力倡导者，他是共产党内左翼民主集中派的领袖。1920 年下半年，奥辛斯基在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文章中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他拒绝向实物税后退，也反对恢复自由贸易，主张国家对农业生活的干预只应加强、不应削弱。他写道，解决农民农业危机的唯一出路，是在政府官员的指导与控制下，实行“强制性的大规模生产组织”。<sup>21</sup>为此，他提议在各地成立“播种委员会”，首要任务是扩大耕地面积以提高产量。新的委员会还将管控农具使用、播种方式、牲畜饲养及其他影响生产效率的事务。奥辛斯基进一步建议，要求农民将种子集中存入公共种子库，由政府决定发放。他的最终构想是建立社会化农业体系：所有小块土地实现集体化，农业劳动统一进行。

奥辛斯基的提议所暗示的，不仅是保留战时共产主义，更是要将其强化到农村生活的几乎每一个环节。他的方案非但没有安抚农民，反而给了他们新的恐慌理由，而农民也很快发出

---

<sup>21</sup> 恩·奥辛斯基：《国家对农民经济的调节》，莫斯科，1920 年，第 8—9 页。

了自己的声音。1920年12月底，第八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反对的契机随之到来。奥辛斯基的方案占据了会议讨论的中心位置。尽管共产党代表占多数，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该计划，但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发出了明确的反对声——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出现在此类全国性会议中。孟什维克方面的费奥多尔·丹、大卫·达林，以及右翼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弗·克·沃尔斯基、伊·尼·施泰因贝格，一致谴责战时共产主义这些“已破产”的政策。他们要求立即用固定实物税取代粮食征集制，并允许农民在完成对国家的义务后，自由交易剩余产品。丹指出，任何建立在强制之上的做法，只会加速播种面积下降，进一步削减急需的粮食产量；继续使用暴力只会扩大城乡鸿沟，把农民推向反革命一边。沃尔斯基也以同样的思路敦促政府：鼓励自愿合作社，废除农民强烈反对的国营农场。达林则针对奥辛斯基提出的播种委员会警告说：任何新的强制工具，都只会加剧现存危机。<sup>22</sup>

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农民代表闭门会议上，农民们亲自对政府的农业政策提出了进一步抗议。列宁亲自出席了会议，他转交给党中央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的会议笔记极具史料价值。列宁的笔记显示，对奥辛斯基方案的反对是一致且毫不留情的。一位来自西伯利亚的农民——彼时该地区已深陷农民起义的浪潮之中——带着毫不掩饰的鄙夷，谴责了设立播种委员会、加

---

<sup>22</sup>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第37—43、50—57、122—123、200—201页。

强国家对乡村事务干预的主张：“奥辛斯基根本不了解西伯利亚。我在那里耕了三十八年的地，可奥辛斯基什么都不懂。”其他代表猛烈抨击政府推行农业集体化的举措，但他们最激烈的怒火，直指武装征粮队的粮食没收行为。这些队伍为完成任意摊派的征粮指标，不分懒惰与勤劳的农民，一律强征。一位代表说，粮食被搜刮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人和牲畜都无粮可吃。一位图拉省的农民抗议道，由于过度征粮，俄中部十个黑土省份（包括他的家乡）连来年播种的种子都所剩无几。一位彼尔姆代表称，若想提高粮食产量，就必须让农民摆脱强制征粮这条“鞭子”。

发言者们纷纷抗议，他们交出的农产品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如果你们想让我们把所有土地都种上，”一位明斯克省的农民说，“就给我们盐和铁。别的我不多说。”众人纷纷附和：我们需要马匹、车轮、耙。给我们金属来修理农具和棚屋，要么就给我们有实际价值的硬通货，好付给铁匠和木匠。一位科斯特罗马省的代表说出了全体农民的心声：“必须给农民激励，否则他们不会好好种地。鞭子底下可以锯木头，可鞭子底下种不了地。”“怎么给激励？”一位诺夫哥罗德农民问道，“很简单：粮食和牲畜都按固定比例征粮。”<sup>23</sup>

列宁本人绝非对农民的处境无动于衷。例如，当他得知某一地区的农民遭到过度征粮、连种子粮都被夺走时，他曾亲自

---

<sup>23</sup> 列宁：《列宁全集》（俄文版全编），第42卷，第382—386页。

出面为他们干预。<sup>24</sup>早在 1920 年 11 月，他就已经开始考虑“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的可能性，<sup>25</sup>而这正是农民们自己所要求的。但至少在当时，他认为这一步骤还为时过早，因而予以否决。他在第八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表示，国内战争卷土重来的危险尚未完全消除。与波兰的正式和约尚未缔结；由法国提供补给的弗兰格尔军队，仍在邻近的土耳其虎视眈眈，伺机发动进攻。显而易见，向新的和平时期经济纲领过渡，绝不能过于仓促。<sup>26</sup>在此之前，列宁曾用一则俄罗斯寓言说明这一点。1920 年 10 月，在莫斯科省农民代表会议上讲话时，他承认（引来台下一片赞同声），农民正承受着沉重的赋税负担，这一负担已造成城乡之间、工人与农民之间的严重裂痕。但列宁问道，如果公羊和山羊——这里指无产阶级和农民——互相争斗，难道就该让反革命这只豺狼把它们一并吞掉吗？<sup>27</sup>

尽管疑虑日益加深，列宁仍坚持推行战时共产主义的旧政策。1920 年 12 月，在第八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正式批准了奥辛斯基关于建立公共种子库与开展来年春季播种运动的方案。大会随即通过决议，要求在农业人民委员部统一指导下实施“全国强制播种计划”。各省、县、乡均需成立播种委员会，

---

<sup>24</sup> 同上，第 51 卷，第 313 页。

<sup>25</sup> 同上，第 42 卷，第 51 页。

<sup>26</sup>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第 10 页及以下。

<sup>27</sup>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第 268 页。

负责调配一切可动用人力与设备，以扩大耕地面积。<sup>28</sup>但至少在当时，列宁认为进一步推行农业集体化尚不具备可行性。他不再相信社会主义能在短期内实现。他在第八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指出，俄国依旧是一个小农国家，而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把他们当作社会主义者，无异于将俄国的未来建立在流沙之上。尽管莫斯科著名的黑市苏哈列夫卡市场已被关闭，但其精神仍活在每一个小私有者心中。“只要我们生活在小农国家里，”列宁说，“俄国的资本主义就会比共产主义拥有更稳固的经济基础。”但他补充道，如果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注定漫长而艰难，那就更没有理由在农村的资本主义势力面前退缩。因此，强制而非让步，依旧是布尔什维克农业政策的核心准则。

29

作为布尔什维克传统主要支撑的城市，其局势在许多方面比农村更为严峻。六年的动荡彻底摧毁了国家的工业经济。尽管公布的统计数据在诸多细节上存在差异，但呈现出的图景近乎全面崩溃。<sup>30</sup>到1920年底，工业总产量已缩减至1913年水平的约五分之一。燃料与原材料供应陷入极度危急的状态。尽管巴库油田与顿涅茨煤田已于1920年春、秋相继收复，但破

---

<sup>28</sup> 同上，第30页。

<sup>29</sup> 同上。

<sup>30</sup> 《五年总结（1917—1922）》，俄共（布）中央汇编，莫斯科，1922年，第408页；克里茨曼：《伟大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第163—164页。参看纳·亚·科尔纳托夫斯基编《喀琅施塔得起义：论文、回忆录与文献集》，列宁格勒，1931年，第8—9页；以及《国内战争（1918—1921）》，3卷本，莫斯科，1928—1930年，第1卷，第361页。

坏范围极广，修复难度极大。许多矿井被淹，大批企业遭到摧毁。1920年末，俄国煤炭总产量仅为战前的四分之一，石油仅为三分之一。更糟糕的是，生铁产量降至1913年水平的不足3%，铜的生产则几乎完全停滞。由于缺乏这些基础原料，全国主要工业中心被迫大幅减产。许多大型工厂只能断断续续开工，工人数量缩减至四五年前的零头。部分重要的重工业部门完全陷入停滞。消费品企业的总产量降至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一以下，鞋类产量降至正常水平的十分之一，纺织纱锭仅有二十分之一仍在运转。

使这场灾难雪上加霜的还有两个额外因素：协约国封锁带来的扼制性影响，以及全国运输系统的崩溃。1918年《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实施的封锁，最终于1920年解除，但对外贸易直到次年才得以恢复，且规模极小。其结果是，苏维埃俄国失去了急需的技术设备、机械和原材料，这些物资的匮乏使得工业体系无法迅速复苏。与此同时，交通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国内大片地区的铁路线被撤退的军队拆毁，桥梁被炸毁。托洛茨基在向第八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汇报交通状况时指出，俄国超过半数的机车处于失修状态；新机车的产量已降至1913年水平的15%<sup>31</sup>。常规燃料的供应极不稳定，铁路工人被迫改用木材驱动火车，这进一步增加了故障发生率。几乎所有地区

---

<sup>31</sup>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第160页；《五年总结（1917—1922）》，第408页。总计有3762座铁路桥梁、3597座公路桥梁被毁，约1200英里铁路与6万英里电报线被毁；埃里希·沃伦贝格：《红军》，伦敦，1938年，第110页。

的交通都严重受损，部分地区甚至彻底陷入瘫痪。

铁路系统的瘫痪阻碍了粮食向饥饿城市的运送。食品极度匮乏，工人与其他城市居民只能领到勉强维生的口粮。手头仅有的少量粮食按照优先配给制分配，该制度最初旨在优待军工行业工人，即便内战结束后仍被保留。因此，1921年初，彼得格勒冶金车间与高炉（高温车间）的工人每日可领到 800 克黑面包，突击工人为 600 克，其他等级的工人仅能领到 400 克甚至 200 克<sup>32</sup>。但即便如此微薄的配给，发放也毫无规律。据称，交通工人的日均饮食热量仅 700 至 1000 卡路里<sup>33</sup>，这一数值远低于维持全天劳动所需的最低热量。

内战期间正规市场的瓦解，使城市的粮食危机变得愈发复杂。在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下，一切私人贸易均被取缔，城乡之间正常的商品交换几乎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黑市迅速应运而生。大批背袋贩子穿梭于各个村庄，收购面包与蔬菜，再将其卖给或物物交换给饥饿的城市居民。到 1920 年底，非法贸易的规模已极为庞大，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官方的分配渠道。与此同时，通货膨胀飙升至惊人的程度，仅 1920 年一年，面包价格就上涨了十倍以上<sup>34</sup>。苏维埃政府为弥补自身开支，疯狂开动印钞机，此举导致 1917 年价值 7 卢布 85 戈比纸币的 1

---

<sup>32</sup> 拉扎列维奇：《喀琅施塔得起义》，《斗争》，1921 年第 1—2 期，第 3—5 页。

<sup>33</sup> 普霍夫：《1921 年喀琅施塔得起义》，第 23 页。

<sup>34</sup> 亚·斯列普科夫：《喀琅施塔得起义》，莫斯科，1928 年，第 13 页。

金卢布，三年后至少需要 10000 卢布纸币才能兑换<sup>35</sup>。据官方统计，截至 1920 年底，彼得格勒工厂工人的实际工资已降至战前水平的 8.6%<sup>36</sup>。随着货币不断贬值，越来越多的工资以实物形式发放给工人。粮食配给额成为工人工资的核心部分，除此之外，他们还能从政府领取鞋服，有时能分到一部分产品，这些产品通常会被用来换取食物。

即便如此，产业工人也极少能为自己和家人果腹，他们加入了大批逃离城市、涌向农村觅食的市民行列。1917 年 10 月至 1920 年 8 月（新一轮人口普查开展时），彼得格勒人口从近 250 万锐减至约 75 万，降幅接近三分之二。同一时期，莫斯科人口减少近一半，全俄城市总人口下降约三分之一。这些流亡者中有很大大一部分是产业工人，他们返回故乡村庄，重新过上了农民生活。例如，1920 年 8 月，彼得格勒只剩下三年前近 30 万产业工人中的三分之一，全俄工人总数的降幅超过 50%。<sup>37</sup>当然，这一剧烈的人口流失部分源于前线的高死亡率，部分源于大量人员返乡参与分地；工业瘫痪、燃料与衣物短缺也加剧了这场外流。但绝大多数人出走的目的是寻找食物，尤其是在 1919 至 1920 年，城市粮食供应已逼近饥荒线。

---

<sup>35</sup> 普霍夫：《1921 年喀琅施塔得起义》，第 11 页。

<sup>36</sup> 同上，第 23 页；拉扎列维奇：《喀琅施塔得起义》，《斗争》，1921 年第 1—2 期，第 3—5 页。

<sup>37</sup> 以上统计数据引自《红色报》，1921 年 2 月 9 日；克里茨曼：《伟大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第 52 页；普霍夫：《1921 年喀琅施塔得起义》，第 19 页。

即便选择留在城市的工人，也有许多重新与乡村恢复联系，定期返乡获取食物，或在生病、农忙收割时回到农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意识形态纲领，此时的俄国本应朝着日益城市化、工业化的方向发展。可事实恰恰相反，受土地分配与内战的影响，俄国在很大程度上倒退回了刚刚摆脱的原始农业社会。对于以产业无产阶级名义执政的苏维埃政府而言，这一局势暗藏巨大危险。人口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不仅削弱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社会基础，农民与工人的重新接触也进一步激化了本已尖锐的社会矛盾。返乡的城市工人亲眼目睹了战时共产主义在农村造成的后果，农民的不满在他们中间引发了强烈共鸣。不满情绪迅速从农民、工人蔓延至陆海军中的普通士兵与水兵。最终，农村骚乱、工人抗议与军队动荡的浪潮愈演愈烈，在 1921 年 3 月的喀琅施塔得事件中达到了爆发性顶点。

与此同时，城镇的状况仍在持续恶化。到 1921 年初，城市生活的基本要素已然崩溃。由于燃料危机，在那个异常严寒的冬季，工厂、住宅和办公场所全程没有供暖。保暖衣物和鞋靴无处可买，甚至时有听闻有人在没有供暖的公寓里冻饿而死。斑疹伤寒与霍乱席卷各城市，造成惊人的死亡人数。但粮食依旧是最严峻的问题：尽管城市人口已大幅减少，粮食仍然供不应求。

劳动者体力耗尽，陷入各种精神萎靡与绝望状态。到 1920 年

底，平均劳动生产率已跌至1913年水平的三分之一。<sup>38</sup>在饥寒交迫之下，人们接连数日抛下机器，前往周边农村拾柴、寻找食物。他们或步行，或挤在超载的火车车厢里，带着个人财物乃至从工厂偷拿的物资，去换取一切能换到的食物。政府竭尽全力取缔这种非法交易。武装路卡分队（zagraditel'nye otriady）被部署在通往城市的要道上，把守各个入口，没收那些“投机分子”为家人带回的珍贵粮袋。路卡分队的残暴在全国臭名昭著，莫斯科各人民委员部收到大量针对其肆意妄为的投诉。<sup>39</sup>

工人阶级的另一大不满，是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下日益强化的劳动军事化管制。推动这一进程的核心人物是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他在将仓促组建的红军整顿成型后大受鼓舞，试图把类似的军事纪律手段套用到濒临崩溃的工业经济中。1920年1月，在托洛茨基的大力推动下，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规定所有健全成年公民均需履行普遍劳动义务，同时批准将闲置的军事人员调配到民用岗位。内战接近尾声时，整支整支的红军部队并未被遣散，而是被保留为“劳动军”，投入到缓解日益严重的燃料与运输危机、挽救基础工业免于崩溃的工作中。成千上万的退伍军人被派去伐木、采煤、修复铁路，另有数千人被分配到城市大型工厂从事重体力劳动。与此同时，政府还

---

<sup>38</sup> S. N. 普罗科波维奇：《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状况》，伦敦，1924年，第20-25页。另见K. 莱茨：《俄国近期经济发展》，伦敦，1922年，第131页及以下。

<sup>39</sup> 参见亚历山大·伯克曼：《喀琅施塔得起义》，柏林，1922年，第10页。

试图强化民用工人的劳动纪律，以遏制偷窃、旷工现象，提高个人生产效率。然而，这些政策的效果令人失望。不出所料，纪律的收紧与军队进驻工厂遭到在岗工人的强烈反感，在车间与工会会议上引发了对“劳动军事化”的激烈抗议。而士兵们在战争结束后也迫切希望返乡。在许多俄国人看来，正当政府试图推广“劳动军事化”之际，这一政策却已失去其正当性。孟什维克领导人将这种新的管制比作埃及法老征发劳役修建金字塔的奴隶制。他们坚称，强制手段在工业领域不会比在农业领域更奏效。<sup>40</sup>令政府观察人士警觉的是，这类言论在产业工人中获得了广泛共鸣。工人们对于布尔什维克及其战时共产主义纲领的幻想破灭，已接近公开举行反政府示威的地步。

“劳动军事化”只是更广泛举措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对国家摇摇欲坠的经济实行中央集权管控。1917至1918年间，产业工人曾将工团主义“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付诸实践。<sup>41</sup>这意味着地方工厂委员会监督工人的雇佣与解雇，参与制定工资、工时与劳动条件，并总体监督管理部门的活动。在一些企业中，不受欢迎的厂长、工程师和工头被赶走，工人委员会自行承担管理职责，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到1918年夏，俄国工业中有效的管理几乎荡然无存，国家正走向经济崩溃的边缘。布尔

---

<sup>40</sup> 参见詹姆斯·布尼安：《1917—1921年苏维埃国家强制劳动的起源：文献与资料》，巴尔的摩，1967年，第89页以下、第135—136页。

<sup>41</sup> 参见保罗·阿夫里奇：《布尔什维克革命与俄国工业中的工人监督》，《斯拉夫评论》，第22卷（1963年3月），第47—63页。

什维克曾在 1917 年鼓励工人监督，以此作为削弱临时政府的手段，如今却被迫采取行动，以免被吞没他们前任的同一场民众浪潮所吞噬。于是，从 1918 年 6 月开始，大型工厂被收归国有，工人监督逐渐被放弃，转而实行一长制管理与严格的劳动纪律。到 1920 年 11 月，五分之四的大型企业重新由个人负责，国有化也扩展到绝大多数小型工厂与作坊。<sup>42</sup>政府尽可能让“资产阶级专家”重返岗位，以提供急需的技术指导与管理。到年底，白领雇员与体力劳动者的比例几乎是 1917 年的两倍。<sup>43</sup>一个新的官僚阶层开始壮大。这是一个成分复杂的群体：资深行政人员与未经训练的新人共事；尽管他们的价值观与观念各不相同，却拥有自身的既得利益，使他们与车间工人区分开来。

对普通工人而言，让阶级敌人重新在工厂占据主导地位，意味着革命理想遭到背叛。在他们看来，1917 年短暂实现的无产阶级民主梦想被夺走，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式的强制与官僚手段。布尔什维克在工厂推行“铁的纪律”，组建武装小队强制执行管理意志，甚至考虑采用“泰勒制”这类令人憎恶的效率手段。这样的政策由他们曾信任、并宣称以他们名义执政的政府推行，对工人来说是难以咽下的苦果。难怪在 1920—1921 年冬，当经济与社会混乱达到临界点时，不满的低语再也无法被压制，即便以开除并取消口粮配给相威胁也无

---

<sup>42</sup> 克里茨曼：《伟大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第 206 页。

<sup>43</sup> 同上，第 197—198 页。1921 年 2 月 2 日，列宁抱怨“莫斯科的人口正被各类职员不断膨胀”，并称必须对此采取措施：《列宁全集》，第 65 卷。

济于事。在车间会议上，发言者愤怒谴责工业的军事化与官僚化，当他们尖锐提及布尔什维克官员的安逸生活与特权时，听众报以愤怒而赞同的呼喊。人们声称，共产党人总能得到最好的工作，似乎比其他人更少受饥寒之苦。反犹主义与反智主义开始抬头，且常常同时出现：有人指责布尔什维克是外来的犹太知识分子，背叛了俄国人民，玷污了革命的纯洁性。

这种日益浓厚的不满与幻灭情绪，恰逢俄共（布）党内激烈争论的时期，党内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反对声音并不少见。这场争论从1920年12月持续到1921年3月，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达到高潮，而此时喀琅施塔得起义正在进行。争论的核心是工会在苏维埃社会中的地位。<sup>44</sup>在这场旷日持久、激烈动荡的争论中，出现了三种相互对立的立场。托洛茨基以其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时形成的军事人力观为指导，主张工会完全从属于国家，由国家独享任免工会干部的权力。该方案最坚定的反对者是工人反对派成员。这一团体主要由工人与前工人组成（以亚历山大·施略普尼科夫、尤里·卢托维诺夫为代表），他们仍保持着无产阶级立场与同情。令工人反对派尤为不安的是，苏维埃政权明显在滑向一个由享有特权的非无产阶级少数群体统治的新官僚国家。施略普尼科夫、卢托维诺夫、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及其支持者谴责对劳动力的军事化以及工厂中一

---

<sup>44</sup> 关于工会争论的精彩论述，参见罗伯特·V·丹尼尔斯：《革命的良知》，马萨诸塞州剑桥，1960年，第119-136页；以及艾萨克·多伊彻：《苏维埃工会》，伦敦，1950年，第42-52页。

长制的推行。他们不仅要求工会完全独立于国家与党的控制，还要求将工业管理权转交给工会及其地方工厂委员会，并由这些组织组成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他们坚持认为，党绝不能让工人的创造性主动性“被官僚机器所摧残，而这台机器浸透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与管理体制的因循守旧精神。”<sup>45</sup>

列宁及其支持者（在党内占绝大多数）试图弥合托洛茨基主张的工会从属国家论与工人反对派的工团主义纲领之间的裂痕。在他们看来，工会既不应被并入国家机器，也不应被授予管理工业的权力；相反，应允许其保留切实的自主权，有权选举自身领导人、自由讨论劳工问题，同时由政府继续掌握经济主导权。列宁希望他的折中方案能够成功团结其他派别。他对这场争论深感不安，在苏维埃历史如此关键的时刻，它有可能粉碎党脆弱的团结。1921年1月，在争论最激烈时他说：“我们必须有勇气正视痛苦的真相。党病了。党在发高烧。”他警告说，除非能“迅速、彻底”治愈病症，否则将出现“不可避免的分裂”，这对革命可能是致命的。<sup>46</sup>

随着冬季深入，俄共（布）党内的辩论反映出整个俄国社会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过去三年里，人民曾拼死捍卫革命成果，追求更自由、更安稳的生活。他们相信，一旦击败敌人，

---

<sup>45</sup> 亚历山德拉·柯伦泰：《俄国的工人反对派》，芝加哥，1921年，第22-23页。另见工人反对派集团的提纲，载于《真理报》，1921年1月25日。

<sup>46</sup> 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第234页。

政府就会立即解除战时严苛纪律，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很快会成为一段逝去动荡年代的模糊记忆。但事实并非如此。内战胜利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既未被废除，甚至也未放松。在弗兰格尔战败数月后，政府几乎没有表现出恢复基本经济与政治自由的迹象。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核心方向，依然是强制与严密管控。结果，强烈的失望情绪迅速蔓延。正是这种情绪，构成了这场不断升级危机的核心。即便那些承认战时共产主义曾有必要的人——认为在与白军殊死搏斗期间，它使军队免于溃败、城市免于饥荒——也确信，强制手段已经过时。在他们眼中，战时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应对紧急状况的临时权宜之计；作为和平时期的纲领，它是一场彻底的失败，是人民再也无法忍受的负担。

然而布尔什维克既不愿废除它，也不愿停止压制政治反对派。为自辩，党发言人坚称战时紧急状态尚未结束，国家仍处于孤立状态，四面强敌环伺，随时可能趁内部虚弱发动攻击。但每一项镇压措施，即便出于经济或政治紧迫需要，都进一步削弱了政府标榜的民主与平等承诺。批评者认为，正是布尔什维克自身在背叛革命理想。对内战期间曾支持苏维埃政权的著名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伯克曼而言，1917年的口号已被背弃，人民最珍视的希望被践踏。他在1921年写道，不公无处不在，所谓的紧急状态成了背叛、欺骗与压迫的外衣；布尔什维克以工农名义执政，却在摧毁革命赖以发展、乃至赖以生存

的主动性与自立精神。<sup>47</sup>

伯克曼的观点得到了左翼其他政党的广泛认同，这些政党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在布尔什维克掌权后遭到粗暴排挤。孟什维克领导人费奥多尔·丹在第八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发言中甚至指责称，随着民众主动性被扼杀，整个苏维埃体系已形同虚设，沦为—党专政的纯粹门面。丹指出，言论与集会自由遭到残酷镇压，公民未经审判便被监禁或流放，政治处决大规模实施。他谴责这些恐怖行径，要求立即恢复政治与公民自由，并呼吁在各地重新选举苏维埃。著名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伊·尼·施坦伯格在发言中响应了丹的呼吁。施坦伯格本人曾担任苏维埃政府司法人民委员，他主张恢复“苏维埃民主”，在地方层面实行广泛自治与自主管理。<sup>48</sup>

实际上，这正是当年列宁主义提出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如今却被左翼批评者用来反对布尔什维克。即便在俄共（布）内部，民主集中派也主张扩大地方苏维埃权力，以医治内战期间政治权力过度集中的弊病。这类呼吁也并非仅限于少数激进知识分子。整个冬季，民众的不满情绪在广泛层面蔓延开来，水兵、士兵、农民与工人纷纷卷入其中。他们既向往

---

<sup>47</sup> 亚历山大·伯克曼：《布尔什维克神话（日记1920—1922）》，纽约，1925年，第319页；伯克曼：《反高潮》，柏林，1925年，第12页。

<sup>48</sup> 《第八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第55—57、122—123页。

1917年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又渴望恢复社会稳定，结束流血冲突与经济匮乏。正是在这些略显矛盾的诉求中，爆发了布尔什维克掌权以来最严重的内部危机之一。到1921年3月，苏维埃政权已面临被农民起义、工人骚动与军队动荡浪潮吞没的危险，这股浪潮最终在喀琅施塔得起义中达到顶点。

归根结底，是饥饿与贫因为这场危机埋下了伏笔。人们很容易指责布尔什维克未能放弃战时共产主义、为民众纾困。然而，与西方各国政府一样，他们也需要时间来评估面临的新形势。正如列宁在第八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言，从战争向和平的过渡并非易事。没有人确定哪条道路最优，没有战略蓝图，也没有先例可循。自掌权之日起，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就是摸索性、实验性、充满不确定性的；三年多之后，他们的讨论与行动依然带有临时应对的色彩。事实上，包括列宁本人在内的部分党的领导人，早在1920年11月就已开始考虑缓和战时共产主义。但在当时，远不像两三个月后那样显而易见：必须立即调整方向，才能避免一场大规模社会动荡。

但事实依然是，国内政策的放松来得太迟。布尔什维克仍受战时心态束缚，不愿放弃符合其意识形态预设的纲领，死死抱住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放，直到1921年2月，列宁才迈出推行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步。然而到那时，已经来不及避免喀琅施塔得的悲剧。

## 第二章

# 彼得格勒与喀琅施塔得

1921年2月，布尔什维克政权与其最主要的依靠力量——工人阶级之间，爆发了公开决裂。入冬以来，即便以俄国的标准来看也异常严酷的寒冬、饥寒交迫，再加上战时共产主义的严苛丝毫不减，在各大城市营造出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莫斯科与彼得格勒的局势尤为如此，只需一点火星便会引爆。这根火星在1月22日出现：政府宣布，城市本已微薄的面包配给将立即削减三分之一。<sup>49</sup>这一削减尽管严厉，却显然无法避免。大雪与燃料短缺阻断了来自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的粮食列车，而这些地区本已征集了余粮，用以供给中部与北部饥饿的城市。2月上旬的十天里，铁路交通完全中断，竟没有一节粮车运抵莫斯科空空如也的粮仓。<sup>50</sup>但配给削减是出于紧急且不可预见的状况这一事实，几乎没有减轻它对饥肠辘辘的城市居民的冲击。某种形式的爆发似乎已不可避免。

---

<sup>49</sup> 《真理报》，1921年1月22日。

<sup>50</sup> 波利亚科夫：《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第233页。

2月中旬，莫斯科首先爆发严重骚乱。事件始于一连串自发的工厂集会，愤怒的工人要求立即废除战时共产主义，改行“自由劳动”制度。这一要求极为强烈，政府只得派遣代表前往工厂，试图为其政策辩护。然而这绝非易事。面对充满敌意的听众，官方发言人往往不等讲完，便在一片嘲笑声与嘘声中被赶下台。据一则报道，列宁本人曾出席莫斯科五金工人一场喧闹的集会，面对指责布尔什维克毁掉国家的听众，他反问他们是否希望白军卷土重来。他的问题得到了一句苦涩的回击：“谁来都行——白党、黑党，哪怕魔鬼亲自来——只要你们滚蛋。”<sup>51</sup>

首都的骚动迅速升级，工厂集会之后便是罢工与示威。工人走上街头，高举标语横幅，要求“自由贸易”、提高配给、废除粮食征收制。他们并未止步于经济诉求。部分示威者呼吁恢复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各处甚至出现要求重新召开立宪会议的标语，还有一些标语则写着更刺耳的口号：“打倒共产党人和犹太人。”<sup>52</sup>起初，当局试图以救济承诺平息示威，但毫无效果，最终不得不动正规军与军官学校学员（学员兵）恢复秩序。

---

<sup>51</sup> 《纽约时报》，1921年3月6日。

<sup>52</sup> 《彼得格勒事件》，马克拉科夫档案，A辑，第5宗，第13号；《1921年2月中旬来自彼得格勒的信》，米勒档案，5M档，第5号；《新世界》，1921年3月1日；H. B. 夸顿（维堡）致国务卿，1921年3月3日，国家档案馆，861.00/8245。据夸顿记载，苏维埃报刊未报道这些示威，以防蔓延至其他城市。

莫斯科的骚动刚平息，一场规模更严重的罢工浪潮便席卷了旧都彼得格勒。整座城市笼罩着悲剧气氛，用当时人的话说，“只剩昔日的幽灵”，“人口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锐减，前途未卜”。<sup>53</sup>彼得格勒位于俄国西北一隅，远离粮食与燃料主产区，饥寒程度甚于莫斯科。可用粮食储备已缩减至一战前的五分之一。<sup>54</sup>市民无保暖衣物、无合脚鞋子，步行数英里到邻近森林砍柴取暖。2月初，彼得格勒 60 多家最大工厂因缺燃料被迫停产。<sup>55</sup>与此同时，粮食供应几乎断绝。据孟什维克目击者费奥多尔·丹记载，饥饿的工人与士兵在街头乞讨一片面包。<sup>56</sup>愤怒的市民抗议不平等的配给制度——某些人群享有特权。有传言称党员领到了新鞋新衣，进一步激化矛盾。这类在艰难时期极易流传的谣言被广泛相信，也成为喀琅施塔得起义前动荡的重要导火索。

与莫斯科一样，彼得格勒数量众多但已萧条的工厂与作坊先爆发一连串抗议集会，随后演变为街头示威。经济苦难首当其冲，粮食问题最为尖锐。发言者纷纷要求停止粮食征收、撤除路卡、废除特权配给、允许以个人物品换取食物。2月23日，特鲁博奇内工厂召开喧闹集会。该厂仍是彼得格勒最大的金属

---

<sup>53</sup> 安杰莉卡·巴拉巴诺娃：《我作为革命者的一生》，纽约，1938年，第261页。

<sup>54</sup> 普霍夫：《喀琅施塔得起义》，第19页。

<sup>55</sup> 《真理报》，1921年2月12日。

<sup>56</sup> 费·伊·丹：《两年漂泊（1919-1921）》，柏林，1922年，第104-105页。

企业之一，尽管工人数量已缩减至三四年前的零头。集会结束前通过决议，要求增加粮食配给，并立即分发现有全部鞋靴与冬衣。工人们次日清晨返厂，但很快放下工具罢工。他们前往涅瓦河北岸的瓦西里岛，试图组织大规模示威以表达不满。代表团前往芬兰团兵营，但未能争取士兵参与。尽管如此，附近工厂的更多工人与矿业学院学生陆续赶来，很快聚集起 2000 人，高呼反对政府的口号。据记载，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布尔什维克主席安采洛维奇赶到现场，劝说工人复工，却被人从车上拖下殴打。<sup>57</sup>局势即将彻底失控之际，彼得格勒党委兼苏维埃主席季诺维也夫派出一支武装军校学员分队，下令驱散示威。在推搡、呼喊与几声对空鸣枪后，罢工者和平散去，未发生流血事件。<sup>58</sup>

瓦西里岛的示威只是即将到来风暴的前奏。次日，2月25日，特鲁博奇内工厂的工人再次走上街头，分散进入周边厂区，号召同行们停工。他们的行动立刻奏效。拉费尔梅烟草厂、斯科罗霍德鞋厂、波罗的海金属厂和帕特罗内金属厂相继罢工；随后，由于有传言称前一天瓦西里岛的示威者被军校学员打死打伤，罢工浪潮蔓延至其他大型企业，包括海军部造船厂和加勒尔纳亚干船坞。多处人群聚集，聆听即兴发表的抨击政府政

---

<sup>57</sup> 《彼得格勒事件》，马克拉科夫档案，A 辑，第 5 宗，第 13 号；《新俄罗斯生活》，1921 年 3 月 8 日。

<sup>58</sup> 《论喀琅施塔得》，布拉格，1921 年，第 6 页；普霍夫：《喀琅施塔得起义》，第 29-30 页；科尔纳托夫斯基编：《喀琅施塔得起义》，第 130 页；伯克曼：《布尔什维克神话》，第 291-292 页。

策的演说，军校学员再度被调来驱散人群。

莫斯科的罢工已经发出警报，在季诺维也夫主持下的彼得格勒当局一直在自己辖区内密切监视动乱迹象。动乱一爆发，他们便迅速采取行动恢复秩序。2月24日，也就是瓦西里岛示威当天，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召开会议，组建了一个三人防务委员会，成员包括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拉舍维奇、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阿夫罗夫，以及工会理事会的安采洛维奇。彼得格勒防务委员会被授予紧急权力，下令城市各区成立各自的“革命三人小组”，防止骚乱扩散。这些革命三人小组仿照防务委员会组建，由区党组织负责人、当地军事指挥官，以及区苏维埃主席或当地军事学校政委组成。同一天，在季诺维也夫主持下，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宣布在全市实行戒严。晚上11点开始实行宵禁，任何时间都禁止街头集会。<sup>59</sup>

当特鲁博奇内的罢工者奔走于各个工厂，呼吁工人们加入他们、共同抗议当局时，季诺维也夫及其同僚正想方设法避免一场大屠杀。2月25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会理事会与党委联合发表《告红色彼得格勒工人书》，呼吁工人坚守岗位。呼吁书承认工人正承受着诸多苦难，但解释说，这是为保卫革命、抵御敌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文中称，即便此刻，白卫军仍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协助下，试图利用粮食危机达到险

---

<sup>59</sup> 《彼得格勒真理报》，1921年2月25日、26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1921年2月26日。安采洛维奇似乎仅在彼得格勒防务委员会成立最初几天任职。此后该委员会所有命令与法令均由季诺维也夫、拉舍维奇和阿夫罗夫签署。

恶目的。“红色彼得”的工人们难道已经忘记尤登尼奇、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弗兰格尔了吗？白匪复辟能给人民带来什么？只会是“地主的皮鞭与沙皇的王冠”。而离开工厂又会带来什么？只会是更严重的饥饿与寒冷。工人们确实做出了巨大牺牲，但正因如此，更不应在胜利刚刚到来的时刻抛弃革命。<sup>60</sup>

凭借这份呼吁，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发起了一场大规模宣传运动，以遏制城内的骚动。所有官方渠道都警告罢工者，不要让反革命分子有机可乘。政府的论调是：饥饿、疲惫与寒冷，是国家刚刚经历的“七年战争”不可避免的后果。为了“白匪猪猡”及其支持者，牺牲如此来之不易的胜利，难道有意义吗？彼得格勒苏维埃宣称，罢工与示威唯一的受益者，只会是里加的波兰地主与伦敦的英国资本家——他们可能会趁机在谈判桌上要求更多让步。同样，彼得格勒军校学员发布的公告谴责特鲁博奇内工人的行为，称这只会让“英国、法国及其他地主、四处潜伏的白卫特务，以及他们的走狗、资本主义的奴才——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感到高兴。<sup>61</sup>彼得格勒防御委员会警告说，英国、法国与波兰间谍已被偷偷潜入城内，企图利用混乱局势。与此同时，日报刊登了彼得格勒各工厂与工会的大量决议，谴责制造骚乱的“挑衅者”与“怠工者”。<sup>62</sup>当局最常用来

---

<sup>60</sup> 《红色报》，1921年2月25日。

<sup>61</sup> 《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1921年2月25日；《彼得格勒真理报》，1921年2月26日。

<sup>62</sup> 参见科尔纳托夫斯基编：《喀琅施塔得起义》，第138、144页。

称呼这些所谓闹事者的词是 shkurniki，即“自私自利者”——字面意思是只关心自己安危的人。而且，当局不用通常表示“罢工”的词（stachka 或 zabastovka），而是使用 volynka 这一贬义词，泛指一切罢工、静坐与怠工。据费奥多尔·丹记载，当局偏爱这个贬义说法，而不愿承认一场针对“工人政府”的真正罢工已经爆发。<sup>63</sup>

2月26日，随着骚乱不断升级，彼得格勒苏维埃召开特别会议商议进一步行动。波罗的海舰队政委 N·N·库兹明——此人在随后几周里将声名狼藉——发出了不祥的警告，提醒注意水兵情绪日益高涨，并告诫说，如果任由罢工继续，可能会发生爆发性事件。彼得格勒防御委员会成员拉舍维奇顺着这一思路宣称，唯有采取严厉措施才能对付罢工者。他特别要求，将此次运动的主要煽动者——特鲁博奇内工厂的工人——驱逐出厂，从而自动剥夺他们的口粮配给。苏维埃对此表示同意，并立即下达了相应命令。作为无产阶级不满的第二个策源地，拉费尔梅工厂也被关闭；其他企业的工人被勒令返回岗位，否则将遭受同样惩罚。<sup>64</sup>

这种毫不掩饰、企图以饥饿迫使罢工者屈辱的做法，只会加剧本已紧张的局势。2月的最后几天里，运动继续蔓延，迫使一家又一家工厂停产。28日，风潮波及拥有6000名工人的

---

<sup>63</sup> 丹：《两年漂泊》，第105页。

<sup>64</sup> 《论喀琅施塔得真相》，第6页；贝克曼：《喀琅施塔得起义》，第7页。

巨型企业普梯洛夫金属加工厂——尽管规模仅为一战时期的六分之一，仍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

此时，二月革命四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正如丹所指出的，彼得格勒的气氛，让人回想起 1917 年专制政权崩溃前夕全城的情绪。<sup>65</sup>另一个引起官方不安的因素，是工人诉求性质的转变。最初，工厂会议通过的决议绝大多数都是人们熟悉的经济要求：正常发放口粮、配发鞋子和保暖衣物、撤除路障、允许到乡村觅食并与村民自由交易、取消特殊工人群体的特权配给，等等。2 月最后两天，这些经济要求的语气变得更加急迫；例如，一份传单列举了工人在家中冻饿致死的案例。<sup>66</sup>但在当局看来，更令人警惕的是：政治不满开始在罢工运动中占据显著位置。工人们要求：将纯粹行使警察职能的布尔什维克武装特别小队撤出工厂；解散劳动军，其中一些部队最近被派驻到彼得格勒较大型企业；在更根本的层面上，要求恢复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起初只是零星呼吁，后来变得普遍而强烈。

在这样的时刻，政治反对派被鼓动起来采取行动，也就不足为奇了。彼得格勒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组织尽管遭到大规模逮捕、受到警方严密追捕，仍设法在工人群众中散发了大量宣传传单。例如在 27 日当天，城中街头便出现了如下宣言：

---

<sup>65</sup> 丹：《两年漂泊》，第 107 页。

<sup>66</sup> 贝克曼：《布尔什维克神话》，第 292 页。

“政府的政策必须进行根本改变。首先，工人和农民需要自由。他们不愿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法令生活，他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同志们，维护革命秩序，以有组织、坚定的方式提出要求：释放所有被捕的社会主义者与无党派工人；废除戒严令；保障一切劳动者的言论、出版、集会自由；自由选举工厂委员会、工会与苏维埃。召开会议，通过决议，向当局派遣代表，争取实现你们的要求。”<sup>67</sup>

尽管这份宣言并未署名，但其带有明显的鼓动特征，而丹及其孟什维克领导层同人也承认，他们在2月底正积极开展此类宣传活动。在向来同情孟什维克、拥有大量支持者的印刷工人协助下，彼得格勒的孟什维克组织得以印发大量传单与宣言，要求实现自由选举的苏维埃与工会、恢复公民自由、停止恐怖统治，并从共产党监狱中释放社会主义者及其他左翼政治犯。在经济领域，孟什维克还呼吁政府停止粮食征购与强制建立国营农场的做法，恢复城乡之间的自由贸易，并以相应规章遏制投机活动。

这些要求自内战初期以来便是孟什维克所一贯主张的，也是费奥多尔·丹与大卫·达林在1920年12月第八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极力提出的内容。孟什维克的核​​心诉求，本质上是落实现行宪法，让所有社会主义政党都能在苏维埃体系中拥有合法地位，使劳动人民享有被布尔什维克专政肆意剥夺的各项自由。

---

<sup>67</sup> 科尔纳托夫斯基编：《喀琅施塔得起义》，第26页。

自 1917 年起，孟什维克便以合法反对派自居，因此始终回避任何呼吁以武力推翻政府的主张。恰恰相反，正如上述宣言所示，他们号召彼得格勒工人召开集会、通过决议、向当局请愿——简言之，以“有组织、有决心的方式”，动用一切合法手段施压，推动政治与经济改革。尽管如此，他们的批评仍引发了政府的担忧与愤怒，因为这些言论无异于直接指控布尔什维克背叛了革命的根本原则。更何况，谁又能保证，工人一旦被动员起来，会仅仅停留在合法抗议，而不会爆发公开的起义？与孟什维克不同，社会革命党人长期以来都寄望于通过群众起义推翻列宁的政权。他们的目标是取而代之，恢复经民选产生的立宪会议——该党曾在立宪会议中赢得多数席位，却在 1918 年 1 月被布尔什维克强行解散。1921 年，推翻布尔什维克统治与恢复立宪会议这两大目标，仍是其纲领的核心。1921 年 2 月 28 日，彼得格勒街头张贴出一份以“涅瓦区社会主义工人”名义发布的宣言，这份宣言大概率出自社会革命党人之手：

“我们清楚谁惧怕立宪会议。正是他们，再也无法掠夺人民，必须在人民代表面前，为其欺骗、劫掠与一切罪行接受清算。打倒可恨的共产党人！打倒苏维埃政府！人民立宪会议万岁！”<sup>68</sup>

这份传单（以及其他同类传单）的立场，远比孟什维克所

---

<sup>68</sup> 同上。本传单及上文所引孟什维克传单的文本，另见《论喀琅施塔得》，第 6-7 页；伯克曼：《喀琅施塔得起义》，第 7-8 页；斯列普科夫：《喀琅施塔得起义》，第 18 页。

能发表的任何言论都更为激进、更不妥协。事实上，无论语气还是内容，它都更接近“俄罗斯复兴联盟”等地下组织的宣传口径；该组织由自由主义者与右翼社会主义者联合组成，其压倒一切的共同目标，便是终结布尔什维克的统治。

二月罢工期间大量涌现的反共宣传，引出了这场运动的领导权问题。是否真如政府所指控的那样，是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把工人推上了街头？毫无疑问，罢工一旦爆发，这两个派别都竭尽所能加以鼓动。孟什维克尤其如此，到1921年，他们已重新赢回在1917年革命中失去的大部分工人阶级支持。彼得格勒骚乱发生时，孟什维克在特鲁博奇内工厂及其他动荡频发的企业中影响力相当可观。<sup>69</sup>孟什维克的鼓动者在工人集会上得到了同情的回应，他们的传单与宣言在众多热切的手中传阅。然而，尽管这些活动无疑对骚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孟什维克或其他任何团体事先策划并组织了罢工。我们已经看到，彼得格勒的工人自身就拥有充分的理由，发起针对政府的公开抗议。从缺乏事先策划——尽管绝非没有动机——这一点来说，二月罢工是民众不满情绪的自发爆发。

经过一周的动荡，彼得格勒当局终于将局势控制住。这并非易事，季诺维也夫及其同僚以果断高效的手段，将武力镇压

---

<sup>69</sup> 参见 P.I. 博尔金：《孟什维克与喀琅施塔得起义》，《红色年鉴》，1931年第3期，第13-14页。

与有限让步结合起来，才达成这一结果。让他们的工作更为棘手的是，卫戍部队中的大部分正规军自身也已卷入普遍的骚动，无法指望他们执行政府命令。被认为不可靠的部队被解除武装并禁闭在兵营内。甚至有传言称，当局禁止发放军靴，以防士兵离开营房、与人群聚集，重蹈四年前那场造成致命后果的覆辙。<sup>70</sup>当局不再依赖正规军，转而依靠军校学员——布尔什维克培养的军官学员，他们从周边军事院校被成百调来在城内巡逻。此外，该地区所有党员均被动员，以备随时投入恢复秩序的行动。

一夜之间，彼得格勒变成了一座武装军营。各个街区的行人都会被拦下检查证件。剧院与餐馆悉数关闭，宵禁被严格执行。街头不时传来零星的枪声。随着局势日趋紧张，产业工人中尤其爆发了反犹情绪，彼得格勒苏维埃将此归咎于白军煽动者散布的反犹宣传品。<sup>71</sup>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指控或许不无道理，尽管在极端艰难的时期，反犹主义本就是俄国农民与工人的传统情绪。无论如何，彼得格勒的犹太居民人心惶惶，部分人选择离开城市，担心一旦政府倒台、街头暴民失控，反犹骚乱便会爆发。<sup>72</sup>

---

<sup>70</sup> 丹：《两年漂泊》，第 107 页。

<sup>71</sup> 《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1921 年 3 月 1 日。

<sup>72</sup> 《新俄罗斯生活》，1921 年 3 月 8 日；夸顿致国务卿，1921 年 3 月 5 日，国家档案馆，861.00/8253。关于反犹主义的抬头，另见普霍夫：《喀琅施塔得起义》，第 32 页；艾玛·戈德曼：《我的生活》，纽约，1931 年，第 875–876 页。

除了在城内集结重兵，布尔什维克还试图通过将更多罢工者拒于工厂门外的方式，瓦解这场抗议运动。这一做法——如同对特鲁博奇内工厂与拉费尔梅工厂所做的那样——意味着剥夺工人的配给。与此同时，彼得格勒契卡展开了大规模逮捕行动。在工厂集会与街头示威中批评政权的发言者均被拘留。据丹统计，2月最后几天里，约500名态度强硬的工人与工会干部身陷囹圄。<sup>73</sup>落入抓捕网的学生、知识分子及其他非工人团体或许数以千计，其中许多人隶属于反对派政党与团体。彼得格勒的孟什维克组织在契卡的突袭中遭受重创，迄今尚未被捕的活跃领导人几乎悉数被押入监狱。卡祖科夫与卡缅斯基因组织工人示威，于2月底被捕。包括罗日科夫与丹在内的少数人则多逍遥了一两天，疯狂印制并散发宣言与传单，最终也被警方逮捕。据估算，1921年前三个月，全俄共有约5000名孟什维克被捕，其中包括该党全体中央委员。<sup>74</sup>与此同时，少数仍自由活动的知名社会革命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也遭到抓捕。据维克多·塞尔日在《革命者回忆录》中记载，契卡本欲将被捕的孟什维克作为罢工主谋处决，但马克西姆·高尔基出面干预，救下了他们。<sup>75</sup>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加大宣传力度，做最后努力，劝说

---

<sup>73</sup> 丹：《两年漂泊》，第108页。

<sup>74</sup> 伦纳德·夏皮罗：《共产主义专制的起源》，马萨诸塞州剑桥，1956年，第205页。

<sup>75</sup> 维克多·塞尔日：《革命者回忆录（1901-1941）》，伦敦，1963年，第130页。高尔基本人不久后便离开了俄国。

罢工者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复工。为补充报刊宣传，党内成员——尤其是那些享有民众声望的人——被派往街头、工厂与兵营进行鼓动。总体而言，他们的遭遇并不太友好，不过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或许因其平民出身）在城内各工厂与军事设施的宣讲，似乎比同僚们更为成功。鼓动者的核心论调是，将罢工与示威归咎于白卫军及其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盟友策划的反革命阴谋。正如艾玛·戈德曼所言，这套说辞经过三年反复宣讲，早已陈腐不堪，<sup>76</sup>但仍产生了一定效果，尤其是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并未掩饰自己在骚乱中的积极角色。

除此之外，季诺维也夫于2月27日宣布，针对工人最迫切的诉求作出多项额外让步。从今以后，工人将获准离开城市前往农村寻找食物。为方便出行，季诺维也夫甚至承诺增开前往周边农村的客运列车。此外，彼得格勒周边的路卡分队接到指令，不得没收普通工人携带的粮食，仅需防范真正的投机行为。季诺维也夫还宣布，政府已从国外购买约1800万普特煤炭，不久即可运抵，以缓解彼得格勒及其他城市的燃料短缺。但最重要的是，他首次透露，政府正计划废除对农民的粮食强制征收，改行实物税。<sup>77</sup>换言之，战时共产主义制度终于要被一项新的经济政策取代，这项政策至少会部分恢复城乡之间的贸易

---

<sup>76</sup> 夸顿致国务卿，1921年3月4日，国家档案馆，861.00/8241。

<sup>77</sup> 《红色报》，1921年2月27日。购买煤炭（1850万普特，1普特等于36磅）的决定已于2月1日由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作出：见《列宁全集》第63卷。

自由。3月1日，仿佛是为了证实这一意图，彼得格勒苏维埃宣布撤销彼得格勒省全境所有路卡。同一天，被派往彼得格勒从事劳动任务的红军士兵——总计约两三千人——被复员，允许返回故乡。官方解释称，生产缩减已使他们不再需要留驻。

78

结果，在数日紧张动荡之后，彼得格勒的骚乱迅速平息。到3月2日或3日，几乎所有罢工工厂都恢复了生产。让步政策起到了作用，因为激发民众不满的最主要原因正是寒冷与饥饿。但不可否认，动用武力、大规模逮捕，以及当局发起的不间断宣传，对恢复秩序同样不可或缺。在这方面，地方党组织表现出的纪律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搁置内部分歧，迅速团结起来，高效、果断地执行了令人不快的镇压任务。无论是地方党魁季诺维也夫，还是他的下属，皆是如此。尽管季诺维也夫一向以怯懦著称，面临危险时容易惊慌，但在平息辖区内乱时，他表现得异常镇定。此外，若不是彼得格勒居民已彻底士气低落，这场运动也不会如此迅速瓦解。工人们实在精疲力竭，无法维持任何持久的政治行动。饥饿与寒冷使许多人陷入萎靡，近乎完全麻木。

更重要的是，他们缺乏有效的领导与连贯的行动纲领。过去，这些都由激进知识分子提供。但正如艾玛·戈德曼所指出的，1921年的彼得格勒知识分子自身已无力为工人提供任何有意

---

<sup>78</sup> 《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1921年3月1日；《红色报》，1921年3月1日。

义的支持，更谈不上积极引导。他们曾是革命抗议的火炬手，如今却疲惫不堪、饱受恐吓，因个人努力徒劳无功而陷入瘫痪，无法再发出反对的声音。大多数同伴或入狱、或流放，有的已被处决，幸存者中很少有人愿意冒同样的风险，尤其是在胜算如此渺茫、哪怕最轻微的抗议都可能让家人失去配给的情况下。<sup>79</sup>此外，对许多知识分子与工人而言，布尔什维克尽管存在种种缺陷，却仍是抵御白军复辟、防止革命垮台的最有效屏障。

出于这些原因，彼得格勒的罢工注定只是昙花一现。事实上，它们结束得几乎与开始一样突然，始终未曾发展为针对政权的武装起义。尽管如此，其影响却极为深远。罢工触动了邻近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他们与旧都的暴动动向紧密相连——由此为一场在诸多层面上堪称苏维埃历史上最严重的起义埋下了伏笔。

喀琅施塔得是位于芬兰湾科特林岛上的要塞城市与海军基地，地处彼得格勒以西约 20 英里处。18 世纪初，彼得大帝下令修建这座要塞，初衷是保卫涅瓦河畔的俄国新首都——彼得大帝著名的“通往西方的窗口”——抵御海上进犯。然而，这座岛屿自身早在 9 世纪便具备战略重要性，当时涅瓦河河口正是著名商路“从瓦良格人到希腊人”的起点。如今，游客站在科特林岛东南岸大陆上的彼得霍夫宫（彼得大帝修建的宏伟宫殿）水边，便能远眺岛屿模糊的轮廓，它守护着通往这座旧都的海

---

<sup>79</sup> 戈德曼：《我的生活》，第 88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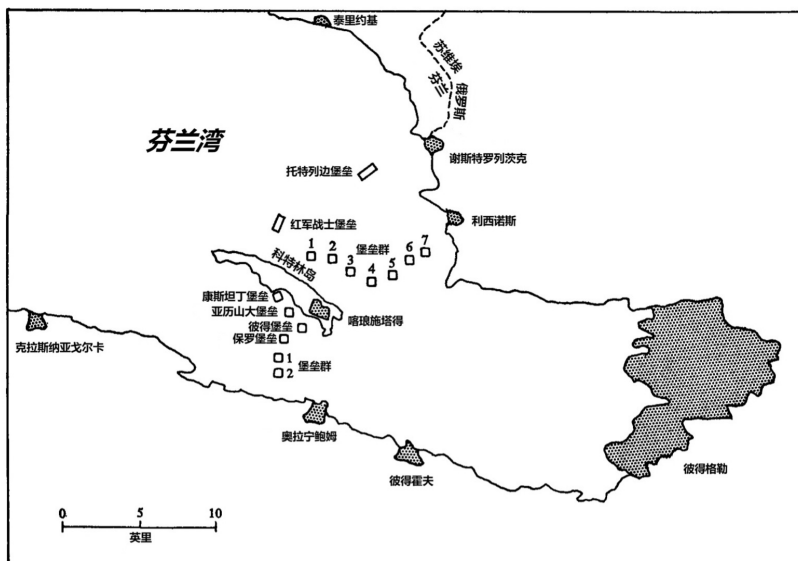
上通道。岛屿地形狭长，长约 8 英里，最宽处约 1.5 英里，不规则的轮廓构成一个拉长的三角形。岛屿对外封闭，南北两侧海岸由延伸至远海的礁石上的要塞与炮台群严密防守。

面向彼得格勒的岛屿东端，坐落着喀琅施塔得市。古老的厚城墙环绕全城，东侧的彼得格勒门是主要出入口。岛屿南侧是波罗的海舰队的港口与干船坞。每年 11 月下旬至次年 3 月底或 4 月初，芬兰湾有四个多月处于结冰期。一战前的夏季，常有观光汽船往返于彼得堡与喀琅施塔得之间；冬季的常规路线则是乘火车前往奥兰宁鲍姆——科特林岛正南 5 英里处的大陆城镇与军事基地，再从那里乘坐雪橇，穿越海湾厚冰上的雪路抵达。无论从何种记载来看，20 世纪初的喀琅施塔得都是一座风景如画的城市。城内运河密布，街道绿树成荫，庄严的公共建筑与邻近的帝国首都颇为相似。其核心地标包括金顶赭墙的圣安德烈大教堂、古老的兵工厂与海军部大楼，以及海军工程学校（1917 年更名为教育之家）。城市中心的核心是宽阔的锚广场，广场上矗立着 19 世纪未建成的宏伟海军大教堂。广场得名于 18 世纪中叶，当时这里修建了大型仓库用以存放船锚。<sup>80</sup>广场可容纳超 2.5 万人，此后被用于新兵训练与军事检阅。1905 年与 1917 年，锚广场成为喀琅施塔得的革命讲坛，

---

<sup>80</sup> 《喀琅施塔得：简要指南》，列宁格勒，1963 年，第 77 页。关于喀琅施塔得的其他描述可见《百科辞典》，圣彼得堡，1895 年，第 16A 卷，第 823–824 页；《大英百科全书》，第 11 版，第 15 卷，第 927–928 页；沃林：《被遗忘的革命（1917–1921）》，巴黎，1947 年，第 408–410 页。关于喀琅施塔得早期历史，参见 A.V. 舍洛夫：《喀琅施塔得要塞史略》，喀琅施塔得，1904 年。

是热情的水兵、士兵与工人每日聚集的场所，他们在此践行着质朴直接的民主，令人联想到早年哥萨克的民众大会。



喀琅施塔得及周边

1921年，喀琅施塔得是波罗的海舰队的主要基地。总人口约5万，其中约一半是平民，一半是军人。军人又分为舰队舰员（占多数）和卫戍部队士兵，后者大多是炮兵，负责驻守主堡垒及外围要塞与炮台。平民中有许多人与要塞、海军基地相关，或是军人家属，或是在船坞、仓库及其他岸上机构工作的工人；其余主要是工厂工人、手工业者、渔民、小商贩，以

及市内合作社和政府机关的职员。<sup>81</sup>

科特林 (Kotlin) 本意为“锅、釜”，用在喀琅施塔得所在的这座岛上再恰当不过——因为这里的核心居民波罗的海水兵，始终处在不满的沸腾状态。他们生性躁动、崇尚独立，痛恨一切特权与权势，随时都可能爆发公开反抗，无论是对抗军官，还是对抗他们眼中外来、高压的中央政府。从性格上看，他们与早年那些桀骜不驯的自由斗士极为相似：17、18 世纪的哥萨克和射击军，其驻军向来是自发暴动的温床。同这些暴烈的先辈一样，水兵们是天生不受驯服的自由灵魂，本能地抗拒外来管束，渴望自由与冒险。一旦被谣言或酒意点燃情绪，他们便会像前辈那样肆意骚乱，把怒火发泄在富人和掌权者身上。

喀琅施塔得有着动荡激进的历史，其源头可追溯至 20 世纪俄国第一场大动荡——1905 年革命。1901 年，非法宣传品首次出现在这座海军基地；此后不久，水兵们便开始组建小组，讨论政治与社会问题，宣泄不满——最主要的是薪资微薄、伙食恶劣，以及长期承受的严苛军纪。1902 至 1905 年间席卷全国的罢工、农民暴动与恐怖主义浪潮，在他们心中引发共鸣，提升了其社会与政治觉悟。违抗军官、违反军纪的行为日渐成为常态。1905 年战争与革命爆发后，舰队主力在对马海峡遭日军歼灭，本就所剩无几的士气遭受毁灭性打击。即便本已无需额外刺激，1905 年 6 月黑海舰队“波将金号”的戏剧性起义，

---

<sup>81</sup> 普霍夫：《喀琅施塔得起义》，第 49 页。

也进一步推动了喀琅施塔得的革命活动。

喀琅施塔得首次严重骚乱始于1905年10月，正值革命高潮。这场骚乱在此后数年中形成了愈发常见的模式：首先是锚广场的群众集会，数千名心怀不满的水兵与士兵聚集于此，宣泄愤懑。除了改善伙食与着装、提高薪资、缩短服役期限、放宽军纪等常见诉求外，人群中还响起呼声，要求立即推翻专制制度，建立保障全体公民充分自由的民主共和国。随后数日，民众情绪以惊人速度激化。10月25日，水兵食堂中有人抱怨伙食，随即引发骚动。跺脚声与敲击餐盘的嘈杂声中，“杀死指挥官”的怒吼此起彼伏。<sup>82</sup>次日，喀琅施塔得爆发公开起义。这场起义完全自发，很快演变为劫掠与破坏的狂欢，堪比彼得大帝时期的射击军兵变。成群水兵与士兵在城内街头横冲直撞，砸碎商店橱窗，纵火焚烧建筑。街垒被筑起，数栋房屋被占据，用以抵御预期中来自彼得堡的镇压部队。骚乱持续两天，造成17人死亡、82人受伤，政府军方才恢复秩序。近3000名起义者被捕，多人被判长期监禁或流放，所幸未处决任何人。<sup>83</sup>

1906年7月19日，在1905年革命的余波中，喀琅施塔

---

<sup>82</sup> F. 科甘：《1905—1906年的喀琅施塔得》，莫斯科，1926年，第7—13页。

<sup>83</sup> 沃罗涅夫斯基、亨里克松：《喀琅施塔得要塞——列宁格勒的钥匙》，列宁格勒，1926年，第10—16页；尤·科拉布廖夫：《1905—1906年波罗的海的革命起义》，列宁格勒，1956年，第24—30页；列·亚·连茨涅尔：《回忆1905—1906年的喀琅施塔得》，莫斯科，1956年，第156—165页。关于1905、1906年喀琅施塔得起义的更多资料，见《1905—1906年波罗的海军事起义》（文献集），莫斯科，1933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的海军水兵（1905—1907）》，莫斯科，1955年。

得爆发了第二次、也更为严重的暴动，导火索是其姊妹港口斯韦阿堡的水兵起义。和 1905 年 10 月的暴动一样，此次事件完全自发、组织混乱，在失控状态下肆虐两天后，才被政府增援部队镇压。起义者的诉求虽与此前基本相同，但在经历了前几个月的失败后，已充满痛苦的幻灭感。对权威与军纪的憎恨，依旧是水兵怒火的核心动力。骚乱中，一名水兵对军官怒吼：“你们吸够我们的血了！”这句呐喊，正是所有起义者心情的缩影。<sup>84</sup>双方以空前的凶残厮杀：起义者被挫败感与愤怒驱使，当局则因俄国革命浪潮已然退去，确信能迅速取胜。严酷的镇压氛围就此笼罩，此次有 36 名领头者被处决，数百人被监禁或流放西伯利亚。<sup>85</sup>

详述喀琅施塔得早期这些自发起义的历史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即将看到，它们在诸多方面预示了 1921 年 3 月的风暴性事件。1917 年的动荡尤为如此，彼时喀琅施塔得再度成为无拘无束革命活动的中心。在全年始终主导着科特林岛躁动民众思想的极左翼影响下，喀琅施塔得以 1871 年巴黎公社为范本，自立为革命公社——巴黎公社是载入社会反抗史与传奇的标志性事件。1917 年 5 月，由布尔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及持无政府民粹主义倾向的无党派激进派领导、特

---

<sup>84</sup> 《1906 年喀琅施塔得起义》，《红色档案》，1936 年第 4 期，第 103 页。

<sup>85</sup> 科拉布廖夫：《波罗的海的革命起义》，第 89–103 页；连茨涅尔：《1905–1906 年的喀琅施塔得》，第 101–124 页。据连茨涅尔记载，70 名起义者被判死刑（部分可能获减刑）。

立独行的喀琅施塔得苏维埃，拒绝服从临时政府的权威，宣布自身为“城内唯一权力机构”。<sup>86</sup>此后，苏维埃在锚广场几乎每日召开的群众大会支持下，行使全面政治权力。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中直言不讳的无政府主义者叶菲姆·亚尔丘克，将锚广场形容为一所“自由大学”，各派革命演说家在此向热切的水兵、士兵与工人群众慷慨陈词。当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伊万·弗列罗夫斯基更自豪地将广场称作“喀琅施塔得的市民大会”，指代中世纪俄国城镇中盛行的喧闹民众集会。<sup>87</sup>

苏维埃与锚广场的集会讲坛相辅相成，满足了喀琅施塔得居民的政治诉求。当时民众并未普遍追求建立全国议会或其他中央统治机构。城市的社会与经济生活，大多由公民通过各类地方委员会自行管理——住宅委员会、舰船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工厂与车间委员会，这些组织在当时盛行的自由氛围中蓬勃发展。当地还组建了民兵，保卫岛屿主权不受外来势力侵犯。喀琅施塔得居民展现出了极强的自发组织才能。除各类委员会外，同一车间、同一街区的民众还组建了小型农业公社，每个公社约 50 名成员，负责开垦岛上空地上所有可耕种的土地。亚尔丘克回忆，内战期间，这些集体菜园曾帮助这座城市免于

---

<sup>86</sup> 罗·普·布劳德、亚·费·克伦斯基编：《1917 年俄国临时政府》（3 卷本），斯坦福，1961 年，第 3 卷，第 1296-1299 页。

<sup>87</sup> 叶·亚尔丘克：《俄国革命中的喀琅施塔得》，纽约，1923 年，第 54 页；伊·帕·弗列罗夫斯基：《1917 年布尔什维克的喀琅施塔得（个人回忆）》，列宁格勒，1957 年，第 17 页。

饥荒。<sup>88</sup>

喀琅施塔得民众珍视地方自治，热烈拥护列宁及其政党在1917年提出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号召。他们从字面意义上理解这一口号：各地方自主管理事务，中央极少甚至不予干涉。亚尔丘克指出，他们将这一点视作“社会主义”的真正精髓。<sup>89</sup>他们把自己的革命公社视为分权自治的典范，并自信地期待全国效仿。伊万·弗列罗夫斯基评价道：“尽管拥有诸多革命品格，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却有一个严重弱点：他们天真地以为，仅凭自身的革命热情，就足以在全俄建立苏维埃政权。”<sup>90</sup>然而，这样的期望最终未能实现。在随后布尔什维克专政的岁月里，1917年的自由公社成了逝去的革命乌托邦。1921年的起义，本质上是喀琅施塔得人试图重回这一自发自治的黄金时代，而“一切权力归地方苏维埃”便是他们的核心口号。

1917年革命期间，波罗的海舰队始终处于动荡状态，针对各类政治与军事权威的暴力冲突频发。与1905年一样，水兵将最猛烈的怒火发泄在军官身上，在他们眼中，军官是腐朽特权与专制权力的鲜活象征。喀琅施塔得人迫切渴望摆脱严苛军纪与苦役般的氛围——科特林岛正因这一点，落得个“水兵

---

<sup>88</sup> 亚尔丘克：《俄国革命中的喀琅施塔得》，第22-23页。

<sup>89</sup> 同上，第37、50页。

<sup>90</sup> 伊·帕·弗列罗夫斯基：《七月的政治教训》，《无产阶级革命》，1926年第7期，第58-59页。

萨哈林”的恶名。<sup>91</sup>因此，二月革命爆发后，他们立刻抓住机会挣脱管制枷锁，与不得人心的上级清算旧账。2月28日，一群愤怒的水兵将基地司令维伦海军上将从住所拖出，押至锚广场就地处决。这一事件拉开了血腥屠杀的序幕，喀琅施塔得共有40余名海陆军军官被杀，约200人被捕入狱。二月动乱期间，暴力浪潮席卷了波罗的海舰队所有基地。仅海军军官就有76人被士兵杀害（陆军卫戍部队军官不计其数），除维伦外，还包括斯韦阿堡基地司令布塔科夫海军上将，以及当时司令部设在赫尔辛福斯（今赫尔辛基）的波罗的海舰队总司令涅佩宁海军上将。<sup>92</sup>

这种私人复仇的渴望，只是二月革命在喀琅施塔得催生的革命极端主义的一个侧面。整座城市被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放任情绪笼罩。当然，布尔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及其他极激进团体竭力推波助澜，很快便在水兵与其他喀琅施塔得居民中获得了巨大影响力。这些团体的主要攻击目标并非军官，而是临时政府本身。在随后的数月里，他们确信水兵会支持一切针对新政权的革命行动。喀琅施塔得人在1917年4月、6月的彼得格勒街头示威中表现突出，6月时他们还支援了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后者筑起街垒抵御预期中的政

---

<sup>91</sup> 弗·弗·拉斯科利尼科夫：《1917年的喀琅施塔得与彼得堡》，莫斯科，1925年，第29-32页。

<sup>92</sup> 《波罗的海水兵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与进行中》，莫斯科，1957年，第19-22页；弗·弗·彼得拉什：《波罗的海水兵为十月胜利而斗争》，列宁格勒，1966年，第52页。

府镇压。而在动荡的七月危机中，他们一得知动乱消息便火速奔赴彼得格勒，在这场未遂起义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托洛茨基因此称他们为“革命的骄傲与荣光”。（在一桩著名事件中，一群水兵扣押了社会革命党农业部长切尔诺夫，全靠托洛茨基巧言周旋，才使他免遭私刑。）<sup>93</sup>

8月底，科尔尼洛夫将军向首都进军之际，水兵们奋起保卫革命。七月起义中充当先锋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船员，再次呼吁立即将权力转交苏维埃，并要求逮捕并处死科尔尼洛夫。四名提出抗议的军官被当场逮捕处决。<sup>94</sup>在随后的数周里，水兵们秉持着革命不妥协的一贯作风，继续施压要求推翻临时政府。10月25日，列宁发动夺权并取得成功，他们的时刻终于到来。水兵们登船赶赴首都，为起义者增援，与彼得格勒赤卫队一同猛攻冬宫；“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则发射空包弹，瓦解守军斗志。凭借十月革命中的表现，喀琅施塔得水兵赢得了托洛茨基在七月危机中赠予他们的赞誉——“革命的骄傲与荣光”。

即便克伦斯基倒台后，喀琅施塔得的革命激进势头也丝毫未减。事实上，胜利反而进一步激起了水兵对被他们推翻的社会阶层的复仇欲。他们的暴力冲动在1918年1月6日至7日

---

<sup>93</sup> 尼·尼·苏哈诺夫：《1917年俄国革命》，纽约，1955年，第444-446页。关于彼得格勒六月、七月事件，参见亚历山大·拉比诺维奇：《革命序曲》，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1968年。

<sup>94</sup> 布劳德、克伦斯基：《俄国临时政府》，第3卷，第1581-1582页。

夜间酿成了悲剧：一群激进的喀琅施塔得水兵闯入彼得格勒一家医院，杀害了卧床的临时政府两名前立宪民主党部长——辛加列夫与科科什金。遵照列宁指示，司法人民委员施坦伯格展开调查，但列宁随后改变主意，决定终止调查，以免与水兵发生正面冲突。<sup>95</sup>列宁之所以极力拉拢水兵，正是看中了他们的决绝狠厉。他极为看重这支如同禁卫军般的力量——他们随时能为苏维埃事业拿起武器。事实上，就在这起谋杀案前一晚，列宁还派遣了由激进青年无政府主义者安纳托利·热列兹尼亚科夫率领的喀琅施塔得分队，强行解散了布尔什维克未能获得多数席位的立宪会议。<sup>96</sup>水兵们反对立宪会议，自然有其自身理由。如前所述，他们对任何中央政治机构都毫无兴趣，尤其是被他们认为过于保守的政党所掌控的机构。在他们眼中，通过地方苏维埃实现直接民主，才是未来的政治方向；与之相对，全国议会只会是历史的倒退，是重回他们费尽心力推翻的、以临时政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

1918—1920年内战期间，喀琅施塔得乃至整个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始终是革命战斗精神的旗手。超过4万名水兵投身对抗白军的斗争。<sup>97</sup>他们以作战勇猛、凶悍著称，操控内河舰队与装甲列车，源源不断补充各条战线的红军兵力。在被誉

---

<sup>95</sup> 伊·尼·施坦伯格：《当我担任人民委员时》，慕尼黑，1929年，第138—163页。

<sup>96</sup> 参见保罗·阿夫里奇：《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普林斯顿，1967年，第156页。

<sup>97</sup> 帕·格·索菲诺夫：《历史转折（向新经济政策过渡）》，莫斯科，1964年，第45页。

为“俄国革命的瓦尔米”的斯维亚日斯克关键战役中，他们为托洛茨基提供了最骁勇的突击部队，助力击退了威胁布尔什维克核心腹地的大规模敌军。

然而与此同时，水兵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却在不断激化。十月政变刚一结束，列宁便宣布组建仅由布尔什维克组成的内阁，这是双方矛盾的最初信号。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对权力高度集中抱有警惕，开始呼吁建立由所有社会主义团体共同参与的联合政府——这正是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纲领的早期雏形。水兵中开始出现不祥的怨言，警告新政权可能沦为新的独裁统治。有传言称，倘若新的人民委员会胆敢背叛革命的民主理想，那么攻下冬宫的大炮，同样可以轻易调转炮口，对准新政府的总部斯莫尔尼宫。<sup>98</sup> 1917年11月，列宁因多名同僚要求吸纳其他社会主义者入阁，扬言要“去找水兵”撑腰，他显然忽略了水兵中这些敌对情绪。<sup>99</sup>

到1918年初，针对布尔什维克统治专断、官僚化的抱怨已不再是个别现象。3月，舰队经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被解散，其职能转由党派任的政委委员会接管，局势进一步恶化。对越来越多的水兵而言，革命已然遭到背叛，而当月签署的《布列斯特和约》更是极大强化了这一认知。许多水兵站在左翼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与左

---

<sup>98</sup> 沃林：《被遗忘的革命》，第200页。

<sup>99</sup> 参见夏皮罗：《共产主义专制的起源》，第74页。

翼社会革命党人一边，认为该条约是向德国帝国主义投降，是对世界革命目标的背弃。4月，波罗的海数艘舰船的船员通过一份措辞强硬的决议，指责政府计划遵照德国要求解散舰队。决议甚至号召发动总起义，推翻布尔什维克，建立更忠实恪守革命原则的新政权。此事最终无果而终，但多名水兵参与了1918年7月莫斯科的左翼社会革命党起义，突袭契卡总部，并短暂逮捕了契卡高官拉齐斯。<sup>100</sup>

10月，彼得格勒海军基地的一场群众大会通过决议，主张废除布列斯特和约，抵抗占领乌克兰的德军——不少水兵正是来自乌克兰地区。<sup>101</sup>与此同时，水兵们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垄断政治权力。他们谴责当局镇压无政府主义者与反对派社会主义者，呼吁举行苏维埃自由选举，让各左翼政党获得更广泛的代表权。最后，他们抨击政府新近推行的粮食强制征收，将粮食征募队斥为“盗贼”与“掠夺农民者”。<sup>102</sup>

1918年10月的这场兵变最终未能发动；政府军随即介入，水兵很快被恢复秩序。但他们的诉求惊人地预示了1921年喀琅施塔得的纲领，甚至包括“自由苏维埃”“打倒委员官僚制”等口号。事实上，这两起事件是一段漫长历史脉络的组成部分。

---

<sup>100</sup> 列·达·托洛茨基：《革命是如何武装起来的》（5卷合订3册），莫斯科，1923—1925年，第1卷，第140、278页。

<sup>101</sup> 格·斯·普霍夫：《彼得格勒如何武装》，莫斯科，1933年，第36页。

<sup>102</sup> 伊·弗列罗夫斯基：《1918年10月14日彼得格勒被动员水兵的兵变》，《无产阶级革命》，1926年第8期，第218—237页。

纵观 1905 至 1921 年波罗的海舰队的动向，可见诸多延续性特征，印证了曾为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布尔什维克军事领袖帕维尔·迪本科所称的水兵“永恒的反叛精神”。<sup>103</sup>多年来，他们始终对特权与权威抱有同样的憎恶，对管制怀有同样的仇恨，对地方自治与自主管理怀揣同样的梦想。此外，他们对中央政府及其任命的官员抱有强烈的对立情绪，这种对立深深植根于下层民众的无政府主义与民粹主义传统，可追溯至 17、18 世纪强大官僚国家兴起之时。

喀琅施塔得与大陆隔绝，相比波罗的海其他姊妹基地，更成为原始无政府主义反叛的堡垒。以革命热忱与独立精神著称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对任何来源的专断与强制都毫无容忍度。自发性与分权是他们的信条。他们渴望建立以地方苏维埃为根基的自由社会秩序，一种效仿哥萨克圈与中世纪市民大会的直接民众民主。他们总是容易突然爆发暴力，对抗掌权者、军官、官僚、有产者与特权阶层。1921 年 3 月，所有这些诉求都迎来了最终、也最猛烈的爆发。

与此同时，随着内战扩大，水兵的不满不断累积。与以往一样，不满的核心是军纪问题。1917 年革命使陆海军陷入彻底混乱，传统指挥体系土崩瓦解，权威真空由无数士兵与水兵委员会填补，他们自行选举领袖，对上级命令自行表决。由此产生的混乱与工业领域的状况如出一辙：地方工厂委员会在一

---

<sup>103</sup> 帕·叶·迪本科：《从沙皇舰队的深处到伟大十月》，莫斯科，1928 年，第 69 页。

家又一家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倾向于推动这种自发的分权进程。根据政府法令，传统军衔与头衔被废除，一支“社会主义”作战部队宣告成立，“基于军官选举、同志式相互纪律与尊重的原则，自下而上组建”。<sup>104</sup>但在实践中，这导致中央权威与正常指挥链彻底崩溃，并助长了俄国军人由来已久的肆意妄为、劫掠抢掠的倾向。

1918年内战爆发后，布尔什维克的军事政策迅速发生逆转。政权的生死存亡，要求结束权力的混乱分散状态，恢复部队的纪律。作为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是整治军队中蔓延的“游击习气”的核心推动者。他依照传统军事规程，迅速打造出一支高效能的新式作战部队。旧有的军衔并未恢复，但数千名前沙俄帝国军官在政治委员的严密监督下，以“军事专家”身份重返军队服役。通过这一方式，军队急需的指挥经验与技术知识得到补充，直至新一代红军指挥军官被培养成型。红军内部废除了委员会制度，严格推行命令服从，无拘无束的散漫状态被骤然终结。<sup>105</sup>

不久后，政府开始将这些措施推广至海军，却在此遭遇了更为激烈的抵抗。正如迪本科所指出的，布尔什维克试图废除舰船委员会、树立中央委派委员权威的举措，在波罗的海舰队

---

<sup>104</sup> 沃伦贝格：《红军》，第41页。

<sup>105</sup> 参见约翰·埃里克森：《苏联最高统帅部》，伦敦，1962年，第25-52页。

引发了抗议浪潮。<sup>106</sup>对素来厌恶外部强权的水兵而言，任何恢复军纪的企图，都等同于背叛他们在 1917 年为之奋战的自由。这不仅让他们回想起沙皇时代的严苛管制，他们还认为，放手发挥自身的主动性，才更能保障军队的战斗力。他们绝不容许，由自己亲手推上权力舞台的政党，剥夺他们的胜利果实。由此，基层水兵与布尔什维克政委、指挥官之间摩擦不断，在内战最激烈的阶段，他们与配合正规军作战的契卡部队间，也偶尔爆发小规模冲突。

内战结束后，局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政府的严苛政策一夜之间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正如农民不再接受粮食被强制征收、自由市场被压制，工人对工会受管控、工厂纪律恢复、一长制推行以及“资产阶级”技术专家返岗感到不满一样，水兵与士兵也要求军队生活回归民主原则。在动荡的波罗的海舰队中，反对强化军纪、废除舰船委员会、任命政委与“军事专家”担任指挥职务的情绪迅速蔓延，形成了威胁性态势。此外，几个新因素进一步助长了舰员与波罗的海卫戍部队士兵的反叛情绪。首先，白军威胁已消除，士兵们数月来首次获准休假。返乡后，他们亲眼目睹了粮食征收制及其推行过程中的暴力手段，部分人甚至被路卡队拦下、搜查非法携带的粮食。在城镇中，他们目睹了战争带来的深重人间苦难，所到之处皆是躁动不满的民众。他们聆听着父兄的抱怨，这些不满与他们

---

<sup>106</sup> 迪本科：《从沙皇舰队的深处》，第 199 页。

自身对当局的积怨如出一辙。喀琅施塔得起义领袖斯捷潘·彼得里琴科曾说：“多年来，布尔什维克的书报审查掩盖了我们在前线与海上时家乡发生的一切。返乡后，父母质问我们为何为压迫者而战。这让我们开始反思。”<sup>107</sup>不难想象，彼得里琴科这类士兵的讲述，在归队后如何加剧了战友们的不满。这对士气的打击极为严重，政府随即采取措施缩减舰队休假。1920年12月，这一举措在喀琅施塔得港内的两艘无畏舰之一“塞瓦斯托波尔”号上引发了愤怒抗议——该舰将在次年二三月的行动中扮演核心角色。1920至1921年冬，波罗的海水兵的逃兵率持续攀升，到1921年初，这支舰队作为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已濒临瓦解。<sup>108</sup>

这一时期另一大隐患，是粮食与燃料危机对舰队的冲击。水兵遭受的饥寒仅略轻于普通平民。入冬后，兵营与舰上缺乏供暖，生活苦不堪言。11月至次年4月，波罗的海地区遭遇异常严寒，却没有储备的军靴与保暖制服御寒。更糟糕的是，士兵配给粮食的数量与质量双双下滑。<sup>109</sup>伙食恶劣是俄国海军由来已久的怨言，历史上曾多次引发骚乱。而到1920年末，波罗的海舰队爆发了坏血病疫情。据流亡者在赫尔辛福斯的消息来源称，12月喀琅施塔得水兵曾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呼吁改

---

<sup>107</sup> 《纽约时报》，1921年3月31日。

<sup>108</sup> 普霍夫：《喀琅施塔得起义》，第44-54页。

<sup>109</sup> 同上，第42页；普霍夫：《1921年起义前的喀琅施塔得与波罗的海舰队》，《红色年鉴》，1930年第6期，第150-153页。

善配给，却在抵达后被当局关押。舰队司令弗·弗·拉斯科利尼科夫为部下求情，警告称若不立即释放代表，喀琅施塔得或将炮轰彼得格勒。然而，他的预言并未被理会。<sup>110</sup>

即便是舰队中身为共产党员的水兵，也无法置身于日益高涨的反对情绪之外。他们与战友们一样秉持独立精神，向来不愿轻易服从党纪与军纪。到1920年末，“舰队反对派”已然成形，它与红军中的“军事反对派”、工厂里的“工人反对派”遥相呼应，三者均主张地方主动性与党内民主，反对管制与僵化的中央集权。“舰队反对派”倡导按“社会主义”原则组建苏维埃海军，以区别于他们眼中过时的等级制与威权旧模式。他们捍卫选举产生的舰船委员会，鄙夷“军事专家”的引入，以及部分布尔什维克官员在舰队政治管理中的“独裁行径”。<sup>111</sup>

更令人警惕的是，越来越多的布尔什维克水兵认为“舰队反对派”不足以宣泄不满，进而采取了更为大胆的举动——撕毁党员证。仅1921年1月，就有约5000名波罗的海水兵退出共产党。1920年8月至1921年3月间，喀琅施塔得党组织的4000名成员流失了一半。<sup>112</sup>布尔什维克官员将此次退党风潮归咎于不可靠分子：内战期间，入党条件被放宽甚至完全取消

---

<sup>110</sup> 《共同事业》，1921年1月2日。

<sup>111</sup> 拉扎列维奇：《喀琅施塔得起义》，《斗争》，1921年第1-2期，第3页。

<sup>112</sup> 艾达·梅特：《喀琅施塔得公社：苏维埃的血色黄昏》，巴黎，1949年，第26页；科尔纳托夫斯基编：《喀琅施塔得起义》，第13-15页。

（如 1919 年 8 月的“党员周”招募运动），这类人员大量涌入党内。据党内消息称，近期的退党者大多是这些新成员。此外，作为预防措施，还有数百名未主动退党的人被清理出党，部分人被调往黑海、里海舰队或远东地区任职。<sup>113</sup>

舰队内部的政治控制权之争，进一步削弱了党的权威：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与彼得格勒党委负责人季诺维也夫就此展开角力。自 1917 年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取代季诺维也夫成为列宁最亲密的助手，季诺维也夫便一直对其心怀不满。据舰队司令费奥多尔·拉斯科利尼科夫与舰队政治部（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巴蒂斯（二人皆效忠托洛茨基）称，1920 年末的几个里，季诺维也夫试图将托洛茨基塑造成“独裁者”以败坏其名声，同时将自己标榜为党内民主与地方主动性的捍卫者。1920 年 11 月，在季诺维也夫的敦促下，彼得格勒党委要求将波罗的海舰队的政治管理权从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转归己方，这一要求遭到托洛茨基支持者的顽固抵制。<sup>114</sup>

由于这场权力争执，政委及其他党务管理人员对基层水兵的控制力大幅削弱。这一点在 12 月初便已显露：彼得格勒海军基地的一场全体大会上，大批水兵愤然退场，抗议第八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推选方式——选举显然被舰队地方政治部

---

<sup>113</sup> 《社会主义信使》，1921 年 3 月 18 日，第 1 页。

<sup>114</sup> 普霍夫：《喀琅施塔得与波罗的海舰队》，《红色年鉴》，1930 年第 6 期，第 174-194 页。参见夏皮罗：《共产主义专制的起源》，第 299 页。

的党务官员操控。入冬后，民众情绪持续激化，最终在2月15日于彼得格勒召开的波罗的海舰队共产党员第二次代表会议上达到激烈顶点。“舰队反对派”已成长为一股强大势力，其提出的立即实现政治管控分权化的决议，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决议提出，应按照季诺维也夫及其同僚去年11月的提议，将权力核心从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及其下属政治部门，移交至地方党委。决议指责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脱离群众、疏离基层党内积极分子。用决议的原话来说，该部门已沦为在基层中“缺乏广泛权威的官僚机构”；要恢复地方主动性，必须“以民主原则”重塑舰队的整个政治架构。部分代表还要求彻底废除舰队政治部门，这一诉求很快便被喀琅施塔得起义者呼应。一名党务官员警告称，若不推行改革，“两三个月内必将爆发起义”。

115

因此，到1921年2月中旬，波罗的海舰队的紧张局势已然濒临爆发点。当月未过，彼得格勒便爆发了罢工浪潮。动乱消息几乎立刻传到喀琅施塔得——自1905年与1917年以来，这里便始终保有与“红色彼得”工人阶级革命团结的传统。首批报道中混杂着各类虚假谣言，迅速点燃了水兵的情绪。例如有传言称，政府军向瓦西里岛示威者开枪，罢工领袖在契卡的地下室被枪决。<sup>116</sup>在当时的动荡氛围中，此类消息不胫而走，令

---

<sup>115</sup> 普霍夫：《喀琅施塔得起义》，第50-52页；格·彼·马克西莫夫：《运转中的断头台》，芝加哥，1940年，第169页。

<sup>116</sup> 丹：《两年漂泊》，第108页；戈德曼：《我的生活》，第876页。

当地政委们惶恐不安，库兹明也向彼得格勒苏维埃警告，若不迅速镇压罢工，必将爆发剧变。但库兹明的警告为时已晚。就在当天，2月26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与塞瓦斯托波尔号的船员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团前往彼得格勒查明实情。这两艘战列舰此刻并排冰封在喀琅施塔得港内，长期以来都是反叛情绪与活动的温床。如前所述，1917年七月危机中，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曾率先激进反抗临时政府；次月，舰上四名军官因涉嫌支持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可疑指控被枪决。因此，曾在该舰服役的帕维尔·迪本科在回忆录中毫不夸张地称其为“永远动荡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sup>117</sup>塞瓦斯托波尔号同样素有激进行事的历史，舰员不久前还因舰队缩减休假发起过骚乱。

喀琅施塔得代表团抵达彼得格勒后，发现工厂已被军队与军校学员包围。仍在运转的车间里，武装布尔什维克小队严密监视工人，水兵上前询问时，工人们皆沉默不语。即将到来的起义领袖彼得里琴科写道：“你会以为，这不是工厂，而是沙皇时代的苦役监狱。”<sup>118</sup>2月28日，代表团带着目睹景象的愤慨返回喀琅施塔得，并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上一场历史性的会议上，汇报了调查结果。

---

<sup>117</sup> 迪本科：《从沙皇舰队的深处》，第159页。

<sup>118</sup> 斯·米·彼得里琴科：《喀琅施塔得事件真相》，出版地不详，1921年，第6页；彼得里琴科：《论喀琅施塔得起义的起因》，《斗争旗帜》，1925年12月—1926年1月，第14—15期，第6—7页。

他们的报告自然对罢工者的各项诉求表示完全同情，并呼吁在工厂与舰队中实现更大程度的自决权。随后，会议投票通过了一份长篇决议，这份决议也注定成为喀琅施塔得起义的政治纲领：

“听取由舰员全体大会派往彼得格勒调查当地局势的代表所作报告后，我们决议如下：

1. 鉴于当前苏维埃未能表达工人与农民的意志，立即通过无记名投票举行新一届选举，选举前保障全体工人、农民享有充分宣传鼓动的自由；

2. 保障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及左翼社会主义政党的言论与出版自由；

3. 保障工会与农民组织的集会自由；

4. 不迟于 1921 年 3 月 10 日，召开彼得格勒、喀琅施塔得及彼得格勒省的工人、红军士兵与水兵无党派会议；

5. 释放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政治犯，以及所有因工人、农民运动相关事件被关押的工人、农民、士兵与水兵；

6. 选举委员会，重新审理监狱与集中营在押人员的案件；

7. 废除所有政治部门，任何政党均不得在宣传其思想时享有特权，也不得为此接受国家财政支持；取而代之的是设立由地方选举产生、由国家出资的文化教育委员会；

8. 立即撤除所有路卡队；

9. 实现全体劳动者配给平等，有害健康工种从业者除外；

10. 废除军队各兵种中的布尔什维克战斗分队，以及工厂、作坊中的布尔什维克警卫队；若确有必要设立此类警卫或分队，军队中须从基层士兵中选拔，工厂、作坊中须由工人自主决定；

11. 保障农民对土地的完全自主处置权，以及饲养牲畜的权利，前提是农民依靠自身劳作经营，即不使用雇佣劳动；

12. 呼吁军队各兵种及军校学员同志们拥护本决议；

13. 要求报刊对本决议进行广泛宣传；

14. 设立巡回监督局；

15. 允许依靠自身劳动开展自由手工业生产。

分舰队大会主席 彼得里琴科 秘书 佩列佩尔金<sup>119</sup>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决议，不仅道出了波罗的海舰队的不满，更反映了全国城乡广大俄国民众的心声。水兵们本就出身平民阶层，他们希望为身为农民与工人的亲眷争取解脱。事实上，决议的 15 项条款中，仅有一项——废除舰队政治部门——是专门针对自身处境提出的，其余内容均直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水兵与广大民众看来，这项政策的存在合理性早已

---

<sup>119</sup> 《论喀琅施塔得》，第 46-47 页；伯克曼：《喀琅施塔得起义》，第 9-11 页。

荡然无存。包括彼得里琴科在内，部分决议发起者不久前刚返乡休假，亲眼目睹了村民的困境，这无疑影响了他们代表农民提出的各项诉求，第 11 条尤为典型：该条款允许农民在不使用雇佣劳动的前提下自由处置土地。这一主张的实质，无异于要求废除粮食征收制，甚至可能连带取消国营农场。同样，水兵对彼得格勒工厂的实地考察，也解释了为何他们将工人的核心诉求——撤除路卡队、废除特权配给、解散工厂武装小队——纳入了自身纲领。

但布尔什维克当局得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会议的消息后，真正为之警觉的并非这些经济诉求。事实上，其中部分要求（如第 8 条撤除路卡队），季诺维也夫及其彼得格勒的下属本就即将应允。此外，就在此时，政府正着手起草一项新经济政策，其满足民众意愿的力度将远超水兵的纲领。真正促使当局下令立即镇压喀琅施塔得运动的，是那些直指布尔什维克专政核心的政治诉求。诚然，水兵并未呼吁推翻苏维埃政府，也没有主张恢复立宪会议，或是为贵族与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利。他们依旧像以往一样蔑视俄国社会中的温和派与保守势力，从未想过给这些势力东山再起的机会。然而，决议开篇便宣称“当前苏维埃未能表达工人与农民的意志”，这显然是对布尔什维克政治权力垄断的挑战。要求重新选举苏维埃代表，并同时保障全体工人、农民与左翼政治团体的言论自由，这是列宁及其追随者绝不能容忍的。实质上，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决议是在要求苏维埃政府恪守自身宪法，大胆重申列宁本人在

1917年曾公开主张的各项权利与自由。其精神内核是向十月革命的初心回归，重拾“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一列宁主义的旧口号。但布尔什维克却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水兵否认他们是革命的唯一守护者、否认他们是工农的唯一代表，在布尔什维克眼中，这无异于一份反革命宣言，必须予以严厉镇压。

随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决议的通过，事态发展骤然加速。次日，3月1日，水兵、士兵与工人在锚广场召开群众大会。约15000人参会，占喀琅施塔得军民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我们如今能看到多份目击者记述，既有共产党方面的，也有无党派来源的<sup>120</sup>，这些材料共同生动、细致地还原了当时的场景。讲台旁站着两名布尔什维克高级官员——米·伊·加里宁与尼·尼·库兹明，他们是从彼得格勒赶来挽回局势的。据部分报道称，季诺维也夫曾陪同同僚抵达奥兰宁鲍姆，但因担心遭到水兵粗暴对待，便决定不再继续前行。<sup>121</sup>加里宁是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出身特维尔省农民家庭，曾是工厂工人，普通俄国民众似乎对他抱有一定好感。此前一周，他是彼得格勒少数能获得罢工者同情倾听的布尔什维克演说者之一。或许正因如此，当局认为他的声望或许能帮助劝服水兵冷静下来。

---

<sup>120</sup> 弗·库兹涅佐夫：《一名政治工作者的回忆》，莫斯科，1930年，第67-68页；《革命俄罗斯》，1921年第7期，第20页；格·阿·切列尚斯基：《1921年2月28日—3月18日喀琅施塔得起义》，手稿，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档案馆。另见普霍夫：《喀琅施塔得起义》，第61页；科尔纳托夫斯基编：《喀琅施塔得起义》，第71-72页。

<sup>121</sup>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起因、缘由、进程与评价》，手稿，胡佛档案馆；夸顿致国务卿，1921年4月23日，国家档案馆，档案号861.00/8619；《新俄罗斯生活》，1921年3月6日。

加里宁抵达时，迎接他的是乐曲、旗帜与仪仗队，这一充满希望的迹象表明，严重的冲突仍可避免。此外，锚广场大会以友好氛围开幕，由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主席帕·德·瓦西里耶夫亲自主持。但当派往彼得格勒调查动乱的代表团报告被宣读时，人群情绪开始激化。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决议提交大会表决时，群情激愤达到顶点。加里宁起身发言反对决议，却不断被起哄者打断：“别说了，加里内奇，你倒是吃得饱、穿得暖。”“看看你身兼数职，我敢肯定好处捞够了。”“我们自己知道需要什么。至于你，老家伙，回去陪你的女人吧。”加里宁竭力想让众人听见自己的声音，却被口哨与嘘声彻底淹没。

库兹明是隶属于舰队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高级政委，他也遭到了同样的对待。他试图博得人群的关注，提醒众人他们在革命与内战中建立的英雄功绩。突然一个声音打断他：“你忘了在北方面军你是怎么下令每十人枪毙一人的吗？把他赶下去！”这句话的具体所指尚不明确，但或许内战期间库兹明曾在北方面军（阿尔汉格尔斯克与摩尔曼斯克地区）担任政委，参与过在兵变或其他违纪事件后处决红军士兵的行动。（此类事件并非个例。曾发生过一桩臭名昭著的事件：一批彼得格勒新兵在伏尔加河劫持一艘轮船，逃往下诺夫哥罗德；托洛茨基下令，一艘临时改装的炮艇截住了逃兵，战地法庭判处指挥官、政委以及队伍中每十人中的一人死刑。）<sup>122</sup>无论缘由如何，库兹明

---

<sup>122</sup> 参见埃里克森：《苏联最高统帅部》，第39页。

发出了威胁性的回应：“劳动人民向来枪决事业的叛徒，今后也会继续这样做。换作是你们，恐怕会每五人枪毙一人，而非每十人。”“够了！”有人喊道，“你别想威胁我们，把他赶出去！”数分钟内，嘲讽与起哄让库兹明哑口无言。随后他做最后一次发言尝试，谴责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决议是反革命文件，高呼无纪律与叛国行为必将被无产阶级的铁腕粉碎——话音刚落，他便在一片震天的嘘声中被赶下讲台。<sup>123</sup>

加里宁与库兹明下台后，讲台便交由水兵与士兵掌控。他们轮番上台，猛烈抨击当局：粮食与燃料匮乏、粮食被强制征收、路卡林立，而最让他们愤怒的是，内战结束数月后，困境依旧看不到尽头。他们声称，普通民众饱受苦难，政委们却衣食无忧、温暖安逸。主要演说者之一是彼得里琴科，他是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的高级文书，也是起义自始至终的领袖。他沿用了昔日针对古莫斯科公国波雅尔与官员的民间传统说法，指责布尔什维克“向人民隐瞒真相”。我们稍后便会看到，这类民间传说深深植根于起义者的心理之中，在其颇为朴素的认识形态中占据核心地位。彼得里琴科呼吁人群拥护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决议（决议上有他的签名），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苏维埃自由选举。

随后，该项决议付诸表决，并在加里宁、库兹明与瓦西里

---

<sup>123</sup> 伯克曼：《布尔什维克神话》，第294页；谢尔盖：《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第127页。

耶夫的反对声中，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接下来，会议决定召开一次特别会议，筹备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的重新选举——该苏维埃的任期，无论如何，似乎恰好在当日届满。最后，会议投票决定派遣一个由 30 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彼得格勒，向当地民众说明其诉求，并请求彼得格勒方面派遣无党派代表前往喀琅施塔得，实地了解当地局势。这些如期出发的代表抵达后便遭逮捕，从此杳无音信。<sup>124</sup>集会散去后，加里宁与库兹明前往当地党部，商议下一步行动。当时在彼得格勒阿斯托里亚酒店关注事态发展的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称，加里宁随后仍秉持友好态度离开了喀琅施塔得。<sup>125</sup>但结合刚刚发生的一切，这一说法令人难以置信。据苏联方面资料记载，加里宁在彼得格勒门被扣留了一段时间，才获准离开该岛；而我们从事后在芬兰接受采访的起义者本人处得知，许多水兵本想将他投入监狱，但有人劝阻称，此举会违背他们自己在决议中阐明的自由原则，这才作罢。<sup>126</sup>无论如何，这一细节并非关键。可以明确的是，随着水兵们的决议在锚地广场获得通过，事态急剧转向彻底的兵变。

对于这一事态发展，维克多·塞尔日将责任直接归咎于加里宁与库兹明，他称二人态度粗暴、言辞拙劣，势必激起水兵

---

<sup>124</sup> 《喀琅施塔得真理报》，第 10 页。

<sup>125</sup> 戈德曼：《我的生活》，第 877 页。

<sup>126</sup> 普霍夫：《喀琅施塔得叛乱》，第 62 页；《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访谈录（“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水兵亚科文科、卡尔片科、阿尔希波夫访谈）》，手稿，胡佛图书馆。

的愤怒。塞尔日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两名官员非但没有平息愤怒的喀琅施塔得人，反而将他们视作无赖与叛徒，并威胁称，若不悔改，将对其施以无情报复。<sup>127</sup>这一说法显然有所夸大，因为这场爆发的兵变有着远比挑衅性言辞更为深刻的根源。此外，水兵们似乎本就有意挑衅共产党人，几乎不让对方说完一句话，便以呼喊与嘘声打断。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加里宁与库兹明在如此情绪激动的听众面前，本应表现得更为审慎。毫无疑问，他们不得体的言辞，加剧了水兵对布尔什维克当局的敌对情绪。与此同时，喀琅施塔得的共产党人未能抵制锚地广场会议的各项决定，这让当局大为震惊。尽管在场的布尔什维克普通党员人数众多，他们却似乎被反叛浪潮裹挟；当加里宁与库兹明发声抗议时，除瓦西里耶夫外，没有一名布尔什维克同志站出来支持他们。事实上，大多数人显然投票赞成“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决议，其余人则投了弃权票。正如伦纳德·夏皮罗所指出的，正是这一特征，使喀琅施塔得起义区别于此前所有针对苏维埃政府的暴动。<sup>128</sup>

次日，3月2日，这场初露端倪的暴动又向前推进一步。由锚地广场集会发起召集的会议正式召开，目的是筹备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的重新选举。约300名代表出席会议，每艘军舰、军事单位、工厂、工会等机构各选派两名代表，均于当天清晨

---

<sup>127</sup> 塞尔日：《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第127页。

<sup>128</sup> 夏皮罗：《共产主义专制的起源》，第303页。参见乔治·卡特科夫：《喀琅施塔得起义》，《圣安东尼论丛》第6辑，伦敦，1959年，第28页。

或前一晚仓促选出。共产党人显然未能像过去那样主导这些选举会议、自行挑选代表。他们在向同志们讲话时，遭到了与前一天加里宁、库兹明同样的诘问与打断。例如，在主力卫戍区，布尔什维克政委刚来得及对此次不合常规的程序表示反对，就被主管炮兵的“军事专家”——前沙皇将军科兹洛夫斯基打断。此人将在本文叙述中占据重要位置。“你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科兹洛夫斯基宣称，“现在该由我来做该做的事。”当天上午，类似场面很可能在其他部队重演。尽管当选代表大多为无党派人士，共产党人仍成功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少数席位，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sup>129</sup>

会议在教育大厦的大礼堂举行，这里曾是海洋工程学院，也是喀琅施塔得城内最显眼的建筑之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武装水兵驻守在楼外及大厅，防止会议受到任何干扰。他们的出现，或许也意在威慑任何试图维护现有秩序的人。不出所料，主持会议的正是该舰水兵佩特里琴科。如前所述，他从一开始就在喀琅施塔得运动中扮演领导角色，并一直担任这一角色，直到两周多后悲剧落幕。斯捷潘·马克西莫维奇·佩特里琴科出身乌克兰农民家庭，具备起义领袖的诸多特质。他约三十岁，是一名情绪强烈的年轻水兵，相貌英俊、体格结实，性格坚毅而富有魅力，赢得了忠实的追随者。尽管带

---

<sup>129</sup> 普霍夫：《喀琅施塔得暴动》，第63页。关于3月2日会议的细节，参见《关于喀琅施塔得的真报》，第115—117页；以及《革命俄罗斯》，1921年第7期，第21—22页。

着乌克兰口音，他讲话却简洁直白、极具感染力，体现出农民出身的背景。他是经验丰富的海员，1912年加入海军，距卷入这场悲剧事件已近十年。此前，他曾在家乡做水管工。各种记载都表明，他虽只受过两年正规小学教育，却拥有敏锐的智力。此外，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都公认他精力充沛、足智多谋。

130

会议由佩特里琴科主持，开幕后首先选举产生了五人主席团。代表们随后听取了数场发言，接着便转入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筹备苏维埃的新一届选举。最先登上讲台的是共产党人库兹明与瓦西里耶夫，二人前一日曾在锚地广场反对《彼得罗甫洛夫斯克号决议》。此番，他们依旧秉持批判立场，令在场听众大为惊愕。库兹明的发言尤其激起了代表们的愤慨。他提醒众人，苏维埃俄国与波兰尚未正式缔结和约，并警告称，政权层面的任何分裂——任何双重政权（*dvoevlastie*）局面——此时都可能诱使毕苏斯基元帅重启敌对行动。他称，西方各国正紧盯苏维埃俄国，伺机寻找其内部虚弱的迹象。谈及彼得格勒的骚乱，库兹明继续说道，喀琅施塔得方面严重误判了事件的严重性与波及范围。骚乱确曾短暂爆发，但旋即平息，如今彼得格勒已恢复平静。其间，库兹明还提及波罗的海舰队内部的动荡，为他本人这类政委的行为辩解——水兵们在近期

---

<sup>130</sup> 参见《俄罗斯意志》，1921年3月15日；《革命俄罗斯》，1921年第8期，第6—7页；《纽约时报》，1921年3月31日；以及埃德蒙·斯特拉顿1921年3月19日对佩特里琴科的采访，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号 861.00/8470。

集会中曾将这些政委视作嘲讽对象。这番话自然难以取悦听众。但最令他们怒火中烧的，是库兹明的结束语，其中暗含的威胁与他前一日发言如出一辙。“你们现在可以随意处置我，”他对众人说道，“只要你们愿意，甚至可以枪毙我。但倘若你们胆敢向政府举起双手，布尔什维克必将拼尽最后一丝力量抗争到底。”<sup>131</sup>

库兹明这番挑衅的口吻，让听众彻底与之离心离德。考虑到会场内一触即发的氛围，采取更为圆滑稳妥的态度本是理所应当。但他的言论并非毫无依据。彼时，苏波双方确实尚未签署和约（双方自10月起停火，和平谈判正在里加进行），在法国军官再度支持下，波兰重启武装干预的威胁不容小觑。彼得格勒的地理位置仍极为暴露，苏维埃官员切实担忧，任何内部动荡的迹象都可能强化波兰在谈判桌上的立场，甚至导致战争全面重启。此外，彼得格勒的罢工浪潮确实已趋于平息，其高潮出现在2月最后一天。但有关枪击与大规模骚乱的传言已然煽动了水兵的情绪；3月2日，当骚乱近乎平息之际，他们却起草了一则失实的通告（将于次日发布），宣称彼得格勒正陷入“总起义”的动荡之中。<sup>132</sup>这一误判让喀琅施塔得人误以为大陆正掀起大规模暴动，从而备受鼓舞，最终投身于一系列严重的行动，不少人事后都将为此追悔莫及。

---

<sup>131</sup> 《关于喀琅施塔得的真理报》，第116页。

<sup>132</sup> 同上，第47页。

库兹明下台后，已解散的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也以类似口吻向大会发言。等到他讲完，尽管代表中仍有大批共产党人，会场的整体态度已明显转向反布尔什维克。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指出的，水兵们的敌意并非针对政党本身，而是针对其官僚与政委——在他们看来，库兹明和瓦西里耶夫的发言正是这些人傲慢态度的集中体现。伯克曼说，库兹明的讲话无异于“把火把扔进了火药桶”。<sup>133</sup>代表们怒不可遏，这几名倒霉的官员，连同喀琅施塔得战列舰分舰队的政委（一位名叫科尔舒诺夫的布尔什维克，其管辖范围包括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一道被逮捕并带离会场。这是一次公然的抗命行为，远比前一天短暂扣留加里宁更为严重，标志着事态朝着公开兵变的方向迈出了巨大一步。不过，代表们否决了逮捕在场其他共产党人并解除其武装的动议。尽管有直言不讳的少数派表达了强烈的反布尔什维克情绪，但大多数代表仍决心恪守《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决议》的原则——这份他们新兴运动的纲领，保障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所有左翼政治团体的发言权。

逮捕三名官员的行为虽性质严重，却还并非不可挽回的一步。然而，这样的一步很快便到来了。卫兵将被捕者带出礼堂后，佩特里琴科重新召集会议恢复秩序。《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决议》按照此时已然固定的仪式被大声宣读，并再次获得

---

<sup>133</sup> 伯克曼：《喀琅施塔得叛乱》，第12—13页。

热烈通过。随后，会议转入议程主要事项：选举新的苏维埃。但突然之间，他们被台下一个声音打断。说话的是一名来自塞瓦斯托波尔号的水兵，他高声喊道：“15 卡车满载步枪和机枪的共产党人正赶来驱散会议。”这一消息不啻一枚炸弹，使代表们陷入恐慌与混乱。经过一阵极大的骚动后，会场才恢复足够平静，会议得以继续。有人提议派遣新代表团前往彼得格勒，与罢工工人结成同盟，但因担心遭到更多逮捕而被否决。随后，出于对布尔什维克可能发动进攻的不安，会议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决定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负责在新苏维埃组建之前管理城市与卫戍区。由于来不及举行正式选举，会议的五人主席团被指定为临时革命委员会，佩特里琴科担任主席。通过这一行动，喀琅施塔得运动超出了单纯抗议的界限，叛乱就此开始。

134

因此，谣言再一次在喀琅施塔得事件的走向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库兹明与瓦西里耶夫的演说激起了代表们的愤慨，为随后发生的鲁莽行动埋下了伏笔。但真正促使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是一则虚假传言——称共产党人正准备袭击此次会议，正是这一传言让水兵们迈出了越过起义底线的关键一步。究竟是谁散布了这则谣言？据彼得里琴科所言，这是共产党人自导自演，目的是解散此次会议。<sup>135</sup>尽管这种说法并非没有可能，

---

<sup>134</sup> 《关于喀琅施塔得的真理报》，第 46 页。参见罗伯特·V·丹尼尔斯：《1921 年喀琅施塔得暴动：革命动力学研究》，《美国斯拉夫与东欧评论》，第 X 卷（1951 年 12 月），第 244 页；以及约翰·G·赖特：《关于喀琅施塔得的真相》，纽约，1938 年。

<sup>135</sup> 《革命俄罗斯》，1921 年第 8 期，第 8 页。

但并无证据佐证事实确系如此。同样有可能的是，高喊这一消息的水兵只是想煽动众人反对共产党人。值得注意的是，彼得里琴科本人也采信了这则谣言，并宣称一支由 2000 名共产党人组成的分队确实正前来驱散会议。会场再度陷入一片混乱，代表们群情激愤地离开了会场。<sup>136</sup>

这则谣言的产生，或许源于一个事实：在教育之家的会议进行期间，有人看到一批由喀琅施塔得契卡一名成员带队的共产党人学员，离开了高级党校。然而，他们非但无意袭击会议，实则是要从喀琅施塔得逃往红戈尔卡——一座位于西南方向大陆上的要塞。前一天发生的另一起事件，或许也加剧了起义者的恐慌。锚地广场集会结束后，一批忠于布尔什维克的人士确实曾考虑采取军事行动以阻止叛乱爆发。喀琅施塔得要塞政委诺维科夫甚至从军火库调取了轻型火炮与机枪。但当他们明显意识到此举缺乏足够支持时，诺维科夫一伙便决定撤离该岛。诺维科夫本人在卡累利阿海岸附近的托特列边要塞遭拦截，却最终骑马踏冰成功逃脱。<sup>137</sup>

无论如何，起义者并未坐以待毙。新成立的临时革命委员会将指挥部设在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上，两天前，所有的动荡正是由此发端。委员会行动极为迅速，派遣武装分队占领了军火库、电话局、粮食仓库、抽水站、发电厂、契卡总部

---

<sup>136</sup> 《喀琅施塔得真理报》，第 117 页。

<sup>137</sup> 同上，第 12、48 页。

及其他战略要点。至午夜，全城已在未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被控制。此外，所有军舰、要塞与炮兵阵地均承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当天早些时候，《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决议》的文本已由信使送往大陆，在奥拉宁鲍姆、彼得格勒及周边其他城镇分发。当晚，奥拉宁鲍姆海军航空中队承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并派代表踏冰前往喀琅施塔得。起义开始向外蔓延。

次日，3月3日，临时革命委员会开始发行日报——《喀琅施塔得市水兵、红军战士与工人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该报不间断出版至16日，即对起义者发起决定性进攻的前一天。在创刊号中，委员会主席彼得里琴科向喀琅施塔得民众呼吁支持：

“同志们、公民们，临时委员会决心不让一滴鲜血流淌……临时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通过友好协作，在本市与要塞内为公平、正当的新苏维埃选举创造条件。因此，同志们，为了秩序，为了安定，为了坚定，为了全新且正直的、能增进全体劳动人民福祉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sup>138</sup>

同日，革命委员会禁止未经特别许可离开城市，取消所有军人休假，并实施晚11时宵禁，同时组建地方革命三人小组<sup>139</sup>，此举俨然效仿季诺维也夫成立的彼得格勒临时防御委员会。

---

<sup>138</sup> 同上，第46页。

<sup>139</sup> 同上，第49页；普霍夫：《喀琅施塔得叛乱》，第69页。

喀琅施塔得已无回头之路。三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被关押，起义者全面掌控城市，与苏维埃政府的实力较量已不可避免。

## 第三章

# 喀琅施塔得与俄国流亡者

从一开始，苏联当局就意识到了喀琅施塔得动荡局势的危险性。当时俄国国内民怨沸腾，水兵起义极易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大规模暴动。外部势力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更是加剧了担忧，而喀琅施塔得地处涅瓦河入海口的战略位置，使彼得格勒陷入严重危机。布尔什维克党人不难联想到历史先例：四年前，军队中的兵变，加之旧都的罢工与示威游行，最终导致了专制政权的倒台。如今，他们自己的政权正面临着相似的威胁。倘若“红色喀琅施塔得”与“红色彼得格勒”都能倒戈反对政府，全国其他地区又会做出何等举动？

因此，布尔什维克竭尽全力诋毁起义者，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并非易事，因为喀琅施塔得素来有着革命忠诚的声誉。1917年，托洛茨基本人曾将喀琅施塔得水兵称作俄国革命的“骄傲与荣光”。可此时，他却竭力辩称，如今的这些水兵早已不是四年前那些忠诚的革命者，而是一批面目全然不同的新势力。托洛茨基声称，在内战中，数千名喀琅施塔得的中坚力量已然

牺牲，幸存的许多人此后也散落于全国各地。最优秀的骨干已然离去，舰队的队伍里充斥着来自乌克兰与西部边境地区的农民新兵，这些人对革命斗争大多漠不关心，有时还因阶级与民族差异，公开敌视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还进一步指控，这批新兵中有许多人来自马赫诺、格里戈里耶夫及其他反苏游击队拥有大量追随者的地区，他们身上带着“无政府匪帮思想”——事实上，其中部分人甚至曾在这些游击武装，或是邓尼金、弗兰格尔的白军中作战。<sup>140</sup>

在布尔什维克的描绘中，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与革命及内战时期的前辈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与心理构成”：往坏了说，他们是腐化堕落、桀骜不驯的粗人，目无纪律、满口污言秽语，沉迷赌博酗酒；往好了说，他们不过是“身着水兵服的农家子弟”，是穿着喇叭裤、梳着抹满发油的蓬巴杜发型博取女性青睐的质朴乡巴佬<sup>141</sup>。布尔什维克称，这些来自农村的新兵蛋子，被资深水兵安上了各式各样的辱骂性绰号：克利什尼基（Kleshniki，源于他们偏爱的宽腿裤）、若尔日基（Zhorzhiki，即打扮花哨的乡巴佬），而最不堪的是伊万莫里（Ivanmory，意为“海上乡巴佬”），这是对内战老兵引以

---

<sup>140</sup> 托洛茨基：《革命是如何武装起来的》，第3卷第1部分，第203-204页；普霍夫：《喀琅施塔得叛乱》，第40-41页；科尔纳托夫斯基编：《喀琅施塔得叛乱》，第12-13页；姆·勒·卢列：《1921年喀琅施塔得叛乱在苏俄与白俄文献报刊中的记述》，《红色编年史》，1931年第2期，第226页。

<sup>141</sup> 斯列普科夫：《喀琅施塔得叛乱》，第20页；普霍夫：《喀琅施塔得叛乱》，第42页；列夫·托洛茨基：《关于喀琅施塔得的喧嚣》，《新国际》，1938年4月，第104页。

为傲的“海军战士”（Voenmory）称号的讽刺性仿称。<sup>142</sup>

这些描述究竟有多准确？毫无疑问，内战期间，波罗的海舰队确实发生了大规模人员更替，许多老水兵被来自农村地区的应征者取代，而这些新兵身上带着俄国农民阶层极为强烈的不满情绪。根据官方数据，到1921年，超过四分之三的水兵出身农民阶层，这一比例远高于1917年——当时舰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彼得格勒地区的产业工人<sup>143</sup>。彼得里琴科本人后来也承认，他的许多战友都是来自南方的农民，因家乡村民的悲惨处境而被激怒。但这并不意味着舰队的行为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相反，除了主要来自工人阶级的技术水兵外，水兵中向来存在大量桀骜不驯的农民成分，他们缺乏纪律，稍有刺激便容易失控。事实上，1905年和1917年，正是这些来自农村的青年，让喀琅施塔得获得了“革命极端主义温床”的名声。而整个内战期间，喀琅施塔得人始终保持着独立、固执的特质，难以控制，对政府的支持也远非始终如一。正因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长期闹事者和不满分子——被调往远离布尔什维克权力中心的新岗位。而留下来的人里，许多人渴望重新获得1917年赢得的自由，那是在新政权开始在全国建立一

---

<sup>142</sup> 科尔纳托夫斯基编：《喀琅施塔得叛乱》，第21页；姆·库兹明：《喀琅施塔得叛乱》，列宁格勒，1931年，第17页。参见卡特科夫：《喀琅施塔得起义》，《圣安东尼论文集》第6辑，第21页。

<sup>143</sup> 参见普霍夫《喀琅施塔得叛乱》第43页的数据；彼得拉什《波罗的海舰队水兵》第20-21页；以及阿·弗·博格丹诺夫《1917年的波罗的海水兵》，莫斯科，1955年，第15页。

党专政之前的自由。

实际上，老水兵与新兵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别。两者大都出身农民；前者在休假期间、后者在入伍前，都亲眼目睹了家乡的苦难；两者都渴望摆脱中央政府的强制权力。不出所料，当起义最终爆发时，正是服役多年的老水兵（部分甚至在一战前就已入伍）站到了领导位置。彼得里琴科早在 1912 年就加入舰队，1918 年起一直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服役。临时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资深水兵亚科文科，曾在 1917 年参加过街垒战斗。凭借成熟与经验，更不用说他们作为革命亲历者所感受到的深刻幻灭，这些经验丰富的水兵自然被推到了起义的最前线。高级水兵和合格技术人员尤其如此（例如彼得里琴科就是战列舰上的高级文书），他们都是从最机敏、有文化的新兵中精心选拔出来的，习惯于自主行动。此外，彼得格勒近在咫尺，其浓厚的思想与政治氛围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其中许多人在 1917 年及之后都参与过革命活动。<sup>144</sup>

喀琅施塔得人长期以来被视为革命战斗精神的火炬手，尽管他们性情冲动、纪律涣散，这一名声在内战期间基本未受损害。艾玛·戈德曼回忆道，直到 1920 年秋，共产党人自己仍将这些水兵奉为英勇无畏、意志坚定的光辉典范；在 11 月 7 日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三周年纪念日，他们站在庆祝队伍的最前

---

<sup>144</sup> 参见德·费多托夫·怀特《红军的成长》，普林斯顿，1944 年，第 155 页；以及沃林《不为人知的革命》第 411-412 页。

列，在彼得格勒重演攻打冬宫的一幕，赢得了群众的热烈欢呼。<sup>145</sup>当时没有人提及喀琅施塔得存在任何“阶级退化”。所谓政治落后的农民冲淡了舰队革命性质的说法，看上去很大程度上只是为水兵中的异见运动开脱的借口，而且早在1918年10月彼得格勒海军基地未遂兵变之后就已被使用，而当时舰队的社会构成尚未发生任何根本性改变。

称喀琅施塔得人大多是非俄罗斯人——来自乌克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对苏维埃政权怀有强烈民族对立情绪的应征者——这一指控同样值得仔细审视。在起义运动的刊物中，约三四百个名字作为文章、宣言、信件、诗歌等的签署者出现。仅从这些姓氏判断——诚然这并非绝对可靠的方法——俄罗斯人占绝大多数。乌克兰人、日耳曼人、波罗的海居民或其他族裔的姓名比例并无异常。然而，当我们审视起义的领导机构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时，情况便有所不同<sup>146</sup>：

1. 彼得里琴科，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高级文书
2. 亚科文科，喀琅施塔得地区电话接线员
3. 奥索索夫，战列舰“塞瓦斯托波尔”号机械师

---

<sup>145</sup> 埃玛·戈德曼：《托洛茨基抗议得太过了》，格拉斯哥，1938年，第7页。

<sup>146</sup> 《喀琅施塔得真理报》，第131、158页。另一份附有成员相关评论的名单见《喀琅施塔得起义是如何爆发的》，米勒档案，5M档，第5号。

4. 阿尔希波夫，高级机械师
5. 佩列佩尔金，战列舰“塞瓦斯托波尔”号电工
6. 帕特鲁舍夫，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高级电  
工
7. 库波洛夫，高级医助
8. 韦尔希宁，战列舰“塞瓦斯托波尔”号水兵
9. 图金，机电厂工人
10. 罗曼年科，干船坞看守
11. 奥列申，第三工人学校校长
12. 瓦尔克，锯木厂工人
13. 帕夫洛夫，水雷厂工人
14. 巴伊科夫，要塞建筑处运输主任
15. 基尔加斯特，远洋航海员

在15名委员会成员中，三人（彼得里琴科、亚科文科、罗曼年科）显然是乌克兰姓氏，另有两人（瓦尔克、基尔加斯特）是日耳曼姓氏。此外，彼得里琴科、亚科文科和基尔加斯特分别担任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秘书等关键职务。据苏联资料记载，彼得里琴科的民族情绪极为强烈，以至于舰上同伴以著名

乌克兰领袖之名给他起绰号“彼得留拉”。<sup>147</sup>而彼得里琴科本人也承认，喀琅施塔得卫戍部队“四分之三”是乌克兰人，其中一些人在加入苏联海军前曾在南方的反布尔什维克部队中服役。

148

这一切表明，民族情绪或许在起义爆发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缺乏更多证据，其具体作用大小仍无法确定。相比之下，委员会成员卑微的社会出身则要清晰得多。水兵（通常出身农民与工人阶级）占绝大多数，显然有 9 人，大多是来自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与塞瓦斯托波尔号的技术水兵，这两艘战舰正是此次起义的火药桶。此外还有 4 名工人与 2 名白领职员（一名校长与一名交通官员）。因此，这场运动的领导层无可否认是平民阶层，与白军领导层截然不同，这显然令苏维埃当局十分难堪，他们不遗余力地证明，起义头目实则出身反无产阶级的社会群体。韦尔希宁是塞瓦斯托波尔号的水兵，在起义初期便落入布尔什维克手中，被污蔑为“投机商”与打扮花哨的乡巴佬（即若尔日基）。更有甚者，帕夫洛夫被指为前侦探，巴伊科夫是喀琅施塔得的有产者，图金则是前宪兵，曾在彼得格勒拥有不下 6 栋房屋与 3 家店铺。据报道，另一名委员会成员基尔加斯特，曾因在喀琅施塔得交通部门挪用公款被判有罪，却

---

<sup>147</sup> 《红色报》，1921 年 3 月 11 日。

<sup>148</sup> 彼得里琴科等人致弗兰格尔将军，1921 年 5 月 31 日，吉斯档案，88 档；美国驻赫尔辛基代办致国务卿，1921 年 4 月 22 日，国家档案馆，861.00/8628。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三周年的大赦中获释。<sup>149</sup>

起义被镇压后很久，抹黑临时革命委员会的行动仍在继续。除了诋毁成员的人格，苏联作者还试图将他们与政治反对派绑定。彼得里琴科被反复指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瓦尔克与罗曼年科为孟什维克，奥列申为民粹社会主义者。另一位人物拉马诺夫，据称是这场运动的主要意识形态理论家与日报主编，是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成员。<sup>150</sup>遗憾的是，尚无可靠信息证实或否认这些党派归属。但从当时的苏联档案中可知，彼得里琴科是“前共产党员”，他于1919年8月“党员周”招募运动中入党（当时常规入党条件暂停执行），并在之后的重新登记期间退党。<sup>151</sup>

彼得里琴科与共产党的短暂关联并非个例——革命委员会秘书基尔加斯特便是又一典型。成千上万的波罗的海水兵都走过同样的历程。到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的党员人数仅为半年前的一半。部分脱党者抓住一切机会返乡休假。彼得里琴科于1920年4月回到家乡村庄，显然一直待到9月或10月，他有充足的时间亲眼目睹布尔什维克征粮队的所作所为，并对

---

<sup>149</sup> 《彼得格勒真理报》，1921年3月11日；科尔纳托夫斯基编：《喀琅施塔得叛乱》，第34页；普霍夫：《喀琅施塔得叛乱》，第77页。

<sup>150</sup> 斯列普科夫：《喀琅施塔得叛乱》，第33页；科尔纳托夫斯基编：《喀琅施塔得叛乱》，第156页注释；伊·瓦尔金：《革命与孟什维主义》，莫斯科，1925年，第140页。关于拉马诺夫与最高纲领派的更多内容将在第五章详述。

<sup>151</sup> 《红色报》，1921年3月11日。参见科尔纳托夫斯基编：《喀琅施塔得叛乱》收录的档案文献，第228页。

政府积攒下强烈的敌意。他后来对一位美国记者称，当局曾因怀疑他从事反革命活动多次逮捕他。他甚至曾试图加入白军，却因曾是布尔什维克而被拒之门外。但他坚称，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与任何政治团体均无关联。“我们的起义，”他说，“是一场摆脱布尔什维克压迫的自发运动；一旦实现这一目标，人民的意志便会彰显出来。”<sup>152</sup>

布尔什维克宣传的核心目的，是证明这场起义并非民众自发的抗议爆发，而是沿袭内战模式的新一轮反革命阴谋。据苏联媒体宣称，水兵在队伍内部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下，无耻地投靠了由前沙皇将军科兹洛夫斯基领导的“白卫军”。《真理报》宣称：“在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的背后，前沙皇将军们早已露出獠牙。”<sup>14</sup> 据称，这是俄国流亡者在巴黎与法国反间谍机构勾结、精心策划的阴谋的一部分。此外，一系列红十字组织——国际红十字会、美国红十字会以及驻芬兰俄国红十字会——被指控为阴谋者充当掩护。3月2日，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以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科兹洛夫斯基将军及其同伙为非法，并斥责《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决议》是一份“黑色百人团—社会革命党”文件。戒严令从彼得格勒市扩大至整个省份，季诺维也夫领导的防御委员会获得处置起义的紧急权力。<sup>153</sup>

---

<sup>152</sup> 《纽约时报》，1921年3月31日；夸顿致国务卿，1921年4月9日，国家档案馆，861.00/8740。

<sup>153</sup> 同上，1921年3月3日。

布尔什维克发言人声称巴黎反苏团体策划了此次起义，其证据是：在起义实际爆发的两周前，法国多家报纸便突然密集报道喀琅施塔得发生起义的消息。托洛茨基在向英美媒体发表的声明中称，这些报道显然暴露了俄国流亡者及其协约国支持者正在酝酿的邪恶计划。托洛茨基表示，选择喀琅施塔得作为目标，是因为其毗邻彼得格勒、且从西方易于抵达，同时也因为近期波罗的海舰队涌入了大量不可靠分子。<sup>154</sup>列宁在3月8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演讲中，重申了托洛茨基的指控。列宁宣称，起义的背后“浮现出白卫军将军那熟悉的身影”。他援引《晨报》与《巴黎回声报》的报道称：“显而易见，这是社会革命党人与流亡白卫军的勾当。”<sup>155</sup>

由于巴黎的新闻报道在布尔什维克论证白卫阴谋时扮演了核心角色，因此有必要考察其内容与来源。这些报道究竟具体说了些什么？2月13日《晨报》以“莫斯科针对喀琅施塔得叛乱者采取措施”为题刊发消息，称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已爆发起义，布尔什维克当局已着手阻止事态蔓延至彼得格勒。2月14日，该报又刊发第二篇报道，将起义归因于一支前往莫斯科要求提高口粮配给的水兵代表团遭到逮捕。报道称，喀琅施塔得局势此时已进一步恶化，叛乱者“将炮口对准了彼得格勒”。同日，《巴黎回声报》也刊登了这一消息，并补充称水兵逮捕

---

<sup>154</sup> 托洛茨基：《革命是如何武装起来的》，第3卷第1部分，第203-204页。

<sup>155</sup>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第33页。

了舰队总政委，且已派出数艘军舰（据称在破冰船协助下）向彼得格勒进发。据2月15日的第二篇报道称，起义者指望获得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支持，而当局正在彼得格勒地区实施大规模逮捕。2月13日至15日间，其他西方报刊也刊登了类似报道。《纽约时报》的报道甚至声称，水兵已完全控制彼得格勒，并正在抵抗托洛茨基派来镇压他们的部队。<sup>156</sup>

当然，1921年2月间，喀琅施塔得及波罗的海其他海军基地并未发生任何此类事件。这类受一厢情愿想法与俄国内部普遍动荡刺激而生的虚假谣言，在当时绝非罕见。然而，关于喀琅施塔得的这些谣言，却（甚至连舰队总政委被捕的细节都）准确预示了两周后真实发生的一切。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些谣言是由波罗的海舰队共产党人第二次激烈会议引发的，当时水兵们高呼要求在舰队政治管理中实现更大民主。<sup>157</sup>但这一推测可以稳妥排除，因为这些虚假报道早于会议（2月15日召开）数天便已出现。

事实上，更早之前，俄国流亡派媒体就已刊登类似消息，为西方报道提供了依据。2月12日，布拉格的社会革命党刊物《俄罗斯自由》报道称“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爆发大规模起义”。而在此前两天，由资深民粹主义者弗拉基米尔·布尔采夫主编

---

<sup>156</sup> 《纽约时报》，1921年3月14日。

<sup>157</sup> 参见梅特：《喀琅施塔得公社》，第80页；卡特科夫：《喀琅施塔得起义》，《圣安东尼论文集》第6辑，第55页。

的巴黎《共同事业》报，便已以“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为题发布了同一消息。这或许是最早的相关报道，其中几乎包含了此后所有报道都会出现、且惊人预示两周后真实事件的全部要素：喀琅施塔得水兵已起义反对政府，占领港口，并逮捕舰队总政委；他们计划对彼得格勒发起军事行动；彼得格勒当局已宣布城市进入戒严状态，并展开大规模逮捕。<sup>158</sup>这些谣言似乎源自单一渠道：驻赫尔辛基的“俄罗斯联盟”通讯社记者，赫尔辛基当时是臭名昭著的反苏宣传中心。然而，究竟是什么触发了这些谣言，至今仍不清楚。除了舰队内部的普遍动荡外，据称有一支喀琅施塔得代表团在莫斯科被拘留，这或许是部分原因。传言称，波罗的海舰队司令拉斯科尔尼科夫警告说，若其同伴不被释放，水兵可能向彼得格勒开火，但政府予以拒绝，甚至威胁对喀琅施塔得实施报复。<sup>159</sup>

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驳斥有关阴谋的指控，称其纯属污蔑，无半分事实依据，只会暴露当局堕落到何等卑劣虚伪的地步。委员会在致俄国工农的宣言中愤怒回应：“我们的敌人企图欺骗你们。他们声称喀琅施塔得起义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协约国间谍与沙皇将军策划的，还把主谋之地安在巴黎。一派胡言！如果我们的起义是在巴黎策划的，那月亮就是柏林造的了。”<sup>160</sup>对于白军军官领导这场运动的指控，委员会的回

---

<sup>158</sup> 《共同事业》，1921年2月10日。

<sup>159</sup> 同上，1921年1月2日。

<sup>160</sup> 《喀琅施塔得真理报》，第120页。

应同样坚决：“在喀琅施塔得，全部权力仅掌握在革命水兵、红军战士与工人手中，而非莫斯科造谣电台宣称的、由某位科兹洛夫斯基将军率领的白卫军手中。”“我们这里只有一位将军，”起义者嘲讽道，“就是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兹明。而他已经被逮捕了。”<sup>161</sup>为证明起义的民众性质，革命委员会公布了全体成员名单。如我们所知，名单中无任何级别的军官，更遑论将军，只有普通水兵与工人。“这些就是我们的将军：我们的布鲁西洛夫、卡缅涅夫之流，”《喀琅施塔得消息报》宣称，暗指布尔什维克阵营内部充斥着前沙皇军官。<sup>162</sup>

尽管如此，科兹洛夫斯基将军确有其人，且 1921 年 3 月时他就在喀琅施塔得。他在起义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若有参与）？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科兹洛夫斯基是职业陆军军官，拥有漫长而显赫的军旅履历。他 1861 年生于彼得格勒附近的红村，毕业于骑兵士官学校、炮兵军官学校与帝国军事学院，一战期间晋升为炮兵少将。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他同众多前帝国军官一样，被征召担任“军事专家”，1921 年出任喀琅施塔得要塞炮兵司令。3 月初动乱爆发后，布尔什维克立即将他斥为这场运动的主谋。科兹洛夫斯基被宣布为非法，其妻儿在彼得格勒被扣押作为人质。其麾下另外三名前军官（布尔克塞尔、科斯特罗米京诺夫、希尔马诺夫斯基）也被指为同谋。

---

<sup>161</sup> 同上，第 57、65 页。

<sup>162</sup> 同上，第 131、158 页。

科兹洛夫斯基本人声称，当局之所以盯上他，只因他是当时喀琅施塔得唯一的前沙皇将军，是充当虚构的白卫军指挥官、策划颠覆革命的现成替罪羊。<sup>163</sup>

这或许确为实情。然而，从现有证据来看，科兹洛夫斯基及其同僚在 1921 年 3 月的事件中确实发挥了作用。起义初期，要塞司令逃往大陆后，科兹洛夫斯基拒绝接任其职位，但仍继续担任炮兵主任本职。临时革命委员会另任命一位炮兵专家——前中校叶·尼·索洛维阿诺夫为要塞司令，科兹洛夫斯基与他密切协作。他们麾下的大多数军事专家（военспецы），尤其是炮兵系统的军官，也纷纷效仿，听命于起义者，为其提供技术指导与协助。这些前沙皇军官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本就毫无好感。前文引述过、据称是科兹洛夫斯基 3 月 2 日对要塞布尔什维克政委所说的那句话，便典型反映了他们的态度：“你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该由我来做必须做的事。”

从一开始，这些军事专家就全身心投入，为起义方策划军事行动。科兹洛夫斯基本人也承认，3 月 2 日，他和同僚曾建议革命委员会立即转入进攻，以抢得对布尔什维克的主动权。<sup>164</sup>军官们拟定了计划：立刻在奥拉宁鲍姆（大陆南侧约五英里

---

<sup>163</sup> 阿·斯·普霍夫：《喀琅施塔得落入革命敌人之手》，《红色编年史》，1931 年第 1 期，第 23 页；《喀琅施塔得真理报》，第 14 页。

<sup>164</sup> 普霍夫：《喀琅施塔得叛乱》，第 83-85 页；夸顿致国务卿，1921 年 4 月 23 日，国家档案馆，861.00/8619。

处) 登陆, 夺取当地军用物资, 与同情起义的陆军部队取得联系, 随后在政府来得及组织有效抵抗之前向彼得格勒推进。他们还提议突袭奥拉宁鲍姆面粉厂, 以获取急需的粮食。另一项计划则是: 由于没有破冰船可用(喀琅施塔得的大型破冰船“叶尔马克号”已前往彼得格勒加油), 炮兵专家们敦促水兵利用要塞和周边炮台的火炮, 为冰封在冰里、射界又互相遮挡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与塞瓦斯托波尔号炸开冰面解围, 并在岛屿周围炸出一条“护城河”, 阻止步兵登陆进攻。<sup>165</sup>

然而, 尽管这些军官积极参与, 他们在整个起义期间始终仅担任纯粹的顾问角色。据现有资料判断, 他们既未参与发起或指挥起义, 也未参与制定起义的政治纲领——这些纲领与他们的思想观念完全格格不入。没有任何军官参与起草《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决议》, 没有军官在锚地广场的群众集会上发言, 没有军官出席3月2日在教育之家召开的会议, 也没有军官进入临时革命委员会任职。确切地说, 他们的作用仅限于提供技术建议, 与他们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下的职能并无二致。后来, 部分起义者与费奥多尔·丹被关押在同一所彼得格勒监狱时曾告诉他, 科兹洛夫斯基只是照常履行职责, 在他们的运动中并未拥有其他权力。<sup>166</sup>考虑到水兵们的独立精神以及对军官由来已久的敌视, 科兹洛夫斯基及其同僚无论如何都不可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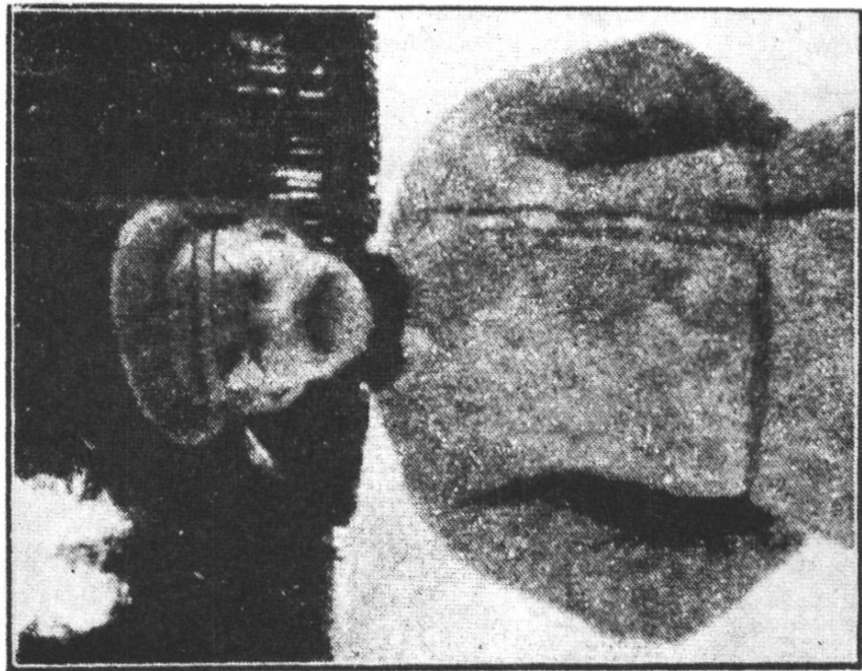
<sup>165</sup> 丹: 《漂泊两年》, 第154页。

<sup>166</sup> 彼得里琴科: 《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真相》, 第8-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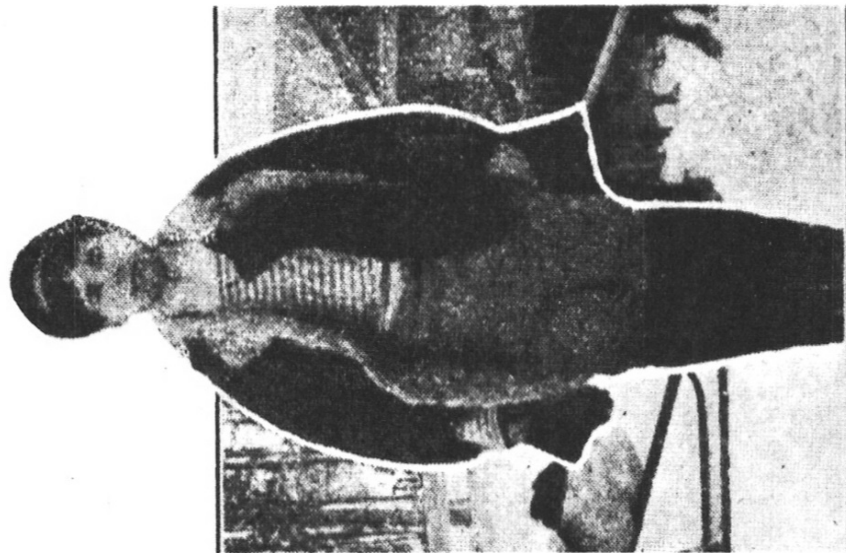
他们中间赢得真正的影响力。在起义全程牢牢掌控局势的临时革命委员会，也表现出对这些军事专家的不信任——即便他们的建议合理且恰当，委员会仍多次予以否决。尽管军官们一再敦促，水兵们既没有炸开岛屿周围的冰层，甚至也没有尝试解救被冰封的战列舰。他们也没有试图在大陆建立桥头堡，利用布尔什维克阵营初期的混乱扩大战果。相反，他们仅将进攻行动局限于：在得知奥拉宁鲍姆的海军航空中队投票支持起义后，于3月2日至3日夜间派遣一支小型分队踏冰前往该地，但这支分队遭遇了密集的机枪扫射，被迫撤退。尽管厘清了上述种种，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仍有待回答：布尔什维克指控这场起义由巴黎的俄国流亡者精心策划，这一说法是否属实？诚然，这些流亡者一厢情愿地期盼反苏起义的爆发。围绕这一主题，他们发表了大量言论与文章，尤其是一个名为全国中心（或称全国联盟）的组织——这是一个由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及其他温和派组成的松散联盟，总部设在巴黎，在欧洲多个国家首都设有分支。举个例子，起义爆发前十天，立宪民主党著名领袖费·伊·罗迪切夫在全国中心的主要机关报《共同事业》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夺取彼得格勒，”罗迪切夫写道，“并非难事。困难的是为这座城市供给粮食并进行组织。一旦准备就绪，行动的时刻便不远了。彼得格勒是所有苏维埃俄国城市中最靠近西方开放边境的，是最便于抵达、开展复兴事业的地点……是时候开始行动了。”<sup>167</sup>

---

<sup>167</sup> 费·罗迪切夫：《寻找救赎》，《共同事业》，1921年2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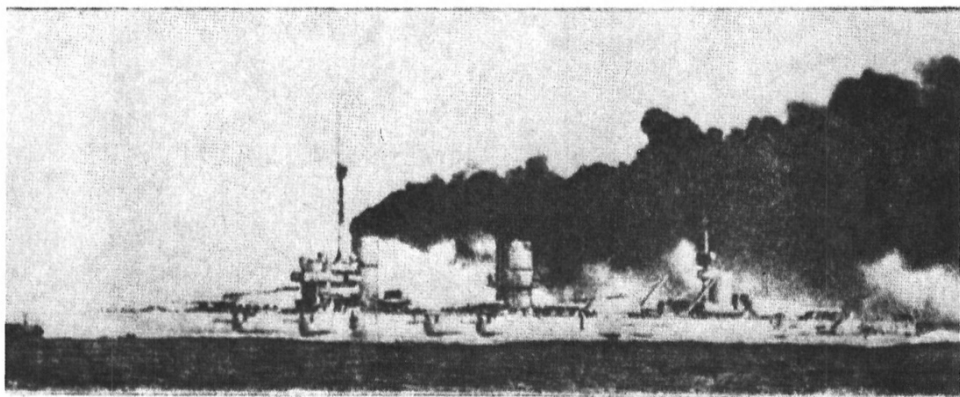
E·H·索洛维扬诺夫 中校  
Lieutenant Colonel E. N. Solovianov



一名在芬兰的喀琅施塔得流亡者  
A Kronstadt Refugee in Finland



喀琅施塔得的城市



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



Kronstadt Refugees Arriving at Terijoki  
喀琅施塔得流亡者抵达泰里约基



喀琅施塔得流亡者在芬兰劳作  
Kronstadt Refugees at Work in Finland

Lenin (right-front) with party delegates fresh from Kronstadt victory.  
Behind Lenin is Voroshilov (in dark coat).



列宁(前排右)与刚从喀琅施塔得胜利归来的党代表们合影。  
列宁身后是伏罗希洛夫(身着深色大衣)。

然而，当时此类公开的威胁并未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引发过度担忧。更令他们警惕的，是他们怀疑流亡者正在秘密策划的未知阴谋。而他们的怀疑也并非毫无根据。迄今未公开的证据显示，就在喀琅施塔得起义爆发的数周前，全国中心内部就已拟定了此类暴动的计划。不过，在阐述这些证据之前，有必要先简要介绍全国中心过往的活动。

全国中心最初成立于1918年，即俄国内战爆发之初，是一个自称为“在俄国组建、旨在反抗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sup>168</sup>该组织由A.B.卡尔塔舍夫、П.Б.司徒卢威以及原立宪民主党其他一众领导人在莫斯科创立，其核心目标是推翻列宁政府，建立立宪政体取而代之。全国中心将大部分资源集中在莫斯科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在彼得格勒、红戈耳卡要塞与喀琅施塔得均设有分支。1919年，该组织参与了尤登尼奇将军在英国装备与海军支援下进攻彼得格勒的行动。卡尔塔舍夫曾是彼得格勒神学院教会史教授，亦担任过1917年临时政府宗教事务大臣，他是尤登尼奇五人政治委员会的成员；而据苏联方面资料记载，<sup>169</sup>全国中心在喀琅施塔得的代理人中，还包括彼得格勒大学前校长Д.Д.格林姆教授，此人在1921年的相关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

<sup>168</sup> 《西北政府的组建》，《俄国革命档案》，第1卷，1922年，第295页。参见A.C.卢科姆斯基：《回忆录》（两卷本），柏林，1922年，第2卷，第116页。

<sup>169</sup> A.C.普霍夫：《波罗的海舰队保卫彼得格勒（1919年）》，莫斯科，1958年，第65—66页。

然而在整个尤登尼奇攻势期间，喀琅施塔得始终忠于布尔什维克，抵御了英国的空袭与鱼雷攻击，其间数艘军舰被击沉或失去作战能力。与之相反，红戈尔卡要塞倒向白军，并在喀琅施塔得拒绝效仿后向其开火。有证据表明全国中心参与其中，且可能得到了英国情报部门的默许<sup>170</sup>；但在“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舰发起毁灭性炮击后，一支喀琅施塔得水兵与红军分队强攻攻占了要塞，这场叛乱随即被镇压。

尤登尼奇战败后，全国中心的大批追随者被契卡逮捕，被判处死刑或长期监禁。但其多名领导人，包括卡尔塔舍夫教授在内，得以流亡国外，并在巴黎设立新总部，随即着手重建组织。至1920年底，全国中心已在伦敦、柏林、赫尔辛福斯（其主要代理人是格林姆教授）及其他白俄流亡者聚居中心建立了分支。除卡尔塔舍夫、司徒卢威与罗季切夫外，其领导层还包括弗·德·纳博科夫、亚·伊·古契科夫等著名立宪民主党人与十月党人，以及《共同事业》主编弗·列·布尔采夫等数位右翼民粹派人士。不过，帕维尔·米留科夫、马·马·维纳韦尔等最具声望的自由派人士拒绝加入，他们已不再寄望于依靠武装入侵——即便有协约国援助——来“解放”俄国<sup>171</sup>。

---

<sup>170</sup> 同上，pp. 68-74；《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921年6月18日。另见路易斯·费舍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2卷本，普林斯顿，1951年，I，206。此时期在俄的英国特工保罗·杜克斯被苏方指控涉案，他本人否认参与其中，也否认英国与全国中心存在关联。见其所著《红色黄昏与黎明》，纽约，1922年，p. 223；及《“ST 25”号的故事》，伦敦，1938年，p. 314。

<sup>171</sup> 帕·尼·米留科夫：《俄国的今天与明天》，纽约，1922年，pp. 125-26。

到 1920 年末，全国中心已恢复到足以筹备召开全欧民族联盟代表大会的程度。此次大会最终于 1921 年 6 月在巴黎举行，并选举成立了俄国全国委员会，由卡尔塔舍夫教授担任主席，其宗旨是“将俄国从共产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sup>172</sup>这当然自 1918 年全国中心成立起便是其目标，但白军将领们——尤登尼奇、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却接连遭遇失败。

不过，弗兰格尔将军成功将其麾下所谓“俄国军”的大部分人员连同武器完整撤离。约 7 万至 8 万名官兵被安置在君士坦丁堡、加利波利和利姆诺斯岛，另有数千人被安置在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他们仍保留着军衔与军纪。弗兰格尔受到法国扶持，法国曾于 1920 年 8 月承认其政权为南俄国的事实政府（这也是唯一给予他此项礼遇的国家），他将部队置于法国保护之下。他撤离时所率领的舰队——包括一艘无畏舰、数艘驱逐舰以及来自黑海舰队的数十艘其他舰只，约有 5000 名船员——被拘留在突尼斯港口比塞大。1920 年 11 月，巴黎撤销了对已不复存在的弗兰格尔政府的承认，但仍以“人道主义理由”继续为其部队提供给养，同时敦促他解散部队。<sup>173</sup>然而这些努力均无果而终。1921 年 3 月喀琅施塔得起义爆发之际，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公使在报告中指出：“可以预料，弗兰格尔将军会极力反对任何解散其部队的提议，因他坚称，作为俄国境外唯

---

<sup>172</sup> 《共同事业报》，1921 年 6 月 6 日。

<sup>173</sup> 帕·尼·弗兰格尔：《弗兰格尔将军回忆录》，伦敦，1930 年，pp. 338-339。

——一支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其军队理应做好准备，利用俄国内部当前发生的事件。”<sup>174</sup>

回到全国中心的活动中，该组织档案中存有一份未署名的手写手稿，标注“绝密”，标题为《关于在喀琅施塔得组织起义问题的备忘录》<sup>175</sup>。备忘录标注年份为“1921”，针对喀琅施塔得预期中的暴动提出了一份详尽的应急计划。从内部信息可以明确，该计划由全国中心派驻维堡或赫尔辛福斯的一名特工于1921年1月或2月初拟定。他预言，水兵起义将在“即将到来的春季”爆发。他写道，民众对布尔什维克的不满已有“大量且明确的迹象”，若“一小群人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夺取喀琅施塔得政权”，舰队其余兵力与卫戍部队便会踊跃追随。他补充道：“水兵当中已组建起这样一个团体，他们准备就绪，有能力采取最为坚决的行动。”他最后指出，若能获得外部支援，“则完全可以指望起义取得成功”。

这份备忘录的作者显然十分了解喀琅施塔得的局势。文件对该基地的防御工事进行了详尽且信息充分的分析，其中仔细评估了来自红戈尔卡要塞的炮火轰击风险，但认为其不会对起义构成严重威胁。此外，文件还强调，必须在起义发动前提前为起义者筹备粮食补给。作者在这一点上态度极为坚决。他写

---

<sup>174</sup> 亨·朗博尔德爵士致寇松勋爵，1921年3月17日，英国《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一辑，第12卷，p. 838。

<sup>175</sup> 《关于在喀琅施塔得组织起义的报告备忘录》，手稿，哥伦比亚大学俄国档案馆。该备忘录英文全译文见附录A。

道，需在法国援助下，将粮食储备安置在波罗的海的运输船上，这些船只将待命驶往喀琅施塔得。他接着提出，作为军事特遣部队，弗兰格尔将军指挥的俄国军队必须动员起来，并由法国海军中队及驻扎在比塞大的黑海舰队部队提供支援。（备忘录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起义须等到春季解冻、冰层融化之后才会发动，届时喀琅施塔得将免受来自大陆的进攻，同时粮食补给已筹备完毕，弗兰格尔的部队也做好作战准备。）

备忘录接着写道，俄军一抵达，喀琅施塔得的全部权力将立即移交其指挥官。该要塞将充当“坚不可摧的基地”，用于在俄国本土登陆、“推翻苏维埃政权”。但此次行动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法国是否愿意提供资金、粮食与海军支援。否则，起义即便爆发，也终将失败。备忘录最后提出，若法国政府同意，最好由其指定一名专人，起义组织者的代表可与该人就此事达成更详细的协议，向其通报起义计划与后续行动的细节，以及起义组织和后续经费所需的确切信息。

尽管作者身份不详，现有证据均指向侨居维堡的俄侨格·弗·蔡德勒教授。十月革命前，蔡德勒曾任彼得格勒俄国红十字会会长；革命后他流亡芬兰，出任芬兰境内俄国红十字会分会负责人。他与曾在彼得格勒大学共事的达维德·格林姆关系密切，格林姆此时在赫尔辛福斯担任全国中心总代理人（蔡德勒本人也与该中心有联系），同时兼任弗兰格尔将军驻芬兰官方代表。作为红十字会官员，蔡德勒格外关注喀琅施塔得与彼得格勒的粮食补给问题，而这一议题在这份绝密备忘录中居于核

心位置。例如，1920年10月，他曾就彼得格勒粮食危机向美国红十字会巴黎总部提交报告<sup>176</sup>。更具关键意义的是，数月后他向巴黎全国中心发出一封电报：“局势要求立即就我所提交的关于必要粮食补给的备忘录相关问题作出决定。实际行动随时可能爆发。”<sup>177</sup>电报日期标注为“1921年2月28日”。遗憾的是未写明月份，但基本可以确定是2月——28日正是彼得格勒罢工达到高潮、喀琅施塔得通过《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决议》的日子。电报底部有手写批注“同意！”，随后是格·勒·弗拉基米罗夫的签名，此人是前沙皇俄国将军，担任全国中心军事专家。蔡德勒所提及的“关于必要粮食补给的备忘录”，极有可能就是上文所述的那份绝密备忘录。进一步佐证蔡德勒为作者的是：1921年4月5日，布尔什维克重新占领喀琅施塔得后不久，他在维堡发表传单，痛惜侨民未能为起义者提供补给，并提出一份新计划，以备彼得格勒再次爆发运动时为其提供物资<sup>178</sup>。我们后续将会看到，在3月起义期间，蔡德勒为及时向起义者输送补给、避免灾难所做的努力无人能及。

除这份绝密备忘录外，还有其他迹象表明，全国中心在

---

<sup>176</sup> 《纽约论坛报》，1921年10月7日。

<sup>177</sup> 哥伦比亚大学俄国档案馆藏。

<sup>178</sup> 格·蔡德勒：《论彼得堡补给》，维堡，1921年。但有一项证据表明作者可能另有其人，姓名首字母为“L. G.”。起义期间，一份署名“L. G.”的文章刊登在赫尔辛福斯由卡尔塔舍夫与格林姆同僚主办的俄文期刊上，内容与该绝密备忘录存在一定相似之处。见 L. G.：《喀琅施塔得的防御能力》，《俄罗斯新生活》，1921年3月15日、17日。

1921年初的数周里一直在密切关注喀琅施塔得。例如值得注意的是，2月有关水兵起义的虚假新闻报道，源自俄罗斯联盟通讯社，这是一个与全国中心联系紧密的侨民记者组织。全国中心的核心人物、其机关报《共同事业》主编弗拉基米尔·布尔采夫（该报率先刊登了相关报道），同时也是俄罗斯联盟通讯社的负责人之一，而《共同事业》的办公地点即为该通讯社的巴黎总部。<sup>179</sup>这些谣言或许只是反映了侨民们迫切希望此类起义尽快爆发的心愿。但左翼工党刊物《伦敦每日先驱报》却不这么认为——该报消息灵通，尽管有时对布尔什维克的同情显得不加批判。该报外交记者写道，《晨报》及其他报纸的报道，揭示了喀琅施塔得“被笃定将会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些报道暴露了在协约国纵容下，白俄流亡者策划的一场反革命阴谋。<sup>180</sup>无论这一说法可信度如何，结合绝密备忘录来看，全国中心完全有可能至少将其在波罗的海的计划告知了法国方面，并请求协助实施。<sup>181</sup>

无论如何，毋庸置疑的是，全国中心内部已在筹划支持喀琅施塔得即将到来的起义。而从绝密备忘录判断，全国中心在波罗的海的代理人并不满足于仅扮演辅助角色；相反，在争取

---

<sup>179</sup> 还可注意到，由卡尔塔舍夫教授担任主席的俄罗斯全国委员会，1921年夏曾在此处召开会议。见1921年6月23日《共同事业》的相关通告。

<sup>180</sup> 《每日先驱报》，1921年3月7日。

<sup>181</sup> 据《每日先驱报》里加通讯员报道，1921年1月，著名社会革命党人鲍里斯·萨温科夫已将白军策划喀琅施塔得起义的计划通报给法国与英国方面：同上，1921年3月18日。

到法国最高指挥部“对起义筹备与指挥的合作”后，他们的目标是尽早与起义者展开积极协作。显而易见，全国中心最终意图利用这场起义达成自身目的。

但该中心是否真的与发动起义的水兵事先建立了联系？在1921年初撰写的这份绝密备忘录中，作者提到“存在一个组织严密、干劲十足的起义策划团体”，并称其消息“来自喀琅施塔得”，消息来源大概率对全国中心持友好态度。考虑到水兵们的不满情绪已持续数月，一个有组织的准起义团体的存在绝非不可能，甚至是大概率事件。即便真的存在这样一个起义组织，其成员中包含后来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也并非不合情理。佩特里琴科在起义伊始便发挥核心作用：他在《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决议》上签字、在锚地广场发表演说、主持3月2日会议及由此诞生的革命委员会，这一切都引发了人们对他在起义爆发前活动的猜测。此外，另一名委员会成员声称，“我们”在3月1日撤销了对加里宁的逮捕令——而此时委员会尚未成立。

182

由此可以推测，佩特里琴科及其同伙便是那份绝密备忘录所寄予厚望的“组织严密的团体”，全国中心的特工甚至可能在1921年1月或2月就已与他们取得联系。有不容否认的证据

---

<sup>182</sup> 《与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的访谈》，手稿，胡佛档案馆。另可参见一封神秘的喀琅施塔得来信，日期为1921年2月21日，信中一名“起义参与者”宣称他与战友将战斗到底，推翻布尔什维克：罗森男爵致米·尼·吉尔斯，1921年3月12日，米勒档案馆，5M档案，第5号。

（后文将予以考察）表明，起义被镇压、部分革命委员会成员在芬兰获得庇护后，该委员会曾与全国中心达成协议，我们不能排除这是双方长期联系的延续。但经过细致梳理，并未发现能够支撑这一推测的证据。目前没有任何材料表明，这份绝密备忘录曾被付诸实施，也没有证据显示起义前侨民与水兵之间存在任何联系。相反，这场起义带有鲜明的自发性特征，一批意志坚定的领导者迅速走到前台，这一事实并不能作为反证。因为任何一场起义，即便是最朴素的自发暴动，都会有其“鼓动者”与“领头人”，唤醒不满者并组织、指挥他们行动。

就喀琅施塔得事件而言，起义者的种种举动几乎看不出经过周密的事前筹备。倘若真有预先拟定的计划，水兵们无疑会再多等数周，待冰层融化，这样既能消除步兵进攻的威胁，又能让两艘战列舰投入作战，同时打通来自西方的补给线。此外，起义者放走了加里宁，尽管他本可以成为极具价值的人质。他们也未主动发起攻势，仅派遣一支象征性部队跨越冰面前往奥拉宁鲍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大量共产党员参与了此次运动。至少在起义初期，喀琅施塔得人显然并未将自己视作革命阴谋家，而是追求社会与政治改革的施压团体。正如乔治·卡特科夫所言，彼得格勒当局当时也是这样判断的，否则他们不会在3月1日派加里宁与库兹明前往喀琅施塔得，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主席瓦西里耶夫也不会主持锚地广场的群众大会，

并对《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决议》进行表决。<sup>183</sup>

水兵们无需外界煽动便已举起起义大旗。数月来，他们的不满持续累积：粮食与燃料匮乏、休假被缩减、舰队管理官僚化，以及从家乡传来的布尔什维克压迫的消息。如我们所见，1921年1月，已有不下5000名波罗的海海员因对政权政策感到厌恶而退出共产党。开小差与擅离职守的现象日益增多。休假期间，水兵们亲眼目睹了粮食征购，自身也遭到无处不在的路哨分队搜查与扣押。因此到1921年2月，喀琅施塔得的起义条件已然成熟。

点燃导火索的并非侨民阴谋家与外国情报人员的策划，而是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与邻城彼得格勒的工潮。而随着起义展开，其模式沿袭了1905年至内战期间反抗中央政府的历次暴动——既对抗过沙皇政权，也反抗过布尔什维克政权。1921年3月起义的一个尤为鲜明的先例，是1918年10月彼得格勒海军基地的兵变：该兵变同样抗议粮食征购与上级指派的政治委员，喊出“自由苏维埃”“打倒委员专政”的口号，且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最高纲领派、无政府主义者及极激进的无党派反叛者在策划者中扮演了突出角色。

喀琅施塔得人自身，无论在起义期间还是流亡之后，都愤怒驳斥政府所有关于其与国内外反革命团体勾结的指控。他们

---

<sup>183</sup> 卡特科夫：《喀琅施塔得起义》，《圣安东尼论文集》第6辑，第27页。参见丹尼尔·斯：《喀琅施塔得暴动》，《美国斯拉夫与东欧评论》，第10卷，第246—247页。

特别否认有恢复旧秩序的意图。“我们是全体劳动者政权的捍卫者，”起义者的《消息报》宣称，“反对任何一党的专制政权。”<sup>184</sup>他们坚称，自始至终，这场起义完全是自发的。暴动爆发前，他们中间没有活跃的煽动者，队伍里没有流传反布尔什维克文献，任何时候都未获得外国资金或援助。这是在布尔什维克最后攻势中逃往芬兰的幸存者们的证词。<sup>185</sup>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佩特里琴科本人在流亡期间的声明。概括他 1925 年所撰文章的大意：我们喀琅施塔得水兵绝非反革命分子，恰恰是革命的守护者。内战期间，我们以无畏的勇气保卫彼得格勒与俄国，抗击白军；1921 年 3 月，我们对革命事业的热忱丝毫不减。与外界隔绝的我们，即便想获得外援也无从获取。我们没有充当任何外部团体的代理人：既非资本家，也非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我们的起义，纯粹是为消除布尔什维克压迫而自发发起的。我们没有预设的行动方案，只是根据形势摸索前行。不排除有人另行拟定了起义计划——事实上此类情况屡见不鲜。但这与临时革命委员会毫无干系。整个起义期间，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我们手中。当得知右翼势力企图利用我们的起义时，我们立即在一篇题为《先生们还是同志们》的文章中向支持者发出了警告。<sup>186</sup>

---

<sup>184</sup> 《真理报论喀琅施塔得》，第 120 页。

<sup>185</sup> 夸顿致国务卿，1921 年 4 月 23 日，国家档案馆，档案号 861.00/8619。参见《与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的访谈》，胡佛档案馆。

<sup>186</sup> 佩特里琴科：《论喀琅施塔得起义的原因》，《战斗旗帜》，1925 年 12 月—1926 年

此处所指系 1921 年 3 月 6 日叛军《消息报》（Izvestiia）的头版社论。该社论宣称：

“同志们，你们此刻正在庆祝一场伟大而无流血的胜利——推翻了共产党专政；但你们的敌人也在与你们一同庆祝。然而，你们欢庆的动机与他们的却截然相反。你们受到的是炽热的愿望所激励：恢复苏维埃真正的权力，并怀抱着崇高的希望——给予工人自由劳动的权利，让农民能够自主处置自己的土地及其劳动成果；而他们所怀抱的，则是恢复沙皇鞭笞统治和将军们特权的希望。你们的利益根本不同，因此他们绝非你们的同路人。你们推翻共产党统治，是为了实现和平重建与创造性劳动；而他们则意在重新奴役工人与农民。你们追求自由，他们却企图再次将你们套上枷锁。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让披着羊皮的狼靠近舵手的驾驶台。”<sup>187</sup>

尽管根据那份《秘密备忘录》，俄国流亡者既未组织也未煽动这场叛乱，但一旦起义爆发，他们并未袖手旁观。诚然，起义者的目标与流亡者的政治诉求相去甚远：水兵们希望建立一个仅由工人和农民代表组成的自由苏维埃制度；他们并不打算恢复立宪会议，也不打算给予地主和中产阶级任何自由或政治权利——这些人仍将作为被剥夺财产、遭社会排斥的少数群体存在。

---

1 月，第 4—8 页。

<sup>187</sup> 《关于喀琅施塔得的真理》，第 61 页。

然而，这次起义仍给海外流亡者带来了新的希望。对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那位命运多舛的临时政府总理而言，这场起义预示着布尔什维克主义即将崩溃。<sup>188</sup>同样，立宪民主党（Kadet）领袖米留科夫（Miliukov）虽已彻底放弃依靠外国武装干涉的幻想，却将此次叛乱视为俄罗斯人民自身发起的一场不可战胜的解放运动之开端。在接受《纽约时报》驻巴黎记者的采访时，他乐观地表示列宁政权的日子已屈指可数，并呼吁美国政府向叛军提供粮食援助，但并未要求派遣军队或输送武器。不过，他的同事维纳韦尔（Vinaver）则更为谨慎：“目前尚无法断言这场运动究竟有多少成功的机会，”他说，“布尔什维克或许能暂时将其镇压下去，但他们无法将其彻底扼杀。”<sup>189</sup>

就全国中心而言，其内部一片欢欣鼓舞。喀琅施塔得发生的一切，正是那份绝密备忘录的作者数周前所预言的，尽管起义爆发得比预期更早。当下的紧迫任务是为起义者筹集援助。全国中心档案中的一份机密通告写道：“喀琅施塔得的起义，在所有俄国流亡者的心中激起了共鸣。”文件接着指出，必须立即以红十字会的名义向起义者运送粮食与药品；除此之外，还需为他们提供飞机、摩托艇、燃料与服装，帮助在布尔什维克集结兵力之前，将起义扩散至俄国本土。<sup>190</sup>3月6日，全国

---

<sup>188</sup> 《俄罗斯之声》（Golos Rossii），1921年3月13日。

<sup>189</sup> 《纽约时报》，1921年3月9日。

<sup>190</sup> 无标题手稿，哥伦比亚大学俄国档案馆。

中心的半官方机关报、布尔采夫主办的《共同事业》向所有侨民团体发出激情呼吁，号召他们联手支持起义，以免错失拯救俄国的最后机会：

“我们正经历一个不会重现的时刻。袖手旁观是绝无可能的。我们紧急呼吁所有俄国人——并通过他们向我们的盟友呼吁——为喀琅施塔得的革命者提供切实的物资支援。为起义者提供武器，为彼得格勒筹措粮食。反抗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倘若我们在这严峻的日子里空谈度日，倘若我们仍无法走出争论与决议的泥潭，我们将万劫不复，俄国将万劫不复！倘若已然错失无数机遇的欧洲再错失此次机会，那么欧洲将万劫不复，整个世界将万劫不复！”<sup>191</sup>

尽管侨民群体四分五裂，难以展开真正的合作，但布尔采夫的呼吁并未被无视。就在次日，3月7日，巴黎俄工商业联合会宣布将向喀琅施塔得运送粮食及其他物资，并将这一决定告知其在赫尔辛福斯的代表。与此同时，该联合会向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拍发了电报（“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报务员可接收经雷瓦尔转发的讯息），向起义者保证将全力支持。电报称，已有200万芬兰马克的首期款项认捐，用于支援喀琅施塔得“解放俄国的神圣事业”；此外，临时政府驻巴黎大使弗·亚·马克拉科夫已从法国外交部长处获得承诺，将协助为起义者提供粮食。3月9日，俄工商业联合会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搭建

---

<sup>191</sup> 《共同事业》，1921年3月6日。

通往喀琅施塔得与彼得格勒的高效补给线。其他反布尔什维克团体迅速跟进，次日便召开联席会议，制定共同计划。<sup>192</sup>

与此同时，全国中心驻赫尔辛福斯分部组建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向起义者输送物资。弗兰格尔驻芬兰首席代表格林姆教授当选委员会主席，蔡德勒教授则成为其中最忙碌的成员，他火速前往俄国侨民的金融中心巴黎，为此次援助行动募集资金。他当即从工商业联合会主席尼·赫·杰尼索夫处筹得 100000 法郎。蔡德勒返回芬兰后，曾在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担任财政大臣与首相、时任巴黎国际银行董事长的弗·恩·科科夫佐夫伯爵向他汇去 5000 英镑，俄亚银行也捐赠了 225000 法郎。欧洲各地的其他俄国银行、保险公司及金融企业，以及俄国红十字会也纷纷追加捐款，红十字会将所有募集款项悉数汇给其驻芬兰代表蔡德勒。截至 3 月 16 日，科科夫佐夫已可告知巴黎俄国银行委员会，为喀琅施塔得募集的捐款已超 775000 法郎，相当于工商业联合会最初向起义者承诺的 200 万芬兰马克。<sup>193</sup>

除了自身积极开展募捐活动外，俄国侨民还寻求协约国列强的援助。全国中心代表向哈定总统与美国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发去紧急呼吁，要求立即向喀琅施塔得水兵运送粮食。巴

---

<sup>192</sup> 《舵报》，1921 年 3 月 9 日、11 日、12 日；《最新新闻报》，1921 年 3 月 9 日。值得注意的是，1919 年维堡的全国中心曾向该工商业联合会筹款，以支援尤登尼奇的西北军：《俄国革命档案》，第 1 卷，第 296 页。

<sup>193</sup> 《舵报》，1921 年 3 月 18 日；格林姆致卡尔塔舍夫，1921 年 3 月 11 日，马克拉科夫档案馆，A 类，第 5 组，第 13 号。格林姆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与鲍里斯·萨温科夫在波兰的反共组织存在关联：格林姆致吉尔斯，1921 年 3 月 15 日，吉尔斯档案馆，第 88 档案。

黎俄国议会委员会与君士坦丁堡的弗兰格尔将军也提出了类似请求，弗兰格尔还向喀琅施塔得的科兹洛夫斯基发去讯息，承诺其麾下俄国军队一旦完成动员，即刻驰援。<sup>194</sup>被解散的立宪会议残余势力在巴黎召开会议，并向临时政府驻华盛顿大使鲍里斯·巴赫梅捷夫发去电报，恳请其游说美方出面调停。但美国政府不愿重拾内战时期的干涉政策，对所有此类呼吁均置若罔闻。英国提供援助的希望更为渺茫，且侨民方面显然也未在伦敦积极争取支持。事实上，就在此时，英国与苏维埃俄国的贸易协定即将签署，这也反映出自去年战事结束以来，双方逐步形成的临时妥协局面。

外国援助的最大希望寄托于法国——协约国中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态度最强硬的国家。档案文献显示，整个起义期间，全国中心与法国外交部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sup>195</sup>克伦斯基在柏林主办的刊物报道称，一支法国分舰队已受命驶往波罗的海港口雷瓦尔，任务是支援喀琅施塔得，<sup>196</sup>但并无证据能够证实这一消息。据工党系《每日先驱报》报道，起义者曾获得法国方面的资金援助。“我可以明确断言，”《每日先驱报》外交记者写道，“法国政府牵涉喀琅施塔得事件，他们已向维堡的某位教

---

<sup>194</sup> 叶·卡·米勒将军（巴黎）致赫尔辛福斯全国中心，1921年3月14日，米勒档案馆，5M档案，第5号；《共同事业》，1921年3月7日；《舵报》，1921年3月9日；《为人民事业》，1921年3月15日。

<sup>195</sup> 见米勒档案馆中米勒将军与法国外交部的往来信件，5M档案，第5号。

<sup>196</sup> 《俄罗斯之声》，1921年3月13日。

授（显然是蔡德勒）汇去一大笔供起义者使用的资金。物资也正通过红十字会的名义秘密运送。”<sup>197</sup>

当然，巴黎侨民迅速筹集并送往维堡蔡德勒手中的大笔款项中，有可能有一部分来自法国政府。（应当指出，在此期间，法国一直在持续供养土耳其境内的弗兰格尔部队。）但另一方面，法国虽比英国速度更慢，却已在朝着与苏维埃政权和解的方向迈进，因此其向喀琅施塔得起义者提供大量援助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大。据帕维尔·米留科夫主办的消息灵通刊物称，法国拒绝在这场危机中进行任何政治或军事干预，仅要求芬兰允许粮食过境，以救济饥谨的喀琅施塔得民众。这与美国驻维堡领事哈罗德·夸顿致华盛顿国务卿的一份详尽且极具价值的报告内容相符；夸顿承认，在所有列强中，法国最有可能牵涉其中，但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法国实际上几乎未提供任何援助。<sup>198</sup>

然而，关于红十字会的参与问题，布尔什维克方面（以及《每日先驱报》）的说法则更有依据。因为毫无疑问，全国中心在搭建喀琅施塔得补给线的行动中，将俄国红十字会用作了掩护。这一点在该中心波罗的海地区代理人的私人通信中得到了承认。<sup>199</sup>但另一方面，苏维埃方面指控国际红十字会与美国

---

<sup>197</sup> 《每日先驱报》，1921年3月14日。

<sup>198</sup> 《最新新闻报》，1921年3月9日；《为人民事业》，1921年3月15日；夸顿致国务卿，1921年4月23日，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号 861.00/8619：《对喀琅施塔得革命的外国援助分析》。

<sup>199</sup> 克柳耶夫将军致米勒将军，1921年3月14日，米勒档案馆，5M档案，第5号；格林姆致吉斯，1921年3月15日，吉斯档案馆，第88号档案。

红十字会也牵涉其中，则毫无根据。蔡德勒教授曾希望动用国际红十字会在斯德丁和纳尔瓦的粮食储备援助起义者，巴黎的俄国红十字会也向日内瓦发报请求许可，但未获批准。蔡德勒还请求美国红十字会波罗的海专员、名为瑞安的上校调拨其在维堡的储备物资。（全国中心无疑认为自己对这批粮食拥有特殊主张权，因为这批粮食最初是尤登尼奇将军于1919年购置，计划在推翻布尔什维克后用于救济彼得格勒民众，后转交美国红十字会，用以援助波罗的海地区的俄国难民。）<sup>200</sup>瑞安急于提供帮助，于3月11日前往巴黎，与美国红十字会欧洲总部的上级磋商。但会谈无果而终。正如瑞安向《共同事业》记者所言，有两大障碍：其一，其组织章程禁止向任何政治或军事团体提供援助；其二，即便能设法绕过这一规定，芬兰政府也不会允许任何粮食过境。<sup>201</sup>尽管布尔什维克指控芬兰与白军勾结，但用哈罗德·夸顿的话说，在整个起义期间，芬兰人“热忱恪守新近缔结的（1920年10月14日）对苏和平条约”。芬兰总参谋部认为这场起义时机过早、注定失败，不愿给布尔什维克任何发动军事报复的借口。正如蔡德勒本人后来所言，芬兰人至

---

<sup>200</sup> 《最新新闻报》，1921年3月15日；《俄罗斯新生活》，1921年3月12日。另见马克拉科夫档案馆A类第5包第13号、米勒档案馆5M档案第5号中，巴黎与芬兰的全国中心领导人（卡尔塔舍夫、克柳耶夫、米勒、格林姆、蔡德勒）之间的通信。

<sup>201</sup> 《共同事业》，1921年3月17日。起义结束后，蔡德勒在致巴黎俄国红十字会会长的信中承认，未从英美红十字会获得任何援助。蔡德勒写道，他永远不会忘记一位美国红十字会官员（名为霍普金斯）那“得意的口吻”，此人对他说道：“我们没把面粉给你们，真是件好事。”1921年3月20日，蔡德勒致勃·叶·伊万尼茨基，吉尔斯档案馆，第88号档案。

多愿意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允许医疗物资过境，<sup>202</sup>但这一提议最终也未能落实。

在巴黎，全国中心及其支持者对这些突如其来的阻碍感到焦头烂额。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的前任格·叶·李沃夫亲王，恳请芬兰大使重新考虑，随后又再次试图让法国出面干预。他还前往美国红十字会总部，请求调拨维堡的储备物资，但所有努力均徒劳无功。<sup>203</sup>与此同时，时间所剩无几。喀琅施塔得的粮食局势愈发危急——危急到3月13日佩特里琴科致电格林姆教授，授权他向芬兰及其他国家求援。据夸顿所述，芬兰总参谋部认为（事实也证明这一判断正确）起义者的粮食储备撑不过月底。但夸顿仍建议华盛顿，美方切勿尝试用雪橇运送补给，以免被截获。<sup>204</sup>美国驻柏林专员也持相同看法，他被当地一些侨民说服，认为任何干预只会让俄国团结起来抵御新一轮外国入侵，反而帮列宁摆脱困境；因此他得出结论，即便出于人道主义考量，答应巴黎流亡者的援助请求也“为时过早，且易遭曲解”。<sup>205</sup>顺便一提，这份意见由国务卿转呈美国红十字会华

---

<sup>202</sup> 夸顿致国务卿，1921年3月11日，美国国家档案馆，861.00/8319；驻赫尔辛福斯代办致国务卿，1921年4月22日，同上，861.00/8628；蔡德勒：《论彼得堡补给》。

<sup>203</sup> 《最新新闻报》，1921年3月8日；《舵报》，1921年3月10日；《共同事业》，1921年3月17日。

<sup>204</sup> 佩特里琴科致格林姆，1921年3月13日，格林姆档案馆；夸顿致国务卿，3月11日，美国国家档案馆，861.00/8318。

<sup>205</sup> 美国红十字会全国秘书长致国务卿，1921年5月21日，同上，861.00/8572。第二封信（5月24日，861.00/8627）指出，仅向芬兰境内的喀琅施塔得难民提供过援助。

盛顿全国总部，或许影响了该组织不进行干预的决定。“红十字会，”起义数周后其全国秘书长写道，“未向喀琅施塔得起义者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也未曾尝试这样做。”<sup>206</sup>

而另一方面，俄国红十字会在起义结束前竭尽所能向起义者输送援助。作为其芬兰分会负责人，蔡德勒继续从欧洲各地的同情者处筹集资金，但他此刻最关心的是找到向被围困的水兵运送补给的办法。3月16日，在起义临近尾声之际，蔡德勒与格林姆的同僚帕·弗·维尔肯男爵，以俄国红十字会代表的身份穿越冰层抵达喀琅施塔得。维尔肯曾任帝国海军上尉，担任过“塞瓦斯托波尔”号舰长与波罗的海舰队布雷支队司令。布尔什维克称他为白军代理人并无不妥，尽管并非如他们所言，他打着美国或国际红十字会的幌子。用夸顿的话说，他的“秘密使命”是：一旦补给路线敲定，便立即向临时革命委员会提供粮食与药品。<sup>207</sup>在以往，这种接触无疑会遭到断然拒绝。但此时水兵们粮食极度匮乏，医疗物资也已耗尽。起义领导人虽知晓维尔肯的军官背景，却抛开了对其动机的疑虑，革命委员会接受了他的提议。佩特里琴科解释道，红十字会是“人道主义组织，而非政治组织”。<sup>208</sup>

---

<sup>206</sup> 美国红十字会全国秘书长致国务卿，1921年5月21日，同上，861.00/8572。第二封信（5月24日，861.00/8627）指出，仅向芬兰境内的喀琅施塔得难民提供过援助。

<sup>207</sup> 《红色档案》，1927年，第6期，第93页；夸顿致国务卿，1921年4月23日，美国国家档案馆，861.00/8619；《红色报》，1921年3月20日；普霍夫：《喀琅施塔得叛乱》，第59页。

<sup>208</sup> 《战斗旗帜》，1925年12月—1926年1月，第8页。

但正如佩特里琴科所指出、共产党人自己也承认的那样，起义者最终没有得到任何外界援助。<sup>209</sup>芬兰走私者用雪橇运来了几吨面粉和猪油，但即便这点微不足道的物资也送达太晚，落入了布尔什维克手中。<sup>210</sup>就这样，立宪民主党侨民为接济喀琅施塔得所做的巨大努力以彻底失败告终。红十字会的粮食储备始终未被调拨；经由芬兰的通道依旧被封锁；寻求破冰船与运输船只的尝试也无果而终。1921年3月16日，英苏贸易协定签署，这成为了最后一击——用《共同事业》悲愤的说法，这是“背后一刀”，<sup>211</sup>此举彻底打消了芬兰及其他国家改变中立政策的念头。简而言之，那份绝密备忘录中的计划完全未能落实，而其作者的警告也悉数应验。倘若起义没有爆发得如此之早、打了侨民们一个措手不及，必要的准备工作或许本可以完成。无论如何，起义者注定能收到的唯一补给，是在起义被镇压后，在芬兰难民营里得到的。

尽管布尔采夫呼吁在推翻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共同事业”中团结一致，但俄国侨民依旧陷入无可救药的分裂状态。在整个起义期间，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全国中心的自由派人士各行其是；彼此之间既无合作，也无力量与资源的整合。不

---

<sup>209</sup> 参见简·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1919—1943）》，3卷本，伦敦，1956—1965年，第1卷，第213—215页。

<sup>210</sup> 驻赫尔辛福斯代办致国务卿，1921年4月22日，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号861.00/8628。

<sup>211</sup> 《共同事业》，1921年3月18日。

过，社会革命党人还是制定了自己的援助计划——尽管最终未能成功。喀琅施塔得的事件给流亡中的社会革命党组织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巴黎、柏林和布拉格，该党最负盛名的领导人——临时政府首脑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以及存在时间短暂的立宪会议主席维克多·切尔诺夫——全身心投入到筹款工作中，以购置维持起义所需的粮食及其他物资。从被布尔什维克情报人员截获并随后由苏联政府公布的私人通信中，我们可知他们筹集到了数额可观的资金。布拉格的弗·米·坚济诺夫致巴黎社会革命党行政中心一名成员的两封信（日期为3月8日与13日）提到，所筹款项超过10万法郎，此外还有克伦斯基派驻美国的大使鲍里斯·巴赫梅捷夫从纽约汇来的2.5万美元。信件还显示，已在阿姆斯特丹筹集了约5万普特面粉，准备运往喀琅施塔得。<sup>212</sup>

所有援助都将经由波罗的海城市雷瓦尔的切尔诺夫调配，他在社会革命党人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蔡德勒与格林姆在立宪民主党全国中心的角色。起义爆发后的第一周，切尔诺夫向临时革命委员会发出了如下电报：

“立宪会议主席维克多·切尔诺夫，向英勇的水兵、红军战士与工人们致以兄弟般的问候——你们自1905年以来第三次挣脱了专制的枷锁。他愿提供人员援助，并通过海外俄国合作社为喀琅施塔得筹措补给。请告知所需物资与数量。我已准备

---

<sup>212</sup> 《海外社会革命党人的活动》，莫斯科，1922年，第66—70页。

好亲自前往，将我的精力与威信奉献给人民革命。我坚信劳动群众终将取得胜利。向率先举起人民解放旗帜的人们致敬！打倒左右两翼的专制暴政！”<sup>213</sup>

革命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审议这一提议。只有瓦尔克投了赞成票，佩列佩尔金则主张立即拒绝；其余人支持佩特里琴科与基尔加斯特，认为目前最好的做法是暂不接受。<sup>214</sup>最终，切尔诺夫收到如下答复：“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向海外所有兄弟致以深切谢意，感谢你们的同情。临时革命委员会感谢切尔诺夫的提议，但目前暂不接受，以待局势进一步明朗。此间一切均在考虑之中。”<sup>215</sup>答复的语气并非不友好。尽管水兵们预计起义会蔓延至大陆，认为无需外界援助，但他们也不愿在日后可能需要时把门关死。然而最终，起义者并未向社会革命党人请求援助，对方的援助也从未抵达喀琅施塔得。

与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人不同，流亡中的孟什维克远离反布尔什维克阴谋，也未试图援助起义者。自列宁及其追随者掌权以来，孟什维克一直作为合法反对党存在，试图通过自由、不受阻碍的苏维埃选举赢得部分政治权力。内战期间，他们认为白军是比布尔什维克更大的祸害，因此反对针对现政权

---

<sup>213</sup> 《革命俄罗斯》，1921年，第8期，第3—4页；伯克曼：《喀琅施塔得起义》，第16页。

<sup>214</sup> 《真理报》，1921年4月7日。

<sup>215</sup> 《革命俄罗斯》，1921年，第8期，第3—4页。

的武装暴动，并威胁开除任何加入反革命阵营的成员。（后来的苏联外交官伊万·迈斯基，因加入萨马拉激进反布尔什维克的社会革命党政府而被开除出党。）即便到1921年，孟什维克虽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的专制与恐怖，却仍坚信：针对列宁政府的武装斗争只会让反革命势力得利。海外孟什维克的主要机关报《社会主义信使》虽同情喀琅施塔得水兵反对一党专政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立场，却与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外部干预主张划清界限。该刊宣称：我们的目标，不是用枪炮，而是通过工人阶级不可抗拒的群众压力来对抗布尔什维主义。<sup>216</sup>

总而言之，俄国流亡者（孟什维克部分例外）对起义欢欣鼓舞，并试图以一切可能方式援助起义者。在这一点上，苏联对他们的指控是成立的。但声称侨民策划了这场叛乱，则并非事实。相反，尽管巴黎与赫尔辛福斯存在种种密谋，喀琅施塔得起义自始至终都是一场自发、独立的运动。证据表明，这场起义并非阴谋的产物，而是：俄国海外圈子里确实存在过初步的密谋计划；密谋者虽与水兵一样敌视现政权，但在实际起义中并未发挥作用。全国中心曾预判起义爆发，并拟定计划协助组织起义，同时在法国援助下为参与者提供粮食、药品、部队与军事装备。该中心的最终目标，是掌控这场起义，把喀琅施塔得变成新一轮武装干涉、推翻布尔什维克统治的跳板。然而

---

<sup>216</sup> 《社会主义信使》，1921年3月18日，第1—3页。

结果是，这些计划根本来不及实施。起义爆发得过早，比密谋所需的基本条件——冰层融化、补给线建立、获得法国支持、将弗兰格尔分散的部队调至附近集结地——提前了数周。

立宪民主党人与社会革命党人试图利用起义为自身谋利，这并不令人意外。但自始至终，主导局势的都是水兵及其革命委员会。直到局势陷入绝境，他们才向外求援，因为他们自信地认为，自身的榜样会在大陆引发大规模暴动。他们也从未收到侨民竭力提供的任何援助；除3月16日维尔肯男爵的到访外，起义期间与潜在支持者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直接接触。顺带一提，现有证据显示：流亡者与喀琅施塔得前沙皇军官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而后者本应是白军阴谋中最可能的合作对象。

但可以证实的是，起义被镇压、其领导人逃往芬兰后，起义者与流亡者之间达成了某种协议。1921年5月，在伊诺要塞难民营的佩特里琴科与数名同伴决定志愿为弗兰格尔将军效力。当月底，他们致信弗兰格尔驻赫尔辛福斯代表格林姆教授，提议联手发动新的运动，推翻布尔什维克，恢复“1917年三月革命的成果”。水兵提出了六项纲领作为任何联合行动的基础：  
1. 全部土地归农民；2. 工人拥有自由工会；3. 边境国家完全独立；4. 喀琅施塔得逃亡者享有行动自由；5. 废除所有军服上的肩章；6. 保留“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非归政党”的口号。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一口号仅打算作为“权宜的政治策略”保留，直至推翻布尔什维克；一旦取得胜利，便将弃用该口号，并建立临时军事专政，以防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最后这一点，

无疑是为安抚弗兰格尔。无论如何，水兵坚持：俄国人民最终必须“自由决定自己想要何种政府”。<sup>217</sup>

格林姆立即同意了这些条件，数周后弗兰格尔本人也发来肯定的答复。此外，该协议似乎得到了执行。据苏联秘密警察的档案记载，1921年夏，佩特里琴科与格林姆、维尔肯男爵合作，招募了一批流亡水兵并将其秘密潜入彼得格勒，计划在适当时机协助夺取该城，作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新桥头堡。这些水兵入城后，在彼得格勒战斗组织的指挥下开展活动。该组织是隶属于全国中心的地下团体，由前彼得格勒大学地理学教授弗·尼·塔甘采夫领导。最终，弗兰格尔将军的部队本应介入，但在此之前，该战斗组织便被破获并镇压。<sup>218</sup>

然而，流亡者并未灰心。1921年6月，由全国中心召集、旨在联合志同道合侨民开展反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全国联盟代表大会，收到了芬兰境内一批喀琅施塔得人的来信，热情支持其纲领。<sup>219</sup>此外，全国中心档案中存有一份1921年10月30日的机密文件，由佩特里琴科与亚科文科（以临时革命委员会主

<sup>217</sup> 佩特里琴科等人致格林姆，伊诺要塞，1921年5月31日；致弗兰格尔，1921年5月31日，格林姆档案馆、吉尔斯档案馆，第88号档案。

<sup>218</sup> 《全俄非常委员会历史（1917—1921）：文献集》，莫斯科，1958年，第433—436、445—458页；《关于在彼得格勒破获的反苏维埃政权阴谋》，契卡主席团，1921年8月29日，哥伦比亚大学俄国档案馆藏。塔甘采夫于1921年8月被处决。关于彼得格勒战斗组织另见：瓦尔京《革命与孟什维主义》，第141—154页；普霍夫《喀琅施塔得叛乱》，第117—118页；《红色年鉴》1931年第3期，第18—19页；《历史问题》1968年第1期，第133—136页。

<sup>219</sup> 《共同事业》，1921年6月13日。

席、副主席身份) 签署, 授权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斯科西廖夫以流亡者代表身份加入巴黎的俄国全国委员会, “与其他秉持武装反抗布尔什维克立场的组织协调开展行动”。<sup>220</sup>

当然, 这一切都无法证明全国中心与革命委员会在起义之前或期间存在任何关联。恰恰相反, 是共同的苦难与失败经历, 以及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共同决心, 促使他们在事后走到了一起。布尔什维克始终否认起义的自发性, 将其归咎于从右翼君主派到左翼无政府主义者的一整批俄国反对派团体, 与协约国情报机构相互勾结。但他们从未拿出过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实这些指控。列宁本人在 1921 年 3 月 15 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也间接承认了这一点, 他说, 在喀琅施塔得, “他们既不要白卫军, 也不要我们的政权”。<sup>221</sup> 尽管他坚持认为流亡者在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列宁也意识到, 这场起义并非内战时期白军运动的简单重演。他更将其看作是党与俄国人民之间已经出现深刻裂痕的信号。他说, 如果说白卫军牵涉其中, 那么“这场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小资产阶级反革命, 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自发浪潮”。他的意思是, 这场起义在根子上反映的是俄国农民的不满——那些小私有者不愿接受国家及其管控, 只想按自己的意愿支配土地。“毫无疑问,” 列宁接着说, “这场小资产阶级反革命, 比邓尼金、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加在一

---

<sup>220</sup> 《委任状》, 1921 年 10 月 30 日, 哥伦比亚大学俄国档案馆藏。

<sup>221</sup>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 第 414 页。

起还要危险。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农民经济已经崩溃的国家，更何况军队复员又释放出了大批具有叛乱倾向的人员。”<sup>222</sup>

他的同事布哈林也持相近看法。布哈林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说，比喀琅施塔得事件本身严重得多的，是从农民蔓延到一部分工人阶级中的“小资产阶级传染病”。他说，这比某位将军在喀琅施塔得发动一场兵变要危险得多。几个月后，布哈林再次谈到这一问题。1921年7月，他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后来公布的文件清楚表明，此事是由纯粹的白卫军中心煽动的，但与此同时，喀琅施塔得兵变也是一场反对社会主义经济强制体制的小资产阶级起义。”<sup>223</sup>

尽管官方宣传机器充斥着谩骂之词，列宁和布哈林的这些论述，却成功揭示了喀琅施塔得叛乱的真正实质。水兵的兵变，与其说是白军阴谋的产物，不如说是当时席卷全国的农民自发起义与工人阶层不满情绪的集中体现。这些运动合在一起，构成了对布尔什维克专政及其过时的战时共产主义纲领的群众性抗议。这是人民对政府的抗议，而喀琅施塔得起义，便是它最鲜明、最震撼的表达。

---

<sup>222</sup> 同上，第33—34页。

<sup>223</sup> 同上，第224—225页；H. 布哈林：《苏维埃俄国的新政策》，芝加哥，1921年，第56页。

## 第四章

# 首次进攻

面对岌岌可危的国内危机，布尔什维克决心尽快平息这场起义。其作为政府的生存本身似乎已岌岌可危。一方面，起义领导人于3月2日采用的“临时革命委员会”这一名称，本身就是一种挑衅与挑战。但更为凶险的是《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决议》提出的初始要求。起义者以“当前苏维埃未能表达工农意志”为由，呼吁重新选举苏维埃，这实际上是在质疑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合法性。3月3日，喀琅施塔得《消息报》创刊号再次重申了这一主旨。该报头版社论称，共产党已彻底与人民离心离德。唯有劳动群众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共同努力，才能将国家从更深的苦难与压迫中拯救出来。<sup>224</sup>考虑到莫斯科与彼得格勒近期发生的骚乱，以及边缘地区仍在肆虐的农民起义，在当局眼中，这类言论带有颠覆性色彩。他们担心，若不迅速采取行动，喀琅施塔得可能会引发一场全国性的大动荡。

---

<sup>224</sup> 《真理报论喀琅施塔得》，第45页。

俄国流亡者重新展开敌对活动，进一步加剧了恐慌。历经近三年内战，对反革命阴谋的恐惧已深深植根于苏联领导层心中。在层出不穷的谣言煽动下，一场“白祸恐慌”（堪比西方的“红祸恐慌”狂热情绪）席卷了全党。对许多布尔什维克而言——尤其是在起义初期局势混乱、可靠信息匮乏之时——喀琅施塔得事件无疑带有反苏阴谋的味道。在科尔尼洛夫、克拉斯诺夫、米勒、尤登尼奇、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等一连串白军将军之后，在协约国与俄国反对派的支持下，科兹洛夫斯基将军似乎又落入了这一熟悉的模式。起义消息刚传到彼得格勒时，季诺维也夫的内弟便在阿斯托里亚酒店叫醒了维克多·塞尔日。“喀琅施塔得落入白军手中了，”他语气激动地说，“我们所有人都已接到命令。”<sup>225</sup>

布尔什维克并非知晓全国中心那份绝密备忘录的内容，否则他们必定会在针对起义者的宣传战中将其公之于众。但他们确实获悉，有人正在筹划向喀琅施塔得运送补给，并派遣部队与装备支援起义。如前所述，苏联特工截获了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的通信，也得知了切尔诺夫向起义者提供援助的提议。此外，立宪民主党与十月党人的筹款活动在侨民报刊上公开报道，蔡德勒与格林姆在芬兰的活动也并未逃过他们的视线。<sup>226</sup>巴黎、柏林、赫尔辛福斯的流亡者们重燃希望、群情激奋，这无疑加

---

<sup>225</sup> 塞尔日：《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第124页。

<sup>226</sup> 《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1921年3月16日。

剧了莫斯科与彼得格勒的紧迫感，也坚定了政府迅速、果断镇压起义的决心。

由此看来，苏联方面关于反革命阴谋的指控，并非单纯为针对起义者而编造的宣传说辞，而是在宣传之外，确实对白军势力卷土重来的前景感到真切的焦虑。无论如何，布尔什维克千方百计地在民众面前抹黑喀琅施塔得起义。他们尤为担心起义对军队造成的影响，若需动用苏联红军镇压兵变，就必须将其定性为危险的反革命运动。于是，科兹洛夫斯基被与内战时期的白军将领绑定，被扣上“新尤登尼奇”的帽子，称其从波罗的海方向威胁彼得格勒。<sup>227</sup>一份面向红军的特别通告还指控起义者企图破坏在里加与波兰的和平谈判；通告告知士兵们，若非喀琅施塔得事件，他们本可复员返乡。<sup>228</sup>

此外，起义还被说成是“一场在苏俄境内制造事端、损害其国际地位的宏大计划的一部分”。<sup>229</sup>白军分子密谋不仅要挑起波兰再次武装干涉，还要破坏苏俄与西方刚刚缓和的关系。具体而言，他们企图阻止美国政策向与苏俄妥协的方向转变。据布尔什维克媒体称，新任共和党总统（哈定）有意恢复与俄国的商贸关系——这一牵强的看法，或许是受一位积极活动的

---

<sup>227</sup> 《彼得格勒真理报》，1921年3月4日。

<sup>228</sup> 《莫斯科卫戍区红军部队命令》，第226号，1921年3月3日，马克拉科夫档案馆，B类，第5包，第5号。

<sup>229</sup> 《真理报论喀琅施塔得》，第71页。

美国访客 W·B·范德利普的鼓动，列宁将此人视作在华盛顿拥有权势人脉的富商。同样，列夫·加米涅夫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警告称，反革命分子一心要破坏即将达成的对英贸易协定。<sup>230</sup>正如苏联驻伦敦特使列昂尼德·克拉辛所言：“无论如何，某些险恶势力正在运作，企图拖延、甚至中断谈判。”但克拉辛确信，喀琅施塔得事件会与此前所有白卫军阴谋落得同样下场：“回想苏联政府过去三年成功应对的种种危机，这次喀琅施塔得事件微不足道。我们会以一贯的方式处理此事。”<sup>231</sup>

让布尔什维克更为担忧的，是流亡者决意要渗透喀琅施塔得，并将其作为在俄国本土登陆的基地。这无异于内战的重新爆发——而在全中国已经普遍筋疲力尽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很可能无法挺过这一关。换言之，当局真正害怕的，与其说是起义本身，不如说是起义可能引发的后果。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指出，真正的危险在于：喀琅施塔得可能成为白卫军复辟的“一步台阶、一架梯子、一座桥梁”。<sup>232</sup>主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及其同事将水兵们视为反革命分子。他们的逻辑仿佛是：“只要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支持者是谁，我们就能判断你们是什么人。”他们并没有把起义者本身说成

---

<sup>230</sup>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第 456 页。

<sup>231</sup> 《每日先驱报》，1921 年 3 月 7 日。

<sup>232</sup>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第 34 页。

是人民的凶恶敌人，而是将其描述为误入歧途的兄弟——既应受到谴责，也值得同情。“我们已经尽可能地等待，”托洛茨基在为镇压起义的部队举行的阅兵式上说，“等待我们盲目水兵同志们亲眼看清，这场叛乱会把他们引向何方。”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也以类似的口吻发言：“谁说喀琅施塔得起义是白卫军发动的？不是。为了理想，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们被迫镇压了我们犯错兄弟的起义。我们不能把喀琅施塔得水兵看作敌人。我们爱他们，如同爱我们真正的兄弟、我们的血肉至亲。”<sup>233</sup>

对于在俄国的外国共产党人，如维克多·塞尔日和安德烈·莫里泽而言，这类言论令他们极为不安。他们原本被引导相信，喀琅施塔得事件不过是内战时期反布尔什维克运动的重演，却“震惊而忧虑地”发现，苏联领导人并未表现出过去对白军及其合作者那样的敌意；相反，他们的谈话中不时流露出“带有同情的沉默”，在这些外国访客看来，这暴露了该党内心的不安。然而，这些外来者也理解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所处的困境：既要掌握政权，又要维护革命理想。经过深刻的内心挣扎，怀着“难以言表的痛苦”，塞尔日最终宣布站在共产党人一边，反对起义，尽管他承认喀琅施塔得一方拥有正义——尽管此时的政党已被大量追逐权力者涌入，在民众中几乎丧失了信任。他认

---

<sup>233</sup> 艾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纽约，1954年，第514页；拉斐尔·R·阿布拉莫维奇：《苏维埃革命（1917-1939）》，纽约，1962年，第203页。参见安德烈·莫里泽：《在列宁与托洛茨基那里：莫斯科1921》，巴黎，1922年，第78-84页。

为，一旦布尔什维克专政倒台，随之而来的将是迅速陷入混乱、爆发全面农民暴动，即重演昔日的普加乔夫起义，共产党人遭到屠杀，流亡者带着空洞而过时的政策卷土重来，最终建立的将是另一种专政，而这一次是反无产阶级的，而非反资产阶级的。尽管如此，塞尔日个人发誓，绝不向那些被逼到忍耐极限、饱受饥饿的工人和水兵动用武力。<sup>234</sup>

最终，武力还是被用来镇压了起义者。但武力真的是必要的吗？布尔什维克在诉诸武力之前，究竟有多认真地尝试过和平解决？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已尽一切努力避免流血，但事实上他们本可以做得更多。诚然，在起义的第一周，当局曾多次呼吁起义者保持理智；我们知道，3月1日，加里宁和库兹明均以调停人身份前往喀琅施塔得，并在锚地广场的露天集会上发表讲话，次日库兹明又在教育之家进行了演说。然而，他们并未作出任何让步，哪怕是此前曾给予彼得格勒罢工工人的那类让步。尽管局势明显需要策略与和解，这两位官员的讲话中却完全看不到这些姿态。他们的态度挑衅、好斗、毫不妥协，语气充满威胁，只会进一步激怒情绪激动的水兵。从一开始，当局的态度就不是认真谈判，而是下达最后通牒：要么醒悟，要么自食恶果。<sup>235</sup>

这实在是 不幸，甚至堪称悲剧，因为倘若采取更具同情与

---

<sup>234</sup> 塞尔日：《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第 126-129 页

<sup>235</sup> 《关于喀琅施塔得的真理报》，第 162 页

灵活的态度，起义者本极有可能作出回应。但布尔什维克正面临其历史上最严峻的危机之一，根本无意妥协。他们的神经已极度紧绷。他们惧怕波兰人、流亡者、协约国，也惧怕喀琅施塔得会成为新一轮武装干涉的先锋；他们惧怕起义蔓延至俄国本土，而本土早已怨声载道，多处爆发农民暴动；他们惧怕丧失政权，随之而来的是无政府状态，最终是白军复辟。在这种情势下，与起义者谈判显得风险过高。面对公然的反抗与颠覆，任何犹豫、任何示弱的迹象，都可能导致其政权全面崩溃。在夺取政权并历经三年浴血内战守住政权之后，难道如今要因一群冲动、无纪律的水兵哗变而放弃一切？他们能耗得起时间静观起义自行平息吗？时间并不站在他们一边。用不了多久，解冻期就会到来。从起义者3月15日的《消息报》中我们可知，喀琅施塔得城内街道上的积雪已开始融化<sup>236</sup>。数周之内，芬兰湾的冰层便会消融，届时步兵将无法对要塞发起进攻。冰封在喀琅施塔得港内的军舰将得以解冻投入作战。更重要的是，即便芬兰依旧禁止跨境通行，物资与增援部队也可通过海路抵达喀琅施塔得。为阻止这一切发生，布尔什维克明白必须迅速行动。有哪个政府会长期容忍在其最具战略意义的军事基地——一处被敌人觊觎、当作新一轮入侵跳板的基地——发生海军哗变？“我们已经尽可能地等待了，”起义被镇压后不久，托洛茨基便称，“但我们面临着冰层消融的危险，因此不得不发

---

<sup>236</sup> 《关于喀琅施塔得的真报》，第162页

起……进攻。”<sup>237</sup>

在当局的诸多顾虑中，有两点或许最为紧迫：一是担心起义蔓延至本土，二是担心引发陆海军其他部队的哗变。3月2日奥拉宁鲍姆发生的事件，进一步加剧了这两种恐惧。当天下午，喀琅施塔得的使者携带《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决议》文本穿越冰层，在彼得格勒及周边数个城镇分发决议。在奥拉宁鲍姆，第一海军航空中队的普通士兵在俱乐部召开会议，一致通过该决议，并效仿喀琅施塔得，选举产生了自己的革命委员会。此后不久，他们在附近的机库再次集会，选出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代表团穿越冰层，与喀琅施塔得方面建立直接联系。午夜时分——显然是在航空中队代表团抵达并表示愿意加入运动之后——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派遣一支250人的队伍前往奥拉宁鲍姆，却遭到机枪扫射，被迫撤退。航空中队的三名使者在返回基地途中被契卡逮捕。与此同时，奥拉宁鲍姆驻军政委得知哗变苗头后，立即致电季诺维也夫的防御委员会，紧急请求增援。奥拉宁鲍姆的全体共产党员都领到了武器，并获得额外配给，以平息他们自身可能因粮食问题产生的不满。3月3日凌晨5时，一列搭载着军校生分队与三个轻炮兵连的装甲列车从彼得格勒抵达。航空中队的营房迅速被包围，人员悉数被捕。数小时后，经过严厉审讯，45人被处决，其中包括红军海

---

<sup>237</sup> 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第514页

军航空兵师师长、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主席与秘书<sup>238</sup>。

奥拉宁鲍姆哗变被镇压，是喀琅施塔得领导层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挫败。他们原本坚信起义会蔓延至俄国本土，进而迫使布尔什维克接受其诉求，因此始终拒绝主动出击，仅向奥拉宁鲍姆派出了一支小规模部队，最终招致惨败。（而奥拉宁鲍姆的起义者同样抱有这种幼稚心态，并未着手武装自己、控制自身基地。）但倘若以海军航空中队的态度为参照，正如科兹洛夫斯基及其同僚所坚持的那样，夺取奥拉宁鲍姆本可以轻而易举，几乎不会遭遇抵抗。如此一来，起义者便可以向彼得格勒进军，而当地居民极有可能受此鼓舞，起身反抗政府。然而，所有这类建议都被顽固地拒绝了。水兵们待在自己的岛屿要塞里，远比在本土陌生环境里充当步兵要安心得多。他们担心兵力不足以发动攻势，宁可将自己困在这座看似坚不可摧、四周布满火炮的要塞中，坐等政府接受谈判条件。

自此以后，一切要求他们掌握主动权的呼吁都被置若罔闻。当“军事专家”提议用火炸开科特林岛周围的冰层，构筑水道以抵御步兵进攻时，革命委员会的回应是，没有足够的备用炮弹执行这一计划，而且即便炸开，海水也会在短时间内重新冻结<sup>239</sup>。因此，在整个起义期间，尽管外界以为他们早已采取此

---

<sup>238</sup> 《关于喀琅施塔得的真理报》，第 92-94 页；佩特里琴科：《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真相》，第 8-9 页

<sup>239</sup> 凯利中尉报告，载夸顿致国务卿电，1921 年 4 月 23 日，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号 861.00/8619。流亡派媒体（如 1921 年 3 月 8 日《政权报》）称起义者使用叶尔马克号破冰船为前往奥拉宁鲍姆开辟航道，此说法不实。该舰当时在彼得格勒，已于起义爆发前

类措施，起义者却从未尝试为要塞挖掘冰上护城河，也没有让冰封的战舰解冻脱困<sup>240</sup>。同样，当军事专家建议在城市东部防御薄弱的彼得格勒门附近构筑街垒（事实证明这是极具远见的提议）时，革命委员会却坚称缺乏人力与物资，尽管二者实际上都十分充足。科兹洛夫斯基后来解释说，水兵们拒绝配合，是因为他们天生不信任军官与一切上级权威。他鄙夷水兵们的固执与缺乏纪律，抱怨称这场起义本不该在芬兰湾冰层融化之前发动。他认为，正是水兵们急于挣脱布尔什维克枷锁的急躁心态，导致了起义的过早爆发<sup>241</sup>。

与此同时，起义在点燃本土反抗之火方面收效甚微。只有少数地区——主要是奥拉宁鲍姆、彼得霍夫和彼得格勒——出现了愿意支持起义事业的异见运动。但该地区的布尔什维克早已对颠覆活动保持高度警惕，每一次异动都被迅速扑灭。例如在彼得格勒，一支喀琅施塔得水兵代表团试图争取破冰船特鲁沃尔号（另有资料称是叶尔马克号）的船员，其目的显然是解救塞瓦斯托波尔号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舰，并为科特林岛开凿冰上护城河以抵御步兵进攻，或许还想打通通往西方的补给通道。但布尔什维克部队立即被派往该船，喀琅施塔得使

---

一天前往该地补充燃料。

<sup>240</sup> 参见，例如，夸顿致国务卿电，1921年3月9日，同上，档案号 861.00/8296：“两岸冰层坚固，但革命者大概率已为自身开凿冰上护城河，并以开阔水域为屏障。”

<sup>241</sup> 1921年3月19日《新俄罗斯生活报》；1921年3月21日《泰晤士报》（伦敦）；1921年4月5日《社会主义通报》，第5页。

者及其同情者悉数被捕<sup>242</sup>。除此之外，喀琅施塔得并未为扩散起义做出更多努力。在被派往彼得格勒省各城镇分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决议》的200名使者中，只有极少数人躲过抓捕；携带传单的水兵最远在南部的德诺——彼得格勒至维捷布斯克铁路线上的枢纽——被截获。起义者还试图通过电话向彼得格勒和红色戈尔卡说明自身立场，但一切努力均无果而终。而当局则致电革命委员会，试图说服他们大势已去，却徒劳无功。与此同时，喀琅施塔得内部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党员利用未被切断的电话线，汇报起义者的弹药、粮食储备与士气情况<sup>243</sup>。

总体而言，起义者采取了防御战略，他们认为这一策略足以让他们坚守到解冻期来临，使自身阵地变得坚不可摧。与此同时，他们着手处理岛屿的行政事务，尤其着力加固防御工事。他们希望政府能够接受谈判，但也并未排除遭遇武装进攻的可能。临时革命委员会在3月4日警告称：“我们随时可能遭到共产党人的进攻，他们企图夺取喀琅施塔得，重新将我们置于其统治之下，让我们再度陷入饥寒、困顿与毁灭。”<sup>244</sup>然而在最初一周，这场起义依旧是一场心理战，而非枪炮之战。

政府为何拖延如此之久才发起进攻？此番推迟，与其说是

---

<sup>242</sup>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原因、诱因、进程与评价》，手稿，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普霍夫，《红色年鉴》，1931年第1期，第17页。

<sup>243</sup> 佩特里琴科：《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真相》，第12页；卡特科夫：《喀琅施塔得起义》，《圣安东尼论文集》第6辑，第33页。

<sup>244</sup> 《关于喀琅施塔得的真理报》，第51页。

为了寻求和平解决，不如说更多是出于完成充分军事准备的需要。3月初，布尔什维克火速控制了旧都彼得格勒及周边关键战略据点，尤其是红色戈尔卡、奥拉宁鲍姆，以及卡累利阿沿岸的利西诺斯与谢斯特罗列茨克。彼得格勒及邻近城镇的全体共产党员被动员起来并配发武器。截至3月5日，一支约4000人的民兵队伍已组建完成，并有共青团员与地方工会志愿者补充兵力。此外，数百名军校生从周边地区及莫斯科、奥廖尔、下诺夫哥罗德等远方城市调集而来，契卡特种部队（内卫部队）与路障分队人员也被投入镇压起义的行动中。当局对从彼得格勒开往喀琅施塔得方向本土各站点的列车实施严密监控，严防任何人员与起义者接触。奥拉宁鲍姆哗变的失败（或许还勾起了1919年红色戈尔卡反布尔什维克哗变的记忆），让苏联领导层深感不安，他们随即增援了这些据点的驻军，并亲自视察排查，肃清一切颠覆活动。

在彼得格勒城内，尽管罢工与示威已基本平息，但一种近乎恐慌的阴郁预期仍在蔓延。3月初的一天清晨，维克多·塞尔日离开阿斯托利亚酒店时，看见一位老女仆拎着几个包裹悄悄往外走。“大娘，这么早您这是要去哪儿？”他问道。“城里透着股要出事的味儿，”老妇人答道，“他们会把你们全都杀了的，我可怜的孩子，他们又要到处烧杀抢掠了。”<sup>245</sup>针对犹太人的威胁言论四处蔓延。因不断有骚乱再起的谣言流传，城内许

---

<sup>245</sup> 塞尔日：《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第125页。

多工厂与商铺始终紧闭大门。3月3日，已在整个彼得格勒省掌握绝对权力的彼得格勒防御委员会，采取严厉措施杜绝任何进一步骚乱。整座城市沦为了一座巨型军营，军队在各个街区巡逻。墙上张贴的告示警示市民：一切集会将被驱散，抗拒者就地枪决。白天街道几乎空无一人，宵禁时间定为晚9点，夜间活动彻底绝迹。<sup>246</sup>

身兼党委负责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与防御委员会主席三职的季诺维也夫，充分运用手中集中的权力。在整个紧急状态期间，他行事高效果决，丝毫不见传闻中那般易怒或恐慌。3月4日，他召集苏维埃特别会议，议程核心便是喀琅施塔得事件。除正式委员外，工会、工厂委员会、军事单位、青年组织等其他机构的代表亦获邀参会。无政府主义领袖亚历山大·伯克曼与埃玛·戈德曼当时仍与政府保持友好关系，二人也出席了会议，并对会议过程留下了生动记述，我们可结合当时的媒体报道补充若干细节。<sup>247</sup>

这场会议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激烈的争吵。季诺维也夫和加里宁将这次起义斥责为白卫军阴谋，称其受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及协约国情报人员的唆使；话音刚落，前排一名来自

---

<sup>246</sup> 1921年3月3日《彼得格勒真理报》；1921年3月3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

<sup>247</sup> 伯克曼：《喀琅施塔得起义》，第30-31页；戈德曼：《我的生活》，第879-881页；1921年3月5日《红色报》；1921年3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另见科尔纳托夫斯基编：《喀琅施塔得叛乱》，第40-42页；《关于喀琅施塔得的真理报》，第165-166页。

兵工厂的工人便起身，为起义者辩护。他伸手指向季诺维也夫，高声喊道：“正是你和你所在政党的冷酷冷漠，逼得我们举行罢工，也激起了在革命中与我们并肩作战的水兵兄弟们的同情。他们除此之外并无任何罪责，这一点你心知肚明。你却蓄意污蔑他们，叫嚣要将他们消灭。”据埃玛·戈德曼记述，会场里顿时响起“反革命分子”“叛徒”“孟什维克匪徒”的叫喊声，整个会场陷入一片混乱，但这名工人仍坚持立场，声音在喧嚣中愈发响亮：“就在短短3年前，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还有你们所有人，都被骂作德国间谍。是我们工人和水兵出手相救，把你们从克伦斯基政府的手中救了出来。当心，同样的命运未必不会降临到你们头上！”

就在这时，一名喀琅施塔得水兵起身，为这名发言的工人辩护。他宣称，自己战友们的革命精神丝毫未变，他们随时准备为捍卫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随后他开始宣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决议》，据戈德曼描述，会场立刻变成一片嘶吼与混乱的嘈杂之地。季诺维也夫在一片骚动中作出回应，要求喀琅施塔得立即投降，否则将处以死刑。尽管有数名代表提出抗议，会议仍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水兵们放弃愚蠢的行为，将权力归还给本就应行使职权的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决议宣称，倘若最终血流成河，一切罪责都将由你们自己承担。“立刻做出抉择。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共同对抗共同的敌人；要么就

与反革命分子一同身败名裂、走向灭亡。”<sup>248</sup>

原本预计会出席这场会议的还有托洛茨基——政府在危机时期最有才干的危机处理专家，但他并未按时赶到。起义爆发时，他正在农民骚乱频发的西西伯利亚。得知消息后，他立刻返回莫斯科与列宁商议，随后火速北上前往彼得格勒，于3月4日或5日抵达这座旧都。他抵达后的第一项行动，便是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3月5日发表），要求哗变的水兵立即无条件投降：

“工农政府已下令，喀琅施塔得及参与哗变的舰船必须立即服从苏维埃共和国的管辖。据此，我命令所有举兵反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人即刻放下武器。拒不服从者将被解除武装，移交苏维埃政权处置。被扣押的政委及其他政府代表必须立即获释。只有无条件投降者，才有可能得到苏维埃共和国的宽恕。与此同时，我已下令准备以武力镇压此次哗变、制服哗变者。若和平民众因此遭受任何损失，全部责任都将由反革命哗变分子承担。此为最后警告。”<sup>249</sup>

如果这真的是为避免武装冲突而发出的真诚尝试，那它显然注定要失败。这份通牒全然不顾水兵们的情绪，只会让他们比以往更加坚定，决心抗争到底，直至改革得到落实。“竟由

---

<sup>248</sup> 科尔纳托夫斯基编：《喀琅施塔得叛乱》，第42页。

<sup>249</sup> 托洛茨基：《革命是如何武装起来的》，第三卷第一部分，第202页。签署该最后通牒的还有红军总司令谢·谢·加米涅夫，以及彼得格勒第七集团军司令米·尼·图哈切夫斯基。

托洛茨基对水兵说出这样的话，“他的传记作者艾萨克·多伊彻写道，“这是历史的又一重讽刺。这里曾是他的喀琅施塔得，是他口中‘革命的骄傲与荣光’的喀琅施塔得。在1917年那些火热的日子里，他曾多少次在这座海军基地奔走演说！水兵们又曾多少次把他高高举起，狂热地拥戴他为自己的朋友与领袖！他们曾何等赤诚地追随他前往陶里德宫，前往他被关押的克利斯特监狱，前往伏尔加河畔的喀山城下，始终听从他的忠告，几乎盲目地执行他的命令！他们曾共担多少忧虑，共赴多少危难！”然而时过境迁，临时革命委员会以自己的警告回应了托洛茨基的最后通牒：“劳动者革命的第九浪【即海上风暴的最高潮】已然掀起，必将把那些卑劣的诽谤者、暴君及其一切腐朽行径从苏维埃俄国的土地上彻底扫除——而托洛茨基先生，你的宽赦，我们并不需要。”<sup>250</sup>

3月5日同一天，彼得格勒防御委员会单独发布了一份传单，由飞机空投至喀琅施塔得上空。其措辞甚至比托洛茨基的最后通牒更具挑衅意味。传单称，在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的背后，白军军官正露出獠牙。起义的真正领导者是科兹洛夫斯基将军及其助手布尔克泽尔上尉、科斯特罗米季诺夫、希尔马诺夫斯基以及其他白卫军分子，他们用民主与自由的许诺欺骗你们。而实际上，他们是在为复辟沙皇制度而战，为让新的维伦【1917年2月遇刺前的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司令】重新骑

---

<sup>250</sup> 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第512页；《真理报论喀琅施塔得》，第68页

在你们头上而战。所谓彼得格勒、西伯利亚与乌克兰都支持你们，这是无耻的谎言。真相是你们已四面被围，处境毫无希望。传单结尾发出了一则预言式的警告：在最后关头，科兹洛夫斯基之流和佩特里琴科之流会弃你们于不顾，逃往芬兰。到那时你们怎么办？若追随他们而去，你们以为在芬兰能有饭吃吗？难道没听说弗兰格尔部下的下场吗？他们正像苍蝇一样因饥饿与疾病大批死去。除非你们在 24 小时内投降，否则同样的命运也在等待着你们。投降即可获得赦免；若胆敢抵抗，“你们将像鹁鸪一样被枪决”。<sup>251</sup>

尽管将起义者“像鹁鸪一样枪决”的威胁常被归罪于托洛茨基，但真正下达这一指令的是季诺维也夫领导的防御委员会。无论如何，水兵们都被激得怒不可遏。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成了他们眼中的头号恶人，是苏维埃政权内部一切邪恶与可憎事物的象征。（列宁此时仍居于幕后，直到下周才遭到喀琅施塔得方面的声讨，即便如此，针对他的抨击也远不及对上述两人那般充满敌意。）当彼得格勒当局下令逮捕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家属作为人质时，民众的愤慨达到了顶点。人质制度是托洛茨基在内战期间推行的举措，用以警示“军事专家”——即前沙皇政府的军官，防止他们背叛麾下指挥的红军部队。1918 年 9 月 30 日托洛茨基的命令中写道：“让叛徒们知晓，他们的背叛行径，同时也会连累自己的至亲——父母、姐妹、兄弟、妻子

---

<sup>251</sup> 科尔纳托夫斯基编：《喀琅施塔得叛乱》，第 188–189 页

与子女。”<sup>252</sup>但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扣押人质的决议并非如诸多记载所言由托洛茨基作出，而是托洛茨基抵达彼得格勒之前，便由彼得格勒防御委员会下达。该委员会要求立即释放3月2日被水兵关押的三名共产党官员：“只要被扣押的同志有分毫损伤，我们便以人质的头颅抵偿。”<sup>253</sup>这一声明于3月5日发布，同日政府向起义者下达了最后通牒。3月7日，《喀琅施塔得消息报》作出回应，要求在24小时内释放人质：“喀琅施塔得驻军在此声明，本地共产党人享有充分自由，其家属亦绝对安全。我方绝不会效仿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行径，因我们认为此类手段即便出于极端愤怒，也堪称最卑劣、最恶毒的行径，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劣迹。”<sup>254</sup>然而这一呼吁最终石沉大海。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伯克曼与埃玛·戈德曼得知布尔什维克最后通牒后，决心竭尽所能阻止流血惨案发生。3月5日，他们与两名同志一同致信季诺维也夫，提议组建中立委员会调解此次争端。该委员会由5人组成，其中2人为无政府主义者，将前往喀琅施塔得，力求达成和平解决方案。信中指出，是饥饿、寒冷，加之诉求无处申诉，才迫使水兵公开抗议；若不快通过友好协商而非武力手段解决问题，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便会借机利用局势。诉诸武力只会激化矛盾，反倒利于白军势力。

---

<sup>252</sup> 托洛茨基：《革命是如何武装起来的》，第I卷，第151页

<sup>253</sup> 《真理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921年3月5日

<sup>254</sup> 《真理报论喀琅施塔得》，第73页

此外，工农政府对工农自身动用武力，将对国际革命运动造成极其消极的影响。<sup>255</sup>

在水兵未能争取到大陆支持的情况下，倘若采取此类和解举措，极有可能平息他们的怒火，避免随后发生的悲剧。尽管伯克曼的呼吁未获回应，但次日即3月6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向革命委员会发去电报，询问是否可派遣一个由苏维埃内部党员与非党员共同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喀琅施塔得，实地了解情况。无论这一提议是否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启发，都是起义爆发以来布尔什维克方面首个具有建设性的和解姿态。因此，它遭到拒绝实属不幸。对刚刚逮捕了自己妻儿的政府满怀怨恨的起义者回复称，他们“不相信贵方非党代表的非党身份”。相反，他们要求彼得格勒民众派出真正的非党工人、士兵和水兵——需在喀琅施塔得观察员在场的情况下选出，再加上由彼得格勒苏维埃任命的、比例最多不超过15%的共产党代表。<sup>256</sup>这一答复生硬且毫不妥协，直接扼杀了该提议。此后，政府再未做出任何与起义者和解的努力。

到3月7日，最后的期限已过。3月5日发出的24小时最后通牒，在次日又延长了24小时，如今已到期，双方均未改变立场。而此时，政府已准备动用武力。在宽限期内，大批人

---

<sup>255</sup> 伯克曼：《布尔什维克的神话》，第301–302页；戈德曼：《我的一生》，第882–883页。该信件由伯克曼起草

<sup>256</sup> 《真理报论喀琅施塔得》，第73–74页

员与装备源源不断地涌入彼得格勒及其周边要塞。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军校学员、契卡分队以及最可靠的红军部队抵达。此外，一些最知名的“军事专家”与红军指挥员也被召集制定进攻计划。3月5日，尽管年轻但才华横溢、经验丰富的米·尼·图哈切夫斯基接任第七集团军及彼得格勒军区所有部队的指挥权，取代了德·尼·阿夫罗夫，并进入季诺维也夫领导的防御委员会。图哈切夫斯基出身奔萨省贵族家庭，曾是帝国士官生军团的侍从，一战期间担任沙皇军队中尉。十月革命后，他转而效忠布尔什维克，成为内战中杰出的军事领导人之一。1920年，年仅27岁的他指挥红军在波兰北部战线作战，险些攻克华沙，最终被毕苏斯基元帅击退。<sup>257</sup>

图哈切夫斯基此刻面临着职业生涯中最为艰巨的任务之一。第七集团军在内战期间一直驻守彼得格勒地区（1919年阻击尤登尼奇的进攻），如今已陷入“复员情绪”。<sup>258</sup>战事结束，士兵们渴望返回家乡。他们大多出身农民，与农村地区有着同样的不满，对起义者的纲领鲜有非议——事实上，喀琅施塔得的口号在他们中间引发了共鸣。此外，彼得格勒的工人示威也影响了部队士气。显然，派遣这样一支部队去攻打革命中素有“骄傲与荣光”之称的同胞，存在极大风险。他们很可能拒绝向

---

<sup>257</sup> 关于图哈切夫斯基在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中的作用，参见勒·弗·尼库林：《图哈切夫斯基》，莫斯科，1964年，第134-150页。

<sup>258</sup> 科尔纳托夫斯基编：《喀琅施塔得叛乱》，第44页；谢·叶·拉比诺维奇：《1921年俄共（布）十大代表在喀琅施塔得》，《红色年鉴》，1931年第2期，第26-31页。

起义者开火，甚至倒向对方。为此，图哈切夫斯基努力提振士气，尽力保障士兵的伙食与装备。但发起主攻时，他主要依靠的是军校学员、契卡特工部队以及从其他地区调来的精锐共产党部队。

与此同时，喀琅施塔得全力备战迎击。作为关键的战略前哨，它拥有规模可观的驻军与坚固的防御工事。起义者约有 13000 名水兵和士兵，另有约 2000 名平民补充入伍。科特林岛被众多堡垒与炮台环绕，其中大部分是 19 世纪末根据俄国杰出军事工程师 E·I·托特列边将军的设计建造的。岛屿北侧坐着托特列边堡垒、红军堡垒，以及向卡累利阿海岸延伸的 7 座编号堡垒。南侧则有彼得堡垒、保罗堡垒、康斯坦丁堡垒、亚历山大堡垒，还有 2 座编号堡垒。所有炮台与堡垒均配备厚重装甲，炮塔内架设着重型火炮。城区本身被厚墙环绕，并有多处火炮阵地防守。总计，喀琅施塔得在各堡垒与舰船上部署了 135 门火炮与 68 挺机枪。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与塞瓦斯托波尔号各搭载 12 门 12 英寸火炮与 16 门 120 毫米火炮。两舰建于一战前夕，是当时十分现代化的战舰，也是俄罗斯帝国海军首批无畏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曾在 1919 年遭英国鱼雷艇重创，但此后已修复并重新服役。然而，两艘战列舰并排冻结在港内，作战效能显然大打折扣。舰体周围的部分冰层虽被凿开，但机动空间依旧不足，大型舰只在一定程度上还会互相遮挡射界。即便如此，它们的火炮火力仍远超大陆上最强大的红戈卡堡垒。红戈卡堡

垒的 12 英寸火炮仅有 4 门可正常使用，1919 年 6 月起义中遭受的严重损毁尚未完全修复，堡垒其余火炮的口径也不足以打击远处的喀琅施塔得。因此，正如秘密备忘录的作者所指出的，一旦发生炮战，红戈卡堡垒根本不是这座岛屿要塞及其战舰的对手——后者有 24 门 12 英寸火炮可正常作战，另有 12 门 11 英寸火炮与 5 门 10 英寸火炮。此外，除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与塞瓦斯托波尔号外，喀琅施塔得港与修船厂内还停泊着另外 8 艘军舰，包括 1 艘战列舰、3 艘重巡洋舰，以及 15 艘炮艇和 20 艘拖轮。但因没有破冰船，这些舰船均无法投入作战。<sup>259</sup>

如此一来，攻克这座要塞绝非易事。除坚固的防御工事外，喀琅施塔得还凭借与大陆布尔什维克据点之间宽阔的冰面占据优势。它距芬兰湾南岸的奥拉宁鲍姆 5 英里，距红戈卡 12 英里；距北岸（卡累利阿沿岸）的利西诺斯 7 英里，距谢斯特罗列茨克 11 英里。这意味着进攻部队必须穿越一片令人胆寒的开阔冰面，毫无遮挡地暴露在钢筋混凝土碉堡后暗藏的火炮与机枪的致命火力之下。正是这一可怕的现实，而非厌战情绪或对守军的同情，极大地打击了集结在芬兰湾沿岸、等待进攻命令的红军部队的士气。

然而，这座要塞看似坚不可摧，实则存在若干致命弱点。

---

<sup>259</sup> 有关喀琅施塔得防御工事的数据整理自：普霍夫：《喀琅施塔得叛乱》，第 80-81 页；科尔纳托夫斯基编：《喀琅施塔得叛乱》，第 43、95 页；《真理报论喀琅施塔得》，第 24、90 页；《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第 35 卷，第 223 页；《方向标》，1921 年 3 月 12 日；《伦敦时报》，1921 年 3 月 16 日、30 日。

其中包括：弹药储备不足以支撑长期围困；守军缺乏御寒衣物与冬鞋；且因燃料普遍短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仅余 300 吨燃料（日均消耗 40 吨），塞瓦斯托波尔号则已完全耗尽。更糟糕的是，粮食供应正迅速枯竭。尽管居民存有部分自种土豆，但罐头食品与马肉储备已岌岌可危。手头无面粉，仅有少量劣质面包，据可靠估算，按照每日半磅的配给量，仅够再维持两周。<sup>260</sup>有一点显而易见：在起义结束之前，双方都将遭受重创。

军事行动于 3 月 7 日打响。当晚 6 点 45 分，北岸谢斯特罗列茨克与利西诺斯的布尔什维克炮台向喀琅施塔得开火。炮火主要针对外围堡垒，旨在为步兵进攻削弱起义者的防御。当堡垒以炮火还击时，对岸的红戈卡堡垒也加入炮击，塞瓦斯托波尔号的 12 英寸火炮随即予以回击。一场全面炮战就此展开。在彼得格勒，亚历山大·伯克曼正穿过涅瓦大街，远处隆隆的炮声传来。喀琅施塔得遭到攻击了！这炮火声对这位无政府主义领袖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彻底摧毁了他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残存的全部信念。“充斥着痛苦与炮火的日子，”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心因绝望而麻木，内心有什么东西已然死去。街上的人们神情哀伤、茫然失措。没人敢开口说话。重炮的轰鸣撕裂着空气。”<sup>261</sup>

---

<sup>260</sup> R·凯利中尉报告，载《夸顿致国务卿函》，1921 年 4 月 23 日，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号 861.00/8619。

<sup>261</sup> 伯克曼：《布尔什维克的神话》，第 303 页。

3月7日是女工节纪念日。在炮弹爆炸的轰鸣中，喀琅施塔得广播电台向全世界的劳动妇女致以问候。起义者斥责共产党人为“劳动者的敌人”，呼吁终结一切形式的专制与暴政。“愿你们早日挣脱一切暴力与压迫，赢得解放。自由的革命女工万岁！世界社会革命万岁！”<sup>262</sup>炮战并未持续太久；大雪与浓雾交织，能见度降为零，双方只得停止炮击。喀琅施塔得方面受损轻微，仅有两名守军受伤。尽管如此，革命委员会仍表达了强烈愤慨。次日清晨，《喀琅施塔得消息报》宣告：第一枪已经打响，但我们必将击沉布尔什维克这艘逼近的“海盜船”。“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别染指这一权力——你们的双手沾满了为自由事业、为抗击白卫军、地主与资产阶级而牺牲的先烈的鲜血！”<sup>263</sup>

按照图哈切夫斯基的计划，在炮火轰击之后，苏军随即试图强攻夺取要塞。次日黎明前，布尔什维克部队从大陆南北两岸同时发起进攻。在漫天暴风雪中，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踏上冰面，士兵身着白色伪装服，融入芬兰湾的皑皑白雪。前锋是军校学员分队，随后是精锐红军部队，契卡机枪手殿后，以防有人临阵脱逃。守军早已严阵以待。进攻部队逼近时，岛屿四周堡垒与炮台射出密集的炮火与机枪火力，构成致命弹幕。爆炸的炮弹炸裂冰层，数十名进攻者坠入冰冷的海水葬身海底。

---

<sup>262</sup> 《真理报论喀琅施塔得》，第80页。

<sup>263</sup> 同上。

正如塞尔日所言，这是一场可怕的自相残杀的开端。<sup>264</sup>芬兰湾吞噬第一批牺牲者后，部分红军士兵——包括一批彼得霍夫军校学员——开始倒向起义者。还有人拒绝前进，尽管殿后的机枪手受命射杀动摇者。北线部队政委报告称，其士兵希望派遣代表团前往喀琅施塔得，了解起义者的诉求。据称在前一晚，已有小股布尔什维克士兵偷偷越过冰面，与守军交换宣传品。<sup>265</sup>最终，仅有少量突击部队成功抵达最外围的堡垒，但也在密集火力下被迫撤退。

黎明时分，暴风雪渐停，广阔的冰面上遍布尸体。能见度恢复后，布尔什维克炮台重新轰击要塞，喀琅施塔得的重炮也予以还击，击毁了奥拉宁鲍姆与彼得霍夫之间的一段铁路，并引燃多座建筑。苏军步兵的零星试探性进攻均无果而终。下午，布尔什维克飞机飞越芬兰湾，轰炸喀琅施塔得防御工事，这是1919年尤登尼奇波罗的海战役以来，岛屿首次遭遇空袭。尽管空袭在当日余下时间断断续续，但收效甚微。傍晚6时许，一枚炸弹落入城区，炸毁一栋房屋，造成一名13岁男孩轻伤。整场起义期间，由于地面火力猛烈且能见度时常不佳，布尔什维克的空袭效果始终十分有限。<sup>266</sup>

---

<sup>264</sup> 塞尔日：《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第130页。

<sup>265</sup> 佩特里琴科：《喀琅施塔得事件真相》，第12页；梅特：《喀琅施塔得公社》，第51页。

<sup>266</sup> 关于3月8日进攻的更多细节，参见科尔纳托夫斯基编：《喀琅施塔得叛乱》，第44-46、67-68页；佩特里琴科：《喀琅施塔得事件真相》，第14-15页；《真理报论喀琅施塔得》，第23、90、106、180页。

3月8日的战斗刚一打响，彼得格勒苏维埃便得意洋洋地宣布，起义者已然“全线溃败”。同日，列宁在莫斯科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对结局同样信心十足。“我尚未收到喀琅施塔得的最新消息，”他说道，“但我毫不怀疑，这场背后浮现着白卫军将军熟悉身影的起义，即便不用数小时，也会在未来几天内被平定。”<sup>267</sup>事实证明，这些声明都为时过早。实际上，3月8日的进攻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布尔什维克损失了数百人，却始终未能突破喀琅施塔得的防御。<sup>268</sup>他们急于镇压起义，部署的兵力不足——总计约2万人——且对成功强攻这座坚固要塞的准备也并不充分。那些因可靠性被选中的部队在关键时刻却动摇了，部分原因是不愿向与自己一样的普通水兵和士兵开火，但主要是惧怕在毫无掩护的情况下穿越开阔冰面，暴露在喀琅施塔得炮台与堡垒毁灭性的交叉火力之下。

当晚，一支布尔什维克分队举着休战旗，从南侧逼近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的两名成员——维尔希宁与库波洛夫——骑马出城与之会面。据布尔什维克一方的一名军校学员称，来自塞瓦斯托波尔号的水兵维尔希宁高声呼吁双方联合行动，对抗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压迫者，并要求以自由苏维埃的形式

---

<sup>267</sup> 《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1921年3月8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第33页。

<sup>268</sup> 一份可靠消息源估算布尔什维克方面阵亡500人、受伤2000人：《喀琅施塔得起义是如何爆发的》，1921年3月12日，米勒档案，第5M档，第5号。

选举真正的革命权力机关。<sup>269</sup>无论如何，维尔希宁当场被抓获，库波洛夫则策马逃至安全地带。

起义者对这一背信弃义的行径怒不可遏，但对阵亡的布尔什维克士兵的同情，又缓和了他们的愤怒。在一篇题为《让全世界知晓》的社论中，革命委员会痛斥“元帅”托洛茨基，要求其在这场流血事件承担责任。为避免更多暴力发生，委员会再次提议，派遣非党代表团前往喀琅施塔得，了解他们运动的真实情况。“让全世界的劳动者都知道，我们，苏维埃政权的捍卫者，正在守护社会革命的胜利果实。我们为劳动群众的正义事业而战，要么胜利，要么葬身于喀琅施塔得的废墟之下。全世界的劳动者将是我们的裁判。无辜者的鲜血，将由那些权欲熏心的共产党狂热分子来偿还。苏维埃政权万岁！”<sup>270</sup>

---

<sup>269</sup> 科尔纳托夫斯基编：《喀琅施塔得叛乱》，第95-96页。参见《真理报论喀琅施塔得》，第94-98、129页。

<sup>270</sup> 《真理报论喀琅施塔得》，第82页。

## 第五章

# 喀琅施塔得纲领

喀琅施塔得起义仅持续了两周多一点。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临时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建立起了一种性质特殊的革命公社。委员会成员虽谈不上有长远战略，却展现出相当强的应急处置与自我组织才能。如前所述，该委员会于3月2日由教育馆会议的五人主席团组建而成。但很快人们便发现，需要一个规模更大的机构来负责城市与驻军的行政及防务。于是，3月4日傍晚，约200名来自喀琅施塔得各工厂与军事单位的代表——大致就是两天前在教育馆开会的同一批代表——下班后聚集在驻军俱乐部，在“胜利或死亡！”的呼声中，选举产生了由15名成员组成的扩大版革命委员会。<sup>271</sup>

为方便统筹喀琅施塔得的民政与军事事务，新委员会将总部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迁至城区内的人民馆。为协助委员会主席佩特里琴科，亚科文科与阿尔希波夫被选为副主

---

<sup>271</sup> 《真理报论喀琅施塔得》，第56-57页。

席，基尔加斯特任秘书。其余成员各分管特定领域：瓦尔克与罗马年科负责民政，帕夫洛夫负责司法，巴伊科夫（他在喀琅施塔得的本职是要塞建筑局运输主管）负责交通，图金主管粮食供应，佩列佩尔金主管宣传鼓动。<sup>272</sup>根据《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决议》第 9 条，差别化粮食配给制被废除。仅医院与儿童之家享有专项配给，病患也可凭医生书面处方领取额外食品。除此之外，喀琅施塔得的食物一律凭票等额发放。分配工作由戈尔公社与城市粮食委员会这两个既有机构负责，受革命委员会严密监督。起义者的日报——《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会不定期公布分发点。委员会还利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的电台向城内民众播发专项公告，并与外界联络。<sup>273</sup>

起义初期，城内实行晚 11 点宵禁，人员进出城市受到严格管控。学校停课，复课时间另行通知。与此同时，革命委员会颁布了一系列关乎喀琅施塔得政治体制的法令。依照《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决议》第 7 条，委员会撤销了要塞政治部，并在驻军俱乐部推出了新的教育计划。当地工农检察院被一个由工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取代，据推测，这一机构是《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宪章》第 14 条所规定的“巡回监督局”的雏形。此外，在所有公共机构、工会、工厂与军事单位中，均选举产

---

<sup>272</sup> 《新俄罗斯生活报》，1921 年 3 月 11 日；普霍夫：《喀琅施塔得叛乱》，第 76 页。

<sup>273</sup> 《真理报论喀琅施塔得》，第 52–54、77–78 页；伯克曼：《喀琅施塔得起义》，第 20–21 页。《消息报》全部 14 期均收录于《真理报论喀琅施塔得》，该书因此成为研究起义者纲领与活动的最珍贵史料。

生了不含共产党员的革命三人小组，在基层执行革命委员会的命令。<sup>274</sup>

除革命委员会外，3月2日在教育大楼召开的代表会议在整个起义期间一直存在，参会人员为水手、士兵和工人，人数在两三百人之间浮动。3月4日，会议召开以扩大革命委员会，并于3月8日和11日再次开会，其间除其他事项外，还成立了不受共产党支配与控制的新喀琅施塔得工会理事会。然而，会议的议程不出所料主要围绕防务、粮食和燃料供应问题。<sup>275</sup>有学者将此次会议描述为喀琅施塔得自身特有的议会形式<sup>276</sup>，但或许更准确地说，它充当了一种临时苏维埃，是起义者为之起义的“自由苏维埃”的雏形。

水手是喀琅施塔得民众中最具战斗性的群体，也是这一系列活动背后的推动力。在组织、规划和宣传事务上，水兵从一开始就主动牵头，并在这场运动短暂的历史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临时革命委员会中没有一名士兵（军官就更不用说了），平民工人和职员仅占其成员的极少数。尽管由水手带头，但喀琅施塔得卫戍部队——驻守周边要塞与炮台的“军事专家”和红军部队——很快便予以支持；市民因职业与水手联系密切，向来容易受其影响，也主动提供了支援。在极短的时间里，喀琅

---

<sup>274</sup> 《真理报论喀琅施塔得》，第177页。

<sup>275</sup> 同上，第56-57页；《革命俄罗斯》，1921年第7期，第22页。

<sup>276</sup> 普霍夫：《喀琅施塔得起义》，第85页。

施塔得摆脱了萎靡与绝望。一位在起义高潮期间访问该岛的芬兰记者，对当地居民的“热情”以及他们重获的目标感与使命感感到震撼。<sup>277</sup>

人们常常指出<sup>278</sup>，喀琅施塔得（Kronstadt）的情绪是一种对 1917 年那种热情洋溢、激情高涨氛围的回溯。对于自称为“公社社员”（Communards）的水兵们而言，1917 年是黄金时代；他们渴望重新唤起革命初期的精神——那时纪律的束缚已被抛弃，他们的理想尚未被掌权后的现实需求所玷污。四年前，当他们选择与布尔什维克结盟时，曾以为双方目标一致：在他们看来，布尔什维克显然是极左翼的革命同志，是群众性大动荡的使徒，这场动荡将消除强制与不公，迎来一个由自由苏维埃组成的劳动者共和国。正如列宁本人在 1917 年 11 月所宣称的：“社会主义并非靠自上而下的命令建立起来。国家官僚式的机械运作与其精神格格不入；社会主义是鲜活的、富有创造力的——它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sup>279</sup>然而，接下来的几个月却见证了中央集权专政的崛起，水兵们深感被背叛。他们认为，自己为之奋斗的民主原则已被一个新的特权精英阶层所抛弃。在内战期间，他们仍忠于布尔什维克，但决心要让革命重回其最初的道路。一旦白军的威胁被消除，他们便揭竿

---

<sup>277</sup> 《为人民事业》，1921 年 3 月 15 日。

<sup>278</sup> 例如，参见沃林：《未知的革命》，第 462 页；伯克曼：《喀琅施塔得起义》，第 18 页；以及卡特科夫：《喀琅施塔得起事》，《圣安东尼论丛》第 6 辑，第 70 页。

<sup>279</sup> 列宁：《列宁全集》，第 35 卷，第 57 页。

而起，以兑现十月革命的承诺。

因此，从政治运动的角度看，喀琅施塔得起义是幻灭的革命者试图摆脱共产党专政——用起义者创办的《消息报》（Izvestiia）的话说，就是摆脱“噩梦般的统治”<sup>280</sup>——并恢复苏维埃的实际权力的一次尝试。从历史上看，苏维埃可追溯至村社（mir），即俄国传统的基层自治制度。正如艾玛·戈德曼（Emma Goldman）所观察到的那样，苏维埃不过是“古老的俄国村社以一种更先进、更具革命性的形式再现。它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如同田野里的花朵自然地俄国土地上生长出来一样。”<sup>281</sup>然而，对列宁而言，脱离政党控制的自由苏维埃始终是不可接受的。他本能地不信任人民的自发行动。他担心地方民主机构可能成为反动势力的桥梁，或导致经济与社会的混乱。尽管如此，当革命爆发、各地苏维埃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他认识到这些机构在摧毁旧秩序和夺取政权方面的价值。“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遂成为其政党最重要的口号之一。然而，在十月政变之后，列宁重拾其原有的中央集权立场，将革命专政强加于那些无政府状态且缺乏纪律的群众之上。尽管苏维埃制度仍被标榜为一种“新而更高”的政府形式，即马克思所构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但苏维埃却逐步被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到1921年，它们已沦为新兴官僚体系的橡皮图章。

---

<sup>280</sup> 《真理报论喀琅施塔得》，第55页。

<sup>281</sup> 阿夫里奇：《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第252页。

水手们正是为反抗这场对革命的扭曲而奋起抗议。在他们看来，这场冲突的核心，是民众所向往的“劳动者共和国”理想，与实则为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对立。他们反对任何单一政党的排他性统治，旨在通过保障工人与农民的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以及重新选举苏维埃，打破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正如伯克曼所指出的，水手们是苏维埃制度最坚定的拥护者；他们的战斗口号正是 1917 年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sup>282</sup>但与布尔什维克不同的是，他们要求建立自由、不受束缚的苏维埃，代表所有左翼组织——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最高纲领派——并反映人民的真实诉求。因此，起义者所办《消息报》报头上的格言有了新的内涵：“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非归政党。”“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电台在 3 月 6 日宣告，“我们主张权力归苏维埃，而非归政党，主张由劳动者自由选举产生代表机关。那些被共产党攫取并操控的苏维埃，始终对我们所有的诉求与需求置若罔闻；我们得到的唯一回应，只有枪声。”<sup>283</sup>

不过，尽管起义者呼吁建立自由苏维埃，他们却并非倡导人人享有平等权利与自由的民主主义者。与他们所谴责的布尔什维克一样，他们对俄国社会秉持着严苛的阶级立场。他们所

---

<sup>282</sup> 伯克曼：《喀琅施塔得起义》，第 24—25 页。

<sup>283</sup> 同上，第 19 页；《真理报论喀琅施塔得》，第 65 页。

谈及的自由，仅属于工人与农民，而非地主与中产阶级。这也正是他们口中“劳动者共和国”的真正内涵——由劳动群众行使共同意志，统治昔日的压迫者与剥削者。他们的纲领中并无建立西欧式自由议会的位置；1918年1月，正是一名喀琅施塔得水兵带头驱散了立宪会议，这一事件颇具象征意义。三年之后，这些水兵依然坚决反对恢复立宪会议，或建立任何类似机构。在他们看来，全国议会即便不被革命中已被驱逐的旧势力掌控，也必然会被新的特权少数群体支配。他们不认同代议制政府，而是希望普通民众通过自由苏维埃，实现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直接群众民主。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宣告：“是苏维埃，而非立宪会议，才是劳动者的堡垒。”<sup>284</sup>简言之，在起义者眼中，议会与苏维埃是相互对立的政体形式，前者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至上权力，后者则代表劳动者的当家作主。但他们同样担忧，任何新的立宪会议都会沦为布尔什维克谋求绝对权力的又一工具。喀琅施塔得陷落之后，一名苏维埃记者曾询问一群幸存者，为何他们不曾呼吁恢复立宪会议。其中一人苦笑回答道：“党派名单就意味着共产党。”他表示，他们所追求的，是工人与农民真正的自决权，而这唯有通过苏维埃才能实现。

285

从经济内涵来看，喀琅施塔得的纲领是一篇直指战时共产

---

<sup>284</sup> 《真理报论喀琅施塔得》，第132页。

<sup>285</sup> 同上，第31页。

主义体制的檄文。它反映了农民与工人阶级决心扫除已强加于他们近三年的强制性政策。喀琅施塔得人（沿袭了俄罗斯由来已久的做法）将国家所遭受的一切弊病都归咎于政府——且只归咎于政府。他们很少将责任归于内战本身的混乱与破坏、交战军队不可避免的蹂躏、协约国的干涉与封锁、燃料与原材料的必然短缺，也不归于饥荒与瘟疫之中赈济饥民、救治病患的种种困境。相反，所有的苦难与艰辛都被算在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头上：“共产党的统治将整个俄罗斯拖入了前所未有的贫困、饥饿、寒冷与其他匮乏之中。工厂作坊纷纷停工，铁路濒临瘫痪。乡村被搜刮一空。我们没有面包，没有牲畜，没有耕种土地的工具。我们没有衣物，没有鞋子，没有燃料。工人饥寒交迫。农民与市民对生活改善完全失去希望。他们一天天走向死亡。共产党的背叛者将你们拖入了这一切境地。”<sup>286</sup>

这些水兵大多出身农民，他们同农民一样，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新农奴制”，尤其是武装征粮队对粮食的强行收缴。喀琅施塔得《消息报》宣称：“有位农民对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说的话是对的：‘一切都好——土地归我们，粮食归你们；水源归我们，鱼儿归你们；森林归我们，木材归你们。’”<sup>287</sup>该报还写道，任何反抗政府掠夺的村民，无论其多么贫困绝望，都会被斥为“富农”与“人民公敌”。《消息报》还谴

---

<sup>286</sup> 同上，第 164-165 页。

<sup>287</sup> 同上，第 82-84、163 页。该言论未见于代表大会正式会议记录，但可能是在非公开会议上提出的，如本书第一章所述列宁出席的那场会议。

责在部分最优质的贵族土地上建立国营农场的做法，这种做法不仅剥夺了农民眼中理应属于他们的财产，还如同沙皇时代一样使用雇佣劳动。在起义者看来，这违背了革命的核心精神——革命已然废除了“工资奴隶制”与一切形式的剥削。《消息报》维护农民依靠自身力量、为自身利益开展小规模耕作的权利。国营农场不过是“新地主——国家的庄园”。这便是农民从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中得到的东西，而非自由使用他们新获得的土地。作为被征缴的粮食、被没收的牛马的交换，他们迎来的是契卡的突袭与行刑队。在一个工人国家里，这是何等荒谬的交换体系——用铅弹与刺刀换取面包！”<sup>268</sup>

同样，在工业领域，起义者主张工人与小型手工业生产者自主掌控自身命运、享有劳动成果的自由。但与普遍看法不同，他们并不支持所谓的工人监督。在他们看来，仅由地方工厂委员会对生产进行监督，既不充分也缺乏效率：不充分，是因为这种模式并未让工人自主管理工厂，而是将原管理者与技术人员留在核心负责岗位；缺乏效率，则是因为它无法保障与其他企业开展必要的协作。他们也不赞同工业国有化、由国家委派管理者与技术专家掌控生产的模式。喀琅施塔得《消息报》称：“在‘工人监督’下打乱生产秩序后，布尔什维克随即对工厂与作坊实行国有化。工人从资本家的奴隶，沦为了国营企业的奴隶。”与此同时，工会沦为“共产党集权化的机构”，只剩无用

---

<sup>268</sup> 同上，第 172-174 页。

的文书工作，而非管理工厂、助力工人的教育与文化发展。唯有重新选举，才能让工会转变为实现工人“广泛自决”的自由组织。对于手工业者与工匠，只要不雇佣雇工，就应赋予其完全的自由。临时革命委员会宣告：“革命的喀琅施塔得，正在为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而战，为劳动者的苏维埃共和国而战——在这样的国度里，生产者本人是唯一的主人，可自主处置自己的产品。”<sup>289</sup>

因此，这场起义的核心基调，是对共产党统治的彻底幻灭。起义者的《消息报》称，布尔什维克只惧怕丧失权力，因此认为“一切手段皆可使用——诽谤、暴力、欺骗、谋杀，乃至报复起义者的家人”。<sup>290</sup>革命的真谛被歪曲，工人与农民被压制，全国民众在政党与其秘密警察的管控下噤声，监狱中关押的并非反革命分子，而是劳动者与知识分子。《消息报》悲叹道：“旧政权被推翻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斥着专断、傲慢、徇私、偷盗与投机的新政权。在这个可怕的政权下，人们连一片面包、一颗纽扣都要向当局伸手求取；人们甚至不属于自己，无法支配自己的劳动，这是一个奴役与屈辱的政权……苏维埃俄国已然变成了一座全俄范围的集中营。”<sup>291</sup>

---

<sup>289</sup> 同上，第 92、173–174 页。

<sup>290</sup> 同上，第 83 页。最后一句显然是指在彼得格勒扣押人质的行为。

<sup>291</sup> 同上，第 83–84 页。上文总结的起义者的希望与诉求，在三份文献中有着最为清晰的阐述：2 月 28 日至 3 月 1 日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决议》，以及起义者报刊中两篇长篇社论——3 月 8 日刊发的《我们为何而战》与 3 月 16 日最后一期刊登的《引号中的社会主义》。这三份文献共同构成了对喀琅施塔得纲领最完整、最有力的表述。《彼得罗

那么，究竟该如何是好？如何才能让革命回归最初的轨道？直到3月8日布尔什维克发起首次进攻前，起义者始终抱有和平改革的希望。他们坚信自身事业的正义性，有信心赢得全国民众——尤其是彼得格勒民众的支持，以此迫使政府作出政治与经济上的让步。然而，共产党的进攻标志着起义进入了新阶段。一切谈判与妥协的可能都戛然而止，暴力成为双方唯一的选择。3月8日，水兵们提出了新的口号：他们呼吁全体俄国民众加入他们的“第三次革命”，完成1917年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未竟的事业：“工人与农民坚定前行，将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立宪会议，以及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统统抛在身后。”西方与苏联史学界均多次试图将喀琅施塔得的纲领溯源至某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左翼政党。这类比对在多大程度上成立？在诸多议题上，起义者的诉求的确与左翼政治反对派的主张相契合。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均曾抗议布尔什维克的权力垄断与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他们都呼吁建立自由苏维埃与自由工会，保障工人与农民的公民自由，结束恐怖统治，释放被关押的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而组建由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参与的联合政府这一诉求，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早在1917年10月便已提出——甚至有一批直言敢谏的布尔什维克也对此表示支持：“我们主张，必须组建由苏维埃内所有政党构成的社会主义政府。我们认为，除此之外只有一条道路：依靠政治恐怖维系纯粹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我们不能、也绝不会接受这一道路，我们深知，这将导致……一个不负责任的政  
巴甫洛夫斯克决议》收录于第二章，两篇社论则收录于附录。

权的建立，最终葬送革命与国家。”<sup>292</sup>

起义者与社会革命党人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即极度关注农民与小生产者的诉求，相应地却对大工业的复杂问题漠不关心。但另一方面，他们拒绝支持社会革命党核心的恢复立宪会议诉求，也不接受该党备受敬重的领袖维克多·切尔诺夫提供的援助。仅凭这一点便足以说明，社会革命党人并未在起义运动中占据主导影响。孟什维克亦是如此。诚然，自1905年苏维埃首次出现以来，孟什维克便是苏维埃最主要的拥护者，而喀琅施塔得提出的由工人、士兵与水兵组成的无党派会议构想，也让人联想到孟什维克领袖阿克雪里罗得的类似提议，该提议正是最初彼得格勒苏维埃建立的理论基础。尽管如此，作为极左翼传统据点的喀琅施塔得，孟什维克的影响力向来十分有限。在城镇与造船厂的手工业者、工人中，的确能找到一些活跃的孟什维克（苏联方面资料认定革命委员会中的瓦尔克、罗曼年科两名委员为孟什维克，二人皆为工人），但喀琅施塔得纲领却相对较少关注影响工业无产阶级的议题。此外，作为起义中坚力量的水兵中，孟什维克的数量微乎其微。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起义期间，彼得格勒与海外的孟什维克领导层均未支持以武力推翻布尔什维克。

相比之下，无政府主义者在舰队中的影响向来颇为深厚，他们有时也被指为这场起义的煽动者。但这一说法大体并不属

---

<sup>292</sup> 丹尼尔·斯：《革命的良知》，第66页。

实。一方面，近年来喀琅施塔得最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已不在当地：曾驱散立宪会议、作风激进的年轻水兵安纳托利·热列兹尼亚科夫，在与白军作战时阵亡<sup>293</sup>；1917年在锚地广场广受欢迎的演说家伊·斯·布莱赫曼，在起义数月前去世；而他的同志、革命期间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的核心人物叶菲姆·亚尔丘克当时身在莫斯科，即便未被关押，也处于契卡的严密监视之下。亚尔丘克本人所著的喀琅施塔得史中，并未赋予无政府主义者在1921年事件中突出角色，同时期其他无政府主义资料也无相关记载。一份详尽的内战中牺牲或20世纪20年代初遭苏联迫害的无政府主义者名录，收录了热列兹尼亚科夫、亚尔丘克与布莱赫曼，却未提及其他喀琅施塔得人。<sup>294</sup>临时革命委员会中仅有佩列佩尔金一名成员曾与无政府主义者产生关联，且仅是间接联系。此外，起义运动的刊物仅在刊载《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宣言》原文时提及过一次无政府主义者，宣言中要求“保障工人与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及左翼社会主义政党的言论与出版自由”。<sup>295</sup>

---

<sup>293</sup> 阿夫里奇：《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第198页。如今喀琅施塔得市立有热列兹尼亚科夫的雕像：《喀琅施塔得：简明指南》，第116页。

<sup>294</sup> 《苏维埃俄国对无政府主义的迫害》，柏林，1922年。

<sup>295</sup> 丹：《流浪两年》，第156页；《真理报论喀琅施塔得》，第46页。参见卡特科夫：《喀琅施塔得起事》，《圣安东尼论丛》第6辑，第59–62页。据知名无政府主义者沃林（《未知的革命》，第469–470页）所述，临时革命委员会曾派遣使者前往彼得格勒，邀请他与亚尔丘克前往喀琅施塔得协助起义，却不知二人已被布尔什维克关押。沃林还称佩特里琴科同情无政府主义，但笔者未找到任何证据可证实这些说法。

然而，1917年在喀琅施塔得曾如此强大的无政府主义精神，此时远未消散。佩列佩尔金（Perepelkin）或许是起义领导人中唯一公认的无政府主义者，但作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决议》的共同起草人以及宣传鼓动部门的负责人，他处于一个极佳的位置来传播其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观点。这场运动的一些关键口号——“自由苏维埃”、“第三次革命”、“打倒委员专政”（commissarocracy）——在内战期间本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口号；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非政党”这一提法也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另一方面，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会对任何呼吁“掌权”的诉求感到犹豫，而水兵们自己也从未要求彻底废除国家——而这恰恰是任何无政府主义纲领的核心主张。

无论如何，全俄各地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因这次起义而振奋不已。他们将喀琅施塔得誉为“第二个巴黎公社”<sup>296</sup>，并愤怒谴责政府派兵镇压。在起义高潮时期，一份无政府主义传单出现在彼得格勒街头；它批评市民背弃了起义者，在芬兰湾炮声隆隆之际却保持沉默。“水兵们是为你们——彼得格勒人民——而起义的，”传单宣称，“你们必须摆脱麻木不仁的状态，加入反对共产党专政的斗争，此后无政府主义必将胜利。”<sup>297</sup>与此同时，其他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如伯克曼（Berkman）和

---

<sup>296</sup> 阿夫里奇：《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第230页。

<sup>297</sup> 科尔纳托夫斯基编：《喀琅施塔得起义》，第164-166页。

戈德曼 (Goldman) ，则徒劳地试图调停冲突，以避免一场血腥屠杀。

简而言之，这场起义既非由任何单一政党或团体煽动，也非由其策划。参与者是形形色色的激进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普通共产党员——他们既无系统的意识形态，也无周密的行动计划。他们的信念糅合了数种革命思潮的成分，模糊且缺乏明确定义，与其说是一套连贯且具建设性的纲领，不如说是一份不满清单，是对苦难与压迫的抗议呐喊。在具体方案上，尤其是农业与工业领域，起义者更倾向于依靠克鲁泡特金所说的“群众的创造精神”，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苏维埃来运作。

他们的意识形态或许最贴切的定义是一种无政府民粹主义，其核心诉求是实现民粹派古老的纲领——“土地与自由”“人民的意志”，即建立一个由自治公社组成的松散联邦，农民与工人在其中和谐协作，自下而上构建完整的经济与政治自由。在气质与理念上与起义者最接近的政治团体是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这是社会革命党中一个规模极小、极具战斗性的分支，在革命阵营中处于左翼社会革命党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同时兼具二者的部分特征。起义者《消息报》所阐述的喀琅施塔得纲领，几乎在所有重要议题上都与最高纲领派的主张一致，这也让苏联方面的说法有了依据——该报主编是一名最高纲领派

成员（名叫拉马诺夫）。<sup>298</sup>最高纲领派宣扬彻底革命的理论，反对恢复立宪会议，转而主张建立以自由选举苏维埃为基础、中央国家权力最小化的“劳动者苏维埃共和国”。在政治目标上，这与喀琅施塔得起义者完全一致，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非归政党”原本就是最高纲领派的战斗口号。

经济领域的相似性同样十分突出。在农业方面，最高纲领派谴责粮食征集制和国营农场的建立，要求将全部土地交给农民，由他们自由支配。在工业方面，他们拒绝由工人监督资产阶级管理者，转而主张“生产的社会组织化，由劳动人民的代表进行系统性领导”。对最高纲领派和起义者来说，这并不意味着工厂国有化和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体制；相反，他们一再警告，集权会直接导致“官僚主义”，把劳动者沦为一部庞大非人格化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不是国家管理加工人监督，而是工人管理加国家监督”是他们的格言，政府只承担计划与协调的职能。简言之，必须把生产资料转交给实际使用它们的人。这也是最高纲领派所有口号的核心：“全部土地归农民”“全部工厂归工人”“全部面包和产品归劳动者”。<sup>299</sup>

---

<sup>298</sup> 斯列普科夫：《喀琅施塔得起义》，第33页；普霍夫：《喀琅施塔得起义》，第77页。尽管1921年起义的相关史料中未提及此人，但阿·拉马诺夫在1917年革命期间实为活跃的最高纲领派鼓动者。

<sup>299</sup> 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联盟：《劳动苏维埃共和国》，莫斯科，1918年；《论工人监督》，莫斯科，1918年；格·涅斯特罗耶夫：《最高纲领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莫斯科，1919年；《最高纲领派》，1918年8月25日第2期，第5-9页；1921年4月15日第16期，第15-16页。

起义的思想本质上是无政府民粹主义，这一点从参与者的语言和观念中可以清晰看出。喀琅施塔得的宣传者所用的情感与话语，贴近农民和工人自身的感受。他们用简单的口号和短句进行宣传，带有一种质朴的民间感染力，抓住了广大民众的情绪。（正如一位采访者后来所记述的）<sup>300</sup>起义鼓动者写作和演说时，使用的是朴素的语言，没有马克思主义术语和外来腔调。他们避开“无产阶级”一词，以地道的民粹主义方式，呼吁建立一个由全体“劳动者”——农民、工人和“劳动知识分子”——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他们更愿意谈论“社会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对阶级冲突的理解不是狭义的产业工人对抗资产阶级，而是传统民粹派意义上的：整个劳动群众与一切靠他们的苦难和剥削为生的人相对立，这些人既包括地主和资本家，也包括政客和官僚。西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他们的观念里几乎没有位置。他们对议会制政府的不信任深深植根于民粹派和无政府主义的传统：赫尔岑、拉夫罗夫和巴枯宁都把议会看作一种腐朽、异己的机构，一个维护上层和中产阶级利益、压制被抛弃者与底层民众诉求的“清谈馆”；在他们看来，底层民众的解放之路，是建立在俄国传统公社基础之上的地方自治。

此外，喀琅施塔得人还表现出强烈的斯拉夫民族主义倾向，考虑到他们大多出身农民，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这些水兵虽

---

<sup>300</sup> 《与喀琅施塔得人的谈话》，《革命俄罗斯》，1921年第8期，第6-8页。

自称国际主义者，却对世界革命运动几乎漠不关心。他们的言论更多围绕俄罗斯人民及其命运展开，而“第三次革命”的主张带有一种救世主式的色彩，近似 16 世纪莫斯科公国的“第三罗马”教义：“专制制度已然倒台。立宪会议已堕入万劫不复之地。委员政权正在瓦解。劳动者真正的权力、苏维埃的权力，已然到来。”<sup>301</sup>不过，他们的农民本土主义有时又与欧洲革命传统的元素奇特地交织在一起，例如在锚地广场的海员大教堂为阵亡起义者举行东正教葬礼时，仪式最后奏响了《马赛曲》。<sup>3 3</sup>但这场运动的民粹主义特征仍占据主导，不仅体现在参与者的宗教仪式与社会信条中，也体现在如同红线般贯穿起义意识形态内核的传统民间神话里。不过，他们的农民本土主义有时又与欧洲革命传统的元素奇特地交织在一起，例如在锚地广场的海员大教堂为阵亡起义者举行东正教葬礼时，仪式最后奏响了《马赛曲》。<sup>3 3</sup>但这场运动的民粹主义特征仍占据主导，不仅体现在参与者的宗教仪式与社会信条中，也体现在如同红线般贯穿起义意识形态内核的传统民间神话里。

其中一个深植于农民心理的神话，便是将中央集权国家视为强行嫁接在俄国社会之上的人为构造，一个外来的赘生物，沉重压迫着人民并造成了他们的苦难。民众对政府及其官吏的仇恨在俄国历史中根深蒂固，可追溯至 17、18 世纪的哥萨克

---

<sup>301</sup> 《真理报论喀琅施塔得》，第 128 页。“第三罗马”教义宣称：“两个罗马已陷落，第三个屹立不倒，第四个绝不会出现。”

与农民起义。<sup>302</sup>对斯捷潘·拉辛与普加乔夫而言，统治阶层的贵族并不属于俄罗斯民众，而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一群吸食农民鲜血的寄生虫。他们秉持一种摩尼教式的观念：以普通民众所代表的善的力量，与以国家及其官吏所代表的恶的力量相对立。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正是这些早期起义者的直接继承者，承袭了反抗官僚专制的自发暴动传统。他们随时准备同“委员与官僚”斗争，一如拉辛与普加乔夫当年反抗“波雅尔贵族与官吏”。旧贵族的种种恶行，如今被安在了新的统治阶层——共产党身上；民众的一切不幸，从饥荒、内战到被奴役与被剥削，全都被归咎于它。

这种由来已久的、与国家官僚阶层相疏离的情绪，在布尔什维克方面首次跨冰发起进攻后随即发表的一篇起义者社论标题——《我们与他们》——中得到了简练的表达。这种情绪也体现在水兵们对苏维埃政权最常使用的蔑称“委员专政”之中：“列宁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但人民却深信，布尔什维克式的共产主义，是委员专政加行刑队。”<sup>303</sup>布尔什维克官僚集团被抨击为一个新兴的特权阶层，这群追逐私利的人享有比其他民众更高的薪水、更多的粮食配给和更温暖的住处。回想对加里宁的攻击，他被人群赶出锚地广场时，民众高呼：“你倒过得暖暖和和”“看看你一身的官职

---

<sup>302</sup> 佩特里琴科：《论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真相》，第18页。

<sup>303</sup> 《真理报论喀琅施塔得》，第79-80、90页。列宁的讲话（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见《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第30页。

——我敢断定好处捞尽了”。党政官员一再被指控窃取了革命的果实，并将一种新的奴役制度强加在俄罗斯的“肉体与灵魂”之上。“这就是共产党专政把我们领进的所谓光辉社会主义王国，”起义者《消息报》最后一期怨愤地写道，“我们得到的，是由官吏组成的苏维埃所支撑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些官吏只会顺从地按照党委会及其一贯正确的政委的指令投票。‘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被新的‘苏维埃’秩序扭曲成了‘一切为了委员’。留给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只有在监狱般的环境里，进行沉闷而无休止的苦役。”<sup>304</sup>

不出所料，喀琅施塔得怒火的主要矛头指向季诺维也夫与托洛茨基，二人“安坐在沙皇宫殿灯火通明房间里的软扶手椅上，盘算着如何最残忍地让起义者流血”。<sup>305</sup>作为彼得格勒的党负责人，季诺维也夫因镇压罢工工人、如今又卑劣地扣押起义者家属作为人质而招致水兵们的极度憎恶。但起义者最痛恨的对象是托洛茨基。作为陆海军人民委员与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对3月5日的严厉最后通牒以及三天后下达进攻命令负有全责。起义者用一连串激烈的贬称抨击他：“血腥的陆军元帅托洛茨基”“特列波夫的化身”“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共产党特辖区团的头目”“俄罗斯的灾星”，称他“像苍鹰一般扑向我们英雄的城市”，是“双膝深陷工人鲜血之中”的专制恶魔。

---

<sup>304</sup> 《真理报论喀琅施塔得》，第172-174页。

<sup>305</sup> 同上，第106页。

3月9日，喀琅施塔得《消息报》宣告：“听着，托洛茨基，第三次革命的领导者们正在捍卫苏维埃的真正权力，反抗委员们的暴行。”<sup>306</sup>

秉持着民粹主义的思维，起义者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与列宁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限——将他们比作背叛民众的波雅尔贵族与被隐瞒了人民疾苦的沙皇。传统上，俄国下层民众不会将怒火指向统治者本人，他们将统治者尊为天赐的父君，而是仇视其腐败狡诈的近臣，在这些近臣身上，他们看到了一切邪恶与歹毒的化身。压迫穷人的并非遥远的专制君主：古谚有云，“上帝在高天，沙皇遥不可及”。真正压榨农民与市民、让他们陷入苦难与屈辱的，是身边的地主与官吏。

有趣的是，列宁在喀琅施塔得起义中的表现，恰恰契合了这一形象。起义第一周，当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亲临彼得格勒、发出威胁并筹备对起义者的进攻时，列宁仍留在莫斯科，仅在3月2日签署命令、宣布科兹洛夫斯基及其所谓同伙为非法分子，除此之外并未过多介入。喀琅施塔得的报刊从未提及过他的名字，而是以其一贯的口吻，激烈谴责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这两名“宪兵”向民众“隐瞒真相”。<sup>306</sup>然而，3月8日，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列宁从幕后走到台前，将此次起义定性为白军将领与小资产阶级分子策划的事件。此番讲话后，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首次对列宁提出批评。起义

---

<sup>306</sup> 同上，第158页。

者的《消息报》称，农民与工人“从未相信过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的一字一句”，却未曾料到列宁会与他们的“虚伪行径”同流合污。该报刊登的一首诗作以讽刺的口吻称其为“列宁沙皇”；此前刊物只谴责“嗜血的托洛茨基及其同伙”，如今也开始抨击“列宁、托洛茨基合伙公司”。<sup>307</sup>

即便在此时，列宁仍受到一定程度的同情，这使他与同僚区别开来。据3月14日起义者的《消息报》记载，列宁在近期讨论工会问题时曾对同事们说：“这一切让我厌烦透顶。即便没有生病，我也情愿抛下一切，远走他乡。”“可”，《消息报》评论道，“列宁的同伙不会让他离开。他们是他们的囚徒，必须和他们一样编造谎言。”<sup>308</sup>这一认知，以最纯粹的形式重现了古老的传说：仁慈的沙皇沦为奸诈波雅尔贵族手中无助的傀儡。列宁依旧被当作某种父亲般的人物受到敬重。因此，当托洛茨基与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画像从喀琅施塔得的办公墙上被撕下时，列宁的画像却被保留了下来。<sup>309</sup>即便在起义被血腥镇压后，这种态度依然存在。在芬兰的一座集中营里，临时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亚科文科仍将列宁与其同僚严格区分开来。亚科文科是一名身材高大健壮、留着胡须的水兵，曾在十月革命中为布尔什维克而战，如今对该党背叛自身理想与承诺的行径感

---

<sup>307</sup> 同上，第89、162、179页。

<sup>308</sup> 同上，第150-152页。参见卡特科夫：《喀琅施塔得起事》，《圣安东尼论丛》第6辑，第49-50页。

<sup>309</sup> 《为人民事业》，1921年3月17日；《新俄罗斯生活》，1921年3月19日。

到愤怒。他满脸怒容，猛烈抨击“杀人犯托洛茨基”与“恶棍季诺维也夫”。“我敬重列宁，”他说道，“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裹挟了他。我真想亲手收拾这两个人。”<sup>310</sup>

托洛茨基更是战时共产主义的鲜活象征，代表了水兵们所反抗的一切。他的名字与集权化、军事化、铁的纪律和管制管控绑定在一起。在工会问题上，他采取强硬且教条的立场，与列宁圆滑、调和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他轻视农民的革命力量，而列宁始终深知，若要夺取并维持政权，农村人口的合作必不可少——当时的正统派将这种态度斥为民粹派异端的残余。托洛茨基偏执狭隘、张扬浮夸、傲慢自负，正如列宁在其著名的《遗嘱》中所形容的，他有着“过分的自信”；而列宁则因简朴的生活作风与不事张扬的个人品格备受敬重。

此外，列宁是来自伏尔加河中游的大俄罗斯人，那里是俄国农民腹地的核心。他生活俭朴、不事张扬、作风严苛，被视作一位朴素的俄罗斯之子，能体察民众的疾苦，在苦难岁月里与人民息息相通。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均为犹太裔，他们更多被视为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际主义派的代表，而非俄罗斯本身的代表。事实上，季诺维也夫时任共产国际主席。而根据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的说法，托洛茨基在内战期间应对成千上万“与其民族不同”的无辜民众之死负责。<sup>311</sup>

---

<sup>310</sup> 《革命俄罗斯》，1921年第8期，第6页。

<sup>311</sup> 《与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的访谈》，手稿，胡佛档案馆。

尽管起义者在同一表态中否认存在任何反犹偏见，但毫无疑问，反犹情绪在波罗的海水兵中十分强烈——他们中许多人来自乌克兰与西部边境地区，这些地区正是俄国恶性反犹主义的典型温床。对这些出身农民与工人阶层的人而言，犹太人向来是艰难困苦时期的替罪羊。此外，传统的本土主义也使他们不信任身边的“异己”分子；而革命已经消灭了地主与资本家，他们的敌意如今便转向了共产党人与犹太人，且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

顺便一提，水兵们对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的犹太出身心知肚明，即便只是通过内战期间白军铺天盖地的反犹宣传——白军试图借此将共产主义与犹太阴谋绑定在一起。“布朗施坦（托洛茨基）、阿普费尔鲍姆（季诺维也夫）、罗森菲尔德（加米涅夫）、施泰因贝格——他们与成千上万其他真正的以色列子民如出一辙”，一份白军传单如此写道，指控犹太裔布尔什维克密谋掌控世界。<sup>312</sup>喀琅施塔得起义期间，驻守彼得格勒海军基地的一名水兵的回忆录证明，此类荒诞言论在波罗的海舰队中广为流传。<sup>313</sup>在一段尤为恶毒的文字中，他将布尔什维克政权称作“第一个犹太共和国”；而当他把犹太人标签为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一群“苏维埃亲王”时，俄国民间神话中极为突出的“邪恶波雅尔贵族”母题也清晰浮现。作者将最恶毒的攻击留给了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他常直呼其原名布朗施坦

---

<sup>312</sup> 诺曼·科恩：《种族灭绝的凭据》，伦敦，1967年，第120页。

<sup>313</sup> 《1914年服役水兵回忆录》，手稿，哥伦比亚大学俄国档案馆。

与阿普费尔鲍姆），将政府对喀琅施塔得的最后通牒称作“犹太人托洛茨基的最后通牒”。他声称，这些看法在其水兵同胞中广为认同，他们坚信，真正从革命中获益的是犹太人，而非俄罗斯农民与工人：犹太人占据着共产党与苏维埃国家的领导职位；他们充斥着每一个政府机关，尤其是粮食人民委员部，确保自己的犹太同胞不会挨饿；即便是那支遭人痛恨的路卡封锁队——尽管 90%的成员是地道的俄罗斯人——其指挥官也几乎全是犹太人。毫无疑问，这类看法在喀琅施塔得即便不比彼得格勒更盛行，也同样普遍。革命委员会成员韦尔希宁 3 月 8 日走上冰面与苏维埃部队谈判时的呼吁便是明证：“别再喊你们的‘万岁’了，跟我们一起打倒犹太人吧。我们工人和农民所忍受的，正是他们该死的统治。”<sup>314</sup>

尽管起义者对共产党官僚体系充满蔑视，但他们并不敌视普通党员，也未否定共产主义理想本身。诚然，一些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后来在芬兰接受采访时，曾愤愤不平地指责共产党人“剥夺了人民的权利”<sup>4 8</sup>。但这种敌意是在起义遭到血腥镇压后才加剧的，而且无论如何，他们针对的是党的领导层，而非普通党员。事实上，不少起义者——包括革命委员会主席彼得里琴科（Petrichenko）和秘书基尔加斯特（Kilgast）——本就是前共产党员。他们认为革命的理想已被玷污，决心恢复其原有的纯洁性。一位仍为党员的水兵所作的声明，典型

---

<sup>314</sup> 科尔纳托夫斯基编：《喀琅施塔得起义》，第 95-96 页。

地反映了他们的思想：“俄罗斯已被一个‘微小的共产党官僚圈子’变成了一片‘可怕的沼泽’，这些人打着共产主义的幌子，在我们的共和国里为自己筑起了舒适的巢穴。”<sup>315</sup>

尽管水兵们对布尔什维克高层怀有强烈敌意，但他们从未要求解散共产党，也从未主张将其排除在俄国政府与社会之外。“没有共产党人的苏维埃”（Soviets without Communists）并非如苏联和非苏联作家常常声称的那样，是喀琅施塔得的口号。这样的口号确实存在：它曾在内战期间由西伯利亚的农民武装高呼；南方马赫诺（Makhno）的游击队也曾提出类似主张——“拥护苏维埃，反对共产党人”<sup>316</sup>。但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从未采纳这些口号。所谓他们使用过此类口号的说法，其实是一种传说，似乎最早出自流亡的立宪民主党（Kadet）领袖米留可夫（Miliukov）。他在巴黎将起义者的目标概括为两条口号：“用苏维埃取代布尔什维克”（Sovety vmesto Bol'shevikov）和“打倒布尔什维克，苏维埃万岁！”他写道，水兵们希望权力从现有的单一政党专政，转移到一个由社会主义者和无党派激进分子组成的联盟手中，而这一联盟将通过排除共产党人的苏维埃来运作。他说，这种安排在全国层面将为恢复立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留下充分空间<sup>317</sup>。

---

<sup>315</sup> 《真理报论喀琅施塔得》，第 66 页。

<sup>316</sup> 特里福诺夫：《苏联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第 106–107 页。

<sup>317</sup> 《最新新闻》，1921 年 3 月 11 日。

然而，这远非对喀琅施塔得纲领的准确描述。喀琅施塔得纲领明确拒绝恢复立宪会议，并且确实允许布尔什维克与其他左翼政治组织一同参与苏维埃。事实上，在起义期间成立的地方“三人小组”（revtroiki）中，共产党人确实被排除在外；但在经选举产生的代表会议上——这是喀琅施塔得最接近其理想中“自由苏维埃”的机构——共产党人却以相当数量参与其中。

因此，起义者的目标并非彻底废除共产主义，而是对其进行改革，清除内战期间凸显出来的独裁与官僚主义倾向。在这一点上，喀琅施塔得运动与党内的反对派思潮——“舰队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十分相近，它们有着相似的不满情绪与左翼理想主义立场。如同他们中无疑有人曾隶属的“舰队反对派”一样，起义者反对身边政治委员粗暴、专断的行事方式。如同民主集中派，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日益加剧的威权化，呼吁在党内与苏维埃内实现“民主化”。如同工人反对派，他们抗议劳动的“军事化”，这一概念涵盖工厂中的一长制与铁的纪律、工会被压制，以及“资产阶级专家”重回掌权岗位。最后，与所有反对派团体一样，喀琅施塔得人痛惜党与民众日益疏离，抨击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违背革命的核心精神——为了权力与权宜之计，牺牲了革命的民主与平等理想。<sup>318</sup>

然而，这些相似之处不应被过度放大。一方面，起义者与

---

<sup>318</sup> 参见丹尼尔·斯：《革命的良知》，第 145-146 页；夏皮罗：《共产主义专制的起源》，第 305-306 页。

农民阶层有着紧密的情感联结，而工人反对派与民主集中派都是城市团体，由工厂工人和知识分子组成，对农民的需求甚少关注。更为重要的是，与起义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力图维护布尔什维克的权力垄断，并默许在必要时使用恐怖手段来维持这一垄断。他们将诉求局限于党内改革，从未主张与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分享政治权力。尽管如此，喀琅施塔得纲领与他们主张之间的相似点，仍令反对派领导人十分尴尬，他们竭力与起义水兵划清界限。工人反对派尤为如此，其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人什利亚普尼科夫与柯伦泰愤怒地否认与这场起义有任何关联，将其归因于“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性”的影响，附和了列宁在大会开幕式上的说法。面对台下的质疑，柯伦泰宣称，工人反对派成员是首批奔赴前线与起义者作战的志愿者。<sup>319</sup>第三位领导人尤里·卢托维诺夫在起义期间身在柏林，担任苏维埃贸易代表团副团长。在一次公开采访中，他谴责起义者，重复官方论调，称这是一场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反革命分子协助的白卫将军阴谋。他说，政府之所以推迟动用武力镇压，只是为了保全城市平民，但“肃清喀琅施塔得这场闹剧，只是极短时间内的问题”。<sup>320</sup>

与此同时，在喀琅施塔得本地，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已被反对情绪所侵蚀。正如托洛茨基所承认的，这场起义“吸纳了相

---

<sup>319</sup>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第 72、300 页。

<sup>320</sup> 《与尤·赫·卢托维诺夫的谈话》，《新世界》，1921 年 3 月 13 日。

当数量的布尔什维克”，其中一些人是出于对报复的恐惧，但绝大多数是因为真心认同起义者的纲领。更具体地说，托洛茨基估计，30%的喀琅施塔得共产党员积极参与了起义，另有40%持“中立立场”。<sup>321</sup>

这无疑只是大规模退党浪潮的顶峰：1920年9月至1921年3月间，党员人数从4000人锐减至2000人，这一鲜明数据折射出内战结束后蔓延开来的反叛情绪。起义期间，喀琅施塔得残存的党组织迅速瓦解：约500名正式党员退党，更有近300名预备党员；据其中一人证实，剩余党员士气严重低落，面对起义摇摆不定、犹豫不决。<sup>5 8</sup> 喀琅施塔得《消息报》不时刊登的长长退党名单，反映出不满情绪的日益高涨。仅两期报纸就登出了超过200个退党者姓名。导致退党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布尔什维克在3月7日至8日发起的进攻。“一想到自己可能被视作无辜者流血事件的共犯，我就不寒而栗，”一名喀琅施塔得女教师在首轮炮击后写道，“我再也无法相信、也无法宣扬那种以如此野蛮行径玷污自身的理念。因此，从第一声枪响起，我便不再视自己为共产党预备党员。”<sup>322</sup>此后，来自大陆布尔什维克要塞的炮火越猛烈，喀琅施塔得的党员退党潮就越汹涌。起义者《消息报》的版面上，每天都刊登着当地共产党小组的来信，谴责政府动用暴力，并支持革命委员会的

---

<sup>321</sup> 科尔纳托夫斯基编：《喀琅施塔得起义》，第13-15、86页；普霍夫：《喀琅施塔得起义》，第50、95页。

<sup>322</sup> 《真理报论喀琅施塔得》，第108页。

应对举措。那些公开宣布退党的人并未放弃共产主义理想，而是抨击党的领导人出于私利歪曲了这些理想。例如，一名喀琅施塔得男教师痛斥投机分子涌入党内，“用污秽玷污了美好的共产主义理念”。<sup>323</sup>另一封来信来自喀琅施塔得卫戍部队的一名红军指挥员，他的父亲是一位民粹主义者，曾在19世纪70年代著名的“193人审判案”中被判处流放。“我逐渐意识到，”他写道，“共产党的政策已将国家带入了一条死胡同，无路可走。党组织已经官僚化……它拒绝倾听民众的声音，却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民众……唯有言论自由，以及通过改革选举程序获得更多参与国家重建的机会，才能让我们的国家摆脱萎靡不振的状态……从今往后，我不再承认自己是俄国共产党党员。我完全赞同3月1日全市会议通过的决议，并在此将我的精力与能力交由革命委员会支配。”<sup>324</sup>

在整个起义期间，喀琅施塔得的共产党组织并未发起有力的抵抗。3月2日，约200名忠于党的人员在高级党校集会并武装起来，准备对抗起义者，但很快便认定局势无望，跨越冰面逃往红戈尔卡。<sup>325</sup>起义初期，其他坚定的党员要么离开岛屿前往大陆，要么奔赴周边堡垒，试图鼓动守军反对起义者，但均徒劳无功。与此同时，革命委员会开始逮捕布尔什维克主要

---

<sup>323</sup> 同上，第133页。

<sup>324</sup> 同上，第59页。

<sup>325</sup> 科尔纳托夫斯基编：《喀琅施塔得起义》，第31页；佩特里琴科：《论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真相》，第8页。

领导人。首批被捕者——于3月2日在教育大楼的会议上被拘押——是舰队政委库兹明、已解散的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以及喀琅施塔得战列舰支队政委科尔舒诺夫。次日，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巴蒂斯在穿越冰面前往托特列本堡垒途中，被起义巡逻队抓获。<sup>326</sup>其他被关押者还包括地区党委书记、资深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布雷格曼医生。

多名官员通过与起义者合作免遭逮捕。3月2日，三名当地布尔什维克组建了“俄国共产党喀琅施塔得组织临时局”：粮食政委伊林、前苏维埃领导人佩尔武申，以及喀琅施塔得工会委员会主席卡巴诺夫。临时局于3月4日发表声明，承认苏维埃重新选举的必要性，号召全体喀琅施塔得共产党员坚守岗位、服从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声明还警告民众警惕协约国特工编造的“恶意谣言”，这些谣言要么称共产党人正准备镇压起义，要么称起义者会处决党员。<sup>327</sup>事实证明，伊林的合作只是伪装，目的是拖延时间等待大陆援军。他暗中向红戈尔卡的上级汇报喀琅施塔得的粮食储备情况。但这一诡计很快败露，伊林被捕，其领导的临时局也显然解散，在起义余下的日子里再无相关记载。<sup>328</sup>

---

<sup>326</sup> 《真理报论喀琅施塔得》，第58页。

<sup>327</sup> 同上，第50-51页。

<sup>328</sup> 同上，第130页；科尔纳托夫斯基编：《喀琅施塔得起义》，第228页；《红色报》，1921年3月18日。

总计，起义期间约有 300 名共产党人遭到逮捕，其中大多为地方官员，另有少数人因试图逃跑或被革命委员会认定具有危险性而被捕。这一数字虽绝非微不足道，约占喀琅施塔得党员总数的五分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苏维埃当局已在奥拉宁鲍姆处决 45 名水兵、并扣押喀琅施塔得人亲属作为人质的情况下，仍有大量共产党人未受任何滋扰、得以自由行动。当局扣押人质的举动虽激起起义者的怒火，却也让他们顾虑到报复的可能，从而克制了自身行为。无论如何，在群情激愤、局势日趋紧张的时期，喀琅施塔得起义者对敌对者的人道处置尤为引人注目。300 名布尔什维克俘虏未遭受任何伤害，既无处决，也无酷刑与殴打。毕竟，这场起义并非针对他们深恶痛绝、会毫不留情予以消灭的白军，而是针对有着共同理想、他们仅希望纠正其行为的革命同志。人们不禁会猜想，倘若托洛茨基或季诺维也夫落入起义者手中，将会是何种下场。

即便最不得人心的官员也毫发无损。有关库兹明遭到残酷对待、险些被就地枪决的报道毫无事实依据。起义结束后，维克多·塞尔日在斯莫尔尼宫偶遇库兹明，库兹明看上去精神饱满，坦言这些说法只是“夸大其词”，他与同志们受到了得体的对待。尽管佩特里琴科对伊林的背叛极为愤怒，伊林也未受伤害。<sup>329</sup>当革命委员会得知共产党人的亲属遭到抵制或被解雇时，随即告诫民众切勿采取报复行为：“尽管共产党人犯下种种暴

---

<sup>329</sup> 塞尔日：《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第 126-127 页；《真理报论喀琅施塔得》，第 130 页。

行，我们仍将保持克制，仅将其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使其恶意的虚假煽动无法妨碍我们的革命事业。”<sup>330</sup>

尽管如此，囚犯的命运还是在布尔什维克政府内部引发了不小的担忧。第一轮逮捕浪潮过后，当局便以扣押人质作为回应，并警告称，若共产党人受到任何伤害，将招致严重后果。据囚犯们自己供述，他们始终生活在随时会被枪决的恐惧之中。<sup>331</sup>当红军堡垒里的 50 名共产党人试图突围逃往卡累利阿海岸并被截获后，他们的处境并未得到改善。还有几次，效忠政府的人用手电筒向岸上发信号，并在夜间发射照明弹为敌方指示目标。结果，尤其是在 3 月 8 日进攻之后，起义者开始对内部的布尔什维克分子采取更严厉的措施。3 月 10 日，所有共产党人被勒令交出武器和手电筒。此后不久，革命委员会告诫民众警惕向敌人发信号的叛徒。《消息报》警告说：“将根据当时形势所决定的法则，不经任何法庭，当场执行惩处。”期间发生了一些小规模冲突事件，例如有两名党员被指控囤积粮食。在 3 月 11 日的代表会议上披露，起义者从布尔什维克囚犯那里收缴了 280 双靴子，分配给在冰面上驻守的防御者，而囚犯们则被换上了树皮草鞋。这一宣布赢得了掌声和“做得好！把他们的大衣也拿走！”的呼喊。而这显然也付诸了行动，因为一

---

<sup>330</sup> 《真理报论喀琅施塔得》，第 75、84 页。关于起义者与当地共产党人的关系，参见卡特科夫：《喀琅施塔得起事》，《圣安东尼论丛》第 6 辑，第 45—48 页。

<sup>331</sup> 参见 1921 年 3 月 18 日《红色报》对瓦西里耶夫的采访。

名俘虏后来作证说，他的大衣和靴子都被没收了。<sup>332</sup>

“我们的起义是一场挣脱布尔什维克压迫的自发运动；一旦达成这一目标，人民的意志便会自然彰显。”<sup>333</sup>佩特里琴科在芬兰接受一名美国记者采访时，如此定性这场三月起义。<sup>6 8</sup> 他用一句话道出了起义的精神内核，因为喀琅施塔得事件最鲜明的特征便是其自发性——这一特质与同期的农民暴动、工人骚乱一脉相承。将这些运动视作一个整体现象，它们构成了继承拉辛与普加乔夫传统的民众起义，水兵们承担了哥萨克与射击军的角色，完整承袭了后者突然爆发、反抗有组织专制的天性。这一传统在1917年也同样显现，正如普希金描绘18世纪普加乔夫起义时所言，是一场经典的“俄罗斯暴动，盲目而冷酷”的新版本。对无政府主义者、最高纲领派及其他左翼极端分子而言，“社会革命”终于到来。他们选择与布尔什维克并肩作战，后者的部分口号甚至借自工团主义者与社会革命党人，恰好契合他们的情绪与诉求。“土地归农民！打倒临时政府！工厂管理权归工人！”作为革命纲领，这一主张更贴近民粹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对俄国底层民众的无政府民粹主义本能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然而十月革命后，列宁及其政党一心巩固权力、将国家从

---

<sup>332</sup> 《真理报论喀琅施塔得》，第96、101、122、130、138、156页；普霍夫：《喀琅施塔得起义》，第99页；科尔纳托夫斯基编：《喀琅施塔得起义》，第77页。

<sup>333</sup> 夸顿致国务卿，1921年4月9日，国家档案馆，档案号：861.00/8470。

社会混乱中解救出来，试图将这场自下而上的革命引向中央集权与威权主义的轨道。他们的举措与农民和工人阶级的诉求背道而驰——对后者而言，革命本身就是对集权与专制的彻底否定。人民真正渴求的，显然是一个建立在地方自主与自决基础上的分权社会。毕竟，免受政府及其代理人的干预，向来是下层民众长久以来的梦想。因此，农民会做出这样的区分并非毫无缘由：他们将赶走贵族、分予土地的人称作“布尔什维克”，而将建立国营农场、向农村派遣征粮队的人称作“共产党”。1917年，布尔什维克许诺了一个无政府民粹主义的理想国度，可一旦掌权，便回归了其原本的国家主义信条。

广义而言，俄国革命传统中存在两股根本对立的思潮。一股是中央集权派思潮，以列宁及其政党为代表，旨在以革命专政取代旧秩序；另一股则由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革命党人倡导，追求分权自治、弱化强势政府权威，并信赖人民的民主本能。喀琅施塔得起义植根于农民本位主义与自发暴动，无疑属于后者。水兵们反对一切形式的中央集权专制，转而与昔日的布尔什维克盟友及其精英式国家社会主义分道扬镳。他们甚至直言，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根本算不上社会主义。对起义者而言，一如此前的巴枯宁，没有个人自由与自决权的社会主义——至少对下层民众而言——不过是一种新的暴政，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它所取代的旧政权更为恶劣。

这种观念分歧，正是1921年3月冲突的核心根源。布尔什维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便是对群众自发性的不信任。列宁

认为，若放任自流，工人与农民要么会满足于局部改良，更糟的是，会沦为反动势力的牺牲品。因此在他看来，群众必须由坚定的革命先锋队“从外部”加以领导。这是其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他也将这一原则套用在喀琅施塔得的局势上。他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表示，我们必须认真考量这一事件带来的政治与经济教训。“这一事件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政治权力转移到了一群成分庞杂的乌合之众或联盟手中，这些杂糅的政治团体看似比布尔什维克稍偏右，甚至可能更偏左——根本无从分辨，喀琅施塔得试图夺权的正是这样一团模糊的政治势力。”尽管列宁将起义归咎于白卫分子的阴谋，却完全洞悉其真实本质。他称，这场运动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自发势力”的反革命，即一场与同期农民、工人骚乱紧密相连的民众暴动。正因如此，它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存续构成了极大威胁，比邓尼金、高尔察克与尤登尼奇加起来还要危险。<sup>334</sup>

最重要的是，列宁担心会爆发一场新的“普加乔夫起义”（Pugachevshchina）。他担心当初将布尔什维克推上权力的同有一股无政府民粹主义浪潮，现在会反过来吞噬他们。水兵之所以特别危险，是因为与白军（Whites）不同，他们是为了苏维埃而起义的。正如维克多·谢尔盖（Victor Serge）所言，叛乱者身心都属于这场革命。他们表达了人民的苦难和意

---

<sup>334</sup>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第33-34页。列宁在另一场合曾试图淡化喀琅施塔得的危险，称其对苏维埃政权的威胁“比爱尔兰军队对大英帝国的威胁还要小”。《列宁全集》，第45卷，第129页。

愿，因此比任何其他反对派运动都更刺痛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良知。列宁明白这场叛乱的群众吸引力。他攻击它是“小资产阶级”和“半无政府主义”的，就像他在四分之一世纪前攻击民粹主义者（Populists）一样，指责他们浪漫地梦想着过去公社和手工艺合作社的时代。这种愿景对布尔什维克的气质来说是可憎的；它不仅原始、低效，而且是反动的，无法在二十世纪生存，因为在那个时代，集权国家和集权工业机器在各地都取得了胜利。这就是为什么对列宁来说，喀琅施塔得比内战中的白军更危险。它代表了一种理想，尽管无法实现，却符合俄国下层阶级最深层的冲动。

但是，列宁推论道，如果让喀琅施塔得得逞，就意味着所有权威和凝聚力的终结，国家将分裂成一千个碎片，进入另一个像 1917 年那样的混乱和原子化时期，但这一次是针对新秩序的。不久之后，某种其他集权政权——可能是右翼而非左翼——将填补这一真空，因为俄国无法在无政府状态下生存。因此，对列宁来说，道路是明确的：无论代价如何，必须镇压叛乱，并在喀琅施塔得恢复布尔什维克主义。

## 第六章

# 镇压

3月9日，即对起义据点首轮进攻失败的次日，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加米涅夫在莫斯科向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发表讲话。他称，喀琅施塔得的军事局势已变得比所有人预期的“更为持久”，平定叛乱无法“在短期内”完成。<sup>335</sup>首轮进攻操之过急。当局急于在起义获得外部援助或蔓延至内陆前将其镇压，行动过于仓促，准备不足，投入的兵力与装备也不充足，最终进攻被击退，损失惨重。

但如今时间更为紧迫，因为冰层不久便将开始融化。因此，布尔什维克指挥官图哈切夫斯基紧急筹备第二次进攻，投入的兵力远超此前。火炮与飞机被火速调往作战区域。在朝向科特林岛的两岸，兵力迅速集结，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锐部队源源不断抵达。由于士气低迷是3月8日失利的原因之一，此次兵员选拔格外严格。整营整营的军校学员与青年共产党员从斯摩棱

---

<sup>335</sup>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第167页。

斯克、维捷布斯克、梁赞、下诺夫哥罗德等遥远城镇赶来，高唱《国际歌》，以示对革命的忠诚。<sup>336</sup>经过挑选的共产党分队与契卡特务部队在新的突击力量中占比极高。此外，效忠政府的团队从乌克兰与波兰前线抽调，还增补了华人、鞑靼人、巴什基尔人与拉脱维亚族士兵——相较于大俄罗斯人，他们向起义者开火时的心理顾虑或许更少。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言，这是共产党人与非俄罗斯族裔对阵普通民众。<sup>337</sup>

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抽调费德科、乌里茨基、迪本科等经验丰富的军事将领协助指挥进攻。迪本科曾是“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船员，亦是革命期间舰队中的重要布尔什维克成员，他发布传单《致我喀琅施塔得的老水兵同志们》，斥责佩特里琴科是“波尔塔瓦的富农”，呼吁起义者放下武器。<sup>338</sup>与此同时，政府竭尽全力向部队灌输水兵是反革命分子的观念。报刊与广播坚称，“白匪喀琅施塔得”的叛乱者受流亡分子及其协约国同伙指使行事。“诅咒喀琅施塔得的叛徒”，彼得格勒一家报刊的头条写道，“喀琅施塔得必将重回红色怀抱”。<sup>339</sup>

---

<sup>336</sup> 《内战：1918-1921》，第1卷，第365页；普霍夫：《喀琅施塔得起义》，第150页；《革命烈火中》，莫斯科，1933年，第56页。

<sup>337</sup> 丹：《流浪两年》，第154-155页；《纽约时报》，1921年3月12日；《新俄罗斯生活》，1924年3月22日；《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原因、诱因、经过与评价》，手稿，胡佛档案馆。

<sup>338</sup> 科尔纳托夫斯基编：《喀琅施塔得起义》，第226-227页。

<sup>339</sup> 《彼得格勒真理报》，1921年3月11日。

与此同时，这座旧都笼罩在一片不安的平静之中。为在最终军事准备完成前防止新骚乱爆发，季诺维也夫向民众作出进一步让步，其中包括承诺召开全市非党工人会议，并遏制党政机关内的“官僚主义”。<sup>6</sup> 在莫斯科，这场起义引发的担忧日益加剧。3月10日，托洛茨基带回一份关于局势的严峻报告，并提交给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闭门会议。当晚，约300名代表志愿奔赴前线，人数超过大会总出席者的四分之一，这也鲜明体现出起义爆发十天后，其严重性已被高度重视。为证明忠诚，工人反对派与民主集中派成员率先报名。<sup>340</sup>

志愿者之一、民主集中派成员M·A·拉法伊勒留下记述，记录了代表们在最终强攻要塞期间的的作用。他们于3月11日抵达彼得格勒，随即被火速分派到驻守喀琅施塔得南北两侧大陆的部队中。拉法伊勒及其同行者被派往奥拉宁鲍姆，一路高唱《国际歌》。<sup>341</sup> 尽管部分人会参与实战，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提振士兵士气，说服士兵他们是在保卫革命、抗击革命之敌，从而消除向起义者开火的犹豫。此外，他们还试图安抚士兵在无掩护情况下穿越开阔冰面的恐惧：3月8日惨败后，士兵们对可能被机枪扫射、或在炮火中坠冰溺亡充满恐慌。代表们的另一项任务是劝诱起义者放弃斗争。他们在散发给喀琅施塔得

---

<sup>340</sup> 大会会议记录收录了279名志愿者的不完全名单，其中包括K·E·伏罗希洛夫、A·C·布勃诺夫（民主集中派）、B·П·扎顿斯基、Г·П·皮亚塔科夫等知名人物：《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第765-767页。

<sup>341</sup> M·拉法伊勒：《喀琅施塔得起义（一名政工人员的日记）》，哈尔科夫，1921年，第4-6页。参见普霍夫：《喀琅施塔得起义》，第152页。

的传单中宣称，“自由苏维埃”实则意味着“资产阶级、地主、将军、海军上将、贵族、亲王及其他寄生虫”的复辟；这一口号只是掩盖“推翻被剥削者的苏维埃政权、复辟资本主义剥削者政权”的烟幕。因此立刻做出选择：“要么与白卫军为伍反对我们，要么与我们并肩对抗白卫军。”<sup>342</sup>

然而起初，代表们收效甚微。共产党部队的士气依旧低迷，而防御一方的斗志却丝毫未见衰退。苏联的军事策略应对此种局面负有部分责任：令维堡美国领事惊讶的是，布尔什维克并未“认识到小规模进攻的徒劳无益”。<sup>343</sup>3月9日，苏军再次在冰面上发起试探性进攻，却被警惕的防御者击退。次日，苏维埃飞机轰炸了要塞，夜幕降临后，大陆两岸的炮兵阵地又对起义者的防御工事展开了猛烈炮击。随后在3月11日凌晨，苏军从南岸再次试图发起进攻，却以惨重伤亡被击退。当日余下时间一片平静，芬兰湾上空浓雾弥漫，军事行动被迫中止。能见度极低，一名从奥拉宁鲍姆飞往彼得格勒的共产党飞行员误降在了喀琅施塔得。发现错误后，他加大引擎马力，在密集的炮火中成功起飞，安全抵达彼得格勒。<sup>344</sup>

尽管接连受挫，苏维埃指挥官们仍决心在冰层解冻前镇压

---

<sup>342</sup> 拉比诺维奇：《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在喀琅施塔得城下》，《红色编年史》，1931年第2期，第50-54页。

<sup>343</sup> 夸顿致国务卿，1921年3月11日，国家档案馆，档案号861.00/8318。

<sup>344</sup> 《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1921年3月11日。

叛乱，在做好更充分准备前拒绝停止进攻行动。3月12日，空袭与炮轰重新展开，整日断断续续地进行，但仅造成轻微损伤。据一份流亡者消息源称，一架布尔什维克飞机被喀琅施塔得的地面火力击落，坠入芬兰湾，这是起义期间唯一的此类损失。<sup>345</sup>次日凌晨，过去数日的模式再度上演：炮击过后，南岸部队在黎明前发起突袭。尽管袭击者身着白色伪装服，但在遭到外国起义要塞的交叉火力阻击后，未能推进多远便被击退。但进攻仍在持续。14日清晨，在夜色掩护下，新锐的布尔什维克分队冒着密集的炮火与机枪火力推进，最终被迫撤退，在冰面上留下数十具伤亡人员的遗体。不过，这已是最后一次小规模进攻。在接下来的72小时里，尽管空袭与炮击依旧如常，但地面行动全面停止，布尔什维克方面正全力筹备，试图一举强攻拿下起义者的据点。

除了军事上的接连失利，布尔什维克还需应对其他严重问题。例如有报道称，彼得格勒西南交通枢纽红村的铁路工人拒绝运送前往镇压喀琅施塔得的部队。另有一例，一名来自莫斯科的青年共产党员发现，他乘坐的列车在从彼得格勒到奥拉宁鲍姆的短途行程中频频停靠，尽管司机抱怨燃料质量不佳，但志愿者们怀疑其中有诈。<sup>346</sup>更为严重的是3月16日——总攻前夜发生的一起事件。在奥拉宁鲍姆，内战中曾在对抗白军的战

---

<sup>345</sup> 《为人民事业》，1921年3月18日。

<sup>346</sup> 《纽约时报》，1921年3月16日；《革命烈火中》，第58页。

斗里表现出色的第 27 鄂木斯克步枪师士兵发动叛乱，呼吁“前往彼得格勒，打倒犹太人”。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的军事专家之一 И·Ф·费德科率领效忠政府的部队迅速封锁了基地，包围了鄂木斯克叛乱者的兵营，并逮捕了头目。但这种不满情绪的传播力极强，即便是可靠的军校学员也未能幸免：几乎与此同时，彼得霍夫指挥学校的学员中破获了一起反布尔什维克阴谋，数名学员被捕并被押往彼得格勒看管。<sup>347</sup>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不满情绪，在决定性进攻发起前的最后两天里，红军部队的士气却出现了显著好转。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他们手中掌握着一件强有力的新武器：3 月 15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代表大会投票决定，以实物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当列宁在大会上宣布这一新纲领时，一位来自西伯利亚的代表宣称：“只需将这一法令告知全西伯利亚的民众，就足以平息农民的骚乱。”<sup>348</sup> 身处前线的代表们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将其传达给了部队。此举效果惊人。一位布尔什维克政委回忆道，士兵们的情绪瞬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而这些士兵大多出身农民。<sup>349</sup> 这一让步标志着战时共产主义走向终结的开端，它的公布对红军在最终

---

<sup>347</sup> 科尔纳托夫斯基编：《喀琅施塔得起义》，第 100–101 页；普霍夫：《喀琅施塔得起义》，第 147–148 页。

<sup>348</sup>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第 430、468 页。

<sup>349</sup> 拉比诺维奇：《喀琅施塔得城下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红色年鉴》1931 年第 2 期，第 32 页。

战役中的作战表现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大约在同一时期，喀琅施塔得的情绪也发生了转变，却是朝着相反的方向。直到3月中旬，尽管面临着压倒性的不利局势，起义者的士气依旧高涨。3月12日，喀琅施塔得《消息报》得意地宣称：“今日是专制制度被推翻的纪念日，也是委员政权垮台的前夜。”<sup>350</sup>当天，美国驻维堡领事馆的一名信使造访了这座要塞，他记录下了“卫戍部队与当地民众纪律严明、士气高昂”的状态。一位社会革命党通讯员在类似的报告中也写道，整座城市秩序井然、人心安定，各类作坊仍在正常运转。“我们要着手开展解放俄国的事业，”佩特里琴科对他说，“我们正努力争取彼得格勒民众站到我们这边……我们要实现苏维埃的真正权力。”<sup>351</sup>喀琅施塔得的人们依旧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起义很快就会蔓延至俄国本土。3月11日，《消息报》呼吁俄国其他地区加入反抗布尔什维克压迫的斗争：“喀琅施塔得正在为你们——饥寒交迫、衣不蔽体的人们——而战……同志们，喀琅施塔得人已经举起了起义的旗帜，他们坚信，数千万工人和农民会响应他们的号召。这里燃起的曙光，必将照亮整个俄国，首先是彼得格勒，这是毋庸置疑的。”<sup>352</sup>

---

<sup>350</sup> 《关于喀琅施塔得的真理报报道》，第126页。

<sup>351</sup> 夸顿致国务卿，1921年3月13日，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号861.00/8319；《伦敦时报》1921年3月17日；《俄罗斯意志》1921年3月15日。

<sup>352</sup> 《关于喀琅施塔得的真理报报道》，第120—121页。

与此同时，革命委员会全力加强岛屿防御，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进攻。入夜后实行宵禁熄灯，以此增加敌方炮手和轰炸机的行动难度。截至此时，尽管遭到密集炮击，起义者的伤亡人数却少得惊人；到访喀琅施塔得的外部人士称，人员几乎没有受伤，建筑与设施也仅遭受轻微损毁。据防御者自身统计，截至3月10日，仅有14人死亡、4人受伤（2名水手、1名士兵和1名平民）。3月12日，起义者的《消息报》特意报道，一名14岁少年在巡逻时负伤（该报解释称，没人能阻拦他，因为他的农民父亲去年在村中被布尔什维克枪杀）。<sup>353</sup>

但局势开始急转直下。出乎预料的是，彼得格勒几乎没有响应起义的迹象。有人将几份喀琅施塔得《消息报》贴在工厂墙壁上，还有一次，一辆卡车驶过彼得格勒街头，散发起义者的传单。3月7日，兵工厂的工人通过了喀琅施塔得的决议，并派遣代表前往其他企业，呼吁发动总罢工以声援起义者。<sup>354</sup>但所有这些努力都付诸东流。彼得格勒在当局的让步安抚与军队的威慑之下，始终保持平静。水兵们感到遭到了背叛，这种怨愤在起义被镇压后仍久久不散。流亡芬兰的难民后来抱怨称，他们原以为彼得格勒工人“是动真格的”，以为罢工会发展成一场彻底的革命。同样，丹在狱中见到的被俘水兵，也指责工人

---

<sup>353</sup> 同上，第122、132页；《纽约时报》1921年3月16日。另有资料称，喀琅施塔得及其要塞的受伤人数为60人：《喀琅施塔得起义是如何爆发的》，1921年3月12日，米勒档案馆，5M档案盒，第5号文件。

<sup>354</sup> 梅特：《喀琅施塔得公社》，第46页。

们“为了一磅肉”就向政府出卖了他们。<sup>355</sup>

事实上，喀琅施塔得没有得到任何一方的支援。这座岛屿陷入彻底的孤立，不断遭到空袭和来自大陆的重炮轰击。布尔什维克突击队彻夜袭扰，防御者们几乎无法入眠；暴风雪肆虐之中，起义军的巡逻队因缺少靴子，只能穿着草鞋在冰面上行进。随着燃料储备日渐枯竭，喀琅施塔得《消息报》呼吁被围困的民众尽可能节约用电。弹药也即将告罄。3月11日，防御者接到命令，禁止用步枪或机枪射击布尔什维克的飞机——这种徒劳的射击只会浪费宝贵的弹药。与此同时，“军事专家”抱怨称，炮弹被漫无目的地远距离射向目标不明的区域。起义者的伤亡人数虽不算惨重，却在持续攀升。3月中旬左右，医疗物资耗尽，死亡率急剧上升。3月14日，喀琅施塔得海军医院举行了集体葬礼；16日，水兵大教堂再次举办悼念仪式，而此时布尔什维克的炮火仍在轰击这座城市。当天傍晚，红戈尔卡炮台发射的一枚12英寸炮弹击中“塞瓦斯托波尔号”甲板，造成14名水兵死亡、36人受伤，起义军的士气遭受沉重打击。

356

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革命委员会一名成员后来回忆的那样，

---

<sup>355</sup> 夸顿致国务卿，1921年4月23日，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号861.00/8619；丹：《漂泊两年》，第153页。

<sup>356</sup> 《关于喀琅施塔得的真理报报道》，第75、138页；夸顿致国务卿，1921年4月23日，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号861.00/8619；佩特里琴科：《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真相》，第18页。

想要维持起义初期燃起的高涨热情已然毫无希望。<sup>357</sup>持续不断的进攻、食物与燃料的匮乏、在严寒中彻夜值守的不眠之夜，正如伯克曼所言，正在一点点消磨这座起义据点的生机。<sup>358</sup>防御者们满心焦灼，等待着那场他们心知肚明必将到来的总攻，紧绷的神经早已不堪重负。

他们最忧心的是喀琅施塔得的粮食储备，这份秘密备忘录的作者，早在起义爆发数周前就已预见了一问题。这座与外界彻底隔绝的岛屿，供养五万居民的物资还能支撑多久？起义第一周结束时，最初每人每日半磅面包、四分之一罐罐头食品的配给标准就已难以为继。3月8日，每人仅领到少量燕麦，勉强够维持四天；9日，又分发了四分之一磅由面粉和干土豆制成的黑饼干。次日，喀琅施塔得的金属工人们同意将自己专属配给的马肉罐头交由全体居民统一调配。除此之外，整个起义期间，每人仅分到过一罐炼乳、偶尔能领到一罐肉罐头，半磅黄油则只配发给儿童。到3月15日，面粉耗尽，面包也几乎断绝，仅剩少量罐头食品。<sup>359</sup>

民众陷入饥饿，而彼得格勒苏维埃曾指出：“在民族战争中，饥饿往往是要塞投降的核心因素。”<sup>360</sup>喀琅施塔得独自坚

---

<sup>357</sup> 《与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的访谈》，手稿，胡佛图书馆藏。

<sup>358</sup> 伯克曼：《喀琅施塔得起义》，第36页。参见戈德曼：《我的生活》，第88页。

<sup>359</sup> 梅特：《喀琅施塔得公社》，第77-78页；《俄罗斯意志》，1921年3月15日；《喀琅施塔得事件的起因、缘由、经过与评价》，手稿，胡佛图书馆藏。

<sup>360</sup> 《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1921年3月14日。

守至冰层解冻的希望日渐渺茫，起义领袖们开始重新考虑接受外部援助。起义初期，切尔诺夫的主动示好曾被他们礼貌回绝；但当维尔肯男爵于3月16日以俄国红十字会的名义送来食物和药品时，他们满怀感激地接受了。

然而我们知道，最终没有任何援助抵达。因为也正是在3月16日，图哈切夫斯基重新集结部队，准备对起义者的堡垒发起最后的总攻。苏军部署了两支进攻力量，主力部队部署在芬兰湾南岸，另一支规模较小的部队沿北岸（卡累利阿沿岸）展开。布尔什维克军队的总兵力估算不一，从3.5万到7.5万人不等，对阵的是约1.5万名防御工事完备的起义守军。<sup>361</sup>实际兵力约为5万人（是3月8日首次进攻兵力的两倍），其中南集群约3.5万人。

布尔什维克麾下多名精锐指挥官亲临前线指挥此次进攻，其中多人在内战中已证明其指挥才能，包括总参谋部学院出身的费德科、季边科，以及负责整编哗变的鄂木斯克第27师的维托夫特·普特纳。尽管政府一再指控喀琅施塔得事件是白军将军策划的阴谋，但前沙俄军官在进攻部队中发挥的作用，远甚于在起义守军之中。北集群指挥官叶·斯·卡赞斯基、南集群指挥官阿·伊·谢佳金，以及他们的上级图哈切夫斯基、谢·谢·加米涅夫（与党内领袖列·波·加米涅夫无亲属关系），均曾在沙

---

<sup>361</sup> 《纽约时报》，1921年3月18日；《俄罗斯新生活报》，1921年3月22日；《喀琅施塔得事件的起因、缘由、经过与评价》，胡佛图书馆藏；蔡德勒致俄国红十字会会长，1921年3月20日，吉尔斯档案馆，第88号档案。

俄军队中担任军官。

得益于兵力的加强、指挥官的出色素养，以及党代表们不间断的宣传鼓动，普通士兵的士气如今远胜以往。“我们忍受了三年的饥寒交迫，如今又遭遇这般背叛。定要清算他们！”<sup>362</sup>这是苏维埃宣传机器的论调，也激起了士兵们一劳永逸镇压起义的坚定决心。士兵们身着白色罩衫与冬靴，配备了充足的弹药，以及用于剪断喀琅施塔得各要塞、炮台防御铁丝网的专用剪钳。每名士兵都领到了两天量的面包和两罐肉罐头，以避免出现关于食物的怨言。然而，北集群的一名指挥官却给出了一条毫无提振士气作用的建议：他让士兵们上阵前不要进食，因为饱腹状态下腹部中弹的伤势会更为严重。<sup>363</sup>

图哈切夫斯基的计划为先实施长时间炮击，再从三面发起协同步兵突击：北集群进攻科特林岛北端，南集群则进攻该岛的南端与东端。3月16日下午2时，炮火齐射正式开始，并持续了整整一天。炮弹落在喀琅施塔得的墓地附近，当时人们正在那里为阵亡的防御者举行葬礼。起义军依托要塞、炮台以及港内的两艘无畏舰，以猛烈的弹幕予以还击。交火期间，一枚布尔什维克的炮弹击穿“塞瓦斯托波尔号”甲板，虽仅对舰体造成轻微损伤，却造成50名水兵伤亡。为避免重蹈覆辙，“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释放了防护烟幕，但次日该舰也被炮弹直接

---

<sup>362</sup> 《红色报》，1921年3月17日。

<sup>363</sup> 科尔纳托夫斯基编：《喀琅施塔得叛乱》，第89页。

命中，5人死亡、7人受伤。<sup>364</sup>除了海岸炮火轰击，苏军还派出飞机飞越芬兰湾，对要塞及其防御体系实施轰炸。然而，海陆空协同炮击并未造成严重的实体损毁，起义军的伤亡人数也相对较少，其主要作用是心理层面的，进一步打击了本已低迷的防御者士气。

夜幕降临时，炮击停止。鉴于过去一周的作战规律，起义军预料到进攻即将来临。每名士兵都坚守在岗位上，尽管许多人已连续两三天没有换班休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四周一片死寂，喀琅施塔得各要塞与舰船的探照灯在冰面上扫视，搜寻着任何异动。终于，17日凌晨3时，苏军开始推进。借助夜色与笼罩在芬兰湾上空的浓雾掩护，主要由彼得格勒地区军校学员组成的北集群分成两路纵队，从谢斯特罗列茨克和利西诺斯出发：一路进攻托季边堡与红军堡，另一路则进攻分布在科特林岛与卡累利阿大陆之间的七座编号要塞。

每支纵队的先锋都是志愿突击队，负责为进攻部队开辟通路。部队竭尽全力避免被发现：禁止交谈，命令均以低语传达；沟通依靠预先精心制定的手电筒信号。除此之外，全程保持黑暗，严禁吸烟。

---

<sup>364</sup> 佩特里琴科：《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真相》，第18页；《纽约时报》，1921年3月19日。此次进攻的细节主要取材于当时的新闻报道与参与者的回忆。尤可参见科尔纳托夫斯基编：《喀琅施塔得叛乱》，第45—51、89—91页；普霍夫：《喀琅施塔得叛乱》，第162—170页；《内战》（第一卷），第367—373页；拉斐尔：《喀琅施塔得叛乱》，第20—26页；克·叶·伏罗希洛夫：《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史事》，《军事历史杂志》1961年第3期，第15—35页。遗憾的是，我未能找到1921年第8期专论该事件的《军事知识》杂志。

凌晨 5 时，来自利西诺斯的左翼纵队——兵力达五个营——发现了叛军最外围的第 5、第 6 号堡垒在前方隐约显现。士兵们接到命令，匍匐前进，在冰面上爬完了剩下的路程，冰面上的积水浸透了他们的白色伪装服。他们抵达厚厚的铁丝网障碍前，正挥刀破网，突然被叛军的照明弹和探照灯照亮。一名士兵回忆，光线亮到“黑夜化作白昼”。第 6 号堡垒喊话劝降：“我们是自己人。我们拥护苏维埃政权。我们不会向你们开枪。”<sup>365</sup>学员兵们无视这些喊话，端着刺刀、投掷手榴弹冲向堡垒，却遭到叛军密集的机枪扫射，伤亡惨重，被击退。学员兵们一次次高呼“乌拉”重新发起冲锋，最终突破叛军防线；经过激烈厮杀，两座堡垒被攻克。

当天上午，大雾散去，3 月 17 日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失去掩护的共产党人对剩余堡垒发起猛攻。双方都拼死作战，伤亡惨重。叛军的炮火击碎冰层，形成一个个小水洼，成了数十名冲锋士兵的坟墓。据总参谋部学院指挥官С. П. 乌里茨基记载，共产党人的一个营最后仅剩 18 人生还。<sup>366</sup>但叛军的抵抗逐渐被瓦解，午后时分，所有编号堡垒均被攻占，学员兵推进至喀琅施塔得市的东北城墙。与此同时，仅由两个连组成的右翼纵队试图攻克托特列边堡垒，却久攻不下。守军虽已精疲力竭，仍拼死顽抗，一次次击退进攻者，双方均伤亡惨重。随

---

<sup>365</sup> 科尔纳托夫斯基主编：《喀琅施塔得起义》，第 90、105 页。

<sup>366</sup> 《国内战争》，第 1 卷，第 370 页。

着步兵冲锋，堡垒的重炮失去作用，但叛军的机枪与手榴弹造成大量杀伤。一队学员兵误入雷区，爆炸震碎冰层，许多人落水溺亡。最终，进攻者攻入堡垒，肉搏战持续了一整天。直到18日凌晨1时，托特列边堡垒才最终投降，附近的红军堡垒也随之缴械。

与此同时，南集群向喀琅施塔得市的南部与东部城区发起了进攻。17日凌晨4时，在北集群出发约一小时后，一支大部从奥拉宁鲍姆启程，拖拽着机枪与轻型火炮，分三路纵队向喀琅施塔得军港推进，第四路纵队则直取彼得格勒门——这座城市最薄弱的入城关口。天色仍黑，第79步兵旅先遣部队已逼近守卫军港的重炮阵地。探照灯射出一道道光柱，但黑暗与浓雾掩护了伪装隐蔽的部队，守军未能发现他们。红军突击分队抵达城南后，迅速控制了数座外围炮台的守军。然而，当他们继续向前推进时，遭到了周边叛军据点密集的机枪与炮火弹幕阻击。炮弹与手榴弹在冰面上炸出一个个窟窿，无数跳弹激起细碎的雪雾。进攻部队在开阔地带直面这场“死亡风暴”，仍表现出惊人的勇气，拼死试图继续推进。后方的劝诫与威逼也在驱使他们向前。但不出所料，部分士兵陷入恐慌，拒绝再前进一步。两名士兵因恐惧躲进一艘冰封的驳船中，被指挥官当场击毙，随后指挥官率其余人继续冲锋。<sup>367</sup>然而，战局最终因叛军数卡车增援部队抵达而逆转——叛军发起反攻，迫使红军

---

<sup>367</sup> 亚历山大·巴尔明：《幸存者》，纽约，1945年，第95页。

撤退。此战中，第 79 旅伤亡过半，其中包括多名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sup>368</sup>

在城市东端，进攻方的战况则稍显乐观。黎明前夕，第 32 步兵旅在第 95、96 步兵团的支援下，成功攻破彼得格勒门北侧的城墙，杀入城内。几乎同时，由费德科指挥、以军校学员突击团为先锋的第 187 步兵旅，从彼得格勒门正门突入，第 167、80 步兵旅紧随其后。此时进攻部队已伤亡惨重，但据当时人描述，一旦攻入城内，他们便陷入了“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sup>369</sup>机枪与步枪仿佛从每一扇窗户、每一片屋顶向他们射击。人行道上，冰雪很快被一块块血迹染红。战斗在街巷与楼宇间逐街逐屋展开，双方死伤枕藉。即便在这场自相残杀的血战中，即便多数堡垒已失守、市区内激战正酣，起义者也并未对被俘的红军士兵实施报复。在彼得格勒门附近，一支政府军救援小队火速赶往关押战友的监狱，砸破窗户，将武器递给狱中的同志；被俘者自行解救，随即投入战斗。<sup>370</sup>

战斗一整天都未曾停歇。据一些记载，喀琅施塔得的妇女们也投身战斗，在猛烈的炮火下为守军运送弹药，将伤员转移至城内医院的急救站。<sup>371</sup>下午 4 时，起义军突然发起反攻，布

---

<sup>368</sup> 科尔纳托夫斯基主编：《喀琅施塔得起义》，第 246—247 页。

<sup>369</sup> 《喀琅施塔得起义期间彼得格勒的事态发展》，手稿，1921 年 3 月 19 日，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档案馆。

<sup>370</sup> 科尔纳托夫斯基主编：《喀琅施塔得起义》，第 78、88 页。

<sup>371</sup> 佩特里琴科：《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真相》，第 21 页；沃林：《被遗忘的革命》，

尔什维克部队节节败退，险些被赶回冰面。但在这危急时刻，第 27 骑兵团与一支来自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志愿分队及时赶到，扭转了战局。日落前夕，从奥拉宁鲍姆调来的火炮进入城区，对起义军展开毁灭性轰击。激战之中，双方士兵因负伤与极度疲惫纷纷倒下。傍晚时分，北集群的军校学员兵从东北方向攻入城内，占领了要塞总指挥部，俘获大批人员。随后他们与南集群的战友会合，此时南集群已从彼得格勒门一路激战至市中心。午夜时分，战斗逐渐平息，最后几座堡垒相继被攻克，胜利已然在望。

早在 3 月 5 日，喀琅施塔得的流血冲突尚未爆发时，彼得格勒防御委员会就曾警告起义者，到最后关头，“科兹洛夫斯基、佩特里琴科之流”的头目会抛弃他们，任由其自生自灭，自己逃往芬兰。<sup>372</sup>这一预言最终应验。3 月 17 日晚，败局已定之际，革命委员会的 11 名成员（包括佩特里琴科）穿越冰面，逃往捷里奥基。（瓦尔克、帕夫洛夫、佩列佩尔金已在战斗中被俘，而维尔希宁，如前所述，已于 3 月 8 日首轮进攻时在冰面上被擒。）科兹洛夫斯基、索洛维亚诺夫及其他合作的“军事专家”也一同逃窜。午夜前夕，约 800 名逃亡者抵达芬兰海岸，其中包括起义军的大部分领导层。这些人最担心被俘后遭处决，因此最先逃离科特林岛，仅有靠近卡累利阿海岸的几座编号堡垒的守军除外。无疑，担心被就地处决是他们决定逃亡

第 499 页；《彼得格勒的事态发展》，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档案馆。

<sup>372</sup> 科尔纳托夫斯基主编：《喀琅施塔得起义》，第 189 页。

的关键原因。无论如何，他们的出逃，成为了科特林岛及其周边要塞守军大规模撤离的信号。在随后的 24 小时里，源源不断的逃亡者——大多为水兵——越过芬兰边境。逃亡总人数约 8000 人，超过起义军总兵力的一半。约 400 匹马被牵过冰面，芬兰边防军还在海岸附近收缴了 2500 支被遗弃的步枪。<sup>373</sup>

人们注意到，布尔什维克的炮击虽断断续续持续了 11 天，却对喀琅施塔得的防御工事造成的破坏小得惊人。但此刻，撤退的水兵们以最后的反抗姿态，拆下各堡垒与炮台火炮的炮闩，捣毁了发电机、探照灯、机枪及其他装备。当布尔什维克夺回北部堡垒时，仅有极少数武器还能使用。<sup>374</sup>3 月 17 日夜，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与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指挥官下令船员炸沉军舰，但船员得知领导层已经逃亡，拒绝执行命令。他们反而逮捕了负责军官，并向苏维埃指挥部传话，表示愿意投降。晚 11 时 50 分，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指挥部向彼得格勒防御委员会发出捷报：“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与塞瓦斯托波尔号上的反革命巢穴已被肃清。舰船控制权已落入拥护苏维埃政权者手中。两舰的军事行动已停止。正采取紧急措施追捕逃往芬兰边境的军官。”<sup>375</sup>3 月 18 日凌晨，军校学员兵分队占领了这两艘无畏舰。与此同时，除少数顽固分子仍在负隅顽抗外，其

---

<sup>373</sup> 《新俄罗斯生活报》，1921 年 3 月 22 日、24 日。

<sup>374</sup> 科尔纳托夫斯基主编：《喀琅施塔得起义》，第 168 页；《国内战争》，第 1 卷，第 372 页。

<sup>375</sup> 科尔纳托夫斯基主编：《喀琅施塔得起义》，第 243 页。

余起义者也纷纷投降。至 18 日中午，堡垒、舰船及几乎整座城区均落入政府军手中，仅剩零星抵抗的守军小队有待清剿。当日下午，最后一股抵抗被击溃，喀琅施塔得的炮火彻底归于沉寂。

喀琅施塔得之战的惨烈程度，堪比苏俄内战中最血腥的战役。双方伤亡都极为惨重，而被迫在开阔冰面上向防御坚固的守军发起进攻的布尔什维克，付出了大得多的代价。据官方卫生报告统计，3 月 3 日至 21 日期间，彼得格勒各医院收治了逾 4000 名伤员与弹震症患者，另有 527 人在院中不治身亡。这些数字自然未计入在战斗中直接阵亡的大量人员。战后，冰面上遍布尸体，芬兰政府为此照会莫斯科，要求俄方清理遗体，担心解冻后尸体会被冲上岸，引发公共卫生危机。<sup>376</sup>官方来源的保守估算显示，布尔什维克方面阵亡约 700 人，2500 人受伤或患弹震症，但一名亲身参战的布尔什维克士兵称，仅从他在第 6 号堡垒亲眼所见来看，这一数字就被严重低估。另有估算称红军伤亡达 25000 人。不过，消息灵通的美国维堡领事哈罗德·夸顿认为，苏维埃方面总伤亡约 10000 人，将所有阵亡、负伤与失踪者合计，这一估算相对合理。<sup>377</sup>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约 15 名代表在此次战役中丧生。3 月 24 日，彼得

---

<sup>376</sup> 梅特：《喀琅施塔得公社》，第 56 页；《泰晤士报》（伦敦），1921 年 3 月 31 日。

<sup>377</sup> 科尔纳托夫斯基主编：《喀琅施塔得起义》，第 107 页；普霍夫：《喀琅施塔得起义》，第 169 页；《彼得格勒的事态发展》，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档案馆；夸顿致国务卿，1921 年 3 月 19 日，美国国家档案馆，861.00/8372。但凯利中尉所说的 2.5 万至 3 万人伤亡数字过高；夸顿致国务卿，1921 年 4 月 23 日，861.00/8619。

格勒举行集体葬礼，他们与其他牺牲的布尔什维克一同被以军礼安葬。<sup>378</sup>

起义军方面的损失相对较少，但也绝非微不足道。目前并无可靠统计数据，不过一份报告显示，起义者阵亡人数为 600 人，1000 余人负伤，约 2500 人在战斗中被俘。<sup>379</sup>阵亡者中，有不少人是在战斗最后阶段遭到屠杀的。进攻部队攻入要塞后，为阵亡的战友展开了疯狂的血腥报复。从一名士兵的表述中，便可窥见进攻期间积攒的刻骨仇恨——他遗憾没能出动飞机，用机枪扫射逃往芬兰的起义者。托洛茨基与其总司令谢·谢·加米涅夫批准对起义者使用化学武器；倘若喀琅施塔得的抵抗再持续更久，由高等军事化学学校学员制定的、通过炮弹和气球发动毒气攻击的计划，便会被付诸实施。<sup>380</sup>

镇压起义的消息迅速传开，在不同地区引发了形形色色的反应。在西欧，俄国流亡者陷入一片绝望。他们哀叹未能向起义者施以援手，同时谴责英国在战斗激战正酣之际，与布尔什维克签署了贸易协定。不过，有一家流亡派刊物并未就此灰心。该刊在一篇题为《喀琅施塔得的教训》的社论中宣称，为俄罗斯解放而战的斗争将持续到胜利来临。同样，格林姆教授在写

---

<sup>378</sup> 《彼得格勒真理报》，1921 年 3 月 25 日。

<sup>379</sup> 波兹尼亚科夫：《化学武器》，收录于 B.H.利德尔·哈特主编《红军》，纽约，1956 年，第 384-385 页。波兹尼亚科夫上校曾是制定该计划的学员之一。

<sup>380</sup> 《为人民事业》，1921 年 3 月 19 日；格林姆致吉尔斯，1921 年 3 月 31 日，吉尔斯档案，第 88 号文件。

给一位同僚的信中表示，若彼得格勒再度爆发起义，他们的团体绝不能再毫无防备。<sup>381</sup>

在俄国国内，布尔什维克为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欢呼雀跃。但喜悦之中，也夹杂着对“误入歧途的水兵同志”的惋惜。来华的外国共产党人也怀有同样的心情，即便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发展方向心存疑虑，却依旧选择支持；在他们看来，布尔什维克治理下的俄国纵然存在种种缺陷，仍是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首个将地主与资产阶级从根深蒂固的权力宝座上赶下台的国家。在他们眼中，除此之外的一切考量都无足轻重。但包括维克多·塞尔日在内的一些外国共产党人，却对这一事件深感不安。而对埃玛·戈德曼、亚历山大·贝克曼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喀琅施塔得起义被镇压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戈德曼在回忆录中回忆，3月17日夜，隆隆炮声停歇后，笼罩彼得格勒的死寂，比前几日连绵不绝的炮火更令人恐惧。战斗的最后时刻，贝克曼“对布尔什维克的最后一丝信仰彻底破灭”，无助地在街头徘徊；而戈德曼则在旅馆中陷入难以置信的痛苦，“每一根神经都被难以言喻的疲惫包裹”。她静坐凝望黑暗，彼得格勒仿佛一具裹在黑纱中的可怖尸骸，街灯摇曳着昏黄的光，“如同棺槨首尾的烛火”。次日清晨，3月18日，彼得格勒的报纸以通栏标题纪念巴黎公社五十周年。军乐队奏响军曲，布尔什维克走上街头游行，高唱《国际歌》。戈德曼写道：“这首

---

381

歌的旋律曾令我欢欣鼓舞，如今却宛如为人类炽热希望奏响的挽歌。”贝克曼在日记中悲愤地写下：“胜利者们正在庆祝1871年公社的周年纪念日。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却在谴责梯也尔和加利费屠杀巴黎起义者。”<sup>382</sup>

与此同时，在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竭尽全力清除起义留下的一切痕迹。帕维尔·迪边科被任命为要塞司令，被授予全权，负责肃清城内的异见分子与不忠思想。喀琅施塔得苏维埃未再恢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瓦西里耶夫、布雷格曼、格里博夫三位喀琅施塔得最受信任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组成的革命三人小组，协助新任司令开展工作。3月18日，一份名为《红色喀琅施塔得》的新刊物在城内创刊。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与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分别更名为“马拉号”与“巴黎公社号”，锚广场也改名为革命广场。俄共（布）立即开展党员重新登记工作，期间约350名党员被开除或未到场登记。正如一位作者所言，苏联海军还经历了一场“外科手术”：不可靠的波罗的海水兵被分散调往黑海、里海、咸海舰队，以及远东的阿穆尔河舰队；所有海军部队都清肃了队伍中所谓的“伊万诺夫分子”，总数约15000人。<sup>383</sup>参与最后总攻的红军士兵也被分散派往全

---

<sup>382</sup> 戈德曼：《我的一生》，第886页；贝克曼：《布尔什维克神话》，第303页。梯也尔为法国总理，加利费是镇压巴黎公社社员的将军。

<sup>383</sup> 科尔纳托夫斯基主编：《喀琅施塔得起义》，第15页；普霍夫：《喀琅施塔得起义》，第176—180页。参见格·阿·切列尚斯基：《1921年2月28日—3月18日的喀琅施塔得起义》，手稿，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档案馆。切列尚斯基是被调往阿穆尔河舰队的波罗的海水兵之一。

国各地的偏远地区。仅一个月后，他们的指挥官图哈切夫斯基便受命率领讨伐部队，前往坦波夫地区镇压安东诺夫领导的游击队。<sup>384</sup>

最后，尚有必要记述喀琅施塔得起义幸存者的命运。所有被俘起义者均未获得公开审判的机会。在战斗中被俘的 2000 余名囚犯中，有 13 人被选为叛乱头目，进行秘密审判。为坐实反革命阴谋的指控，苏维埃媒体刻意强调他们的社会出身：5 人是出身贵族的前海军军官，1 人是前神父，7 人出身农民家庭。<sup>385</sup> 这些人名不见经传：其中无一人来自革命委员会，也无一人是在起义中担任顾问的“军事专家”。尽管如此，这 13 名“头目”仍于 3 月 20 日受审，并被判处死刑。

其余囚犯中，据说有数百人在喀琅施塔得被当即枪决。剩下的被契卡押往大陆的监狱。彼得格勒的监狱人满为患，在随后数月里，数百名起义者被分批带出枪决。其中包括佩列佩尔金，费奥多尔·丹曾在监狱庭院放风时见过他。临刑前，他起草了一份关于起义的详细记述，但这份文稿的下落丹并不知晓。

---

<sup>384</sup> 费德科也参与领导了镇压安东诺夫起义的行动。参见米·尼·图哈切夫斯基：《与反革命起义的斗争》，《战争与革命》，1926 年第 8 期，第 3—15 页；阿·伊·托多尔斯基：《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莫斯科，1963 年，第 71—73 页；尼库林：《图哈切夫斯基》，第 151—156 页。

<sup>385</sup> 《红色报》，1921 年 3 月 23 日；《彼得格勒真理报》，1921 年 3 月 23 日；科尔纳托夫斯基主编：《喀琅施塔得起义》，第 247—249 页。根据指控，被告对“数千名”红军官兵的伤亡负有责任，这一说法与夸顿对布尔什维克方面损失的估算相吻合。

<sup>386</sup>另一些人被送往集中营，比如白海沿岸臭名昭著的索洛夫斯基监狱，被判强制劳动——对许多人而言，这意味着在饥饿、疲惫与疾病中慢慢死去。<sup>387</sup>部分起义者的家属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3月初被当作人质扣押的科兹洛夫斯基的妻子与两个儿子被送往集中营，只有他 11 岁的女儿得以幸免<sup>388</sup>。

逃往芬兰的起义者结局如何？约 8000 人穿越冰面逃脱，被关押在捷里奥基、维堡和伊诺的难民营中。几乎所有逃亡者都是水兵与士兵，仅有少量男性平民、妇女和儿童<sup>389</sup>。美国与英国红十字会为他们提供了食物和衣物。部分人被安排参与道路修建及其他公共工程。但难民营的生活凄凉压抑，起初难民被禁止与当地民众接触，他们很难适应生活。芬兰政府向国际联盟求助，希望协助将他们安置到其他国家，而布尔什维克则要求将他们连同武器一并遣返。许多人被大赦的承诺诱骗回国，结果刚返回就遭到逮捕，被送往集中营。5月至6月间，一批批这样的人途经丹所在的监狱，走向强制劳动与早逝的命运。

---

<sup>386</sup> 丹：《两年漂泊》，第 153—157 页。

<sup>387</sup> 马克西莫夫：《运转的断头台》，第 168 页；戴维·达林、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苏俄的强制劳动》，纽黑文，1947 年，第 170 页。但苏联近年一部著作称，被俘水兵中的大多数后来获得赦免，仅头目与苏维埃政权的死敌遭到“严惩”（即处决）：索菲诺夫：《历史转折》，第 36 页注释。

<sup>388</sup> 丹：《两年漂泊》，第 158 页。另一则当代史料（或许有误）称，科兹洛夫斯基的两个儿子均被枪决：《彼得格勒 4 月 12 日消息：喀琅施塔得及其起义的余波》，手稿，胡佛图书馆。

<sup>389</sup> 规模最大的伊诺堡垒难民营关押了 3597 名被拘者，其中男性 3584 人、女性 10 人、儿童 3 人，男性中仅 25 人为非军事人员：《新俄罗斯生活报》，1921 年 3 月 27 日。

尽管笼罩在绝望与悲愤之中，佩特里琴科依旧受到其他逃亡者的敬重。他们说，他最大的失误，是没有在喀琅施塔得处决那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佩特里琴科本人对此并无悔意。但他在捷里奥基接受一名美国记者采访时承认，这场起义发动得过早，组织也十分混乱。“我们战败了，”他说，“但这场运动还会继续，因为它源于人民本身……俄罗斯还有数百万和我一样的人，他们既不是反动的白军，也不是嗜杀的红军，正是这些普通民众，终将推翻布尔什维克的统治。”<sup>391</sup>关于佩特里琴科流亡后的生活，世人知之甚少。苏联一份关于喀琅施塔得起义的文献与回忆录汇编中，收录了一封据称是这位起义领袖写给俄罗斯友人的信，日期为1923年11月17日，信中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已申请重返祖国<sup>392</sup>。但这封信的真实性存疑。1925年12月，佩特里琴科在一份社会革命党刊物上发表文章，对自己在起义中的角色毫无悔意，他依旧坚持，这场起义是反对共产党（实则是党的领导层）独裁统治的自发抗争。

---

<sup>390</sup> 《泰晤士报》（伦敦），1921年3月30日；丹：《两年漂泊》，第159页。据部分报道，同年晚些时候，一批喀琅施塔得难民组建了“普列汉诺夫营”，与芬兰游击队一同在东卡累利阿对抗布尔什维克。参见C·杰伊·史密斯：《芬兰与俄国革命（1917—1922）》，佐治亚州雅典市，1958年，第193—197页。

<sup>391</sup> 夸顿致国务卿，1921年4月5日，美国国家档案馆，861.00/8446；《纽约时报》，1921年3月31日。

<sup>392</sup> 科尔纳托夫斯基主编：《喀琅施塔得起义》，第163—164页。

苏联官方内战史错误记载，佩特里琴科不久后离开芬兰，定居捷克斯洛伐克。事实上，他在芬兰停留了近四分之一世纪。如前所述，起义失败后，他曾愿意与西欧的流亡团体合作，与他们一样渴望将俄罗斯从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后来，他加入了芬兰的亲苏团体。二战期间，这些活动让他遭到芬兰当局的惩处，1945年他被遣返回苏联，刚回国就立即被捕。一两年后，他死于一座集中营。<sup>394</sup>

---

<sup>393</sup> 佩特里琴科：《论喀琅施塔得起义的起因》，《战斗旗帜》，1925年12月—1926年1月，第4—8页。

<sup>394</sup> 《国内战争》，第1卷，第362页；塞尔日：《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第132页注释；翁托·帕尔维拉赫蒂：《贝利亚的花园》，纽约，1960年，第21、285页。

## 第七章

### 结语

喀琅施塔得陷落了。起义者们以坚定的勇气奋战到底，但他们的胜利希望从一开始就十分渺茫。正如起义领导者自己承认的，这场起义时机不当、准备不足。水兵们没有进攻部队，也没有任何外部援助；而赢得内战的布尔什维克，得以调集最精锐的武装力量全力对付他们。此外，芬兰湾的海面仍封冻坚实，政府军得以对这座孤立的起义据点发起大规模步兵进攻。因此，与内战时期的各类反苏运动相比，喀琅施塔得起义规模并不算大。既然布尔什维克能够击败邓尼金、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击退毕苏斯基的军团，那么喀琅施塔得本身就不可能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

真正让布尔什维克警觉的，是这场起义可能引爆内地的全面暴动，或是成为新一轮外部干涉的先锋。他们清楚，整个国家已陷入近乎全民反叛的动荡之中。此前，他们尚能将对手各个击破；但喀琅施塔得尽管人数少于西伯利亚、坦波夫等地的农民起义，却防御工事坚固、驻守人员训练有素，且地处波罗

的海而非偏远内陆，足以成为外敌入侵的跳板。

即便如此，起义军的胜利也难以想象。俄国人民纵然满怀怨愤，却早已厌战、士气低落，他们即便对政府满腹不满，对白军复辟的恐惧也更甚于对布尔什维克的憎恨。此外，水兵们寄予厚望的彼得格勒罢工，此时已过高潮。至于外部支援，西方列强早已放弃干涉政策，转而寻求与布尔什维克和解。这场起义并未如白军所期望、布尔什维克所担忧的那样，打乱英苏贸易协定的签署——该协定于3月16日在伦敦签订，仅数小时后，政府军就对喀琅施塔得发起了总攻。同日，苏俄还在莫斯科与土耳其缔结了友好条约。喀琅施塔得起义也未阻碍苏波谈判，波兰人无意重启与宿敌的战事。《里加条约》于3月18日签署，此时布尔什维克部队正在清剿起义军的最后残余据点。芬兰同样背弃了起义者，禁止任何援助物资越过边境。最终，俄国流亡者依旧四分五裂、毫无作为，合作的希望渺茫。弗兰格尔将军的部队溃散、士气低迷，根本无力支援；即便只是动员部队、将其从地中海调往波罗的海，也需要数月时间。倘若试图在南方开辟第二战场，也几乎注定会以惨败收场。

对起义者而言，唯一的取胜希望在于立刻向内地发起进攻。倘若他们采纳“军事专家”的建议，在奥拉宁鲍姆夺取一处桥头堡，那么红军部队乃至普通民众都极有可能倒向他们的阵营。正如亚历山大·贝克曼所指出的，一场反抗国家的起义必须掌握主动权、果断出击，不给政府集结兵力的时间。一旦起义者陷入孤立或采取观望策略，就注定会走向失败。贝克曼指出，

在这一点上，喀琅施塔得起义重蹈了巴黎公社的致命覆辙：巴黎公社在梯也尔政府尚未组织起来时，拒绝立即进攻凡尔赛；而喀琅施塔得起义者则未能在当局布防完毕前向彼得格勒进军。<sup>395</sup>1908年3月，列宁在一篇纪念巴黎公社的文章中也提出过类似观点，他谴责“无产阶级过分宽宏大量：没有消灭敌人，反而试图对他们施加道德影响；忽视了内战中纯粹军事行动的重要性；没有以向凡尔赛的坚决进军来巩固在巴黎的胜利，而是拖延过久，让凡尔赛政府集结起反动势力，最终酿成了五月的血腥一周。”<sup>396</sup>这也恰是1921年喀琅施塔得公社的恰当墓志铭。

由此，我们难以回避这样一个结论：除非向内地发动进攻，否则起义者被镇压只是时间问题。即便他们能坚守到冰层融化、获得西方援助，结局大概率也不会改变。凭借开阔水域的掩护，在补给粮食、药品和弹药后，他们或许能再多坚持数周，给布尔什维克造成更大的伤亡，但他们迟早会屈服——即便不是单纯迫于军事压力，也会败给武力与经济让步相结合的手段，正是这种手段终结了彼得格勒罢工运动与全国范围内的农民起义。新经济政策正在各处消解民众的不满情绪，喀琅施塔得也不会成为例外。

这并非意味着喀琅施塔得起义对新经济政策的出台负有任

---

<sup>395</sup> 贝克曼：《喀琅施塔得起义》，第39—40页。一位孟什维克撰稿人也在《社会主义信使》1921年4月5日刊中提出了同样的观点，第5页。正如恩格斯曾写道：“防御是一切武装起义的死路。”

<sup>396</sup> 列宁：《列宁全集》，第16卷，第432—453页。

何责任，至多只是加速了其推进行程。截至1921年3月，列宁早已下定决心放弃战时共产主义纲领。自内战结束后，他与同僚便已重新评估经济政策，并在起义爆发的数周前就拟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框架。早在1920年12月，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代表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呼吁停止粮食征收、推行实物税时，列宁就已在考量这一举措。然而，此后数周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最终，不断高涨的不满浪潮让他意识到，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已岌岌可危。2月8日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仔细审议了全部农业政策问题，列宁在会上提出方案：以实物税取代强制征收，农民在完成对国家的义务后，有权自行处置剩余农产品。随后数周，苏联报刊对这一方案展开了讨论。2月24日，即喀琅施塔得起义爆发的五天前，一份基于列宁笔记拟定的详细草案提交至中央委员会，被列入即将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议程。<sup>397</sup>

但3月8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时，与会者无不洞悉了这场起义的深意。起义凸显了民众反抗的激烈程度，为会议进程注入了紧迫感，也打消了所有人对立即推行改革的疑虑。布尔什维克党已然看到了不祥之兆。事实上，有人推测，倘若新经济政策能早一个月出台，这场起义或许根本不会发生。<sup>398</sup>无论如何，与会者普遍认为，改革已刻不容缓，

---

<sup>397</sup> 同上，第42卷，第333页。参见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第280—282页。

<sup>398</sup> 斯列普科夫：《喀琅施塔得起义》，第15页。

否则布尔什维克将被民众的愤怒浪潮掀下权力宝座。正如列宁所言，喀琅施塔得起义“比任何事物都更清晰地照亮了现实”。列宁意识到，这场兵变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涵盖农村起义、工厂骚乱与军队内部日益加剧的动荡在内的广泛不满浪潮的一部分。他指出，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危机，已然演变为“一场政治危机：喀琅施塔得危机”，布尔什维主义的的未来悬于一线。

399

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会议之一，标志着苏维埃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多年前，列宁曾为俄国社会主义的胜利设定两项前提：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以及俄国工人与农民的联盟。<sup>400</sup>到 1921 年，这两项条件均未达成。为此，列宁被迫放弃了“若无欧洲革命支援，便无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从本质上看，这正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萌芽——该理论数年后由斯大林系统提出，核心是放缓革命进程，对外与资本主义列强妥协，对内与农民阶层和解。当下最紧迫、压倒一切的需求（一切的基础），是安抚奋起反抗的农村民众。正如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言：“只有与农民达成妥协，才能在其他国家爆发革命之前，挽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sup>401</sup>三年前的 1918 年 3 月，列宁在国际战线

---

<sup>399</sup> 列宁：《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138、387 页。

<sup>400</sup> 同上，第 413 页。

<sup>401</sup>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第 404 页。

也曾做出类似退让：他放弃对德发动“革命战争”，签署了《布列斯特和约》。如今，为了争取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未能得到的“喘息时机”，列宁废除战时共产主义，转而推行更为审慎、缓和的国内政策。他宣称：“我们必须满足中农的经济诉求，推行自由贸易，否则，在世界革命推迟的情况下，俄国无产阶级政权便无法维系。”<sup>402</sup>

3月15日，第十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被一位代表（马克思主义学者达·鲍·梁赞诺夫）称作“农民版布列斯特和约”的决议。<sup>403</sup>这项举措是新经济政策的基石，以实物税取代强制征粮，准许农民在自由市场处置剩余农产品。这只是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混合经济的一系列举措的第一步。瓦列里安·奥辛斯基在第八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中央指令式播种运动方案被废止。公路与铁路沿线的武装路障全线撤除，城乡贸易重新恢复。此外，托洛茨基组建的劳动军被解散，工会获得一定自治权，包括选举自身负责人、就涉及工人利益的一切议题开展自由讨论的权利。后续法令恢复了私营零售商铺与消费品生产，国家则牢牢掌控经济“制高点”——重工业、对外贸易、交通运输与通信行业。每一步举措都进一步瓦解了大规模的民众反抗，同时为俄国城乡注入新的生机。此后数月，坦波夫、西伯利亚与伏尔加河流域的农民骚乱仍在暗中蔓延，但政府调集了镇压

---

<sup>402</sup> 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第138、387页。

<sup>403</sup> 同上，第468页。关于废除强制征粮的决议，见同上，第608—609页。

喀琅施塔得时所用的同类部队——军校学员兵与契卡武装重兵清剿，至 1921 年秋季，有组织的抵抗已被彻底扑灭。

对列宁而言，新经济政策并非只是秩序恢复、布尔什维克政权根基巩固之前的权宜之计。他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表示：“在我们改造农民之前，在大规模机械化重塑农民之前，必须保障他不受限制地经营自身经济的可能。我们必须找到与小农共存的形式。”列宁承认，集体化推行得过急，疏远了个体农民经营者。他指出，未来多年里我们都必须与个体农民打交道，“因为改造小农，重塑他的全部思想与所有习惯，是一项需要几代人完成的任务。”<sup>404</sup>列宁的这一承认，实则默认了孟什维克批评者的观点——1917 年时，孟什维克就曾警告，切勿仓促尝试将落后的农业国俄国推入社会主义。他们坚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深知时机尚未成熟，俄国无产阶级规模狭小、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

恩格斯也曾写道，没有什么比一场早产的革命更糟糕，即社会主义政党在工业与民主获得充分发展前就夺取政权。然而，布尔什维克却试图践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认定为不可能的事：在必要前提尚未具备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新经济政策正是为弥补这些缺失而做出的尝试。在列宁的构想中，新经济政策将是一段漫长的经济恢复期，是城乡和解的时期，在此期间将为社会主义社会奠定基础。新经济政策成功缓解了俄国社会的大

---

<sup>404</sup> 同上，第 37—38、406 页。参见夏皮罗：《共产主义专制的起源》，第 311 页。

量矛盾，却未能满足喀琅施塔得起义者及其支持者的诉求。诚然，粮食征收被废止，路障撤除，劳动营解散，工会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国家独立地位。但国营农场依旧保留，工业领域部分恢复了资本主义。此外，与无产阶级民主原则相悖的是，旧有的工厂主管与技术专家仍在管理大型工厂，工人依旧是“工资奴隶制”的受害者，和此前一样被排除在管理决策之外。

军事领域自然也未恢复任何民主。选举舰上委员会与政治委员的权利依旧形同虚设。喀琅施塔得起义后，舰队内部权力下放、放松军纪的设想再无可能。相反，列宁向托洛茨基提议解散波罗的海舰队，因为水兵不可靠，军舰的军事价值也存疑。但托洛茨基成功说服列宁，无需采取如此极端的举措。取而代之的是，苏联海军肃清了所有异见分子并进行彻底重组，青年团员充实进海军军官学校，以确保未来领导层的可靠。与此同时，红军军纪进一步收紧，而从工农志愿者中组建人民民兵的计划则被永久废弃。<sup>405</sup>

更重要的是，叛乱者提出的任何一项政治要求都未获满足。相反，专制统治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新经济政策（NEP）所作出的让步，实际上正是为了巩固布尔什维克对权力的垄断。列宁在为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起草的讲话提纲中写道：“喀琅施塔得的教训在于：政治上——党内必须更加团结一致（并加强

---

<sup>405</sup> 普霍夫：《喀琅施塔得起义》，第185—205页；怀特：《红军的成长》，第191—193、246—249页。

纪律），更坚决地打击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经济上——尽可能满足中农的要求。”<sup>406</sup>因此，民众的自主行动能力继续处于瘫痪状态，自由苏维埃也沦为一个破灭的梦想。国家拒绝恢复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这些权利曾被“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宪章”明确呼吁；也拒绝释放那些被指控犯有政治罪行的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左翼各政党不仅未能如愿参与由复兴后的苏维埃组成的联合政府，反而遭到系统性镇压。

3月17日深夜，在一种令人黯然神伤的巧合下，正当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穿越冰面逃往芬兰之际，格鲁吉亚那个已被推翻的孟什维克政府——苏俄境内最后一届此类政权——也从黑海港口巴统启程，流亡西欧。<sup>407</sup>在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因四面受白军威胁，尚容许亲苏维埃的左翼政党在持续骚扰与严密监视下勉强生存。但喀琅施塔得事件之后，就连这种有限容忍也不复存在。1921年5月，列宁公开宣称，所有持不同政见的社会主义者应与白卫军一道被关进监狱或流放海外，至此，一切合法反对派的伪装彻底被抛弃。<sup>408</sup>一股新的镇压浪潮随即席卷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当局指控他们与叛乱勾结。其中较幸运者获准移民国外，但成千上万人被契卡（Cheka）一网打尽，流放到远北地区、西伯利亚和中亚。

---

<sup>406</sup>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第625页。

<sup>407</sup> 博尔金：《孟什维克与喀琅施塔得起义》，《红色编年史》，1931年第3期，第28页；卡特科夫：《喀琅施塔得起义》，《圣安东尼文集》第6辑，第13页。

<sup>408</sup> 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第241页。

到年底，政治反对派残存的活跃力量已被彻底噤声或逼入地下，一党专政体制的巩固几近完成。因此，喀琅施塔得起义——如同所有针对专制政权失败的反抗一样——恰恰实现了与其初衷完全相反的结果：它非但没有开启人民自治的新纪元，反而使共产主义独裁统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地强加于整个国家。

布尔什维克统治的收紧，还伴随着一场旨在消除党内分裂的运动。列宁非但没有推行所谓的“党内民主”，反而宣布：若要政权渡过当前危机，派系纷争必须立即终止。“现在是时候了，”他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说道，“必须终结反对派，必须盖上盖子；我们已经受够了反对意见。”<sup>409</sup>列宁将喀琅施塔得事件当作大棒，迫使党内反对派屈服，暗示他们对党的政策的批评鼓动了叛乱者拿起武器对抗政府。<sup>410</sup>他的观点在与会代表中获得强烈共鸣，因为他们同样担心群众暴动可能将自己扫地出门。“目前，”一位发言者宣称，“党内存在三个派别，本次大会必须表明，我们是否还能继续容忍这种状况。依我之见，面对科兹洛夫斯基将军这样的敌人，我们不能以三个派别的状态应战，党代会必须就此表态。”<sup>411</sup>代表们欣然照办。他们通过了一项措辞严厉的决议，谴责“工人反对派”的纲领是背离马克

---

<sup>409</sup>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第 118 页；夏皮罗：《共产主义专制的起源》，第 316 页。

<sup>410</sup>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第 34—35 页。

<sup>411</sup> 同上，第 276 页。

思主义传统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偏差”。另一项名为《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则以喀琅施塔得为例，指出党内分歧可能被反革命势力所利用，并要求解散党内一切派别和小团体。该决议的最后一款（秘密保留近三年）赋予中央委员会特别权力，可直接开除持异议党员。<sup>412</sup>不久之后，列宁下令对全党“自上而下”进行清洗，以清除不可靠分子。到当年夏末，近四分之一的党员被清除出党。

对于亚历山大·贝克曼这样敏感的自由意志主义者而言，喀琅施塔得起义是一次发人深省的经历，促使他批判性地重新审视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然而，这场起义尽管充满悲剧色彩，在当时却并未被多数人视作决定性事件。它并未对列宁政权的政策制定产生重大影响；自内战结束后，苏维埃在内外事务上转向缓和的趋势便已形成。其重要性，本质上是作为一场更广泛社会危机——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象征，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演讲中，将这场危机称为苏维埃历史上最严峻的一次。<sup>413</sup>但随着时间推移，斯大林式极权主义时代到来，这场起义被赋予了新的意义。1938年大清洗高潮时期，埃玛·戈德曼写道：“事实上，十七年来，那些在喀琅施塔得被扼杀的声音，如今愈发响亮。”她还说：“多么可惜，逝者的沉默，有时比生者的呐喊更振聋发聩。”<sup>414</sup>

---

<sup>412</sup> 同上，第 571—576 页。

<sup>413</sup> 德格拉斯主编：《共产国际》，第 1 卷，第 213 页。

<sup>414</sup> 戈德曼：《托洛茨基的抗议也太过了》，第 7 页。

站在莫斯科审判与斯大林恐怖统治的视角回望，许多人将这场起义视为俄国革命史上一个致命的十字路口，它标志着官僚专制的胜利，也标志着去中心化、自由意志主义形态的社会主义最终走向失败。

这并非意味着苏维埃极权主义始于对喀琅施塔得起义的镇压，甚至也不是说极权主义在当时就已注定不可避免。维克多·塞尔日曾说：“人们常说，‘斯大林主义的萌芽，从布尔什维主义诞生之初就已存在。’对此我并不否认。但布尔什维主义中同样孕育着诸多其他萌芽——无数种其他的可能——那些亲历过第一场胜利革命最初岁月里那份热忱的人，不该忘记这一点。仅凭尸检中发现的、或许与生俱来的致命病菌，就去评判一个鲜活的人，这难道是理性的吗？”<sup>415</sup>换言之，在20世纪20年代初，苏维埃社会仍面临着多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正如塞尔日本人所强调的，布尔什维克理论与实践，始终存在着鲜明的专制倾向。列宁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对集权领导与严格党纪的坚持、对公民自由的压制以及对恐怖手段的认可——这一切都给苏共与苏维埃国家的未来发展留下了深刻烙印。内战期间，列宁曾将这些政策辩解为紧急状态下的短期权宜之计。然而这种“紧急状态”从未终结，而一套服务于未来极权政权的统治机器，却在悄然搭建。随着喀琅施塔得起义被镇压、左翼反对派被扼杀，最后一次对劳动者民主的有效诉求也湮没于历史。

---

<sup>415</sup> 塞尔日：《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第 xv—xvi 页。

此后，极权主义即便并非注定发生，也成为了极有可能的结局。

1924年列宁逝世，布尔什维克领导层陷入了激烈的权力斗争。三年后，斗争迎来高潮：中央委员会援引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决议中的秘密条款，将托洛茨基开除出党，不久又将他驱逐出境。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托洛茨基组建反对派，反抗斯大林的专制与官僚主义时，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却搬出喀琅施塔得的往事来抨击他，重提他在镇压这场起义中所扮演的角色。为回应批评者，托洛茨基试图证明自己并未直接参与其中。1938年他写道：“事实是，我本人丝毫没有参与平定喀琅施塔得起义，也没有参与随后的镇压行动。”<sup>416</sup>他坚称，整个事件期间，自己一直留在莫斯科；彼得格勒的事务由季诺维也夫处理，而镇压行动是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契卡一手实施的，捷尔任斯基从不允许任何方面插手干预。

他表示，无论如何，这场起义都必须被镇压。理想主义者总是指责革命存在“过激行为”，但这些行为实则“源于革命的本质，而革命本身就是历史的‘过激之举’”。喀琅施塔得起义不过是“小资产阶级针对社会革命的艰难处境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厉性发起的武装反抗”。倘若布尔什维克没有迅速行动，这场起义或许会推翻他们的政权，打开反革命的闸门。批评者难道要剥夺政府自卫、整顿自身武装力量的权利吗？有哪个政府

---

<sup>416</sup> 列·托洛茨基：《再论喀琅施塔得的平定》，《反对派公报》，1938年10月，第10页；《新国际》，1938年8月，第249—250页。

能容忍内部发生军事兵变？难道我们本该不做任何抵抗就放弃政权吗？托洛茨基最后总结道，布尔什维克在喀琅施塔得的所作所为，是“一场悲剧性的必然”。<sup>417</sup>

但批评者并未被说服。尽管托洛茨基一再否认，作为陆海军人民委员与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对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负有总体责任。他确实前往彼得格勒，并于3月5日发出了最后通牒；他还视察了奥拉宁鲍姆与红戈尔卡，即便作用不及季诺维也夫与图哈切夫斯基关键，也在监督布尔什维克军事筹备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正如德怀特·麦克唐纳所指出的，托洛茨基始终没有回应一项指控：布尔什维克以不必要的强硬与残酷手段处理了这场起义。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尝试过和平解决？即便白军确实会从党内分裂中获利，一个隔绝民众压力、密不透风的独裁政权所带来的危险，难道不是更为巨大吗？倘若政党允许民众更广泛地参与、给予左翼反对派更多自由，斯大林集团还能如此轻易地篡夺党的控制权吗？<sup>418</sup>安东·西利加也以类似的观点，反驳了布尔什维克的说法——即喀琅施塔得起义若不被镇压，就会释放反动势力。西利加承认这种可能性存在，但可以确定的是，革命在1921年就已消亡。<sup>419</sup>

---

<sup>417</sup> 托洛茨基：《关于喀琅施塔得的喧嚣》，《新国际》，1938年4月，第103—105页；托洛茨基：《斯大林》，纽约，1946年，第337页。托洛茨基所谓过激行为“源于革命的本质”这一说法，令人想起恩格斯的名言：革命是“可以想象的最具权威的事物”。

<sup>418</sup> 《新国际》，1938年7月，第212—213页。

<sup>419</sup> 安东·西利加：《喀琅施塔得起义》，伦敦，1942年，第13页。

最终，喀琅施塔得的胜利者们，反倒成了自己亲手缔造的体制的牺牲品。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被污蔑为蓄意纵容反革命的“人民公敌”。1939年的一份苏联小册子宣称，“犹大·托洛茨基”将自己的党羽——包括匪徒与白卫军——安插在喀琅施塔得，同时故意以工会问题制造烟幕。另一部斯大林主义著作将起义归咎于托洛茨基的“亲信、第七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以及波罗的海舰队司令、“老牌托派分子拉斯科尔尼科夫”。该文称，为处置这些叛徒，党派遣了斯大林的战友、“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而他在喀琅施塔得前线仅担任政委，作用微乎其微）。<sup>420</sup>

革命逐一吞噬了它的缔造者。季诺维也夫、图哈切夫斯基、迪边科在大清洗中被枪决；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遭苏联秘密警察特工暗杀；拉斯科尔尼科夫与拉舍维奇自杀身亡。前往喀琅施塔得的诸多党代表，包括皮亚塔科夫、扎顿斯基、布勃诺夫，都在斯大林的监狱中消失。几乎只有加里宁在1946年得以善终。而喀琅施塔得的殉道者们却永存于世，作为革命无罪的儿女，被镌刻在人民的记忆中。<sup>421</sup>

---

<sup>420</sup>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版，第35卷，第222页；第2版，第23卷，第484页；奥·列奥尼多夫：《肃清喀琅施塔得叛乱（1921年3月）》，莫斯科，1939年，第8—9、139页；卡·扎科夫希奇科夫：《1921年粉碎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叛乱》，列宁格勒，1941年，第62页。参见阿布拉莫维奇：《苏维埃革命》，第209页。

<sup>421</sup> 参见梅特：《喀琅施塔得公社》，第6页；伊·尼·施泰因贝格：《在革命的熔炉中》，纽约，1953年，第300页。

## 附录 A

# 关于组织喀琅施塔得 起义事宜的备忘录<sup>422</sup>

绝密 1921

来自喀琅施塔得的情报使人确信，即将到来的春季，喀琅施塔得将爆发起义。若起义的筹备工作能获得外部支援，此次起义完全有希望取得成功，以下形势将为起义提供有利条件。

目前，波罗的海舰队所有舰艇均集结于喀琅施塔得港，这些舰艇仍具备军事价值。就此而言，喀琅施塔得的核心力量为现役舰队水兵，以及喀琅施塔得要塞的岸勤水兵。全部权力都集中在一小部分共产党员水兵手中（包括当地苏维埃、契卡、革命法庭、各舰政治委员与舰艇党组织等）。卫戍部队其余人员与喀琅施塔得工人并未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水兵群体中，可以观察到大量明确的、对现有秩序不满的群体性迹象。

---

<sup>422</sup> 《关于组织喀琅施塔得起义的报告备忘录》，手稿，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档案馆。  
(由作者译)

一旦有一小批人采取果断迅速的行动夺取喀琅施塔得政权，全体水兵将一致加入起义者行列。水兵中已组建起这样一支队伍，他们已做好准备，并有能力采取最为坚决的行动。

苏维埃政府对水兵的敌对态度了如指掌。为此，苏维埃政府采取措施，确保喀琅施塔得的粮食储备始终不超过一周的供应量，而此前，粮食会整月运往喀琅施塔得仓库。苏维埃当局对水兵的不信任程度极高，已指派一支红军步兵团守卫当下封冻的芬兰湾通往喀琅施塔得的冰上通道。但一旦起义爆发，该团无法对水兵形成有效抵抗，因为若起义筹备得当，这支步兵团会被水兵打个措手不及。

夺取舰队与喀琅施塔得要塞本身的控制权，将确保起义军能够压制所有不在科特林岛紧邻区域的其他堡垒。这些堡垒的火炮射角无法对喀琅施塔得开火，而喀琅施塔得的炮台却对这些堡垒实施炮击（1919年5月起义的奥布鲁切夫堡垒，在喀琅施塔得炮台开火半小时后便宣告投降）。

起义爆发后，布尔什维克方面唯一可能对起义形成的即时军事抵抗，是从红戈卡堡垒（位于芬兰湾南岸大陆的堡垒）的炮台向喀琅施塔得开火。但红戈卡的火炮在喀琅施塔得的舰艇与要塞炮台面前，完全处于劣势。喀琅施塔得港内的舰艇至少配备32门12英寸舰炮、8门10英寸舰炮（小口径火炮不计在内，其状态暂无可靠情报）。红戈卡堡垒仅有8门12英寸火炮、4门8英寸火炮，其余火炮口径不足，无法对喀琅施塔得构成

威胁。

此外，喀琅施塔得、红戈卡堡垒及波罗的海舰队的全部炮弹储备，均存放在喀琅施塔得的弹药库中，届时将落入起义者手中。因此，布尔什维克无法通过红戈卡炮台的炮火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相反，可以断定，若红戈卡与喀琅施塔得展开炮战，喀琅施塔得必将取胜（1919年5/6月红戈卡起义，便是经喀琅施塔得四小时炮击后被镇压，炮火夷平了红戈卡地区所有建筑——布尔什维克自身当时都禁止直接轰击红戈卡炮台，为的是保留其供后续使用）。综上所述，喀琅施塔得起义的成功具备极为有利的条件：（1）已形成一支组织严密、行动力强的起义骨干队伍；（2）水兵群体普遍具备起义倾向；（3）喀琅施塔得地域范围狭小，便于掌控，可确保起义全面成功；（4）喀琅施塔得与俄国内陆相隔绝，且水兵群体同质化、团结度高，起义可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下筹备。

若起义取得成功，布尔什维克既无喀琅施塔得之外可投入作战的舰艇，也无法调集足够火力压制喀琅施塔得炮台的陆基火炮（尤其是红戈卡堡垒已无法发挥作用），根本无法通过沿岸炮击或协同登陆作战攻占喀琅施塔得。<sup>423</sup>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喀琅施塔得要塞与现役舰队配备的反登陆火炮数量极多，足以构筑密不透风的火力网。若要实施登陆，首先必须压制这批火炮，而喀琅施塔得要塞及舰队的重炮会为反登陆火炮提供支援，

---

<sup>423</sup> 备忘录作者假定起义将在冰层融化后发动。

布尔什维克根本无力完成这一任务。

综上所述，起义爆发后喀琅施塔得的军事态势可视为完全稳固，该基地能够根据需要进行长期坚守。

然而，起义后的内部生存条件却可能成为喀琅施塔得的致命问题。起义后城内的粮食仅够维持数日。若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后未能立即为喀琅施塔得提供补给，且后续粮食供应无法得到妥善保障，难以避免的饥荒将迫使喀琅施塔得重新落入布尔什维克的掌控。俄国反布尔什维克组织实力不足，无法解决这一粮食问题，只得向法国政府寻求援助。

为避免起义后向喀琅施塔得运送粮食出现延误，必须在预定起义日期前，将适量粮食储备运往运输船，这些船只将停泊在波罗的海各港口，待命驶往喀琅施塔得。

若无法提供粮食，喀琅施塔得除了会向布尔什维克投降外，还面临起义军自身士气崩溃的风险，进而导致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喀琅施塔得复辟。倘若起义水兵未能获得外部——尤其是弗兰格尔将军指挥的俄国白军——的同情与支持承诺，且水兵意识到起义无法进一步发展、难以推翻俄国境内的苏维埃政权，从而感到与俄国其他地区隔绝，那么士气崩溃将不可避免。

在此方面，极为理想的情况是：起义发动后，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有法国船只抵达喀琅施塔得，以此象征法国的援助。若能有俄国白军部队抵达喀琅施塔得，则效果更佳。挑选此类

部队时，应优先考虑目前驻泊在比塞大的俄国黑海舰队水兵；黑海舰队水兵前来支援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将在后者中激起无可比拟的热情。

还必须牢记，无法指望喀琅施塔得在起义夺权后、尤其是夺权初期建立起有序的政权组织。因此，弗兰格尔将军麾下的俄国陆军或舰队部队抵达喀琅施塔得，将产生极为有利的影响——届时喀琅施塔得的全部权力将自动移交至这些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手中。

此外，若设想从喀琅施塔得发起军事行动、推翻俄国境内的苏维埃政权，那么为此也需要向喀琅施塔得派遣弗兰格尔将军的俄国武装部队。就此而言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开展此类军事行动，还是仅以此类行动作为威慑，喀琅施塔得都可充当一座坚不可摧的基地。从喀琅施塔得发起行动的最近目标便是无险可守的彼得格勒，攻克这座城市，意味着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已胜过半。

然而，若出于某些原因，近期内不宜从喀琅施塔得向苏维埃俄国发起进一步军事行动，那么喀琅施塔得由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部队驻守、与法军指挥部协同行动这一事实，仍将对来年春季欧洲整体军政局势的发展产生重大意义。

但必须谨记，倘若喀琅施塔得起义的初步胜利因粮食补给不足，或波罗的海水兵与喀琅施塔得卫戍部队因缺乏精神与军事支援而士气低落而夭折，那么最终局面非但不会削弱苏维埃

政权，反而会使其得到巩固，并让苏维埃的敌人名誉扫地。

综上所述，俄国反布尔什维克组织应秉持如下立场：若无法完全确保法国政府已决定为此采取相应举措，则不得为喀琅施塔得起义的成功提供助力。这些举措具体包括：（1）承诺为起义筹备提供资金支持，起义若要取得有利结果，所需资金数额极少，约为 20 万法郎；（2）承诺在喀琅施塔得夺权成功后继续为其提供资金；（3）采取措施为喀琅施塔得运送粮食，并确保喀琅施塔得夺权成功后首批粮食即刻运抵；（4）同意在喀琅施塔得起义后，派遣法国军用舰艇以及弗兰格尔将军麾下的陆海军部队进驻喀琅施塔得。

此外必须明确：即便法军指挥部与俄国反布尔什维克组织不参与起义的筹备与指挥，来年春季喀琅施塔得仍会爆发起义，但这场起义在短暂的成功之后，终将注定失败。而这一结局将极大提升苏维埃政权的威望，使其敌人错失一个极为难得、且大概率不会再现的机遇——夺取喀琅施塔得，给予布尔什维主义最沉重的一击，令其难以复苏。

若法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上述考量，则宜由其指定一名专家，起义组织者的代表可就此事与该专家达成更详尽的协议，向其通报起义及后续行动的计划细节，以及起义组织与后续资金所需的具体数额。

## 附录 B

### 我们为何而战<sup>424</sup>

十月革命胜利后，工人阶级曾希望实现自身的解放。然而结果却是人的个性遭受了更加深重的奴役。沙皇警察与宪兵专制的权力，如今落入了共产党篡权者之手；他们非但没有给予人民自由，反而使人民时刻生活在恐惧之中——唯恐落入契卡（Cheka）的酷刑牢房。而契卡的恐怖手段，远比沙皇宪兵制度更为骇人。刺刀、子弹和契卡“特辖军”（oprichniki）粗暴的命令——这就是苏维埃俄国的工人阶级在历经无数斗争与苦难之后所赢得的一切。工人国家那光辉的象征——镰刀与锤头——事实上已被共产党当局以刺刀和铁窗所取代，只为维系新崛起的共产党委员与官僚阶层那安逸无忧的生活。

然而，最可耻、最罪恶的，莫过于共产党所建立的精神奴役：他们不仅掌控了劳动者的外在生活，更染指其内心世界，强迫人们按照共产主义的方式思考。借助官僚化的工会，他们

---

<sup>424</sup> “Za chto my boremsia”（《我们为何而战》），载《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1921年3月8日，见《关于喀琅施塔得的真相》（Pravda o Kronshtadte），第82–84页。（译者自译）

将工人牢牢钉在工作台前，使劳动不再是一种喜悦，而变成一种新型的奴役。面对农民自发起义所表达的抗议，以及工人因恶劣生存条件被迫举行的罢工，他们的回应是大规模处决与血腥镇压——其残酷程度，连沙皇时代的将军们都望尘莫及。

这个率先举起劳动解放红旗的劳动者之国——俄罗斯，如今却浸透了为共产党统治殉难者的鲜血。在这片血海之中，共产党人正将工人革命所有崇高而炽热的承诺与口号——淹没。这幅图景日益清晰：俄国共产党绝非它所标榜的劳动者捍卫者。劳动人民的利益对它而言完全陌生。一旦掌权，它唯一惧怕的就是失去权力，因此认为一切手段皆可接受：诽谤、暴力、欺骗、谋杀，甚至对叛乱者家属实施报复。

劳动者长久以来的忍耐已到尽头。各地燃起反抗压迫与暴政的起义烈火。工人罢工此起彼伏，但布尔什维克的秘密警察（okhrana）并未沉睡，他们采取一切措施，企图阻止并扑灭这场不可避免的“第三次革命”。然而革命终究还是到来了——它正由劳动者自己的双手掀起。共产主义的将领们清楚地看到：人民已经奋起，因为他们确信社会主义的理想已被背叛。尽管这些当权者为保全性命而颤抖，深知无法逃脱工人愤怒的审判，却仍试图依靠他们的“特辖军”，用监狱、行刑队及其他暴行来恐吓起义者。然而，在共产党独裁枷锁下的生活，已比死亡更加可怕。

奋起反抗的劳动人民明白：与共产党及其所建立的新式农

奴制之间的斗争，绝无中间道路可走。必须战斗到底。共产党人表面上做出让步：例如在彼得格勒省撤除了路障检查站，并拨出一千万金卢布用于从国外采购粮食。但人们切勿被此假象所蒙蔽——在这诱饵背后，隐藏着主人、独裁者那只铁腕；一旦局势恢复平静，他必将百倍索回今日所作的“让步”。

不，没有中间道路。胜利或死亡！红色喀琅施塔得树立了这样的榜样，它是左右两翼反革命势力的威胁。在这里，革命迈出了崭新的前进步伐。在这里，反抗的旗帜高高举起，反抗共产党统治三年来的暴力与压迫——这种压迫已让三百年的君主制枷锁黯然失色。在喀琅施塔得，第三次革命的基石已然奠定，它将打碎劳动群众身上最后的枷锁，为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实践开辟一条宽广的新道路。

这场新革命也将唤醒东西方的劳动群众，它以新型社会主义建设的范例，对抗官僚化的共产党“创造”。国外的劳动群众将亲眼看到，迄今为止凭借工农意志在此建立的一切，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未发一枪，未流一滴血，我们已迈出第一步。劳动者不需要流血。他们只会在自卫的时刻抛洒热血。尽管共产党人犯下种种暴行，我们仍保持足够的克制，仅将他们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使其恶意虚假的煽动无法妨碍我们的革命事业。

工农群众坚定前行，将立宪会议及其资产阶级制度、共产党专政及其契卡与国家资本主义抛在身后——后者的绞索套在

劳动群众的脖颈上，妄图将他们勒死。这场变革终于让劳动者得以拥有自由选举产生的苏维埃，运作时不受任何党派压力的强制干预，并将官僚化的工会改造为工人、农民与劳动知识分子的自由联合体。

共产党专制的警棍终于被打碎。

## 附录 C

### 引号里的社会主义

《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1921年3月16日，载《喀琅施塔得真相》，第172-174页。（作者译）

十月革命中，水兵与红军战士、工人与农民为苏维埃政权、为建立劳动者共和国抛洒了热血。共产党曾密切关注民众的态度，将蛊惑人心的口号写在旗帜上，煽动工人加入自己的阵营，并许诺带领他们步入光明的社会主义王国——仿佛唯有布尔什维克懂得如何建造这一王国。

工农大众自然陷入了无边的喜悦。他们心想：“我们在地主与资本家枷锁下遭受的奴役，终于要成为传说了。”仿佛田间、工厂与作坊里的自由劳动时代已然来临，仿佛一切权力都交到了劳动者手中。

共产党人通过精巧的宣传，将劳动人民的子女吸纳入党，用严苛的纪律将他们束缚。待自觉羽翼丰满后，共产党人先是将其他派别的社会主义者逐出权力中枢，随后又亲手把工农大众推下国家航船的掌舵位，却始终打着他们的名义统治国家。

为维护窃夺的权力，共产党人用政委的专断统治，掌控着苏维埃俄国公民的肉体与灵魂。他们违背理性、忤逆劳动者的意志，执意要打造国家社会主义，用奴隶取代自由劳动者。

布尔什维克在“工人监督”的名义下打乱生产秩序后，便着手将工厂作坊悉数国有化。工人从资本家的奴隶，沦为国营企业的奴隶。很快这仍不满足，他们又计划推行劳动加速制度——泰勒制。全体劳动农民被宣布为人民公敌，与富农划上等号。共产党人不遗余力地摧残农民，一心筹建国营农场——这是新型地主、亦即国家的庄园。这便是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带给农民的一切，取而代之的不是自由耕种新得的土地，而是被征走的粮食、被没收的牛马，换来的却是契卡的突袭与行刑队的枪决。这就是工人国家里绝妙的交换体系：用铅弹和刺刀换面包！

公民的生活变得单调乏味、循规蹈矩，一切都要遵照当权者制定的时刻表度日。个体人格的自由发展、自由的劳动生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极端奴役。一切独立的思想、一切对罪恶统治者行径的正当批评，都成了罪行，轻则监禁，重则处决。在这个“社会主义社会”里，践踏人类尊严的死刑反倒大行其道。

这就是共产党专政带我们走进的光明社会主义王国。我们得到的，是由官僚苏维埃组成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些官僚只会遵照党委会及其绝对正确的政委的指令，顺从地投票。“不劳

动者不得食”的口号，被新的“苏维埃”秩序扭曲成了“一切为了政委”。留给工人、农民与劳动知识分子的，只有在监狱般的环境里，从事着沉闷无尽的苦役。

局势已变得不堪忍受，革命的喀琅施塔得率先打碎了这座监狱的锁链与铁栏。它为另一种社会主义而战，为劳动者的苏维埃共和国而战——在这样的共和国中，生产者本人将成为唯一的主人，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劳动产品。

## 注释性参考文献

### 档案资料 (ARCHIVES)

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与东欧历史文化档案馆 (Archive of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History and Cul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俄罗斯全国委员会 (Russian National Committee) 档案藏有《关于组织喀琅施塔得起义的秘密备忘录》(Dokladnaia zapiska po voprosu ob organizatsii vosstaniia v Kronshtadte) 及其他反映起义前后流亡者活动的史料。此外，本馆还收录了俄国同时代人士撰写的、与喀琅施塔得事件相关的珍贵回忆录与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包括：

1. 格·阿·切列尚斯基 (G. A. Cheremshansky) : 《1921年2月28日—3月18日喀琅施塔得起义》(Kronshtadtskoe vosstanie, 28 fevralia-18 marta 1921)

2. 德·达拉甘 (D. Daragan)、尼·日古列夫 (N. Zhigulev) : 《1921年喀琅施塔得起义》(Kronshtadtskoe vosstanie 1921 g.)

3. 《一名 1914 年服役水兵的回忆》（K vospominaniiam matrosa sluzhby 1914 goda）

4. 《喀琅施塔得起义期间彼得格勒的事态发展》（Khod sobytii v Petrograde vo vremia Kronshtadtskogo vosstaniia），1921 年 3 月

5. 《关于彼得格勒破获反苏维埃政权阴谋案》（O raskrytom v Petrograde zagovorov protiv Sovetskoii vlasti），契卡主席团（Presidium of Vecheka），1921 年 8 月 29 日

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米·尼·吉尔斯（M. N. Giers）、弗·阿·马克拉科夫（V. A. Maklakov）、叶·康·米勒将军（General E. K. Miller）、巴·尼·弗兰格尔男爵（Baron P. N. Wrangel）的档案中存有大量相关史料，尤为重要的有：

1. 吉尔斯档案（Giers Archives）：

◦ 德·德·格林姆教授（Professor D. D. Grimm）致吉尔斯信函，1921 年 3 月 15 日、31 日

◦ 格·弗·蔡德勒教授（Professor G. F. Tseidler）致俄国

红十字会 (Russian Red Cross) 主席信函，1921 年 3 月 20 日

。斯·米·佩特里琴科 (S. M. Petrichenko) 等人致格林姆教授、弗兰格尔将军信函，1921 年 5 月 31 日

2. 米勒档案 (Miller Archives) : 《喀琅施塔得起义的爆发经过》 (Kak nachalos' vosstanie v Kronshtadte) , 1921 年 3 月 12 日

3. 胡佛图书馆综合馆藏 (general collection of the Hoover Library) :

。《对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 (“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水兵科文科、卡尔片科、阿尔希波夫) 的采访》 (Interv'iu s chlenami Vremennogo Revoliutsionnogo Komiteta (s matrosami "Petropavlovska" Iakovlenko, Karpenko i Arkhipovym))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起因、诱因、经过与评价》 ( Prichiny, povody, techenie i otsenka Kronshtadtskikh sobytii)

。《1921 年 4 月 12 日彼得格勒来电：喀琅施塔得及起义余波》 ( Svedeniia iz Petrograda ot 12 apreliia: Kronshtadt i otgoloski ego vosstaniia) , 1921 年 4 月 12 日

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档案馆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美国国务院 (State Department) 《1910—1929 年俄苏内政相关档案》 (Records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10-1929) (档案编号: 861.00) 中收录了相关外交文件, 尤以美国驻维堡领事哈罗德·B·夸顿 (Harold B. Quarton) 的翔实电文最为关键, 核心文献包括:

1. 1921 年 4 月 23 日致国务卿两份报告: 《对喀琅施塔得起义的外部援助分析》 (Analysis of Foreign Assistance Rendered to the Cronstadt Revolution)、《喀琅施塔得事件的起因、经过与结果》 (Cause, Progress and Results of Cronstadt Events) (档案号: 861.00/8619)

2. 美国记者埃德蒙·斯特拉顿 (Edmond Stratton) 在芬兰对佩特里琴科的采访, 1921 年 3 月 19 日 (收录于夸顿 1921 年 4 月 9 日致国务卿函, 档案号: 861.00/8470)

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 (The Trotsky Archives, Harvard University)

遗憾的是, 本馆仅存一份与喀琅施塔得起义直接相关的文献: 1921 年 3 月 15 日托洛茨基 (Trotsky) 致列宁 (Lenin) 的电报 (档案编号: T 647), 内容为澄清“关于喀琅施塔得的

不实传言”；但藏有多份同期农民起义的一手报告。

除上述档案外，巴黎私人收藏的德·德·格林姆教授（Professor D. D. Grimm）档案亦具有重要价值，尤其记载了起义期间及起义后流亡者的活动。

书籍、小册子与文章（BOOKS, PAMPHLETS, AND ARTICLES）

阿布拉莫维奇，拉斐尔·R.（Abramovitch, Raphael R.）《苏维埃革命，1917—1939》（The Soviet Revolution, 1917-1939）。纽约，1962年。孟什维克重要人物撰写的颇具价值的研究著作。

亚历山大，亨特（Alexander, Hunter.）《1921年喀琅施塔得起义与斯特凡·佩特里琴科》（The Kronstadt Revolt of 1921 and Stefan Petrichenko）。《乌克兰季刊》（Ukrainian Quarterly）第23卷，1967年秋刊，第255—263页。

《安东诺夫运动》（Antonovshchina）。坦波夫，1923年。收录关于安东诺夫运动的文章与史料，极具价值。

安魏勒，奥斯卡（Anweiler, Oskar.）《俄国苏维埃运动，1905—1921》（Die Ratebewegung in Russland, 1905-1921）。莱顿，1958年。苏维埃研究的开创性著作。

阿夫里奇，保罗 (Avrich, Paul.) 《布尔什维克革命与俄国工业中的工人监督》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nd Workers' Control in Russian Industry)。《斯拉夫评论》 (Slavic Review) 第22卷，1963年3月刊，第47—63页。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The Russian Anarchists)。普林斯顿，1967年。

巴拉巴诺夫，安杰丽卡 (Balabanoff, Angelica.) 《列宁印象记》 (Impressions of Lenin)。安阿伯，1964年。

——《我的叛逆人生》 (My Life as a Rebel)。纽约，1938年。共产国际首任书记的回忆录。

《波罗的海水兵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筹备与开展》 (Baltiiskie moriaki v podgotovke i provedenii Velikoi Oktiabr'skoi sotsialisticheskoi revoliutsii)。莫尔德维诺夫 (R. N. Mordvinov) 编。莫斯科，1957年。

《十月革命与内战中的波罗的海舰队》 (Baltiiskii flot v Oktiabr'skoi revoliutsii i grazhdanskoi voine)。德列津 (A. K. Drezen) 编。列宁格勒，1932年。

巴尔明，亚历山大 (Barmine, Alexander.) 《幸存者》 (One Who Survived)。纽约，1945年。

贝克曼，亚历山大 (Berkman, Alexander.) 《反高潮》

(The "Anti-Climax")。柏林，1925年。贝克曼日记《布尔什维克神话》的终章。

——《布尔什维克神话（1920—1922年日记）》（The Bolshevik Myth (Diary 1920-1922)）。纽约，1925年。喀琅施塔得起义期间身处彼得格勒的著名无政府主义者的详实回忆录。

——《喀琅施塔得起义》（The Kronstadt Rebellion）。柏林，1922年。从无政府主义视角对起义的简要而重要的记述。

波格丹诺夫，阿·瓦。（Bogdanov, A. V.）《1917年的波罗的海水兵》（Moriaki-baltiitsy v 1917 g.）。莫斯科，1955年。

波格丹诺夫，米·阿。（Bogdanov, M. A.）《1921年西西伯利亚富农—社会革命党叛乱的镇压》（Razgrom zapadnosibirskogo kulatsko-eserovskogo miatezha 1921 g.）。秋明，1961年。

博尔金，皮·伊。（Boldin, P. I.）《孟什维克与喀琅施塔得叛乱》（Men'sheviki v Kronshtadtskom miatezhe）。

《红色编年史》（Krasnaia Letopis'），1931年第3期，第5—31页。

布劳德，R.P.、克伦斯基，A.F.（Browder, R. P. and A.

F. Kerensky) 编。《俄国临时政府，1917》(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1917)。全3卷，斯坦福，1961年。

邦扬，詹姆斯 (Bunyan, James.) 《苏联国家强制劳动的起源，1917—1921：文献与史料》(The Origin of Forced Labor in the Soviet State, 1917-1921: Documents and Materials)。巴尔的摩，1967年。

卡尔，爱德华·哈利特 (Carr, Edward Hallett.) 《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全3卷，纽约，1951—1953年。对喀琅施塔得着墨不多，但为研究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理论与实践的里程碑式著作。

卡罗尔，E.马尔科姆 (Carroll, E. Malcolm.) 《苏维埃共产主义与西方舆论，1919—1921》(Soviet Communism and Western Opinion, 1919-1921)。查珀尔希尔，1965年。

钱伯林，威廉·亨利 (Chamberlin, William Henry.) 《俄国革命，1917—1921》(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1921)。全2卷，纽约，1935年。俄国革命史的经典著作，出版三十余年后仍具价值。

西利加，安东 (Ciliga, Anton.) 《喀琅施塔得起义》

(The Kronstadt Revolt)。伦敦，1942年。简要而深刻的分析著作。

科恩，诺曼 (Cohn, Norman.) 《种族灭绝的凭据》 (Warrant for Genocide)。伦敦，1967年。

克罗斯曼，理查德 (Crossman, Richard.) 编。《失败的上帝》 (The God That Failed)。纽约，1950年。

达林，戴维、尼古拉耶夫斯基，鲍里斯 (Dallin, David and Boris Nicolaevsky.) 《苏俄的强制劳动》 (Forced Labor in Soviet Russia)。纽黑文，1947年。

丹，费·伊. (Dan, F. I.) 《两年漂泊 (1919—1921)》 (Dva goda skitanii (1919-1921))。柏林，1922年。起义期间被囚禁于彼得格勒的孟什维克核心人物的重要回忆录。

丹尼尔斯，罗伯特·V. (Daniels, Robert V.) 《革命的良知：苏俄共产党内的反对派》 (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Communist Opposition in Soviet Russia)。马萨诸塞州剑桥，1960年。研究苏共内部反对派运动的重要著作。

——《1921年喀琅施塔得起义：革命动力学研究》 (The Kronstadt Revolt of 1921: A Study in the Dynamics of Revolution)。《美国斯拉夫与东欧评论》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第10卷，1951年12

月刊，第 241—254 页。颇具价值的论文。

德格拉斯，简 (Degras, Jane.) 编。《共产国际，1919—1943》 (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全 3 卷，伦敦，1956—1965 年。

《俄共 (布) 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 年 3 月》 (Desiatyi s"ezd RKP(b), mart 1921 goda) 。莫斯科，1963 年。喀琅施塔得起义期间于莫斯科召开的、极具戏剧性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多伊彻，艾萨克 (Deutscher, Isaac) 《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1879—1921》 ( The Prophet Armed: Trotsky 1879-1921) 。纽约，1954 年。经典三卷本传记的第一部。

——《苏联工会》 (Soviet Trade Unions) 。伦敦，1950 年。对 1920—1921 年工会争论有精彩的简要论述。

杜瓦，玛格丽特 (Dewar, Margaret) 《苏联的劳工政策，1917—1928》 ( Labour Policy in the USSR, 1917-1928) 。伦敦，1956 年。

杜克斯，保罗 (Dukes, Paul) 《赤色黄昏与翌日》 (Red Dusk and the Morrow) 。纽约，1922 年。

——《“ST 25”的故事》 (The Story of "ST 25") 。伦敦，1938 年。

季边科，彼·叶. (Dybenko, P. E.) 《从沙皇舰队深处走向伟大十月》 (Iz nedr tsarskogo flota k velikomu Oktiabriu) 。莫斯科，1928年。

埃里克森，约翰 (Erickson, John) 《苏联最高统帅部》 (The Soviet High Command) 。伦敦，1962年。关于苏联武装力量诞生的杰出史学著作。

法因索德，默尔 (Fainsod, Merle) 《苏联统治下的斯摩棱斯克》 (Smolensk under Soviet Rule) 。马萨诸塞州剑桥，1958年。

费代利，乌戈 (Fedeli, Ugo) 《从乌克兰农民起义到喀琅施塔得暴动》 (Dalla insurrezione dei contadini in Ucraina alla rivolta di Cronstadt) 。米兰，1950年。

费舍尔，路易斯 (Fischer, Louis) 《国际事务中的苏联》 (The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全2卷，普林斯顿，1951年。

费希尔，哈罗德·H. (Fisher, Harold H.) 《苏俄饥荒，1919—1923》 (The Famine in Soviet Russia, 1919-1923) 。纽约，1927年。

弗列罗夫斯基，伊·彼. (Flerovskii, I. P.) 《1917年布尔什维克化的喀琅施塔得（亲历回忆）》 (Bol'shevistskii Kronshtadt v 1917 godu (po lichnym

vospominaniiam))。列宁格勒，1957年。

——《七月的政治教训》（Iiul'skii politicheskii urok），《无产阶级革命》（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1926年第7期，第57—89页。

——《1918年10月14日彼得格勒被动员水兵的哗变》（Miatezh mobilizovannykh matrosov v Peterburge 14 oktiabria 1918 g.），《无产阶级革命》（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1926年第8期，第218—237页。对1921年兵变前史的揭示性研究。

金科娜，叶·波。（Genkina, E. B.）《苏维埃国家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1921—1922）》（Perekhod Sovetskogo gosudarstva k novoi ekonomicheskoi politike (1921-1922)）。莫斯科，1954年。

——《弗·伊·列宁与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V. I. Lenin i perekhod k novoi ekonomicheskoi politike），《历史问题》（Voprosy Istorii），1964年第5期，第3—27页。

戈德曼，埃玛（Goldman, Emma）《我的生活》（Living My Life）。纽约，1931年。著名无政府主义者的经典自传，包含对喀琅施塔得起义的生动记述。

——《托洛茨基抗议得太过了》（Trotsky Protests Too Much）。格拉斯哥，1938年。就喀琅施塔得事件对托洛茨基

的回应。

戈林科夫，德·勒. (Golinkov, D. L.) 《粉碎苏俄境内革命据点》 ( Razgrom ochagov vnutrennei kontrrevoliutsii v Sovetskoï Rossii ) , 《历史问题》 (Voprosy Istorii) , 1968年第1期, 第133—149页。

《对苏俄无政府主义的迫害》 ( Goneniia na anarkhizm v Sovetskoï Rossii ) 。柏林, 1922年。

《内战, 1918—1921》 ( Grazhdanskaia voïna, 1918-1921 ) 。全3卷, 莫斯科, 1928—1930年。第1卷载有布尔什维克军事领导人乌里茨基 (S. Uritsky) 关于进攻喀琅施塔得的文章, 附实用军事地图。

英国《英国外交政策文件, 1919—1939》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第一辑, 第12卷, 伦敦, 1962年。

亚尔丘克, 叶. (Iarchuk, E.) 《俄国革命中的喀琅施塔得》 (Kronshtadt v russkoï revoliutsii) 。纽约, 1923年。无政府主义者对1917年喀琅施塔得的记述。

《全俄非常委员会历史资料集, 1917—1921》 (Iz istorii Vserossiiskoi chrezvychainoi komissii, 1917-1921 gg. Sbornik dokumentov) 。莫斯科, 1958年。

《坦波夫农民如何为自由而战》（Kak tambovskie krestiane boriatsia za svobodu）。出版地不详，1921年。坦波夫农民起义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小册子。

卡特科夫，乔治（Katkov, George）《喀琅施塔得起义》（The Kronstadt Rising），《圣安东尼文集》（St. Antony's Papers）第6辑，伦敦，1959年，第9—74页。开拓性研究。

科甘，弗。（Kogan, F.）《1905—1906年的喀琅施塔得》（Kronshtadt v 1905-1906 gg.）。莫斯科，1926年。

科尔宾，伊·恩。（Kolbin, I. N.）《从二月到科尔尼洛夫事件时期的喀琅施塔得》（Kronshtadt ot fevralia do kornilovskikh dnei），《红色编年史》（Krasnaia Letopis'），1927年第2期，第134—161页。

——《1917年的喀琅施塔得》（Kronshtadt v 1917 godu）。莫斯科，1932年。

柯伦泰，亚历山德拉（Kollontai, Alexandra）《俄国的工人反对派》（The Workers' Opposition in Russia）。芝加哥，1921年。

科拉布廖夫，尤。（Korablev, Iu.）《1905—1906年波罗的海革命起义》（Revoliutsionnye vosstaniia na Baltike v 1905-1906 gg.）。列宁格勒，1956年。

科尔纳托夫斯基，尼·阿. (Kornatovskii, N. A.) 编《喀琅施塔得叛乱：论文、回忆录与文献集》(Kronshtadtskii miatezh: sbornik statei, vospominanii i dokumentov)。列宁格勒，1931年。研究此次起义的基础史料与回忆录汇编。

克里茨曼，勒·恩. (Kritsman, L. N.) 《伟大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Geroicheskie period velikoi russkoi revoliutsii)。第2版，莫斯科，1926年。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深入研究。

《喀琅施塔得：简明指南》(Kronshtadt: kratkii putevoditel')。维诺库罗夫 (I. P. Vinokurov) 等编。列宁格勒，1963年。

《1906年喀琅施塔得起义》(Kronshtadtskoe vosstanie 1906 g.)，《红色档案》(Krasnyi Arkhiv)，1936年第4期，第91—116页。

《喀琅施塔得起义，1921—1956》(Kronshtadtskoe vosstanie, 1921-1956)。柏林，1956年。学术价值极低。

库兹明，米. (Kuz'min, M.) 《喀琅施塔得叛乱》(Kronshtadtskii miatezh)。列宁格勒，1931年。通俗史学著作，对专业研究者参考价值有限。

库兹涅佐夫，弗. (Kuznetsov, V.) 《政治工作者回忆录》(Iz vospominanii politrabotnika)。莫斯科，1930年。

拉扎列维奇 (Lazarevich, 佚名) 《喀琅施塔得起义》 (Kronshtadtskoe vosstanie) , 《斗争》 (Bor'ba) , 1921年第1—2期, 第3—8页。社会革命党视角的有益分析。

莱特斯, K. (Leites, K.) 《俄国近期经济发展》 (Recent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Russia) 。伦敦, 1922年。

列宁, 弗·伊. (Lenin, V. I.) 《列宁全集》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第5版, 55卷, 莫斯科, 1958—1965年。

连茨涅尔, 勒·阿. (Lentsner, L. A.) 《1905—1906年的喀琅施塔得：回忆录》 (Kronshtadt v 1905-1906 gg.: vospominaniia) 。莫斯科, 1956年。

列奥尼多夫, 奥. (Leonidov, O.) 《肃清喀琅施塔得叛乱 (1921年3月)》 (Likvidatsiia Kronshtadtskogo miatezha (mart 1921 g.)) 。莫斯科, 1939年。斯大林主义宣传小册子。

利德尔·哈特, B.H. (Liddell Hart, B. H.) 编《红军》 (The Red Army) 。纽约, 1956年。

卢科姆斯基, 阿·斯. (Lukomskii, A. S.) 《回忆录》 (Vospominaniia) 。2卷, 柏林, 1922年。

卢列，米·勒. (Lur'e, M. L.) 编《1917年七月事件中的喀琅施塔得水兵》(Kronshtadtskie moriaki v iiul'skom vystuplenii 1917 goda)，《红色编年史》(Krasnaia Letopis')，1932年第3期，第76—105页。

——《苏俄与白俄文献报刊中的1921年喀琅施塔得叛乱》(Kronshtadtskii miatezh 1921 goda v Sovetskoii i beloi literature i pechati)，《红色编年史》，1931年第2期，第225—240页。有用的文献综述。

——《列宁著作中对喀琅施塔得叛乱的评价》(Otsenka Kronshtadtskogo miatezha v proizvedeniakh V. I. Lenina)，《红色编年史》，1931年第3期，第166—175页。列宁关于起义的论述。

麦克唐纳，德怀特 (Macdonald, Dwight.) 《再论喀琅施塔得》(Kronstadt Again)，《新国际》(The New International)，1939年10月，第315—316页。

——《再一次：喀琅施塔得》(Once More: Kronstadt)，《新国际》，1938年7月，第212—214页。对托洛茨基的尖锐回应。

马赫诺，尼·伊. (Makhno, N. I.) 《纪念喀琅施塔得起义》(Pamiati Kronshtadtskogo vosstaniia)，《劳动事业》(Delo Truda)，1926年第10期，第3—4页。

马克西莫夫，格·彼. (Maximoff, G. P.) 《运转中的断头台》(The Guillotine at Work)。芝加哥，1940年。

梅德韦杰夫，弗·康. (Medvedev, V. K.) 《1917年七月日子里的喀琅施塔得》(Kronshtadt v iiul'skie dni 1917 goda)，《历史札记》(Istoricheskie Zapiski)，第42辑，1953年，第262—275页。

梅特，伊达 (Mett, Ida.) 《喀琅施塔得公社：苏维埃的血色黄昏》(La Commune de Cronstadt: Crepuscule sanglant des Soviets)。巴黎，1949年。无政府主义视角下简明、翔实且富有洞察力的史著。英文节译本：《喀琅施塔得公社》(The Kronstadt Commune)，伦敦，1967年，团结出版社。

米留科夫，巴·恩. (Miliukov, P. N.) 《俄国的今天与明天》(Russia Today and Tomorrow)。纽约，1922年。

莫里泽，安德烈 (Morizet, Andre.) 《在列宁与托洛茨基那里：莫斯科1921》(Chez Liline et Trotski, Moscou 1921)。巴黎，1922年。

涅斯特罗耶夫，格. (Nestrov, G.) 《最高纲领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Maksimalizm i bol'shevizm)。莫斯科，1919年。

尼库林，勒·弗. (Nikulin, L. V.) 《图哈切夫斯基》

(Tukhachevskii)。莫斯科，1964年。

《西北政府的成立》（Obrazovanie severo-zapadnogo Pravitel'stva），《俄国革命档案》（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第1辑，1922年，第295—308页。

《十月风暴（1917年波罗的海水兵）》（Oktiabr'skii shkval {Moriaki Baltiiskogo flota v 1917 godu}）。库杰利（P. F. Kudelli）、叶戈罗夫（I. V. Egorov）编。列宁格勒，1927年。

奥辛斯基，尼。（Obolenskii, V. V., 笔名 Osinskii, N.）《国家对农民经济的调节》（Gosudarstvennoe regulirovanie krest'ianskogo khoziaistva）。莫斯科，1920年。

帕尔维拉赫蒂，温托（Parvilahti, Unto.）《贝利亚的花园：苏联乌托邦里的苦役犯经历》（Beria's Gardens: A Slave Laborer's Experiences in the Soviet Utopia）。纽约，1960年。

皮尔斯，布赖恩（Pearce, Brian.）《1921年及相关事件》（1921 and All That），《劳工评论》（Labour Review），第5卷，1960年10—11月，第84—92页。

佩特拉什，弗·弗。（Petrash, V. V.）《为十月胜利而斗争

的波罗的海水兵》(Moriaki Baltiiskogo flota v bor'be za pobedu Oktiabria)。列宁格勒，1966年。

佩特里琴科，斯·米。(Petrichenko, S. M.) 《论喀琅施塔得起义的原因》(O prichinakh Kronshtadtskogo vosstaniia)，《战斗旗帜》(Znamia Boffy)，1925年12月—1926年1月，第14—15期，第4—8页。

——《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真相》(Pravda o Kronshtadtskikh sobytiakh)。出版地不详，1921年。

本篇与上一篇均为起义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记述。

彼得罗夫-斯基塔莱茨，叶。(Petrov-Skitaletz, E.) 《关于建立自由俄国政府的喀琅施塔得纲领》(The Kronstadt Thesis for a Free Russian Government)。纽约，1964年。

波利亚科夫，尤·阿。(Poliakov, Iu. A.) 《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与苏维埃农民》(Perekhod k NEPu i Sovetskoe krest'ianstvo)。莫斯科，1967年。内容翔实，研究起义时期俄国农民状况。

波拉克，伊曼纽尔(Pollack, Emanuel.) 《喀琅施塔得起义》(The Kronstadt Rebellion)。纽约，1959年。大量借鉴贝克曼及其他少量著作。

《喀琅施塔得真相报》(Pravda o Kronshtadte)。布拉格，1921年。最重要史料，收录起义者日报全部期数。

普罗科波维奇，斯·恩。(Prokopovitch, S. N.) 《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状况》(The Economic Condition of Soviet Russia)。伦敦，1924年。

普霍夫，阿·斯。(Pukhov, A. S.) 《保卫彼得格勒的波罗的海舰队(1919年)》(Baltiiskii flot na zashchite Petrograda (1919 g.))。莫斯科，1958年。

——《1921年喀琅施塔得叛乱》(Kronshtadtskii miatezh v 1921 g.)。列宁格勒，1931年。苏联方面最佳记述。曾以略有不同的形式在1930—1931年《红色编年史》连载。

普霍夫，格·斯。(Pukhov, G. S.) 《彼得格勒如何武装》(Kak vooruzhalsia Petrograd)。莫斯科，1933年。

拉比诺维奇，斯·叶。(Rabinovich, S. E.) 《1921年喀琅施塔得前线的俄共(布)十大代表》(Delegaty 10-go s"ezda RKP(b) pod Kronshtadtom v 1921 godu)，《红色编年史》(Krasnaia Letopis')，1931年第2期，第22—55页。

拉比诺维奇，亚历山大(Rabinowitch, Alexander.) 《革命序曲：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与1917年七月起义》

(Prelude to Revolution: The Petrograd Bolsheviks and the July 1917 Uprising)。布卢明顿，1968年。

《流亡社会革命党人的活动》(Rabota eserov zagranitsej)。莫斯科，1922年。收录流亡社会革命党人为起义者筹款的信件。

拉菲伊尔，米·阿。(Rafail, M. A.) 《喀琅施塔得叛乱（一名政治工作者的日记）》(Kronshtadtskii miatezh (Iz dnevnika politrabotnika))。出版地不详[哈尔科夫]，1921年。俄共十大自愿前往喀琅施塔得前线代表的回忆录。

拉斯科尔尼科夫，费·费。(Raskol'nikov, F. F., 笔名 H'in) 《1917年的喀琅施塔得与彼得格勒》(Kronshtadt i Piter v 1917 godu)。莫斯科，1925年。

罗京，伊·彼。(Rotin, I. P.) 《党史一页》(Stranitsa istorii partii)。莫斯科，1958年。

夏皮罗，伦纳德(Schapiro, Leonard.) 《苏联共产党》(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纽约，1960年。苏共通史最佳著作。

——《共产主义专制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Communist Autocracy)。马萨诸塞州剑桥，1956年。杰出著作，对起义有精彩简要分析。

朔伊尔，格奥尔格 (Scheuer, Georg.) 《从列宁到.....? 一场反革命的历史》 (Von Lenin bis . . . ? Die Geschichte einer Konterrevolution) 。维也纳，1954年。

塞尔日，维克多 (Serge, Victor.) 《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1901—1941》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1901-1941) 。彼得·塞奇威克译编。伦敦，1963年。对起义持同情批评立场的引人入胜的回忆录。

——《再一次：喀琅施塔得》 (Once More: Kronstadt) ，《新国际》 (The New International) ，1938年7月，第211—212页。

——《回应托洛茨基》 (Reply to Trotsky) ，《新国际》 ，1939年2月，第53—54页。

舍洛夫，阿·弗. (Shelov, A. V.) 《喀琅施塔得要塞史略》 (Istoricheskii ocherk kreposti Kronshtadt) 。喀琅施塔得，1904年。详细记述喀琅施塔得早期历史。

辛格尔顿，塞思 (Singleton, Seth.) 《坦波夫起义 (1920—1921) 》 (The Tambov Revolt (1920-1921)) ，《斯拉夫评论》 (Slavic Review) ，第25卷，1966年9月，第497—512页。

斯列普科夫，阿. (Slepkov, A.) 《喀琅施塔得叛乱》 (Kronshtadtskii miatezh) 。莫斯科，1928年。

史密斯，J·杰伊 (Smith, C. Jay.) 《芬兰与俄国革命，1917—1922》 (Finland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1922)。佐治亚州雅典，1958年。

索菲诺夫，彼·格. (Sofinov, P. G.) 《历史转折 (向新经济政策过渡) 》 (Istoricheskii povorot (perekhod k novoi ekonomicheskoi politike))。莫斯科，1964年。

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联盟 (Soiuz S-R Maksimalistov)。《论工人监督》 (O rabochem kontrole)。莫斯科，1918年。

——《劳动苏维埃共和国》 (Trudovaia sovetskaia respublika)。莫斯科，1918年。

施泰因贝格，伊·恩. (Steinberg, I. N.) 《当我任人民委员时》 (Als ich Volkskommissar war)。慕尼黑，1929年。

——《在革命的熔炉中》 (In the Workshop of the Revolution)。纽约)。苏哈诺夫，尼·尼. (Sukhanov, N. N.) 《1917年俄国革命》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乔尔·卡迈克尔编译。纽约，1955年。

托多尔斯基，阿·伊. (Todorskii, A. I.)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 (Marshal Tukhachevskii)。莫斯科，1963年。

特里福诺夫，伊·亚. (Trifonov, I. Ia.) 《新经济政策初

期苏联的阶级与阶级斗争（1921—1923）》（Klassy i klassovaia bor'ba v SSSR v nachale nepa (1921-1923 gg.))。第1卷：《反击富农武装反革命》。列宁格勒，1964年。附有1920—1922年农民起义的完整文献述评。

托洛茨基，列·达。(Trotsky, L. D.) 《再论平定喀琅施塔得》(Eshche ob usmirenii Kronshtadta)，《反对派公报》(Biulleten' Oppozitsii)，1938年10月，第10页。英译文《再论镇压喀琅施塔得》(More on the Suppression of Kronstadt)，《新国际》(The New International)，1938年8月，第249—250页。

——《革命是如何武装起来的》(Kak vooruzhalas' revoliutsiia)。3卷分5册，莫斯科，1923—1925年。

——《被背叛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纽约，1937年。

——《围绕喀琅施塔得的喧嚣》(Shumikha vokrug Kronshtadta)，《反对派公报》，1938年5—6月，第22—26页。英译文《喀琅施塔得风波》(Hue and Cry Over Kronstadt)，《新国际》，1938年4月，第103—106页。本篇与第一篇为托洛茨基为自己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的角色辩护。

——《斯大林：评其人及其影响》(Stalin: An

Appraisal of the Man and His Influence) 。纽约，1946年。

蔡德勒，格。(Tseidler, G.) 《论彼得格勒的供应》(O snabzhenii Peterburga) 。维堡，1921年。

图哈切夫斯基，米·尼。(Tukhachevskii, M. N.) 《镇压反革命起义》(Bor'ba s kontrrevoliutsionnymi vosstaniiami) ，《战争与革命》(Voina i Revoliutsiia) ，1926年第8期，第3—15页。关于镇压安东诺夫起义。

瓦尔金，伊。(Vardin, I.) 《革命与孟什维主义》(Revoliutsiia i men'shevizm) 。莫斯科，1925年。

《在革命烈火中》(V ogne revoliutsii) 。古尔维奇(L. Gurvich) 编。莫斯科，1933年。

《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的海军士兵，1905—1907》(Voennye moriaki v period pervoi russkoi revoliutsii, 1905-1907 gg.) 。奈达(S. F. Naida) 编。莫斯科，1955年。

《1905—1906年波罗的海武装起义》(Voennye vosstaniia v Baltike v 1905-06 gg.) 。德列津(A. K. Drezen) 编。莫斯科，1933年。

沃林(艾肯鲍姆，弗·米。)(Volin [V. M. Eikhenbaum])

《被遗忘的革命（1917—1921）》（La Revolution inconnue (1917-1921)）。巴黎，1947年。含无政府主义视角记述起义的有趣章节。

沃罗涅夫斯基，弗.、亨里克松，尼。（Voronevskii, V. and N. Khenrikson）《喀琅施塔得要塞——列宁格勒的钥匙》（Kronshtadtskaia krepost' — kliuch k Leningradu）。列宁格勒，1926年。

伏罗希洛夫，克·叶。（Voroshilov, K. E.）《从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历史说起》（Iz istorii podavleniia Kronshtadtskogo miatezha），《军事历史杂志》（Voенно-Istoricheskii Zhurnal），1961年第3期，第15—35页。

《第八届全俄工农红军哥萨克苏维埃代表大会》（Vos'mo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rabochikh, krest'ianskikh, krasnoarmeiskikh i kazach'ikh deputatov）。速记报告（1920年12月22—29日）。莫斯科，1921年。

怀特，D·费多托夫（White, D. Fedotoff）《红军的成长》（The Growth of the Red Army）。普林斯顿，1944年。前俄国帝国海军军官的权威著作，史料价值高。对起义军事方面有精彩记述。

沃伦贝格，埃里希 (Wollenberg, Erich) 《红军》 (The Red Army)。伦敦，1938年。

弗兰格尔，巴·恩. (Wrangel, P. N.) 《弗兰格尔将军回忆录》 (The Memoirs of General Wrangel)。伦敦，1930年。

赖特，约翰·G. (Wright, John G.) 《喀琅施塔得真相》 (The Truth About Kronstadt)。纽约，1938年。托洛茨基追随者为布尔什维克辩护的著作。

《五年历程，1917—1922：俄共中央文集》 (Za 5 let, 1917-1922: sbornik Ts.K.R.K.P.)。莫斯科，1922年。

扎科夫希奇，K. (Zhakovskchikov, K.) 《粉碎1921年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叛乱》 (Razgrom Kronshtadtskogo kontrrevoliutsionnogo miatezha v 1921 godu)。列宁格勒，1941年。斯大林主义史学著作。

祖别列维奇，尤. (Zubelevich, Iu.) 《喀琅施塔得：1906年一位女革命者的回忆》 (Kronshtadt: Vospominaniia revoliutsionerki, 1906 god)。喀琅施塔得，出版年代不详。

## 当代报刊与期刊

《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伦敦。

《巴黎回声报》(L'Écho de Paris)。

《俄国之声》(Golos Rossii)。柏林。

《喀琅施塔得市水兵、红军战士与工人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Izvestiia Vremennogo Revoliutsionnogo Komiteta Matrosov, Krasnoarmeitsev i Rabochikh gor. Kronshtadta)。喀琅施塔得。

《彼得格勒工农红军代表苏维埃消息报》(Izvestiia Petrogradskogo Soveta Rabochikh i Krasnoarmeiskikh Deputatov)。彼得格勒。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Izvestiia VTsIK)。莫斯科。

《红色报》(Krasnaia Gazeta)。彼得格勒。

《最高纲领派》(Maksimalist)。莫斯科。

《晨报》（Le Matin）。巴黎。

《人民事业》（Narodnoe Delo）。雷瓦尔。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

《新俄罗斯生活》（Novaia Russkaia Zhizn'）。赫尔辛基。

《新世界》（Novyi Mir）。柏林。

《共同事业》（Obshchee Delo）。巴黎。

《彼得格勒真理报》（Petrogradskaia Pravda）。彼得格勒。

《最新新闻》（Poslednie Novosti）。巴黎。

《真理报》（Pravda）。莫斯科。

《革命俄罗斯》（Revoliutsionnaia Rossiia）。布拉格。

《舵》（Rul'）。柏林。

《社会主义通报》（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柏林。

《泰晤士报》（The Times）。伦敦。

《军事知识》 (Voennoe Znanie) 。莫斯科。

《俄罗斯意志》 (Volia Rossii) 。布拉格。

本书是保罗·阿夫里奇（Paul Avrich）撰写的一本历史书，讲述了 1921 年喀琅施塔得对布尔什维克的叛乱。在 2003 年的那个时代的参考书目中，乔恩·斯梅尔（Jon Smele）将该书归纳为“精通书写”，“唯一完整的，学术的，无党派的关于叛乱的起源，过程和镇压的英语书。”